

1893—1993

毛泽东

大型电视纪录片《毛泽东》

主编 杨伟光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戴联斌
特约编辑:苏 英
装帧设计:阮双庆 尹凤阁
版式设计:若 瞰
责任校对:常再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型电视纪录片《毛泽东》/杨伟光 主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2

ISBN 7-01-002111-2

I. 大…

II. 杨…

III. 电视纪录片—电视文学剧本—中国—现代

IV. I23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14030 号

大型电视纪录片《毛泽东》

DAXING DIANSHI JILUPIAN 《MAO ZEDONG》

杨伟光主编

沈 纪 刘效礼 赵 群 副主编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5 年 3 月第 1 版 1995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5 插页 40

字数:258 千字 印数:1—2000 册

ISBN 7-01-002111-2/A·209

定价:16.00 元

1. 1913年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求学时的毛泽东。



一九一九年毛泽东在长沙。



3. 1920年冬，毛泽东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仰。



一九二五年，毛泽东在广州。



5. 1934年，毛泽东和警卫员在瑞金。



6. 1936年毛泽东在保安。

7. 1937年春,毛泽东和贺子珍在延安。



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在延安给一二〇师干部作报告。





9. 1942年5月,毛泽东和参加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的代表合影。

10. 1943年12月,毛泽东在陈云(中)、林伯渠的陪同下参观陕甘宁边区第三届生产展览会。





11. 1944年11月，毛泽东和朱德在延安会见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赫尔利。

12. 1945年，摄影师吴印咸为毛泽东照像。





13. 1945年8月,为争取国内和平,毛泽东在周恩来等的陪同下亲赴重庆谈判。图为他在延安机场向送行的军民挥帽告别。



14. 1945年8月,毛泽东和蒋介石在重庆谈判期间合影。

15.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飞抵重庆，经过四十三天的艰苦谈判，国共双方代表于10月10日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图为毛泽东10月11日飞回延安后在机场向欢迎的军民发表讲话。



一九四六年，延安军民向毛泽东献金匾。

17. 1946年,毛泽东在延安打乒乓球。



18. 1947年,毛泽东转战陕北。





19. 1947年,毛泽东在野战中。



20. 1948年,毛泽东在西柏坡。



21. 1949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作报告。



22. 1949年4月,毛泽东与毛岸英、刘松林、李讷在香山。



23. 1949年毛泽东在北平。

24. 1949年9月19日，毛泽东邀请部分国民党起义将领和民主人士游览天坛。





25. 1949年,毛泽东在天坛和售货员交谈。

26. 1949年9月30日,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图为政协会议上新疆代表团向他赠献民族服装。





27.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28. 1949年10月20日，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图为毛泽东和部分委员合影。



29. 1949年12月，毛泽东首次出访苏联。

1950年，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



31. 1953年，毛泽东视察
人民海军东海舰队。左一
为罗舜德。



32. 1953年9月,毛泽东和身边工作人员打扑克牌。



33. 1954年5月,毛泽东在故宫城墙上远眺。



34. 1954年6月，
毛泽东和孩子们在
一起。



35. 1954年9月，毛泽东会见西藏
宗教领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
(右)、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
(左)。



37. 1955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



36. 1954年,毛泽东在绍兴。



38. 1955年,毛泽东在南京郊区。

39. 1956年1月12日,毛泽东视察国营南京无线电厂。





40. 1957年5月,毛泽东在北京中山公园和各界青年欢度青年节。

41. 1957年11月16日,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上签字。





42. 1957年,毛泽东
在飞机上学英语。



43. 1958年5月,毛泽东在彭真陪
同下,在北京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
劳动。



44. 1958年6月,毛泽东在中南海观看我国自己研制的武器。

45. 1959年6月,毛泽东回到了阔别三十二年的故乡韶山。图为他在父母墓前鞠躬行礼。



46. 1959年,毛泽东和农家儿童合影。



47. 1959年7月,毛泽东
在庐山水岸游泳。



48. 1960年2月,毛泽东和出席中共中央军委会议的负责人在一起。



49. 1960年，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彭真在一起。



50 一九六一年，毛泽东在上海拜访宋庆龄。



51 一九六四年，毛泽东在北京，济南部队军事训练表演现场。

52. 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



53. 1970年5月2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就是在这一天发表了他著名的“五·二〇”声明。



悼念陈毅同志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日,毛泽东到八宝山参加陈毅追悼会。





55. 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

(以上照片均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提供)

序

逢先知

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1993年12月前后影视界推出了一批表现毛泽东的好作品，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电视台等单位联合摄制的十二集大型电视纪录片《毛泽东》，就是其中之一。

用电视纪实手段比较全面地反映毛泽东同志伟大的一生，《毛泽东》一片开了先河。此片取得了较高的收视率。观众反映，片子虽然只有十个小时的长度，却概括而生动地表现了毛泽东的历史业绩和个性特征，使人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毛泽东，一个伟大的毛泽东。

《毛泽东》一片受到观众的欢迎，得到观众的好评，在社会上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此片表现的毛泽东，是一代历史伟人，他深受人们的爱戴和关注。他的丰功伟绩，他的雄才大略，他的丰采魅力，使他至今具有崇高的威望和地位。尽管他已逝世将近二十年，但依然活在亿万中国人民的心中。因此，只要是正确地真实地描述毛泽东生平业绩的影视片，人们就愿意看，就喜欢看。当《毛泽东》这部电视片播映时，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只要有电视机的家庭和单位，总有一批雷打不动地坚持收看的观众。此片获得如

此高的收视率，正由于它拥有雄厚的群众基础，这是它的得天独厚的条件。

其次，此片以纪实方式来反映毛泽东的生平业绩，是独具特色的，是成功的。该片充分运用了有关毛泽东的纪录影片资料，同时大量使用对当事人或知情人进行现场采访的生动镜头，并配以珍贵的文献资料，这为达到真实的效果创造了基本的条件和良好的氛围。尤其是创作人员坚持了真实性的创作原则，对掌握的素材，认真考究，严加取舍，不仅力避史实的错讹，而且力求还毛泽东以真实面貌。这是这部片子得以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只有真实地反映毛泽东的生平业绩，真实地再现毛泽东的形象，影片才会有最感人的效果，才有生命力。

再次，此片的成功要归于参加创作的各方面同志的紧密合作和艰苦努力。参加摄制这部片子的主要成员有两部分，一是长期从事电视工作的同志，一是长期从事毛泽东研究的同志。这两者配合得比较好，相得益彰，使全片既有一条好的整体思路，保证作品正确把握分寸和有一定历史厚度，并且提供大量的细节和采访线索，又能将好的创作构思转化为好的屏幕形象，充分发挥艺术个性，调动电视手段。有的评论文章已指出这一点，我觉得是有道理的。

《毛泽东》一片的制作，由于时间紧，难度大，还有不足之处。但是总的来说，这次创作为党的文献工作者生动形象地宣传领袖人物开辟了新天地，也为电视工作者用纪实方式塑造领袖人物形象找到了新路子。

早在审片的时候，有的同志就提出要把《毛泽东》一片的文学台本（其中的解说词在一定程度上是关于毛泽东的研究成果）和有关评介文章汇集起来出版，现在这项工作已接近完成。我认为这样做是很好的，这对宣传毛泽东，对广大读者了解和学习毛泽东，都是有益的。是为序。



2. 摄制组在湖南韶山拍摄现场。左一为编导冷治夫，右一为音乐音响总设计包布和，右二为摄影师彭红军。



3. 曾任毛泽东卫士的周福明(中)在向摄制组展示毛泽东的内衣。



4. 摄制组在采访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连(右二)。



5. 摄制组在江西三湾合影。右二为执行总编导崔屹平。



6. 摄制组在江西井冈山与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部分同志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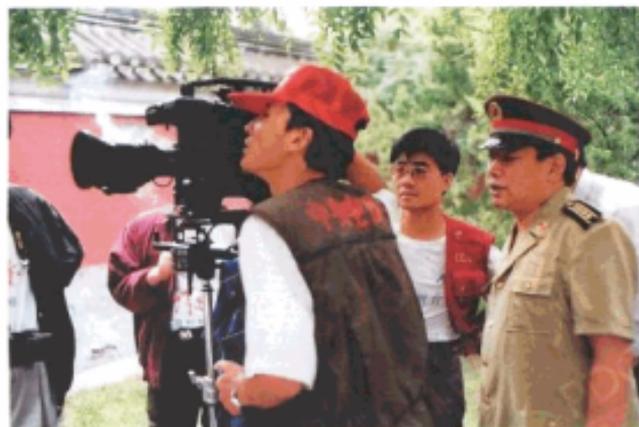
7. 摄制组在江西兴国采访。



8. 摄制组在寻乌采访。左一为编导王益平，左二为录音师王爽，左三为演员吴晓梅。



9. 摄制组在陕北采访。



10. 总编导刘致礼(穿军服者)在中南海拍摄现场。

11. 执行总编导汪莹(中)、陈庆芳(左)在中南海拍摄现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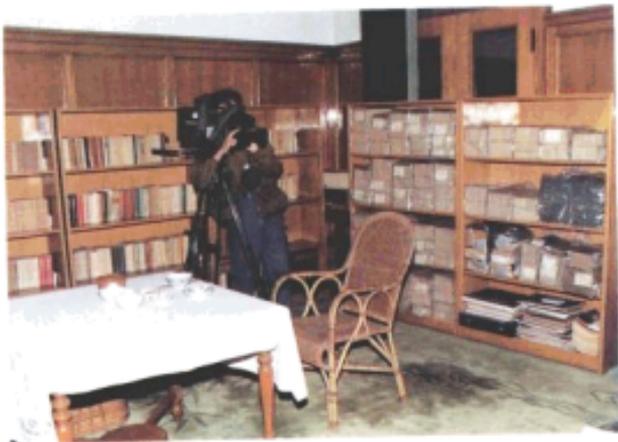


12. 为确保拍摄质量,在中南海的行进拍摄中使用了稳定架。左一为总摄影赵立信,右一为摄影师赵阳,右二为编导褚嘉骅。

13. 周福明(左一)在毛泽东卧室接受采访,右一为制片主任吴文政。



14. 摄影师王沛毅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内拍摄。



15. 编导李安东(左)在中南海游泳池采访毛泽东的保健护士长吴旭君。



16. 总撰稿陈晋和赵忠祥在录音室讨论解说词。

17. 中央电视台台长杨伟光(左)在向薄一波汇报《毛泽东》拍摄情况。



18. 薄一波在审看电视纪录片《毛泽东》。



19. 大型电视纪录片《毛泽东》研讨会会场。



2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逢先知在《毛泽东》研讨会上发言。



21. 毛泽东的部分亲属和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部分同志参观中央电视台时合影。

(以上照片除署名者外,均由《毛泽东》摄制组提供)

目 录

序..... 逢先知 1

《毛泽东》(文学台本)

第一集 丰碑在人民心中.....	3
第二集 历史的选择	19
第三集 曲折之路	36
第四集 艰难的探索	56
第五集 书山有路	75
第六集 大海纳百川	93
第七集 胸中百万兵.....	111
第八集 放眼世界.....	130
第九集 独领风骚.....	148
第十集 到中流击水.....	166
第十一集 领袖家风.....	183
第十二集 晚年岁月.....	200
大型电视纪录片《毛泽东》创作人员名单.....	217

《毛泽东》编导阐述.....	刘效礼 222
历史资料的“活用”.....	汪 恒 223

——大型电视纪录片《毛泽东》创作谈			
把“旧闻”做成“新闻”.....	陈晋	230	
——《毛泽东》创作谈			
用细节塑造典型人物的人格魅力.....	褚嘉骅	236	
——创作《毛泽东》的细节选择与运用			
	杨伟光	逢先知	
新颖·真实·感人.....	刘效礼	赵群	244
——大型电视纪录片《毛泽东》研讨会发言摘录			
出类拔萃之作.....	刘扬体	250	
又一份文献珍品.....	夏之平	256	
——电视纪录片《毛泽东》观后			
历史的另一种笔法.....	王纪言	于爱群	261
深情赞颂《毛泽东》.....	朱羽君	268	
电视纪录片《毛泽东》与电视纪实艺术.....	朱景和	272	
电视纪录片的重大突破.....	仲呈祥	278	
——《毛泽东》启示录			
丰碑植根在人民心中.....			281
——纪录片《毛泽东》观感摘编			
丹心写春秋 精品献人民.....	李德润	李战吉	286
——记大型电视纪录片《毛泽东》摄制组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邵燕君	298	
——大型电视纪录片《毛泽东》精彩内幕			
留下一代人的思考.....	赖仁琼	304	
——大型电视纪录片《毛泽东》拍摄前后			
大型纪录片《毛泽东》的背后.....	汪恒	317	

我们怎样去拍《毛泽东》·····	吴晓梅	327
我用心拍《毛泽东》·····	王沛毅	338
附录：		
外国政治家谈毛泽东·····		343

这是一部伟人的历史。
这是一部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

文学台本

毛泽东

- 第一集 丰碑在人民心中
- 第二集 历史的选择
- 第三集 曲折之路
- 第四集 艰难的探索
- 第五集 书山有路
- 第六集 大海纳百川
- 第七集 胸中百万兵
- 第八集 放眼世界
- 第九集 独领风骚
- 第十集 到中流击水
- 第十一集 领袖家风
- 第十二集 晚年岁月

丰碑在人民心中

大区书记到中南海开会，毛泽东只给每人一碗面条……

——题记

1. 以安塞腰鼓开始，画入实地拍摄的 1993 年各地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的种种活动。

字幕并解说：公元 1993 年，是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全国人民以不同方式，有组织或自发地举行纪念活动，表达他们深深的怀念之情。

2. 毛泽东在陕北旧址的各种镜头。枣园。杨家岭。毛泽东和陕北农民在一起的照片。采访赵子明、杨再林、雷志富、杨步浩之子杨士文。采访吴旭君。

解说：走过万里长征，毛泽东在陕北的黄土高原上生活了十三年。他在窑洞里筹划着天下大事，还经常走出户外同农民聊天，把自己的感情融进了这片土地，留给了这里的老百姓。

赵子明（枣园农民，当年毛泽东邻居）：毛主席说，我在枣园住着，就是枣园一户居民，我这户是个大家业。毛主席说他这个户大。他那户人不是多嘛，他的户大点。

毛主席散步出来，见了老百姓就问天旱不旱，今年收成咋

样,见了农民就讲农民的话。

杨再林(杨家岭农民):这个是我,这个姓冯,这个姓郭,这个姓杨,我也姓杨。当时毛主席说老乡们好,我们说你好。(我们)不知道是主席。李参谋说,这是毛主席。这时群众说,主席好。(毛主席说)你看我不晓得你贵姓,问那姓冯的;我姓冯。(毛主席说)你就是冯异(东汉将军)。(又)问这姓郭的,你贵姓;我姓郭。(毛主席说)你就是郭子仪(唐朝大将)。(又)问这个姓杨的,你贵姓;我姓杨。(毛主席说)你就是杨林(《隋唐演义》中人物)嘛。然后就在这儿照像,那儿照像。照完像以后,(毛主席)说,我们这里人多,你们有意见没有?我们说没意见。

雷志富(枣园农民):1946年农历正月,毛主席说抗日胜利了,要给枣园军功烈属来拜年。那时村政府就在我们现在修的窑洞中间的一个老爷庙里。主席来到以后,就在村政府等了一个小时,把人找到一块儿到了区政府。主席拿来烧酒,拿了几个菜,给军功烈属、干部每人敬酒三杯,祝福大家新年愉快,工作顺利。有一些老年人和军功烈属感动得流泪了。说开天辟地,哪一个领袖给群众来敬酒,好不过,好不过。就是担当不起的意思。主席说好得过嘛!军民是一家人。最后能喝的喝了三杯,不能喝的喝了一杯。

字幕:毛泽东和杨步浩在中南海(1952)

解说:一位普通的农民成了中南海的客人,他就是当年陕甘宁边区的劳动模范杨步浩。在延安,毛泽东和他坦诚相见,结为朋友。大生产运动中,杨步浩看到毛泽东工作繁忙,还亲自开荒种菜,非常感动,几次提出要为毛泽东代耕代交公粮。解放后,他

四次赴京看望毛泽东，毛泽东也托人给他捎过白砂糖和两瓶好酒。

记者：听说你父亲去北京，也带了很多陕北土特产。

杨士文（杨步浩之子）：每次都带延安的特产，绿豆、小米、南瓜、红枣。他把东西一直背在身上，服务员说你咋不放在架上。

冯晓亮（延安地委宣传部干部）：杨老有一次去北京的时候，带了很多土特产，到了火车上，东西一直在身上抱着，或扛在背上。列车员觉得奇怪，这东西咋不往行李架上放。后来杨老说，这是送给主席的东西，不能随便放。列车员知道这情况后，专门给他安排了一个卧铺，把他的东西专门保管起来。

杨士文：主席的卧车请，卧车送。

杨士文：（到了北京）主席还请我爸爸吃饭，一顿吃八个馍。

记者：八个馍，就是我们北京的八个大馒头。一顿吃八个，主席一定很高兴。

杨士文：主席说：“吃得好。”

吴旭君（曾任毛泽东护士长）：主席对党内的高级领导要求非常严格，他总是希望这些负责同志能够像他一样，要求别人做到的事，他们自己也要说到做到，不要脱离群众。在60年代后期的时候，有一次在游泳池（住所），毛主席主持了一次大区书记的会议，这个会开得很热闹，时间开得非常长，快到吃饭的时候，还没散会呢。主席那个时候也该吃东西了。这时候汪东兴同志就去请示主席，说是不是搞点东西给大家吃。主席说，那好啊，不要搞多了，每人吃一碗面条就行了。我当时一听，觉得主席真怪。后来等到散会以后，我看到主席挺高兴的，跟主席开了一个玩笑，

我说主席，今天来开会的，都是一些高级领导同志，到了你的家里你才给他们吃一碗面条，你真太小气了。主席听了我的话，他也笑了，他说正因为他们都是些高级领导同志，平时谁敢让他们饿肚子？总是吃得饱饱的。他说，到了我这里不准吃饱，让他们记住饿肚子是什么滋味。他说官当大了，容易忘了还有受苦的人。

3. 南泥湾，车行进中。大生产运动镜头。毛泽东“自力更生、丰衣足食”题词。采访李志安。

解说：唱了半个世纪的《南泥湾》，把我们带到了“陕北的好江南”。

1941年和1942年，陕甘宁边区在日军野蛮“扫荡”和国民党军队的封锁下，财政经济处在最困难的时期。面对严酷的环境，毛泽东没有从向农民加征公粮找出路。他严厉批评“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需要”的现象，是竭泽而渔，是“国民党的思想，我们决不能承袭”。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他和中央领导亲自动手，带头开荒种地，号召军民大生产。王震将军率领的三五九旅进驻南泥湾，开荒屯田，用自己的双手和汗水，养活了自己，分担了人民的困难，使昔日荒凉的南泥湾变成黄土高原上的一片绿洲。

记者：老大爷，您高寿？

李志安（老红军）：一百零四岁。

记者：您当时在哪个部队？

李志安：三五九旅八团。当时南泥湾没有房子，没有窑洞。盖

房子，挖窑洞，还要开荒。在南泥湾，三大任务都完成了。

解说：三五九旅八团在大生产运动中受过毛泽东的表彰。尽管岁月沧桑，往事如烟，当年“在深山密林安家，向荒山野岭要粮”的火热生活，毛泽东视察南泥湾的情景，依然留在这位老人的记忆中。

4. 陕西安塞县烈士陵园。摄制组献花圈。采访孙恩堂、朱芝富、陈耀。张思德照片。毛泽东在张思德追悼会上讲话照片。张思德塑像。中南海“为人民服务”影壁。

字幕：陕西省安塞县烈士陵园

解说：同无数在战场上、刑场上牺牲的烈士相比，张思德的死似乎有点平凡。但是，张思德的名字，却和他们一样永垂青史。

孙恩堂（张思德生前战友）：张思德同志是替别人牺牲的。别的一个同志负责火窑，火窑不抽烟，往外冒烟了，他就把别的同志拉出来，自己进火窑里面去了。从火窑向外撤的时候，火窑哗地塌下来了，别的同志出去了，把他压里面了。他是这样牺牲的，他替别人死的，所以这个同志伟大就在这儿，明知道是个危险的事，把别人叫出来，把危险留给了自己。他牺牲以后我们这个连队都流泪了。

朱芝富（北京卫戍区某团团长）：在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时候，我们听老首长讲过，当毛主席知道张思德牺牲以后，遗体还埋在炭窑下面，他就指示当时中央警备团的领导，一定要把张思

德同志的遗体挖出来，洗干净，派哨兵看好，不要给狼吃了，要做一口棺材，要开个追悼会，他还要亲自参加。

字幕：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警备团举行的张思德追悼会上作《为人民服务》的讲演。

解说：虽然历史只为我们留下了这张模糊不清的照片，但毛泽东讲话的神态，却清晰地留在当年老战士的心中。

陈耀（张思德生前战友）：毛主席还给张思德同志送了花圈，来的时候看毛主席以悲痛的心情，缓慢的步伐，走上了追悼大会讲台。毛主席作了《为人民服务》的演讲，讲得很动情，还有手势：“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我们记得毛主席还打着手势吹了一下。

解说：毛泽东把深深的敬意献给了一位普通的战士，向世人表明：“为人民服务”是革命者的人生观，是共产主义的最高境界。

从此，“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字广为流传，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旗帜。

5. 航拍的黄土高原。1944年3月《新华日报》。李自成塑像。景山。崇祯皇帝上吊之树。故宫。残月。毛泽东1944年11月21日致郭沫若信手稿。采访黄火青。采访黄大能。毛泽东与黄炎培合影。

解说：毛泽东坚信，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

力，依靠人民，共产党一定能得天下。可是，从山沟走进城市，马背上的共产党人能治天下吗？

抗日战争即将胜利，中国革命也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毛泽东，开始考虑未来。

1944年3月，郭沫若先生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史论文章《甲申三百年祭》，立即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

根据古代天干地支的计年方法，甲子六十年为一个轮回。从1944年回溯五个轮回，三百年前的1644年正是甲申年。这一年，北京城里狂澜迭起，风云突变。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直捣皇宫。崇祯皇帝急忙鸣钟，召集群臣，但无一人入宫。崇祯皇帝见大势已去，便仓皇逃出紫禁城，吊死在景山的一棵歪脖树上。经历了十几年艰辛奋斗的李自成，勒马下鞍，进入皇宫，文臣武将，几十万士兵在城里纵情享乐，只派几千士兵镇守山海关。不料，吴三桂降清，引清军进关，李自成仓促出征，大败而归。四月二十九日被迫离开北京，大顺朝的梦只做了四十一天。

黄火青（曾任延安中央党校秘书长）：报纸上忽然登出来了《甲申三百年祭》，大家一看，不光只是要胜利，胜利以后事还多着呢！胜利以后怎么巩固，这是中央的意见，毛主席的意见。

解说：1944年5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说：近日我们印发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目的是叫同志们引以为戒，不能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黄火青：这篇文章一发表，我认为给充满革命胜利信心的热

情注射了一针清凉剂。

字幕：1945年7月黄炎培等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访问延安。

解说：历史的悲剧发人深省。如何避免，郭沫若没有正面回答。黄炎培，这位清末举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在1945年访问延安时，与毛泽东有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谈话。

黄大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席，黄炎培之子）：这个谈话的内容主要就是我觉得我父亲黄炎培认为，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改朝换代次数很多。开始的时候，都是兴旺发达的，大多得到老百姓的欢迎，而且团结，富有朝气。但是，历代君王到了后期总是懈怠了，松懈下来，脱离了群众，对老百姓处处制造许多麻烦。而在这时候，这些朝代的君王，反而变成一个被革命的对象。这样一段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他归纳为历史上的周期率。这个周期率，就是从兴旺到衰败，“其兴也溥焉，其亡也忽焉”。他请教了毛泽东，你们中共现在在延安，是非常受到老百姓欢迎的，你们和群众真正打成一片，是大有希望的。但是中国这样一部历史的周期率，我想请教毛主席，能不能现在考虑跳出这个周期率，能够保持江山的颜色不变，他的中心意思就是这些。毛泽东当时就回答他了，我们有办法来跳出这个周期率，我们主要用民主来达到这个目的，也就是说，我们要无时无刻，各个阶层，都来接受群众的监督，在群众监督之下工作，不致于发生脱离群众的情况。

6. 七届二中全会历史镜头。采访贺文迅。

贺文迅（西柏坡纪念馆副馆长）：1949年3月5日到13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就在这里开的。毛泽东同志在这个会上作了

极其重要的报告。现在把这个报告概括为“两个务必”、“两个转折”。根据主席的提议,这个会议还作出了六条规定,当时也叫“六约”:一不做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要求我们永远谦虚谨慎,戒骄戒躁,革命到底。这个会议结束后十天,就是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就离开西柏坡,前往北京。在进北京之前,毛泽东同志说过一段话:我们快要进北京了,我们进北京可不是李自成进北京,他们进北京就腐化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京,需要建设社会主义,一直到共产主义,教育大家不要中了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

7. 建国初恢复生产的劳动场面。1951年11月《人民日报》有关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的报道。河北省公安厅、最高人民法院档案库。毛泽东在华北局给中央的报告上的批示。采访刘澜涛。枪决刘青山、张子善的照片。

解说:不是每个干部都能做到不当李自成,也不是每个干部都能保证不被糖衣炮弹击中。建国初,当人民正在为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辛勤工作,勒紧腰带支持抗美援朝时,党内一些干部经不起和平时期的考验,贪图安逸、脱离群众的歪风开始滋生、蔓延,有的甚至走上贪污腐化的犯罪道路。1951年11月,刘青山、张子善特大贪污案被揭发了出来。

字幕:河北省公安厅档案库

刘海陆(河北省公安厅档案科长):这就是我们保存的关于刘青山、张子善的档案材料。这是当时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杨秀

峰给第一任公安厅厅长王光华的亲笔信。这信介绍了案件主要情况，实际上是下达了逮捕令。

这个材料是原件，其他材料我们这里没有，都在省法院，我们这儿保存的就这一份材料。

字幕：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档案库

韩丽（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档案员）：关于刘青山、张子善的案卷材料，在我们这儿保存着两册。1952年我省院做一审案卷：“大贪污犯刘青山，被捕前任中共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大贪污犯张子善，被捕前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该二犯利用职权，于1950年春至被捕前，先后盗窃国家资财总计共达一百七十一亿六千二百七十二万元。”

字幕：折合现在的人民币 1716272 元。

刘澜涛（曾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最令人痛心的是他们把灾民的救济款贪污了，把国家发给修河的好粮食给卖掉，发坏粮食给河工吃，弄得很多人闹病，还有很多事非常令人痛心、气愤。至于腐化、盗窃国家财产，到最后刘青山抽大烟成瘾，腐化堕落，不可挽救。

解说：刘青山、张子善腐化堕落的罪行，令人大为震惊。毛泽东看了华北局的报告后批示：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委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

刘澜涛：虽然他们革命经历久，功劳大，立过功，但中央下决心这样处理。这样处理他们两个人后，二十人，二百人，二千人，二万人就可以避免受到损失。这话都是毛主席当时说的，从二十人到两万人可以得到教育。这事必须这样处理，说到做到，不要遇到自己的问题就躲开了。

字幕：1952年2月10日，刘青山、张子善在河北保定大校场被枪决。

8. 采访吴本瑞。水灾及灾情报告。毛泽东关于治理淮河的四个批示。治淮大场面及歌曲。毛泽东在黄河岸边。几条江河的今日新貌。

吴本瑞(淮河水利委员会总工程师)：淮河在历史上就是一条多灾多难的河道。1950年淮河流域发生了一次大的洪水，当时受灾的面积有四千多万亩，灾民一千三百多万。当时毛主席看到灾区的报告，特别是大水淹了很多的面积，有些群众爬到树上，蛇都上去了。当时毛主席看到这些心情非常沉重，听说当时还掉了眼泪。虽然我们建国刚刚开始，还要抗美援朝，当时毛主席还是决定要治理淮河。从1950年的7月至9月，短短两三个月时间里，毛主席亲自作了四次关于治淮的批示，提出要三省(河南、江苏、安徽)共保，一起动手，要抓紧治淮工程的计划，抓紧施工。

毛主席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指示以后，淮河流域四省人民都沸腾起来了。人山人海，场面非常宏伟，我记得有一首歌反映了当时大家热烈、愉快的心情。我们还可以唱几句，这首

歌的名字叫《淮河两岸鲜花开》。(现场唱歌)。

解说：治理淮河，是新中国治水的第一个战役。之后，毛泽东又向一系列给人民带来过灾难的大江大河发起了挑战，号召亿万人民向大自然进军，掀开了中国历史上一页又一页与天奋斗的壮丽篇章。毛泽东多次听取治理黄河的汇报，研究长江水文资料。他说：“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还提出：“为了广大人民的利益，争取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并号召“一定要根治海河！”毛泽东还在关于兴建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报告上批示：“赞成兴建此坝”。为了造福于人民，毛泽东立下了一个又一个的宏愿。

几十年过去了，我国的江河水系发生了重大变化，防洪排涝的能力大为增强。毛泽东的变水害为水利、造福人民的理想正逐步变为现实。

9. 毛泽东与人民群众在一起。采访高智。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采访原余江县委书记。血吸虫病害镜头。毛泽东给沈钧儒的信。采访徐运北。消灭血吸虫场面。《送瘟神》诗手迹。

解说：风雨同舟，甘苦与共，毛泽东的情感始终和人民连在一起。每闻百姓疾苦，他会不安、忧虑，甚至潸然落泪；而当听到千家万户传喜讯，便兴奋、激动，快慰之极。

高智(曾任毛泽东机要秘书)：那天晚上我们都休息了。主席房间的灯一直亮着。因为从我住的那个房子，可以看到他那个窗户的灯一直亮着，主席晚上还在办公。我以为他在批文件、办公。

第二天早晨天刚亮，他就按电铃，把我叫去，他说：“高智，我很兴奋，我一晚上没睡觉。”我说：“主席你怎么一晚上没睡觉呢？”他说：“头天晚上，看到《人民日报》，报道江西消灭血吸虫病的消息……”

解说：这篇登在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第七版上的报道，为什么会使毛泽东彻夜难眠呢？因为血吸虫病是当时危害着一亿人民生命的大事。

孙永久（曾任江西余江县委书记）：当时形容晚期病人治愈以前，“肚大如鼓，骨瘦如柴，手拿半斤铁（锄头），到了田头就想歇”。因为有病，没有劲呀。

解说：在中国，血吸虫病流行的历史至少有两千多年。从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女尸中就发现了血吸虫卵。

血吸虫病对人危害极大，得了这种病，儿童影响发育，妇女不能生育，青壮年丧失劳动力。这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危害人民最严重的一种疾病。

字幕：沈钧儒（曾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解说：1953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先生在太湖地区发现血吸虫病流行猖獗，写信向毛泽东反映。毛泽东很重视，在回信中指出：血吸虫病危害极大，必须着重防治。

徐运北（曾任卫生部第一副部长、党组书记）：1955年11月，毛主席在杭州召开华东局、中南局第一书记会议，研究农业问题。叫我去汇报血防工作。毛主席问到底有什么办法治疗，我

说现在西医没有什么好办法。毛主席说可以中西医结合嘛，利用科学技术。谈到灭螺，问题非常复杂，水利问题联系的面很广，毛主席提出采取综合措施。当时各部门都在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问卫生部计划怎么样？我们提出十五年基本消灭。毛主席听了后感到很不以为然，他说，社会主义革命完成以后，进行现代化建设，这么大的地区这么多的人，十五年消灭，对农业生产影响太大。回想起来，我们历来没有消灭血吸虫病，没人敢提这个问题。毛主席首先提出要消灭，坚决为人民服务，根据人民的急需，要迎着困难上，战胜自然灾害。怎样消灭法，过去是单搞治疗，毛主席说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毛主席是伟大的领袖，有高度的政治修养，科学的哲学观、世界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毛主席）又是群众中的一员，只有是群众中的一员，才能老老实实地为人民服务。

1955年11月份在杭州开会决定，12月份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在上海召开第一次血防工作会议，成立九人领导小组。1956年、1957年全面展开，1958年就出现了第一个消灭血吸虫病的县江西省余江县。我们可想象毛主席当时特别高兴，余江县能够消灭，其他的县当然也可以相继消灭。

解说：的确，毛泽东此时此刻的心情，正像他在《送瘟神》这首诗的小序中描写的那样：“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

字幕：电影《枯木逢春》中苦妹子的原型

10. 江西庐山毛泽东住过的房间。采访江西省委接待处服务员。

解说：毛泽东认为，在人民中间，只有工作岗位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

晚年毛泽东，最后一次外出是从湖南转道江西返回北京的。

王惠英（江西省委接待处八二八住所服务员）：1975年的时候，主席病得很厉害了，走路都要人搀扶着。快走的时候，有一个场面我一直记得很清楚。我们其他的工作人员都要求见主席一面，但那时主席行动已不太方便了，我们扶他到门厅里面，让他们看一眼就走，我们把他扶到椅子上坐下，这时候他挣扎着要站起来，我们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只好把他扶起来。他慢慢站稳后，刚好我面对着他，他就把我一下推开了。当时我好疑问，这是干什么啊？是不是有什么想法，因他不太说话了。只见他恭恭敬敬地向我们服务员行了一个礼。这下使我们好感动，好感动。面对我敬礼，我受到这个殊荣，确实是对我们服务员一片感激之情。我们深深感到主席相当伟大。他的群众思想、一直跟大家打成一片、关心工作人员值得我们学习，值得我们钦佩。毛主席在那个时候，都想着大家，没有想到他自己。

11. 人民英雄纪念碑。毛泽东为纪念碑奠基。三个为毛泽东塑像、授勋的报告，以及毛泽东在报告上的批示。采访吴旭君。

解说：毛泽东信奉的是人民。他深知人民是历史的主人，是历史的创造者。

这座高耸入云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是毛泽东心中的一块圣地。开国前夜，他铲起第一铲土，把崇高的敬意注入碑底。

人民热爱毛主席，也想授予他荣誉。建国初期，沈阳市政府根据人民的意愿，打算在开国纪念塔上立一尊毛泽东的全身铜像。他闻讯婉言拒绝：铸铜像影响不好，故不应铸。

北京市第三届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要求，在天安门前建立毛泽东大铜像。他在报告上批示：不要这样做。

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的一项提案，要求全国人大授予毛泽东最高荣誉勋章。他又一次拒绝：不要通过此项提案。

吴旭君(曾任毛泽东保健护士长)：记得50年代初期，我跟主席聊天，我称赞主席说，你真伟大啊！主席听了这句话，很慈祥地笑了，他用很平静可又很认真的态度，用夹杂着浓浓的湖南乡音的普通话对我说：这话不能这么讲，有了功劳不要记在一个人的账上，在整个历史中，个人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你可以忘记我，但是，不能忘记那些先烈们。紧接着他就问我，你还记得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是怎么写的吗？我想了一下说，我看过但记不清了。后来他就说，我还是主张像碑文上写的那样来算这笔账。紧接着，他就很流畅地背起碑文(毛泽东讲话原声)：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第二集

历史的选择

邓小平说：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

——题记

1. 1984年10月1日邓小平同志在天安门城楼上讲话。毛主席纪念堂前的人流。

解说：从20世纪初以来，毛泽东这个名字便出现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重要转折关头。时光流逝，岁月不会留住一个伟人的生命，但毛泽东的影响，却始终渗透在我们生活的许多方面。

这座建于1977年5月的纪念堂，从开放那天起，年复一年地向中国人和外国人免费开放。

2. 纪念堂前及其他地方采访领导和群众。

纪念堂前参观群众一：看见毛主席就回想起毛主席在历史上的伟大功绩。所以人民很怀念他。所以我们都怀念他。来北京之后就到这里来，我是第一次瞻仰毛主席遗容。

群众二：这个小家伙是9月9日生的，今年他一周岁。也是纪念毛主席去世十七年了。叫泽西。毛泽东去世是9月9日，他是9月9日生的，所以我们给小孩取名叫泽西，就是为了让别人

忘了毛主席。

群众三：毛主席他创业很难，创建这么大一个国家。

群众四：打得日本帝国主义，打得国民党反动派落花流水，推翻了三座大山。

西藏日喀则牧民：我们西藏人民得到幸福生活，全靠毛主席的恩情。今天能这样高高兴兴地过好日子，全靠毛主席。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热爱、想念毛主席。旧社会苦啊，更加仇恨旧社会，我们在心中感谢毛主席。

薄一波（曾任中顾委副主任）：我觉得，他最大的功劳当然是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是最大的成功。再一个就是领导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道路也走了……就是说，有一个探索的时期，当然在这个问题上，他是积极地探索这条道路的。但是在探索的过程中间，由于种种原因，他并没有找到这条道路。探索社会主义道路，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功劳。比如现在一方面继承了他的那个精神，一方面继续探索，没有这一条也不行的，所以他的功劳高。就是人们把他全部功劳和错误都说了，也不妨碍他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这一点也不能够减少。他是最伟大的人物，最有影响的人物。

3. 克莱德曼《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钢琴曲。一辆轿车行驶在上海街道。采访参加上海国际行动理事会的外国前首脑。

解说：1992年，一位西方艺术家曾用音乐把自己对一个中国人的理解告诉了中国的观众。毛泽东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没有谁能像毛泽东那样改变中国命运，乃至影响世界历史的进程。

1993年5月12日，第十一届国际行动理事会在上海开幕。到会的是一些国家的前首脑人物，他们当中有的见过毛泽东，有的没有见过，但毛泽东都曾给他们留下过深刻印象……

· 福克·耶诺(匈牙利前总理)：毛泽东为中国人民，为世界人民，特别是为中国人民，做了许许多多的好事。但也做了不少错事。从总体看，我认为，对毛泽东的评价应该是肯定的。

特鲁多(加拿大前总理)：历史已证明毛泽东是一个伟人，因为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毛都能够把自己的理想付诸行动，并且明白中国人民需要鼓舞，需要领导，这就是伟人的特征。

卡拉汉(英国前首相)：毫无疑问，对中国人来说，他是一个世纪的毛泽东故事中的核心人物。时代造就了这样一个人物，时代需要变革，他实现了这种变革。现在历史仍在变化，我想如果他在这里他会接受这个巨大的变化。历史总是在不断变化的。

· 弗雷泽(澳大利亚前总理)：我从未见过他，这是我一生的一大憾事。因为他是中国的伟大领导人，为世界各国人民所尊重、纪念。我不知道中国怎么说，但在世界许多国家，他被看成是时代之父。他给予这个国家以生机，关心人民，建立了能使整个国家走向富足的制度。

福田赳夫(日本前首相):毛泽东长期将这个国家掌管起来,领导中国人民走自己的路,这仅靠策略是很难做到的,毛泽东是个哲学家,具有很强的领导能力,做了了不起的事,为人类做出了贡献。

德斯坦(法国前总统):首先,法国人知道,中国人对毛泽东仍旧很虔诚很尊敬。要知道现代社会变化很快,很多国家元首都被人忘记了,只有少数人仍被人所知。例如法国的戴高乐将军,法国人知道他,敬重他,那么在中国,毛泽东也是一样。

基辛格(美国前国务卿):世界上对毛泽东有很多见解,他们认识到,毛泽东统一中国获得了成功,建立了他的体制。另一方面,从他运用的方法和取得的结果上,他是个伟大的人,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同时也有比较大的错误。

卡翁达(赞比亚前总统):如果要说到某一个人,他解放了一个非常大的国家,当时有五亿多人,这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至于你问我对他有什么印象,我说他既是一个伟人,又是一个普通人。

4.1 次列车呼啸驶往长沙。起伏的韶峰。群山之中的韶山冲。采访吴大为。

解说:传说五千年以前,舜帝南下到这里,被这山水之间的灵气所感动,在山上奏起一支《韶乐》,引来了凤凰起舞。于是这

崖山便叫做韶山，被它环抱的一块狭长平地便叫韶山冲。

一百年前的12月26日，韶山冲农民毛顺生家出生了一个男孩，取名毛泽东，字润之，还有一个小名叫石三伢子。

吴大为(韶山纪念馆馆长)：这里存放着有关毛主席一生的档案资料。有很多珍贵的文献资料。毛氏族谱就是很珍贵的。这个是清代修的，也有解放前民国修的，一共有四修。其中我们收到了三修。这是二修族谱。还有三修族谱。这个是四修。这个我拿到外边去，给你们介绍一下，看一看。这个四修族谱上面就记载了毛泽东。毛主席的父亲叫毛贻昌(字顺生)，早年家里很穷，曾经到外面去当过兵，回来以后因为他善于持家，做谷米生意、猪生意，善于经营，所以后来家发展起来了。主席对于父亲也是很尊敬的。对母亲更加尊敬，母亲很和蔼。

5. 青年毛泽东像。新民学会旧址。采访周彦瑜。

解说：毛泽东在偏僻的韶山冲长大了，但他却不是个情愿守着土地的农民后代。辛亥革命爆发的那一年，不足十八岁的毛泽东出远门来到省城长沙，剪了辫子。二十五岁时，毛泽东发起组建了新民学会，投身到大变动的社会急流之中，并立志“改造中国与世界”。

周彦瑜(新民学会会员周世钊之女)：他们第一批最早的会员有二十九个。大家聚集在蔡和森同志的家里，参加成立大会。在这里新民学会召集了多次会议，一批热血青年对中国的命运和前途，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当时主要有两种不同意见，他们争

论得很激烈。一种是以毛泽东和何叔衡为首的，主张走俄国人的道路，走共产主义的道路。另一派是以我父亲和其他几个同学为代表，主张改良，从教育入手，走教育救国的道路。所以我父亲就继续上学，走上了教育的道路。他后来一直从事了几十年教育工作，在教育战线上勤勤恳恳。但毛泽东和很多的新民学会会员，后来都参加了共产党，走上革命道路。新民学会1918年4月14日成立，历时三年。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新民学会就自行解散了。

6. 湘江。橘子洲头。谢觉哉日记特写。在上海采访叶永烈。

解说：1921年夏天，毛泽东的人生历程发生重大转折。一天傍晚，毛泽东过湘江去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送行的谢觉哉在日记中是这样写的：“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接着便是当时谁也看不懂的几个圆圈。

叶永烈(作家)：这些都是采访的录音带。像这个，这是我说的沈志瑜，就是茹志娟的哥哥。中共一大会址就是他找到的。他那时和我谈话，是1989年9月4日。现在他已经去世了。这盒录音带也应该说是很珍贵。他那时跟我回忆，他怎么跟周佛海的妻子一起去找一大会址。房子都改掉了。所以他老是在兴业路，也就是今天的黄兴南路走来走去。当时来自全国各地的十三位代表，加上两位共产国际的代表共十五个人，就围坐在这个长方桌的四周。他们当时是很随便坐的。毛泽东是作为湖南代表来出席会议，他又担任会议的记录员。

二大和一大相差差不多一年，二大闭幕的那一天是7月23日，一年前那一天一大开幕。这里是李达住的地方，也就是当时人民出版社所在地。会议是由陈独秀来主持。当时毛泽东在上海，但他没有来出席会议。据他1936年跟斯诺谈话时说，他因为把李达的地址弄丢了，所以他不知道开会的地址，就没有来出席这次会议，大家很遗憾。

7. 安源煤矿。地下三百米采煤工作面，采访杨桂香。在北京采访易礼容。

解说：在本世纪初，由于株萍铁路穿过这里成为向外运煤的主要干道，安源矿局和株萍路局便通称安源路矿。1922年这里发生的工人运动是和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等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杨桂香（萍乡党史办）：这是安源煤矿总的井口，叫总平巷。安源煤矿是1898年开办的。它在江西的西面，湖南的东面。毛泽东1921年秋和1930年，两次从这里下过矿井。刘少奇、李立三他们在安源开展工人运动的时候，也多次从这里下过矿井。1921年秋天时毛主席要去下矿井，工人不让他下，说这里头很危险。毛泽东说，你们天天井下挖煤都要干，我下去一次还不行吗？就和工人一起下到了矿井里。咱们再到井里去看看，到工作面看看。毛主席当时在矿井跑了好长时间，从东平巷到西平巷一直和工人谈心。为了说明团结，要工人团结起来才能够解除自己的痛苦，他用那个小石子打比方说，一个小石子一脚就可以把它踢开，如果把很多小石子用石灰、三合土凝固在一块，它就搬不

动了。我们工人要想不受苦不受压迫，就要团结起来跟资本家斗。

这次大罢工在1922年9月14日凌晨开始，18日完全取得胜利。在第一次中国工人运动高潮当中是最成功的一次罢工斗争。

易礼容(湖南泥木工人罢工领导人之一)：1922年9月安源工人罢工胜利，湖南泥木工人也有了一定群众基础。10月泥木工人罢工。泥木工人罢工有四千多人。毛泽东领导泥木工人代表团，要求同赵恒惕谈判，赵恒惕答应了。起初是同民政司长吴景鸿谈了，然后吴景鸿带着毛泽东，同赵恒惕省长见面。毛泽东很能干，见面谈判的结果，赵恒惕答应了，答应泥木工人增加工资。大致是从原来的二角四分钱，增加到三角四分还是四角四分。赵恒惕答应增加工资，泥木工人罢工大胜利。

8. 广州，中共三大会址。在北京采访罗章龙。

解说：1923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三大上当选中共中央执行委员，随后，进入中央局并担任秘书工作。许多中央通告都由陈独秀和毛泽东签署后才下达各地。中共三届中央局委员罗章龙谈到了陈独秀在三大的发言。

罗章龙(中共三届中央局委员)：是这样说，湖南的工作，北方的工作，还有满洲的工作，都算最好的，都算走在前面的。他没有指明说毛泽东。

9. 广州,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旧址。采访张竞、文强。

解说:1924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一大标志着国共合作的开端。毛泽东作为湖南代表出席了会议。

有人说毛泽东就在这时第一次见到蒋介石,也有人说蒋介石没有到会。查阅会议记录,我们在代表名单中没有看到蒋介石的名字,只发现孙中山委他为黄埔军校筹备委员长等两项任命。而毛泽东在大会上却十分引人注目。

张竞(广东博物馆):毛泽东在会上发言很踊跃。他有两个重要的发言,一个是讨论党章的时候关于党章审查委员会的发言,一个是关于选举问题的发言,引起了与会代表的极大的注意。他在大会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担任了国民党的党章审查委员会委员,他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到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时候,毛泽东也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汪精卫曾经是国民党的宣传部长,1925年10月的时候,经汪精卫推荐,由毛泽东代理国民党宣传部长,并且主办《政治周报》。

文强(黄埔军校三期学员):有一天大家都在那里唱《国际歌》。唱得很高兴的时候,一看毛泽东也在那里唱,他跑到里头也在那里唱。他认识我,那时我喊他大哥,因为他妈妈是我们文家的,姓文。我说大哥你怎么也在这里唱?他说《国际歌》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唱,为什么我就不能唱呢?我说不是那个意思,我说你那样忙。他那时是中央党部宣传部的副部长,部长是汪精卫。我

说你这样忙，你还有时间来唱歌？他说我听见你们唱我才出来的。唱完这个歌他就走了。

10. 井冈山全景。黄洋界。采访参观人群。

解说：这段国共合作的历史结束在1927年夏天，中国共产党人开始用武装起义和暴动的形式同国民党反动派较量。10月，毛泽东出人意料地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率秋收起义农军上了湘赣边界的井冈山。

当时，这个偏僻的地方，无论对于湖南的长沙还是江西的南昌，都是山高路远。同时，四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也给它播下过星星火种。与毛泽东上井冈山同时，蒋介石已成为全国乃至世界赫赫有名的人物，正远在日本向宋美龄求婚。这位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没有想到，井冈山的朱毛红军会成为他日后难以对付的强手。

黄彩霞（导游）：井冈山，两件宝，历史红，山林好。从历史红的角度来讲，在1928年的8月30日，黄洋界有一场著名的黄洋界保卫战。不过黄洋界能作为井冈山一大哨口，这跟1927年10月24日，毛主席带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是有很大关系的。由于建立了井冈山根据地，井冈山根据地建立了五大哨口，这五大哨口最著名的，也就是我们现在到的黄洋界哨口。

马毓真（驻英大使）：我是第一次来，一直都希望能来井冈山。这次有机会来我们很高兴。驻外使节回国休假期间，一般都是要到地方上参观访问一下。这次是江西省政府和省委邀请我

们到江西来，这也是我们多年的愿望。

王庆余(驻荷兰大使)：我们能够取得1949年的胜利，能够有今天新中国建设的成就，应该说这个根源是从这里开始的。

解说：由于毛泽东曾在这里为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才使得井冈山作为中国革命的摇篮闻名中外，使它有了今天发展和未来繁荣的更多机会。

张大勋(外交部教培司司长)：这个地方除了是个革命根据地以外，它还是一个非常有名的风景区。我们从外事工作的角度看，将来这个地方将有很大的发展。昨天市里面给我们介绍，这个地方将开发成一个很著名而且很广大的开发区。将来交通，还有各方面的设施，如果能够有更大的发展，我想这个地方将吸引很多外国游客，将是一个有很大发展前途的旅游地区。

11. 摄制组乘车前往福建永定金丰大山下午牯扑村。采访当地群众。

解说：大概没有人统计过，全国到底有多少处毛泽东的旧居在向游人开放？每一座旧居又有多少毛泽东的故事？

1929年6月，由于红四军党内发生争论，毛泽东失去前委书记的职务。8月，他去福建永定县金丰大山下的牛牯扑村养病。这是一个至今也只有一个土楼、十来户人家的小山村。一个叫陈添裕的村民在白军的搜捕中把身患疟疾的毛泽东背到这里隐蔽起来住了二十多天。当时，他只知道他背的这个人共产党

员，叫杨先生。以后人们终于知道这个杨先生就是走上天安门城楼宣告新中国诞生的毛泽东。

陈连定(陈添裕之侄)：毛主席当年来的时候就在那边住。这边房子过去是老房子，主席来了以后就在这边住。

胡大新(永定县党史办)：当时这边是一个小房间。毛主席在这边住。房子被国民党烧掉以后，解放初1954年才盖起来的。镇里拨款、群众集资盖起这个纪念亭。

陈连定：这个是背毛主席的陈添裕的妻子。

赖楼生(岐岭乡乡长)转述陈添裕之妻张大妹的回忆：当时毛主席得了疟疾，当地话讲打摆子。头天上午听说民团要来追杀毛主席，因为毛主席走不动，他丈夫就背毛主席转移撤离牛牯扑。当时转移的时候，为了骗国民党民团，他丈夫就把草鞋倒过来穿，欺骗敌人使敌人向相反的方向走，他就把毛主席背到了另外一个地方，背到青山下。(问张大妹)你丈夫陈添裕是照片中哪一个？就这个，这就是陈添裕。

12. 瑞金全景。采访村民。

解说：中国的老百姓就这样与中国共产党人产生着休戚相关的联系。在中央根据地的中心瑞金，他们更在有田耕有衣穿的日子里，一点点汇聚着不仅仅对毛泽东一个人的感激之情。

杨来娣(叶坪村村民)：毛主席来的时候我不认识，他戴着平

顶的斗笠。我正在凳子上搓绳子，见他来我就站起来让他坐。我起来他就坐在我坐的凳子上。毛主席来了我很欢喜。毛主席要住在我家里，我要我弟媳搬掉梯子，毛主席不让搬。知道红军来很欢喜。毛主席来了就好了，没有屋的有屋住，没有田的有田种。

萧银根（叶坪村村民）：毛主席挖的井我带你去看一下。毛主席就带着人去挖井。1933年毛主席在这里挖的井，挖好井让群众挑水，挑水水不够。先挖这口井水不够吃，又到这里来挖一口井。群众就有水吃了。那口井水不够吃就吃这口井。群众蛮高兴都吃这里的水。原来的水不好吃，吃了还生病，毛主席挖的这口井水蛮好。

13. 红井边“吃水不忘挖井人”的碑刻。遵义会议旧址。采访师哲。

解说：这片红色的土地在“左”倾路线指导下丢失了。革命事业呼唤着一位能真正把握革命未来方向的领袖。1935年1月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终于使中国共产党从此有了自己的核心人物——毛泽东。在这之前，中共建党十四年中已换过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好几位领导人。直到今天谈起这种期盼领袖的心情，即使没有经历长征的师哲也感慨万分。

师哲（延安时期曾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我们在苏联学习的那个时候，我们难过的、痛苦的就是没有一个带头人，主要的就是一个作为党的中心人物，把全党能团结起来，通过党把群众带动起来，有这样一个人能以实际行动带动起来。不是嘴巴

讲。你空喊口号乱叫唤，但你不起作用还是带动不起来。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国外心情非常沉重。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多的人民，这么多要求干革命的人，没有一个带头人，我们是非常痛苦的。因为这关系到中国的命运。

14. 延河水。八路军骑兵训练画面。西安事变画面。

解说：1935年10月，毛泽东突破蒋介石层层围追堵截，终于把长征的红军队伍带到了陕北。一年后，西安发生的事情又一次把中国历史推至十字路口。中国共产党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一改中国两大政党武装对抗状态，国共双方第二次携手合作，抗击日寇。

15. 采访张玉麟、吴仲、殷邵。

张玉麟（伪装本捐献者）：我一看是三本《文史通义》，我很奇怪，而且是线装的，是用我们太行区自己的麻纸，我就翻过来看，一看，是不错，《文史通义》，再翻呢，《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其他的两本是《论持久战》，还有《论新阶段》，都是毛主席的著作。这是1943年春天的事情，正好五十周年。

吴仲（原香港新民主出版社经理）：1946年，中央通知南方局要东江纵队、广东省省委，赶快派人从广东到香港，占领宣传阵地，开办新民主出版社。出版社主要是出版毛主席的著作，《毛泽东选集》。我们这些书出版以后，主要发行到南洋一带去。

殷郁(原香港新民主出版社会计):海外,就是东南亚一带,还有美洲、欧洲,我们都发行了。另外还有蒋管区,因为蒋管区当时看不到进步的书报,也不知道党的方针政策,所以我们出版社也担负了这一任务。对国统区,还有一些游击区,华南的游击区,我们都大量地发行了毛主席的这些著作。

16. 重庆江面。毛泽东与蒋介石 1945 年在重庆合影。报刊有关毛蒋会谈资料。

解说:蒋介石没有想到,毛泽东已经勾画了一幅未来新民主国家的蓝图,并且开始深入人心。当时,谁敢于读这些书会有杀身之罪,但十年之后,蒋介石自己在台北的办公桌上也放了一本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他弄不懂毛泽东为什么能赢得胜利。

1945年8月,日本投降,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毛泽东穿上新皮鞋,换上新做的咔叽布制服,和蒋介石站到了镜头面前。这时候,毛泽东的身后已经汇聚了解放区一亿人口、近百万军队和一百二十多万中共党员的力量。蒋介石认为,中国大地的上空不能有两个太阳;而毛泽东则说,两个太阳应该由老百姓来选择一个。

姚江屏(原《新民报》记者):后来我记得有一个镜头,是毛主席来和蒋介石照了一张像,两个人站在那里。就在现在的外科医院,那里有个照像馆,在门口挂着。好多人围着看,一天到晚。毛主席一来,各行各业大家都非常兴奋,把毛主席当成救星。因为毛主席来了可能就和平了,和平了就不打内战了,生活就稳定

了。当时从这个角度，一般的学界、知识界、文化界把毛主席确实是当成大救星。一些工人、市民、学生，对毛主席的安全特别关心。民主党派、工商界一些进步人士，学校一些师生员工，对毛主席的安全、身体健康情况，是非常关心的。其他报刊也有反映。但主要反映在《新华日报》上。其中有一个当时可能是小康家庭，拿出一万块钱，捐给《新华日报》编辑部，希望给毛主席买点鱼肝油，买点东西，营养营养身体，说：有毛主席在，我们中国就有希望。

17. 延安的窑洞。黄土。采访杨在林、党音之。

解说：对于重庆市民，毛泽东的名字不再那么遥远、陌生。国统区人民和解放区人民，做出的是同一个选择。

党音之（延安作曲家）：这就是杨老的家。杨老当年和毛主席在一起多次照像，经常在一起谈话，后来有好多电视台、电影制片厂，有十多家，来拍电视都找杨老。这一次你们来，咱们见见他。

杨在林（毛泽东在延安的邻居）：你们来了，又见面了。

党音之：这是中央电视台的，来拍《毛泽东》，大型电视片。来见见你。你过去和毛泽东是邻居吧？

杨在林：是毛泽东的邻居。

党音之：你给他们把情况介绍一下。

杨在林：毛主席来到这儿，我们是老邻居了。他和我们照像，和主席一搭照过像。主席来就住在这上边，我就在这儿住。那时

候生活苦焦，毛主席来到陕北，陕北生活就大改变了，来了个减租减息。过去地主租子贵，放账利息贵，来了个减租减息，减轻群众的负担，群众相当热爱毛主席。大家对毛主席很感激，歌颂毛主席。唱《东方红》嘛。

党音之：对对，《东方红》。那个时候这样唱来：东方你就一个红，太阳你就一个升，咱们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是人民大救星。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嗨哟，他是人民大救星。呼儿嗨，呼儿嗨，呼儿嗨，……

18. 高山大川。升起的红太阳。毛泽东走上天安门城楼，宣布一个新中国的诞生。

（毛泽东站在天安门上）

字幕：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时年56岁。

第三集

曲折之路

毛泽东第一次当主席的时候，心中装满了苦涩……

——题记

1. 金水桥畔。天安门城楼。毛主席像。采访群众。

解说：从新中国成立的那天起，这座建于明代的天安门城楼就成了祖国心脏的象征。看到了天安门，人们就想到毛主席。毛主席，这个几乎每个中国人都熟悉的称呼，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金水桥畔，游客们的回答）

游客一：主席是什么时候当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不是吗？我觉得是1949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候。要不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怎么能当主席呢？他是国家主席嘛！我也不太清楚，反正我很崇拜他的。

游客二：到遵义会议的时候确定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任军委主席。

游客三：从什么时候开始毛主席的称呼？当然应该是1949年，国庆节解放的。是不是全国解放那一天称他毛主席？不对，不对。在延安时已经叫他主席了。是不是那么一回事？

游客四：毛主席啊？你知道吗？这个问题还是请问大家吧，我是不太清楚的。

游客五：好像在解放之前吧，解放前就有了，当然具体年代不知道了。

游客六：毛主席？好像是解放战争时候吧？具体年代不太清楚，具体日子不太清楚。

游客七：西柏坡第一次会议吧？说不清，这个忘了。是不是遵义会议以后？在延安那个红色政权时叫几大会议？

游客八：叫毛主席可能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就这么称呼。

游客九：叫主席？是不是庐山会议开始的？

2. 慢推近天安门上毛主席像。逐渐翻篇，出现毛泽东在历史上的四幅照片。

字幕：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任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字幕：1949年9月30日，毛泽东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字幕：1945年6月19日，毛泽东任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

解说：今天老百姓的心目中，虽然毛泽东早已走下神坛，但留在他们记忆里的还是毛泽东的那些辉煌岁月。其实，伴随着中国革命曲折的历程，毛泽东的个人命运和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核心的邓小平一样，也经历过几次起落沉浮。

字幕：1931年11月27日，毛泽东在瑞金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解说：很少有人会想到，毛主席这个称呼最早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但是，这个主席的日子并不好过。毛泽东说，他经历过大小二十次挫折。那么，从下面的几次挫折里我们能看到什么呢？

3. 1927年国民党屠杀共产党。八七会议旧址。采访李远志。

解说：这是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屠杀共产党人的影片资料。它已不新鲜，却足以说明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要搞八一南昌起义，实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方针。1927年8月7日，在武汉租界内一处住所，中共中央秘密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领导。这就是党史上著名的八七会议。毛泽东是以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身份到会的。

李远志(武汉八七会议纪念馆)：这里是汉口鄱阳街一百三十九号，以前是三教街一百四十一号。1927年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紧急会议。以前这底下一楼是个商店，是印度人开的绸布店。这个楼上当时是苏联农运顾问的住所。一楼和三楼都是他的。中共中央就选择这个地方作为会场。当时二十多个代表和

国际代表，都在这个小小的屋子里面。据李维汉同志回忆，当时毛泽东同志就坐在第二排的中间。他先后作了七次发言，强调这次中央政策的改变，一定要重视武装。他当时就说：“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成为后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理论。正式提出武装斗争的理论，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在这之前都没有过。

4. 秋收起义之火。秋收起义军旗。起义军进入山区示意图。摄制组乘车往三湾村。采访左招祥。

解说：1927年9月9日这一天，秋收起义第一次打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的旗帜。按当时中共中央的指令，它应该插在湖南省会长沙城上。但毛泽东却在进攻计划接连遭受挫折之后，把部队引向了山区。这个决定让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大吃一惊。

毛泽东的人生轨迹始终联接着中国革命的迂回转折。秋收起义是毛泽东第一次领兵打仗，但它对后来中国革命的影响深远久长。9月29日，毛泽东把眼看就要垮掉队伍带到永新三湾村进行改编。

左招祥（永新县党史办）：这就是三湾。1927年9月29日至10月3日，毛泽东亲自领导的著名三湾改编，在这里进行。三湾改编一共有三项内容：第一项内容就是从组织上对部队进行整顿，将原来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叫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第二就是政治建军，把党的组织建在连上，营团建立党委，把党的支部建在连上，确定了党对军队的领导。第三项内容

是建立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治军。制度当时明确规定，士兵有说话开会的自由，经济公开。毛泽东率领的部队到了三湾以后，第二天消息就传到宁冈了。袁文才，包括贺敏学、贺子珍，还有县委的王怀他们几个人合计，来的是不是国民党的部队？那样他们就要吃亏了，要想办法派人去侦察。派人侦察，谁去？贺子珍她讲我去。为什么非她去呢？她有她的理由，她是女同志，三湾这个地方地形也很熟，她化装一下作为走亲戚到三湾来，行动反而不被人注意。她提出这个方案以后袁文才同意了，贺敏学也同意了，去就去吧，但要小心。

5. 蜿蜒的小路。江西省宁冈县古城文昌宫古城会议旧址。油画：《毛泽东在古城会议上》。

解说：贺子珍当时十七岁。她在三湾村外撕下一条标语，带给了袁文才。当时袁文才和王佐率两支队伍驻在井冈山上下。毛泽东的部队要上山，必须同他们取得联系。10月3日，毛泽东从三湾到古城，通过前委扩大会议，确定了落脚井冈山的决策。会后第二天，毛泽东赴大仓村同袁文才见面。

6. 江西省宁冈县大仓村。毛、袁会面处林家吊楼。袁文才像。刘晓农的介绍。

刘晓农（井冈山会师纪念馆）：这就是大仓村。当时这个山村只有二十多户人家，现在还只有二十多户人家。1927年10月6日，毛泽东在这儿跟袁文才见面。为什么非在这儿见面呢？因为这个地方介于古城和茅坪之间。叫袁文才到古城去不合适，请毛

泽东到茅坪去也不行，所以找了这么个中间地方。因为这里有个大土豪叫林风河，和袁文才的关系不错。当时毛泽东带了两三个人空手来的，为了表示诚意。但是袁文才很不放心，袁文才的部下已经在后边山上，埋伏了一个连。最后发现毛泽东确实很有诚意，才把部队给撤了。他们进到这屋子里面，在这儿见面。就是在这儿会面，毛泽东和袁文才商定了部队安家茅坪的事情。当时袁文才知道部队供应很紧张，就说欢迎毛部，你们工农革命军在茅坪安家，至于你们的粮和军饷我全包下来。当场赠送一千块钱元给毛泽东部队。毛泽东和前委决定，把一百枝枪送给袁文才。一百枝步枪在那个时候，是相当了不起的大事。袁文才当场感动得热泪盈眶，说毛泽东很看得起自己，把他看作一家人。袁文才表示我们一定听毛委员的，在这里发展武装割据。

7. 湘赣边界起伏的井冈山。朱毛会师油画。采访冯惠。蓉市龙江书院，采访陈钢。采访萧克。

解说：毛泽东就这样上了山。五百里井冈，这个盛产稻米和茶油的地方，成了中国红军的摇篮。在中共党内普遍认为革命形势不断高涨，全国胜利即将来临的时候，在白色区域的包围之中，毛泽东开辟了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农军也来到这里。但他们见到毛泽东时，毛泽东只有师长头衔，还自称是“党外民主人士”。因为他刚刚受到中共中央一个处分。

冯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中央为什么给毛泽东

一个处分？这个处分是在中共中央 1927 年 11 月 14 日，通过的一个《政治纪律决议案》里边作出的。在这个决议案里，认为毛泽东在秋收起义里边犯了军事投机错误，还认为他所率领的军队经过的区域里头，没有执行屠杀土豪劣绅的政策。就这样给他作了组织上的处分，组织上处分在决议里头是，一个开除他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另外一个撤销他湖南省省委委员职务。那么这样一个决议，后来是经过中共湘南特委，派了一个代表，这个代表叫周鲁，他到井冈山去传达贯彻这个决议的。周鲁到井冈山以后，他还指责毛泽东太右了，烧杀得太少了，说毛泽东没有执行所谓的把小资产变为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周鲁他去传达这个决定的时候，他还误传毛泽东被开除了党籍，这样毛泽东就不能再担任党代表了。

陈钢(井冈山会师纪念馆)：这个地方就是毛泽东和朱德同志第一次见面的地方，叫文星阁。当时的回忆材料就是朱德同志坐在这边，毛泽东坐在那边。也就是在这个地方。谈到要召开红四军党的一大，大家推选毛泽东同志任军委书记，毛泽东说我都不是党员了，后来毛泽东就说了前面周鲁讲的，中央开除了他政治局候补委员，还有湖南省委委员的职务，还开除了党籍。讲到这里，朱德同志就讲，怎么有这个事情？周鲁乱弹琴，他乱传圣旨。也就是这里解了毛泽东的围。在这个地方毛泽东才知道，自己并没有被开除党籍，而是被解除了一些职务，所以开一大时他又当选为军委书记。

萧克(1928 年曾随朱德上井冈山)：朱毛会师之后军事影响大。我们湘南部队会师井冈山，八千农民军上井冈山，八千人上

井冈山这是不得了的。在那时候，虽然是梭标多，但八千人呐！井冈山这一支部队影响比较大，这样一来各个地方搞武装斗争，所以过了几年后，全国的十几个革命游击战争区域，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发展起来）。井冈山这个部队，它因为起的作用大，有一套比较完整的政策，中央又介绍这个政策到各个方面。国民党报纸也帮我们宣传，国民党的报纸有时它也得讲一讲呀！其他地方的革命群众看到，喔！井冈山有这么一支革命力量，大家高兴了，起到鼓舞作用。

8. 井冈山风光。红军树。参观游览的人群。

解说：1929年新年过后，为对付敌军新一轮“会剿”，解决给养，扩大根据地，朱、毛率红四军游击赣南，自此离开井冈山。半个月后，井冈山失守。这一年春天，山上的雪一连下了四十天。

红军在井冈山只呆了短短一年多时间，而民间早已用这样的传说，把这片山同毛泽东的命运联在了一起。

黄彩霞（导游）：种树的时候就把两棵枝拧在一起，上面的枝桠就不分你我了，就好像当年的红四军和红五军，拧在一起不分你我的意思。体现了当时革命力量的集中、信赖。真正的感情树在这个屋后，这个柞子树。这两棵树很奇怪，那我讲一句话在前，信不信由你。在1927年部队上山时，这两棵树还很小，1929年井冈山失守，这两棵树就枯死了。在1949年全国解放的时候，这两棵树又复活了。在1976年的时候，这两棵树又枯死了，对！这一年是主席去世。1980年以后这两棵树又返生了。不过还有一点，在1965年5月的时候，当年5月25日是毛主席重上井冈

山,5月份的时候,这两棵树是长得最旺盛的。

9. 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历史影片资料。

解说:毛泽东多次对人说起,江西是我的第二故乡。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阔别三十六年,故地重游。年逾古稀的毛泽东感慨万分。

10. 福建省龙岩市全景。龙岩公民小学,红四军七大旧址。 采访张兆声。

解说:1929年6月,红四军一夜奔袭,第三次打下龙岩。就在这里,来自红四军内部的一场争论,使毛泽东在党内遇到了第二次挫折。

张兆声(龙岩市博物馆):这个小学有很悠久的历史,它是在明代兴学祠的基础上创办的。后来1904年在这个基础上,改为公民小学。公民小学现在已经面目全非了,就剩了一对石狮子还保留着,这对石狮子是原来兴学祠的原物。红四军七大是1929年6月22日在这里召开的。现在公民小学新学址——七大的会址,已被拆除了,就剩下这么一棵树。旧址就在这儿,位置就在这儿。会议在1929年6月22日上午召开,一直到下午结束,前后一天时间。里面争论是非常激烈的,关于党领导军队,还有军队一系列工作的问题,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没有被采纳,他当时不得志,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被选掉了,陈毅就当选前委书记。

11. 上杭县苏家坡全景。毛泽东养病的山洞。采访当地有关人员。

解说：这时，毛泽东还受到了一些批评，说他有家长制领导作风。会后，中央曾打算要毛泽东去苏联留学和养病。毛泽东不愿离开红四军。

郑汝林（上杭县委宣传部）：这就是苏家坡村。当时苏家坡这个地方穷乡僻壤，比较僻静，环境比较幽静。他为构思总结整个中国革命，党内军内的一些历史经验教训，选择了这么一个地点。栏杆是以后加上去的，以前非常险峻，走这条小路过来。当时是搭个梯子，毛泽东沿着梯子下来。下面是深潭，前面过不来。毛泽东进来就沿着这个石梯爬过来。以前这个里面还放有石头桌子，还有竹椅可以躺着。因为比较潮湿，竹椅已经撤走了。这个里面洞中有洞。这个洞，中央电视台《毛泽东》摄制组是第一次来，也是第一个来，其他人恐怕还没来过。省级以上电视台是第一次拍这个洞。这个洞听当地人说有些传奇色彩，主要是他当时的交通，姓雷的不在了，刚好去年逝世了，如果他没逝世，他讲得非常生动。

12. 陈毅 1929 年 8 月赴上海途中照片。古田会议旧址。

解说：就在毛泽东养病期间，陈毅去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一路上，耳闻目睹朱毛红军在白区的政治影响，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上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认为毛泽东仍应为前委书记，要求红军官兵维护朱毛威信。10月，陈毅回到红四军，接

连几次写信请毛泽东回前委主持工作。12月28日，红四军九大在古田召开，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案，再次选举毛泽东为红四军前委书记。朱、毛携手，逐渐开创了以江西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

13. 一组蒋介石在南昌布置“围剿”中央苏区的历史影片资料。宁都县小布镇。第一次反“围剿”红军有关作战资料。缴获的电台。采访曾庆圭。采访冯文彬。

解说：自从1927年以来，蒋介石一直忙于和各路军阀交战，对于活动在湘赣边界的朱毛红军没有用心对付。然而，到了1930年，他不得不腾出手来解决这个越来越难办的事情。于是蒋介石飞抵江西南昌。不到两年时间，就先后投入六十万军队，三次“围剿”朱毛红军。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正规军会在山沟沟里一而再再而三地打败仗。他想知道，他的对手，那个当过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的毛泽东是怎么打仗的。

曾庆圭(宁都县博物馆)：第一次反“围剿”时，毛主席决定第一仗准备在小布打。所以红军从黄陂开到小布来诱敌深入。当时这些山头上都埋伏了红军。但因为已进到源头的敌人谭道源这个师不愿意离开源头那个居高临下的阵地，所以红军两度开到这个地方来，又两次原道撤回。反“围剿”以前，红军没有电台。在第一次反“围剿”当中，在永丰的龙冈捉了张辉瓒，缴到一部电台。但是因为红军当时不知道是电台，所以把一个发报机打碎了。

冯文彬(曾任红军第一个无线电总队政委);当时用的电台是缴来的。缴来的首先还是一个收报机,那个一、二、三次反“围剿”打得很顺利。当然毛主席的指挥领导没有问题,但是没有这些情报毛主席也很困难,主席可高兴了,看到我说:文彬同志,这个缴来的电台很好啊,奖他两块大洋买鸡吃。那个时候毛主席奖来的,拿两块大洋买鸡奖给收电报的人,那已经高兴得不得了。毛主席奖的,那时候还没有国家主席的毛主席,那时候叫毛政委,他是最高政委。朱毛,朱毛嘛!

14. 王明的著作《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莫斯科、上海和收发报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旧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场。1931年11月毛泽东在瑞金照片。

解说:1931年1月,二十七岁的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扶持下,成为中共中央决策人。九个月后,他离开中国,去了莫斯科。共产国际的总部就设在这里,许多国家的共产党组织实际都是它的下属支部。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二十四岁的博古在中共中央负总责,当时他在上海。正在反“围剿”前线的毛政委没有想到,红军架起的无线电之桥,给莫斯科、上海向瑞金发号施令提供了最大方便。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开幕。选择这一天,是因为它是俄国十月革命纪念日。二十天后,一个按苏联模式建立的红色国家宣告成立。毛泽东被选举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毛主席,这个后来神圣而又亲切的称呼,就从这里开始了。

但在以军事斗争为中心的年代，政府主席并非要职。他的头上还扣着一顶“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并失去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毛泽东第三次在党内遭受政治上的挫折，远离了大敌当前的前线，在后方做政府工作。

15. 瑞金宾馆一号楼。采访瑞金有关人士。

解说：这幢楼是瑞金人1958年盖的。他们希望有一天毛主席能回来住上几天。但毛泽东一直没有回来。井冈山上受到中央处分，误传为开除了党籍，是他政治生涯的一段插曲。红四军七大前后的一场争论，也在不长的时间里解决了。而在瑞金，毛泽东经受的打击时间最长。今天的瑞金人，是怎么理解的呢？

黎金辉（瑞金县县长）：毛泽东同志为什么一直没有来瑞金，这个事情我们也很难理解。我倒考虑毛泽东同志对瑞金这段政治生涯是不是有什么想法？因为来到瑞金这段历史，是他政治生涯的低潮，是受打击的。

曾庆红（瑞金县委宣传部长）：当时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干扰，毛泽东受到排挤，这些都属于党内的事情。人们真正怀念的、缅怀的，是毛泽东在这里创下的业绩，以及这里作为首都的历史。

钟久传（瑞金革命博物馆）：毛泽东同志为什么一开始选择瑞金这个地方为中央政府的所在地？因为在1931年11月，当时这里是中央革命根据地。这块地方从党的机构，从红色政权的建

立,从群众的觉悟,从各方面看,成立中央政府是有条件的。从全国的红色政权来说,已经成立了大小十五块革命根据地。为了统一全国苏维埃运动的领导,所以有必要成立这么个中央政府,来集中领导全国的苏维埃运动。毛泽东在一苏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这是苏区群众对毛主席的拥戴。所以说毛主席这个名称,就是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以后,他当选为主席才叫毛主席了,一开始叫毛主席就在瑞金。

杨方村(瑞金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土地革命的中心就是土地问题。围绕解决这个中心问题,毛泽东利用这个时候进行大量调查,这是一个方面。我觉得第二个方面,就是从理论上来看,中国革命的道路当时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采取武装割据的方法,沿着这条道路取得了胜利。毛泽东在这个阶段对这个理论,对这条道路进行了勇敢的探索。比如说他指挥的战斗,包括我们大柏地战斗,包括井冈山下来的一系列战斗。他之所以当时受到王明“左”倾路线的打击,就是这一点以及军事上的分歧。一个是要农村包围城市,一个是要实现一省数省的胜利,也就是先夺取中心城市。而毛泽东主张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方法解决问题。根本的分歧就是这个问题。我觉得毛泽东同志在这个方面,在瑞金他勇敢探索了这个问题。他以后所以能够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与他在这个阶段的工作是分不开的。

刘良(瑞金县委党史办):从他的总的指导思想来讲,毛泽东当时的战略方针,不是打哪个城市就占这个城市,而是要削弱敌人的力量,扩大我们红军的力量。这个指导思想和王明路线截然不同。王明路线打赣州就是要夺到赣州,认为我们这个红色区域

红成一片了，不要那个小小的赣州在中间隔一下。毛泽东主张消灭敌人据点，并不是要占领这个城市，而是要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16. 瑞金县东华山全景。

解说：毛泽东当选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不久，就带着贺子珍一起上东华山养病。

释语福（东华山尼姑）：听我爸爸说，毛主席 1932 年 1 月，到东华山养病。

17. 毛泽东养病处原址。项英像。福建省委旧址。采访王其森。

解说：毛泽东人在山上，心在山下。1932 年春天，红军围攻赣州二十四天没有打下来反被包围。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受周恩来之托，上山请毛泽东。毛泽东带病冒雨下山，起用红五军团解了赣州之围。

王其森（长汀县党史办）：毛泽东组织红军向闽西发展，建议打漳州。所以毛泽东、周恩来，他们都来到了长汀，住在福建省委，在福建省委召开会议决定打漳州。那么为什么要打漳州而不打赣州呢？打赣州是打下来，要把苏维埃政府迁到赣州，要占领这个大城市。毛泽东主张打漳州，就不是去占领大城市，而是解决红军的给养。漳州是很富饶的地方。我们红军这一次打漳州

是发了大财，得到了一百万的光洋，那一百万光洋运到我们苏区，搞了一个金山银山的展览会，给苏区的人民非常大的鼓舞。在漳州也给红军战士很大的鼓舞，那个时候，红军战士从来没有见过胶鞋，打下漳州以后，缴获了很多的胶鞋。一双胶鞋顶得上一百多双草鞋啊！可以穿一年啊！

18. 江西省宁都县小源村全景。

解说：打下漳州，毛泽东骑着一匹大白马进了城。打漳州胜利后，毛泽东恢复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重返前线。但好景不长，1932年10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会议，指责毛泽东反对打赣州是对中央“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会后撤了他的职，又让回后方工作。这是毛泽东在党内受到第四次政治上的挫折。接着，一些人被当作“毛派分子”也受到排挤。其中就有邓小平。这是邓小平经受的平生第一次政治打击。

当我们在小源村问起毛泽东在宁都会议的遭遇时，村民们都说不清楚。

（小源村村民的回答）

村民一：我不清楚。

村民二：他在这里住过，也就是说毛主席受迫害的时候，在这开过会。其他情况都搞不清。

村民三：那时的事，我哪里知道？要问那些老年人才知道。

村民四：开会的地方我没见，几十个人在哪里开会我不知道，但那时毛泽东与朱德两个人我见到过，两个人过河去。

19. 小源村宁都会议旧址、内景。在北京采访刘英。

解说：我们到过许多毛泽东故居或毛泽东参加过重要会议的旧址。和那些地方相比，宁都会议旧址是最特别的。它没有标记，也没有文字说明。除了这里村民所用的东西外，差不多还是当年那个样子。这样的环境，也许更能让我们体会那次会议对毛泽东的不公正。这使我们想起毛泽东曾经说过的话：无论你们整我到什么程度，整错了，对我有极大益处，激发我研究一下，激发我想一下。

刘英(张闻天夫人)：毛主席这个人原则性是很强的，他对中央，那个时候特别是对共产国际——对共产国际那个时候是很信仰的，提意见是提意见，他服从还是服从。不同的意见他到会上争论，在军委会上争论，我们在底下不知道，他和我们也不谈。但是他很苦恼。这个时候，他就在开会的时候提他的意见，说这样的打法不对，但总是被否定了。否定了以后，他后来也没有办法，他还是继续调查研究，他还是干他的工作。他是政府主席，他仍然干他的工作。

20. 下霄村村民谢春娣带摄制组找独立房子。

解说：1933年初，中共中央在上海无法立足，搬到瑞金。10月，一条小船为中央苏区送来了一个毕业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德国人，他叫李德，被“左”倾领导者聘为中国红军的军事顾问。李德选了立在稻田中央的一座孤庙当自己的住处。瑞金人叫它“独立房子”。

谢春娣(下霄村村民):他们正在那里割禾,就在那块地里有
个庙,有三间。中间是房子,两边是小房子,叫作围下庙。

杨荣薄(下霄村村民):(画外音)叫佛祖庙。

谢春娣:我一直是叫作围下庙。

杨荣薄:(画外音)是佛祖庙。

杨荣薄:庙拆掉以后成了一块空地;空地后来就把它改来做
田了。是这么个情况。房子原来蛮高,中间一个厅,两边一个隔
间,正方形的。这里有一隔间。这边是菩萨,这边也是菩萨。这
下面是天井,下面是空的,那个下面可以搭台子,可以唱戏。

记者:(画外音)李德你见过吗?

谢春娣:李德呀,是那个脸上长红毛的吗?见到回把子,见到
都不敢说话,看到都不敢说他的名字,脸上是红头发,络腮胡子,
那个人个子蛮高。

21. 独立房子原址。蒋介石第五次“围剿”影片资料。采访陈
士桀。

解说:这位老人对李德至今还有一种神秘感。

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开始了。独立房子的主
人主持红军的反“围剿”战争,与他对垒的是蒋介石请来的军事
顾问塞克特,也是一位德国人。1934年4月,李德的阵地战和塞
克特的堡垒进攻战在广昌决出胜负。不到二十天,红军被迫撤离
广昌,丢了中央苏区的北大门。

陈士榘(曾参加第五次反“围剿”);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总的来讲是失败了。这是从整个的战略方向上来讲,它是失败了。但留下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当时留给我们的教训也是很多的。整个的中央苏区丢掉了,红军受到了很大的损失。重要的失败原因呢,就是没有很好地按照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以我为主的不放弃运动战的消灭敌人的机会。毛泽东本人当时也受排挤,虽然说也可能提出一些建议,说下面反映了很多情况,说这样打简直不行,伤亡很大。部队反映也很强烈,但上面不行,不听,你虽然反映到上面去,最后他的命令下来,还是要按他的执行。最后还是要撤退出来,有了一个二万五千里长征。主要的经验就是说,李德、博古他们这些叫做苏联吃面包回来的,并不懂中国革命的特点,这样就失败了。

22. 福建省永定县松毛岭钟复村。

解说:红军在这里进行了守卫中央苏区的最后一战。1934年10月18日傍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带病从于都走上长征之路。人们不明白为什么会丢失这个存在三年的红色国家,更不清楚要走到哪里去。苏区的乡亲们就这样送别了红军。

23.《十送红军》过门之一。

解说:这一年寒冷的11月,中央红军在湘江两岸遭受惨重失败,八万余人损失过半。

24. 《十送红军》过门之二。

解说：这一年寒冷的12月，担架上的毛泽东，渐渐接近贵州遵义城。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

25. 采访。

伍修权(1935年参加遵义会议)：遵义会议是两种意见的斗争。一种意见是李德代表的错误路线，毛泽东代表一条正确路线。毛泽东的地位，是他自己(威望)决定的。因为他有这样的威望，所以就形成了这样的地位。

26. 遵义会议旧址。

解说：遵义会议决定，增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后，毛泽东担任了前敌司令部政委，和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决策红军军事行动。

历史就从这里开始转折。毛泽东率领着红军向广袤的北方走去。

27. 毛泽东头戴红星军帽照片。

字幕：1936年美国人斯诺摄于陕北保安。

艰难的探索

毛泽东曾想骑马沿黄河考察……

——题记

1. 画面开始在《颂歌一曲唱韶山》的音乐声中，热闹的韶山市场。采访几位韶山农民。

解说：1893年，毛泽东诞生的时候，这个叫做韶山冲的小山村，大多数人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

和当年中国大多数农民一样，毛顺生为儿子毛泽东设计的人生道路，无非是做一个能干的农民，并像他一样会做生意赚钱。毛顺生把毛泽东送进了学堂，结果，毛顺生当年这个比一般乡亲高明的决定，却让毛泽东走上了另外一条人生道路，他所追求的就是要让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过上好日子。

韶山农民之一：在我心里觉得毛主席挺伟大，因为他领导我们中国人民翻身得解放。他生前不仅为整个中国人民造福，而且死后也为我们韶山人民带来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韶山农民之二：莫在这里照，又不跟我做生意！在这里照么子喽？你们又不跟我做生意嘛！在这里照什么啦？跟我做笔生意吧！做个开张生意嘛，要不要呐？便宜点，你说多少？

韶山农民之三：做这个生意经济活跃一点，提高生活水平。

记者：（画外音）你是不是感谢毛主席？

韶山农民之三：（画外）当然感谢毛主席，搭帮毛主席了。也是邓小平现在的政策好！

韶山农民之四：主席给我们带来了不少的财富，是托毛主席的福，沾毛主席的光。要不这里是个穷山沟，谁到这里来？

韶山农民之五：我们生活好了，毛主席也放心了。

2. 毛泽东旧居前参观的人们。湖南第一师范纪念馆讲解员的介绍。

解说：从青年时代起，毛泽东就对中国农村社会抱有极大的兴趣。

湖南第一师范纪念馆讲解员：1917年暑假的时候，他与他的同学，就是在楚怡小学任教的萧子升，一同从长沙出发到几个县和地区，进行农村调查，途经宁乡县、安化县，还有益阳、沅江，包括长沙，共五个县和地区。其中他在宁乡沙田的村子里，进行贫民座谈会。同时在1917年冬天，毛泽东又与蔡和森一同到浏阳县进行社会调查。他通过这些调查研究，了解当时社会上的许多情况。这是他当时在1917年暑假以后，他调查回来写给友人的一封信，提出了自己改革社会旧思想的道路，并且提出了他的一些见解，认为要了解中国必须要深入社会，并且了解实际，才能学到书本上所学不到的知识，取得实践经验。

3. 连绵起伏的湖南山川。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采访彭捷。

解说：在过去的千百年里，一向以老实本分为美德的中国农民，始终没有放弃过改变自身命运的愿望。

1926年秋，北伐战争席卷湖南，所到之处裹挟着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打土豪，分田地，一切权力归农会。1927年初，同时在国共两党负责农民运动的毛泽东回到湖南，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三十二天行程七百多公里。他相信，农民们正在农村完成孙中山四十年没有完成的大业，中国革命若没有农民革命就无法实现，并提出立即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从此，毛泽东获得“农民运动的王”的称号，西方人则形容：卡尔·马克思降临了亚洲的稻田。

彭捷（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纪念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在这盏煤油灯下写成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写成以后，发表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毛泽东经过那么艰苦的考察，有了他的思想，最早把他这个思想刊登出来的是《战士》。这个刊物是全文刊载的。刊载以后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向导》上也开始刊载。但这个刊载遭到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反对，这样就在《向导》上只刊登了一半。但在这个事情上瞿秋白是支持的，他就把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改写了一个题目叫《湖南农民革命》，1927年4月，在汉口的长江书店出版了一个单行本。而且瞿秋白给它写了一个序，在序中他就称毛泽东是“农民运动的王”。毛泽东在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并不是他一个人来的。他是一家人都来了。当时有杨

开慧、毛岸英和毛岸青，而且还有一个保姆陈玉英。杨开慧还在这儿生下第三个孩子毛岸龙。毛泽东在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时候，杨开慧经常协助毛泽东工作，给毛泽东抄稿子，给毛泽东擦油灯。每天晚上毛泽东写的时候都熬到深夜，他早上起来的时候灯罩都是亮的，因为杨开慧都给他擦干净了。在毛泽东《湖南农民革命》单行本发表的同时，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也在武汉召开了。这个开会的地点就在对面。当时毛泽东是以候补代表的身份出席这次会议，因此他在这次会议上只有发言权没有表决权，但毛泽东没有放弃这样一次机会。他就利用这个机会在大会上把农民运动决议案提交大会讨论，要求大会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但是大会还是拒绝了他的建议。

4. 兴国京九铁路建设工地。采访邝小平。

解说：历史还是翻开了土地革命的篇章。1930年10月，毛泽东曾在罗坊对兴国八个参军农民进行深入调查，1931年1月写成著名的《兴国调查》。兴国，是毛泽东多次到过的地方。通过兴国这个窗口，毛泽东加深着对中国农村的认识，今天我们依然从这个窗口可以看到中国革命能够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兴国人，至今有着很多引以骄傲的话题。

邝小平（兴国县委书记）：毛泽东同志后来到兴国作调查，是为了解决农民的问题、土地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来到兴国调查以后，认为兴国的长冈乡苏维埃政权工作抓得好，抓得出色，所以当时就称赞我们兴国是个模范县，称赞我们长冈乡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如今京九铁路从我们兴国县经过，同样也是遇到一个

土地的问题和农民的问题。因为这个京九铁路从我们这里过，必然牵扯到征地的问题，农民房屋拆迁的问题。我们现在同样碰上这个问题。对这个问题怎么办？那么我们对群众说，我们要像当年支援红军一样，支援铁路建设。为什么呢？当年毛泽东同志来到我们兴国县，主要为的是中国革命的胜利。如今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条铁路建设也必定带来我们兴国经济的腾飞。你看这里，这里叫营盘山隧道，这就是当年毛泽东同志率领红军第三次反“围剿”的主战场之一。我们兴国县在苏区时期，诞生了五十多位将军，为中国革命牺牲了两万三千多名烈士。

5. 兴国激江书院毛泽东旧居。将军们生平、照片。采访老红军。

解说：在毛泽东当年住过的这个激江书院里，今天陈列着兴国籍将军的照片和生平。农民问题与土地问题，始终是中国国情的基本问题，兴国在1929年4月就颁布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兴国土地法》，打破了兴国地主、富农人数不过百分之六，却占有百分之八十田地的旧有土地关系。毛泽东还在这个书院举办了一个月的“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从这里走出的泥腿子们把兴国的土地革命和扩大红军运动闹得轰轰烈烈。从1929年到1934年，兴国就有五万八千多人当红军，并成了全国有名的将军县。蒋介石曾说，谁控制了北京、广东、上海和武汉，谁就控制了全中国。而毛泽东则说，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谁得到农民的拥护，谁赢得了农民，谁就赢得了中国。

刘恋（老红军）：为什么当红军？为了保卫自己分得的果实。

分了田嘛，分了地嘛，你要保卫果实，让国民党不回来，去当兵。把国民党反动派打跑了，我们的田和地就能保住了。如果不把他打倒，他回来以后，田他也收了，我们也得不到利益，得不到果实。那个时候我们脑子里头狭隘，就是这些。农民的狭隘性。为什么？就是分到了田分到了地，这是自己所得的果实，自己得到的果实要保护它。什么全中国的解放，人民的解放，这些思想那个时候脑子里还没有。

黄益源(老红军)：一个人大概人分四担或者六担，平均是五担多一点。我家有七八个人，分得蛮多地。当时想当兵真正是自愿，自愿想当兵。想去当兵就是为了报答分田分地，保护自己的果实，保护革命的果实。

6. 一张 30 年代的照片。叠出谢培兰的讲述。

解说：这是 30 年代初期中共兴国县委成员的一张合影。当年十八岁的谢培兰是县委妇女部书记。

谢培兰：当红军的。你领导我，我领导你，大家都努力去。你也去，我也去，全体出发。妇女就来做田，妇女在后方就犁呀耙呀，全都是妇女干。兴国县一个月就建了兴国模范师，一个少共国际师，一个工人师，组建了三个师。鼓动妇女让老公去当兵。你也叫你的老公当兵，我也叫我的老公当兵，去参加红军。大家当，大家当，大家去当红军。做鞋子，做这个鞋子，做军鞋。做鞋子，一个妇女做三五双。

谢培兰唱当年的歌：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官长士兵都一样，没有人来压迫人。

7. 在当兵就要当红军的歌声中，兴国烈士陵园的烈士名录。

解说：获得土地的农民用鲜血和生命铺垫着革命胜利的道路。长征路上，几乎每前进一公里就有一个兴国籍的战士倒下。兴国县的烈士人数占整个江西省烈士的四分之一。

8. 寻乌县全景。旧城巷景。寻找毛泽东《寻乌调查》中提到的胡东林木工房。原天主教堂，毛泽东写作《寻乌调查》的旧址。采访黄世标。

解说：1930年春天，住在这里一所天主教堂的美国牧师好奇地接待了一支红军部队和他们的领导人毛泽东。

毛泽东在寻乌大约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对农村和小城镇工商业作了详细调查，写下了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重要历史文献的两篇文章《寻乌调查》和《调查工作》，后者也就是后来的《反对本本主义》。

黄世标（寻乌县委党校校长）：毛泽东当年来了以后，就通过这个老街深入到各家各户。他都要问一下碰到的老人，他们需要什么，情况都会问一下。问一些店里掌握情况的老人，问一些当时的经济情况，他们这里寻乌卖什么东西。比方说毛泽东调查以后他就发现，这里相当多的人卖豆腐，再就是水酒有的地方叫黄

酒，就是用糯米蒸的那种酒，也相当好。毛泽东那时还问过红军宣传员，问他你们调查的情况怎么样？这里最喜欢什么？他们都回答了。寻乌卖水酒比较多，卖豆腐比较多。除了这个以外，他就问他们，哪一家的豆腐最好吃，群众最喜欢？哪一家的水酒最好吃？他们都说不出来。毛泽东又对红军宣传员说，调查研究把所要掌握的情况，一定要问清楚。这就是毛泽东当年作木工房调查的地方，保持原貌最好的就是这个木工房，因为它现在也是木工在这里做。这是最好的，保持了原貌的。其他有些地方都改变了它原来的面貌。

（黄世标与木工房主人的对话）

木工房主人：以前就有，30年代就有了。原来的店主我就知道了，要问一下人家年纪更大的，问前辈人。我是下放来的。

黄世标：你从哪里下放来的？

木工房主人：上海。上海来的。

黄世标：下放几年了？

木工房主人：下放二十年了。

黄世标：你做的是桌子吧，冰水桌子。

木工房主人：冰水桌子，卖冰水的。

黄世标：当时寻乌这个地方在安远、会昌、平远这一带都是红色地区。当时红军分兵发动群众，所以毛泽东在这里有时间搞调查。他以前都没有时间来搞。再加上寻乌这个地方，处在福建、广东、江西三省的交界处，对于福建、广东、江西三个省的情况，他都可以把握。所以他就选择了这个地方搞“寻乌调查”。以前他所走的地方要找县城都很难，到了寻乌以后，终于有一个县

城，而且到县城里看一下，工商业还可以。可以前我们党的政策对工商业这方面没有制定比较正确、比较好的政策。所以他来了以后，有这个条件。再加上我们当时那个政策属于“左”倾，把工商业者误认为是剥削阶级，都是要打倒的。毛泽东来了以后通过对寻乌调查，觉得他们这些商店小店主，都属于我们革命应当争取的对象，不应该把他们打倒，应该把他们争取过来。所以后来他就制定了要保护中小工商业这个政策，使我们党的政策进一步完善了。这就是毛主席当时在这里办公的地方。那个就是他的办公桌。当时他写《寻乌调查》就在这个地方。他对调查工作的重要性，通过寻乌调查有了很深刻的认识，所以他当时就把它写下来了。《调查工作》就是在这里写的。据一些老同志回忆，他搞了一本油印件，这个油印件还散发到红军当中，红军战士当中进行流传。叫他们要学会，每个红军战士都要学会搞调查研究。这个油印本发了后，有的红军战士可能留下来了。后来在龙岩地区发现了石印本《调查工作》，1964年发表时改名为《反对本本主义》。

9. 摄制组坐摩托车沿很窄的山路进龙岩上杭县上官村。采访《调查工作》石印本的保存人之一赖茂基的后人。展示保存此书的木盒。

解说：从1927年到1934年长征前，毛泽东的足迹遍布井冈山和中央革命根据地。他写下了不少调查报告，但有的在战争中失落了，其中包括毛泽东1930年5月写的《调查工作》。近三十年后，这个石印本在闽西一个偏僻的小村庄重新被发现。毛泽东得知后，高兴得犹如找回自己失落多年的孩子。在这篇文章里，

可以看到后来成为毛泽东思想灵魂的“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和“群众路线”的雏形。

毛泽东在这篇文章里说，我们需要马克思主义，但中国革命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才能取得，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在当时被教条主义者看作“狭隘经验论”，结果，多次被剥夺发言权的恰恰是毛泽东。

赖建长(保存人赖茂基之孙)：50年代交上去我才知道。一共多少年了？(画外音)现在快三十年了。1957年交上去的，就他一个人知道。对，就他一个人知道。

赖建湘(保存人赖茂基之孙)：我们知道是在1961年，不是1960年。我是1960年10月下来的，在龙岩。那个时候我们才知道。因为中央下来人搞调查，人家县里面的同志转告我们。那个时候我的祖父已经病故了。当时就拿了个文件，但这个文件没有写福建省茶地官山，没地址，但有这个名字，赖茂基的名字。也没有收据，也没有什么东西。就是这样的。

赖建长：保存这个书他确实是冒着生命危险，并且我们住地被白鬼子烧毁了。

郑汝林(上杭县委宣传部)：这个是我们才溪纪念馆黄馆长。他专程从才溪过来，把当年那个放书的箱子带过来了，珍藏《调查工作》的那个。

黄馆长：当时官山村有个叫老鸦山的地方，那时是兵工厂。

1931年敌人包围了这个兵工厂，一个游击队员临走之前，就把一系列文件，还有《调查工作》交给赖茂基，并对赖茂基讲，你是老共产党员，这份材料十分珍贵。要把它永远保存，一直保存到革命胜利。这是当年游击队员讲的话。后来赖茂基老人说兵工厂被烧掉了，后来赖茂基就隐居了，带着这个文件一直保存到解放。当时主席在1927年到1937年这十年时间，一共写了二十多个调查材料，其中长征路上失散了很多，保留了十一件。这件《调查工作》当时没保留下来，他没找到，是解放以后才找到。主席就讲，就好像找回了我的孩子。这是复制件，原件交给革命博物馆去了。

10. 延安晴朗的天空。清凉山全景。《农村调查》特写。采访刘煜。

解说：到延安后，毛泽东在全党大力倡导调查研究作风。他曾说过：没有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1941年，他把自己以前做的一系列调查报告汇集成书，取名《农村调查》，还特地写了序言和跋，列为整风文献。他还当了调查研究局主任。这时候，延安发生了一件事。

刘煜（延安革命纪念馆）：固临调查，高老知道吧。固临调查，就是西北局宣传部李卓然组织了一个六人调查组，到固临县调查。这是陕甘宁边区的区划图，五个分区，绥德、三边、陇东、关中，这是延属分区，这是延安。延长、固临就在这一带。固临调查咋回事？1941年6月3日中午，边区政府正在边区礼堂开县长联席会，突然乌云密布，电闪雷鸣，一道闪电下来，结果把开会的

延川县的李采荣给打死了。这一下子在延安街头巷尾人们议论纷纷。有一位安塞的老乡在四长沟，公开指名道姓骂了毛泽东，说，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毛泽东啊？毛泽东知道这个情况以后，他没有埋怨这位老乡，也没有惩办这位老乡，他说调查一下是什么原因。结果一调查，群众对负担加重不满意。调查了这个情况以后，主席掌握了第一手材料，立即下令减收公粮四万担。这四万担一减，群众负担轻了，我们机关、部队、学校得勒紧裤腰带了。这时候毛主席讲“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用自己的两只手搞生产，解决粮食不足的问题，这一下子情况就好转了。

11.《中国土地法大纲》特写。土改中喜悦的农民。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积极入社的农民。采访薄一波。

解说：在中国共产党实现由乡村到城市的工作重心转移的过程中，新老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在1952年底基本结束。从调查研究中产生的土地革命政策，打碎了旧的生产关系。随后毛泽东把握中国农村跳动的脉搏，推动农民走上农业合作化道路。农村土地关系的又一次变革，促进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完成，使得新中国在1956年就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在只有苏联模式可供参考的情况下，毛泽东决心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薄一波：第一次的调查，是在我们感觉到苏联的这一套办法不行时开展的。开始报告的时候是偶然的，刘少奇同志曾经找许多的部，已经报告了七家。有一次我见到毛主席以后，我说少奇

同志现在组织各个部门，进行调查研究很有效果。毛主席提出，你也给我组织一下。组织什么？就是工交部门一共十八个部，在这里面包括部，包括局，和各委员会在内一共十八个部。他说你也给我组织一下，我就给他组织了。以后，少奇同志他是听另外的。这一个个报告毛主席听得很辛苦，毛主席除了要听工交部门汇报以外，我们的财贸部门也去听，也要汇报（共听了三十四个部的汇报）。毛主席听汇报的时候，有时候虽然中央个别同志去，但是可以说毛主席始终一个人听。听得很累。他的口号就是，你们把我搞成这个样子，床上地下——从床上下来——地下床上，床上地下，地下床上，搞得很累。最后报告的结果整理成《论十大关系》。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大家都看过，就不必重复地再说。

12.《论十大关系》特写。毛泽东视察工厂、农村的影片资料。天津街道挤满人群的一张照片。采访王宇清。

解说：《论十大关系》提出的处理各种经济关系和其他关系的指导方针，和随后召开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的决议，以及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论述，都代表了毛泽东和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当时对中国社会实际的正确认识，标志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时代到来了；在探索的道路上，这是个令人振奋的良好开端。可惜，这些却没能连贯地执行下去。

毛泽东一生始终保持着伟大的探索精神，但探索的路充满曲折。

王宇清（曾任毛泽东的警卫科长）：毛主席视察了天津郊区农村，视察了天津的南开大学，还视察了天津大学和它的校办工

厂的科研成果。接着主席就到市区来视察。大概是快到中午了，主席提出要吃饭，就来到了天津市正阳春饭馆。主席在这里吃饭。主席一下汽车，就被路过的行人发现了。后来群众几个街道人都满了，里三层，外三层。毛主席也非常高兴，群众情绪也非常激动。大家都不知道主席来到这里吃饭。主席临时到这儿来了，他以普通的身份到这里来，一个普通的饭馆吃普通的饭，也没有单独给他做什么准备。他很愿意接触群众，愿意到基层来看看。他心情是这样子的。所以群众一包围，对他老人家自由行动客观上形成一种限制，走路、乘车都不方便了。人挤了。

13. 毛泽东在十三陵劳动被群众包围的历史影片资料。采访武钢有关人员。

解说：毛泽东无论在哪里公开露面，总是要被欢呼他的人群层层包围。这是当年毛泽东在十三陵的镜头。由于摄影师被挤在外面，所以没能纪录到毛泽东劳动的场面。客观上，他的调查研究再也不像几十年前在中央苏区那样自由自在，能看到真实的情况了。

苏恒秀(原炉前工)：1958年9月13日下午3点多钟，毛主席说，第一次铁水出得不多啊。说，今后会多的，今后会多的。连着说了几次。毛主席看完以后就沿走廊继续往前走，走到这里和下面的人山人海招了招手，下面的欢呼声简直是不用说了。

茅希经(武钢炼铁厂宣传部)：毛主席他一生比较注重调查研究。建国以后要发展经济，他对工业生产很关心。到武钢来以

前先到了马钢，到马钢视察了，对马钢的工人说，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样东西就好办了。他是接连这样说的。所以到武钢以后对武钢生产很关心，在厂前跟领导详细询问了建设情况、建设规模。当时呢，李一清大概跟主席说：今天哪，是第一次开炉，恐怕铁还出不来。毛主席说：没关系，我今天看不到我明天还来，总之，我三顾茅庐我也要看到你们出铁。

黄顺宽(原武钢秘书处)：毛主席在来之前，早就跟我们总经理李一清打了招呼。说，你们建得怎么样？我要去看你们出铁。我们总经理就领会了。因为毛主席国庆节前要赶回北京去参加国庆典礼，所以他路过就必须看我们出铁。我们回来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在9月13日出铁，就是这么个原因。这个历史背景就是这样。后来慢慢地就是为了完成“一〇七〇”，就以小钢铁来凑数，这样出现了大办钢铁，武钢也有这个现象存在。

14. 大炼钢铁等一组“大跃进”历史影片资料。庐山会议历史影片资料。

解说：1958年，毛泽东在中南海只住了两三个月，视察了全国十七个省市。一百年来，中国落后挨打的沉痛历史，激发着毛泽东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他试图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方式，在短时间内改变中国的面貌，但是忽略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这产生的种种始料不及的问题，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

1958年冬，毛泽东着手纠正“浮夸风”、“共产风”等错误做法，但这都是在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前提下采取的措施。于是他最终不能接受1959年7月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意

见，中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转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至高无上的个人威望，阻隔着毛泽东与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沟通。

15. 采访张耀祠等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

张耀祠(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这是我自己记的材料。主席搞调查的时间,讲话的时间,我这上头有。这是当时主席交待回去调查的任务,非常具体,一条一条讲的。1955年1月,他指示我们,要从全国每一个省每一个专区,调一个现役军人到中央警卫团一中队。主席通过这些人间接和农民接触,这样就可以了解全国的一些情况。参加调查农村情况的,就有张仙朋,有曾文,有高碧岑,人很多,我一下子记不起来了。

张木奇(曾任毛泽东的警卫):我来给你们看一看。这里边着重是我们家那个合作社社员一些利益问题,以及一些好坏社的对比情况,同时这些社在我们了解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和反映。

曾文(曾任毛泽东的警卫):这是当时农村调查我写给主席的报告的提纲。我还有一份东西就是第一次汇报,主席有批示。那个后来给军事博物馆要去了。现在还在军事博物馆。

张仙朋(曾任毛泽东的副卫士长):先不要拍。这是我写的宫家岛乡调查报告。这是主席给我写的。他说你应加上山东省福山县。这是主席一个字一个字给我改的,一个字一个字给我批的。你看主席这里有批示:“写得还好,文字应通俗些。要研究社会情况,学得经验。”批示这么几个字。后来主席随着生产建设的

发展,觉得利用回家这十天半月的假搞调查,恐怕还不行。所以他考虑很长时间,就下决心将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他的机要秘书、他的英文秘书、卫士、警卫等等,分期分批地放到农村锻炼。当时主席曾经讲过,你们要下放一年农村,再下放一年工业,再下放半年商业。

16. 广州小岛,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旧址。采访通先知。

解说:间接的调查只能解决一时一地的问题。1961年初,毛泽东直接组织和领导三个调查组赴浙江、湖南、广东三省农村调查研究,随后又在广州召集了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逢先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广州会议当时主要解决什么问题?解决农村问题。当时处在经济最困难的时候,特别是农村里头十分困难,毛泽东召集这次会议,主要是要彻底解决农村问题。这次会议的成果主要是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在这之前毛泽东就下决心,要解决农村的困难问题,扭转整个国民经济困难的形势。所以在这之前,1960年底到1961年初,就开中央工作会议,接着开八届九中全会,他在八届九中全会上就提出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说要使1961年成为实事求是年。1961年3月广州会议以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当时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邓小平同志、彭真同志,还有其他一些中央领导同志都下去调查。所以可以说,1961年真是实现了毛主席讲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之年,实事求是之年。

17.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有关邓小平的画面。1984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阅兵式。邓小平有关恢复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的讲话。

解说：1961年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在十七年后为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这位党的第一代领导成员，成了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他复出后，果断提出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新的探索开始在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探索再一次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那就是：不以书本为教条，不照搬别国模式，闯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

18. 邓小平 1992 年南巡的画面。

解说：如同在本世纪 20 年代末毛泽东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一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仍然经过艰辛的探索，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使今天的中国充满希望。

再回首，毛泽东的探索更加令人难以忘记。

19. 黄河大合唱交响乐。莽原大地。奔腾的黄河水。

解说：1952年，毛泽东面对黄河说，大家都讲，不到黄河不死心，我是到了黄河也心不死。这条中华民族的母亲之河，曾使毛泽东想到些什么？

面对大跃进和自然灾害带来的困境，毛泽东想起在江西苏

区的那段日子。他感慨地说：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做得少了。他表达了三个愿望：一是到基层搞一年工业，一年农业，半年商业；二是写一本书把自己的缺点错误写进去让人民去评价。还有一个愿望，就是骑马到黄河源头实地考察。1964年，为实现毛泽东这个愿望，中央警卫局在北京西郊山区秘密组建了骑兵大队。

20. 静场。一幅毛泽东 1964 年在北戴河骑在马背上的照片。

解说：1964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由卫士簇拥着，骑上专门为他训练的这匹白马。此时，他已是年逾古稀的老人了。

字幕：1964年底毛泽东视察黄河计划取消。骑兵大队解散，毛泽东的坐骑因病而亡。

书山有路

谁也不知道毛泽东一生读了多少书，但他反对本
本主义…… — 题记

1. 北京图书馆。采访毛新宇、薛殿玺。展示毛泽东的借书卡、借书条。

毛新宇(毛泽东的孙子):这些书毛主席都读过。主席幼年的时候就是念四书五经。《孟子》、《老子》……,这些书主席都读过。主席一生很爱读书。博览群书。在书中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我是主席的后代,唯一的孙子。受主席的影响,我也爱读历史,也很爱读哲学,也很爱读军事,也很爱读书。

薛殿玺(北京图书馆办公室主任):现在我们还保存着主席在这里的登记卡,还有一些借书条,待会儿我带你去看一看。

我们现在搞了两本书,主席过去看过的书,拿出来给你看看。这个《李氏焚书》,就是主席看过的。这里的“自叙”两个字,就是主席自己写的,这是主席的亲笔。这个是1954年的。1954年当时主席还没有办借书证,是由郭沫若郭院长代借的。后来我们馆到1958年的时候,就给中央首长包括主席,当时的刘少奇、朱德、周总理,都给他们办了借书证。当时第一批办的时候一共是……这是当时中共中央办公厅逢先知同志办的,但这个词谁签的不知道了,可能是办公厅的同志签的。当时签了三个,一个

是毛泽东，一个是田家英，一个还有张经武。他们这三个借书证是交了手续费，三个借书证一共交了四角五分钱。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主席做事是非常遵守制度的，尽管是一角五分钱，算不了太多，主席还是遵守制度，当时借书卡手续费，还是一并由办公厅给交来了。这就是毛主席当时的借书条，借书证当时的号码是00001号。刘少奇副主席的是第2号。这样写：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联系人是逢先知。在这后面是当时借书的书条子，书条子就放在这儿。当时工作人员比较有心，把它保留下来了。像《天问注补》、《楚辞》、《历代诗话续编》、《全唐文》等等。借《楚辞》借得比较多。

2. 湖南韶山南岸私塾外景、内景。采访李德湜。

解说：书籍构筑着人类的文明史，凝结了每个民族思想文化的成果。作为一位卓越的理论家和思想家，毛泽东和书籍相伴相随了一生。1902年，九岁的毛泽东被送往一家私塾启蒙。最先接触的，自然是孔夫子的书。他先后从师于几位先生，其中一个维新派教师李漱清。

李德湜（李漱清之孙）：主席就坐在这里，这个座。那时候读书打板子，老师用这么长的竹板子，有的是藤条。如果是学生不听话就掰着打，一个手掰住，这个手打。遇到不听话就打。主席没有挨过打。主席的父亲不让他读书，因为要经商，他父亲是做米生意的，卖大米，做米生意的。我爷爷跟主席的父亲关系很好，所以主席遇到了这种情况，他父亲不让他读书，主席就跑到我家里去找我爷爷。最后我爷爷找他的父亲做工作，把工作做通继续

让他读书。

3. 少年毛泽东读过的《论语》、《诗经》。广州一位小学生对此发表感想。

解说：这样的教育对于今天的孩子来说已经十分遥远了。

龙婧（广州培正小学学生）：我觉得吧，他那个私塾位置很小，可能那个时候没有多少人能上学。毛主席家大概是算富农了，所以他能上学。但是就算能上学，他读书的环境也不好。听说中午还要在那儿吃饭。我们就不用，我们还可以回家，受到爸爸妈妈的温暖。他们的位置很小，楼板也不够结实，我就想，万一它们塌下来怎么办？而且那些教书先生是千篇一律，只会教些什么“人之初，性本善”。都不像我们现在，可以教美术、地理、自然，各项活动都有。

4. 湖南长沙定王台原湖南省立图书馆。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该校三三一班学生们的感想。第八班教室，采访周彦瑜。

解说：韶山冲的少年毛泽东，向往着外面广阔的世界。他不太喜欢学校束缚思想个性的一些陈规陋习，希望有更多的自由选择自己想读的书。1912年秋，毛泽东从湖南全省高级中学退学，开始定王台图书馆自学生活。半年里，他读了达尔文、亚当·斯密、赫胥黎、穆勒、斯宾塞、孟德斯鸠、卢梭等反映19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科学成就的著作，留下深刻印象。1913年，二十岁的毛泽东为了以后能当一名教师，便报考湖南第四师范

学校，并在第二年随学校合并进入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毛泽东在这里集中学习阅读了中国经史子集典籍，奠定下深厚的国学基础。今天，这些学生最引以自豪的话题，就是他们所在的课堂就是毛主席当年就读的地方。

学生黄敏：按毛主席当时第八班一直排下来，到我们现在就是三三一班了。对这个学校的历史，我想每个同学都像我这样应该知道的。

学生周小燕：我刚考到第一师范来的时候，我的同学和我的老师都非常高兴。而且我爸爸说，你光荣地成为第一师范的学生，你是毛泽东的校友。所以我到这里来读书的时候，还比较刻苦。

学生龙彩虹：我说一下。我到这个学校来，不仅觉得做毛主席的校友是骄傲，而且我觉得他给我很大安慰，也给我带来一点很苦恼的问题。就是我的数学成绩特别不好，语文成绩比较好一点。今年期考的时候，我的数学成绩才考七十二分。开始的时候我是好伤心，后来我一想，毛泽东他的作文当年打一百分，可是他的数学打零分，而且上美术课的时候他交白卷。那样子一想，我就觉得好像好过些。因为我觉得人尽其才吧，哪方面好一点就重点发挥。

三三一班数学教师：我们三三一班的同学，跟毛主席是校友。三三一班的教室，跟毛主席的八班教室是邻居。我们感到无尚的荣幸。希望我们三三一班的同学，今后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

人才。

周彦瑜(毛泽东的同学周世钊之女):第一师范学校旧的校舍,在战争年代被毁掉了。就是1938年吧,毁于长沙大火。后来到50年代初期,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第一师范从岳麓山搬回现在这个地方。现在这个地方就是第八班的教室。是根据我父亲周世钊和其他一些同学的回忆,建成这个样子。根据他们的回忆,毛泽东当时就坐在这个座位上。因为毛泽东的个子比较高,所以排在教室比较靠后的位置。记得50年代,我父亲到北京晋见毛主席的时候,毛主席回忆他们在第一师范的生活,同时说起,我没留过洋也没上过大学,我的学问都是在第一师范打下的基础,一师是个好学校。他们两个一起在八班上了五年半学。他们第八班的合影,大家可以看到这儿有个照片。这个后面一排的就是毛泽东,这个就是我的父亲。

5. 毛泽东在八班的照片。湖南长沙岳麓书院。王夫之、魏源、曾国藩、谭嗣同照片。采访朱汉民。

解说:在第一师范,毛泽东推崇的国学大师王夫之、魏源、曾国藩、谭嗣同等人的名字是和这座千年学府联系在一起的。湖湘文化讲求实际的学风,通过它的传播代代延续。深受这种文化熏陶的毛泽东,最终没能成为一名职业教师,但他却用毕生的实践,让中国传统的思想焕发了新的生命力。

朱汉民(岳麓书院副院长):岳麓书院是湖湘文化的渊源地。毛泽东虽然不是岳麓书院的学生,但是他的岳父,也就是他

的老师杨昌济，是岳麓书院的一个教授，他在这里接受了岳麓书院的传统，他对毛主席本人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这里有一幅匾额：实事求是，是1916年当时的校长写的。1917年和1919年，毛泽东曾经住在岳麓书院，他当时肯定看到了这幅匾额，这无形中会对他产生很重要的影响。后来毛泽东主席反复强调实事求是，这个思想正好是中国传统的思想，也是岳麓书院办学的一个重要传统。岳麓书院还有四块大碑，这是岳麓书院的院训：整齐严肃。这是清代乾隆年间一个院长制定的。这个院训，对毛泽东也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毛泽东在抗大制定了一个校训：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在这个中间也有一种继承关系。当然更重要的是发展了其中一些内容。在岳麓书院的学规中，对岳麓书院的学生有一些要求，通过这个要求，也形成了一些办学的传统。这是清代乾隆年间，岳麓书院院长王文卿制定的学规。这个学规中间，王文卿对岳麓书院的学生，有些什么要求呢？像通晓时事物理，也就是要求学生了解国家大事，了解各个方面的知识，这一点也是湖南的一个传统的学风。从王夫之到曾国藩，一直到现代的毛泽东，他们都继承了这个传统的学风。这个传统的学风可以说是湖南培养的许许多多人才的一个重要特点。湖南出了许许多多的人才，大量的的是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他们正好和这种关心国家大事，参与政治这样一种思想传统，是密切相关的。

6. 岳麓书院。原北京大学红楼。原北京大学图书馆。采访罗章龙。

解说：1918年，毛泽东从湖南第一次来到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在李大钊当主任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一名助理员，每月

工资八块大洋。罗章龙是当年与毛泽东一起进北京大学的。

罗章龙：毛主席到北京大学，为什么当管理员呢？大致是这样。他是根本不赞成进北京大学的，他说北京大学好像是旧式大学的气氛很多，不是自由研究的。他说自由研究更好一些。他赞成自由研究，所以他就不去考北京大学。他多半是整理屋子，大概有十五平方米，整理这些报纸。有的时候整理得不好不够整齐，看书的人有意见了，就说你是干什么的，乱七八糟地放。他说书在乎人看，整理好了你就不会看了。他看书很专心，他有的时候在人行道上看书，人家来了说：让开点！他还不知道，人家就把他推走。可见他是这样一个看书很专心的人。

7. 一些马列主义书籍资料特写。

解说：毛泽东说过，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到1918年才读马列主义。1920年，他第一次读了刚翻译成中文的《共产党宣言》等书，便从中取了四个字：阶级斗争。从此，他用这个方法研究社会，并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

8. 夜幕下的福建永定县。《浏阳河》曲乐。浏阳河航拍。赴永定岐岭乡牛牯扑村寻找饶丰书房。

解说：为反映毛泽东秋收起义之后到长征结束前这段读书生活，我们摄制组从江西的寻乌、瑞金，经福建的长汀、古田进入永定县，当我们又听到这首乐曲时，湖南的浏阳河已经远在千里之外。

中国共产党人选择的是一条充满艰难困苦的道路。从井冈山到赣南、闽西，到二万五千里长征，革命的过程和毛泽东的经历都像浏阳河一样九曲十八弯。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在国民党地方部队的“会剿”中，永定的土地上不止一次留下过毛泽东和红军的足迹。1929年8月，毛泽东由一个普通农民背着，秘密来到永定金丰大山脚下养病。

赖楼生(岐岭乡乡长)：毛主席1929年到我们牛牯扑这个地方，一边养病一边读书。他是酷爱读书的，他在我们牛牯扑的青山下有个竹寮，在那里读书。几乎每天都在那里读。他在房子门口上写了“饶丰书房”几个字。这个图片是1973年拍的，后来这个地方去参观的人比较少了，竹林树木长得比较多，没有多少人去，后来这个竹寮也腐烂了。现在树木也长起来了，基本看不见了。这个具体地点就在山的后面。他当时读了很多书，读什么书我们就搞不清楚了。

9. 江西瑞金全景。

解说：“饶丰书房”没有给我们提供更多的信息。但毛泽东的生活里不能没有书。一些零星的回忆资料告诉我们，1932年红军打下漳州，毛泽东特意跑到图书馆找了一车书运回瑞金。其中就有列宁的两本名著《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两本书，他一生读了几十遍。

10.《彭德怀自述》第183页。采访刘英。

解说：1933年11月，他还向在前线打仗的彭德怀推荐《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说，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了，就不会犯错误。又说，你看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而这时候，“左”倾路线领导人正把毛泽东看作一个不懂马列的“土包子”。

刘英（张闻天夫人）：有一次我到中央局去，到中央局去的时候碰到李维汉同博古两个人在谈话。毛主席刚刚从博古那里离开。我听见博古在那里讲，他讲老毛——他们当时把毛主席叫老毛——说老毛也不看《孙子兵法》，也来学马列了，到我这里来借马列的书了，又一笑。那个意思就是讽刺。

11. 延安的蓝天与耸立的宝塔。毛泽东 1938 年的日记。

解说：艰苦的探索与实践使毛泽东开创了一条独特的中国革命胜利之路。1938年2月1日，毛泽东这样写道：“二十年没有写过日记了，今天起再来开始，为了督促自己研究一点学问。”

12. 一组毛泽东在延安写作影片资料。毛泽东在延安出版的理论著作特写。采访龚育之。

解说：在陕北的窑洞里，毛泽东更加发愤读书。他认为党内有二百个真正掌握马列主义的人，事情就好办了。他还打比方说，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东西；没有学问好比在暗沟里行走，摸索不到方向。

毛泽东开始从理论上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当他为这些鸿篇巨著打上句号的时候，他就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无可争议的政治、军事领导人，同时还登上了一座精神领袖的巅峰。

龚育之教授：毛泽东也说过，每一个国家的共产党人，都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创造自己的理论。过去中国就没有创造出来，因此革命就走了很多的曲折。有了两次曲折，革命胜利又失败，胜利又失败两次曲折的经验，总结了个经验，又分析了抗日战争形成的中国矛盾的各个方面。把这个经验很好地总结起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加以系统化，这就创造了中国革命的新民主主义的理论，指导中国抗日战争和抗日以后中国发展前途的一系列理论著作。正是这些理论著作，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成熟，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在多方面展开。

13. 延安杨家岭，1945年4月23日中共“七大”开幕。

解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是1928年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的，距中共“七大”的召开相隔十七年之久。这期间的1938年，共产国际明确传达了中共党的领袖是毛泽东的指示；这期间的1943年，共产国际正式解散。

“七大”上，中国共产党确立以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并把这个规定写进了党章里。

14. 新华门。丰泽园菊香书屋。采访高智。

解说：1949年9月，毛泽东带着一批书进了中南海丰泽园内的菊香书屋，一住十七年。

挥散战争的硝烟，拂去历史的尘埃。这个以前清王朝的藏书地，从此成为毛泽东名符其实的书斋。除了马列著作，在毛泽东身边放得更多的是中国哲学、历史和文学典籍。毛泽东是大学问家，他读过《资治通鉴》，还通读过洋洋四千万字的《二十四史》。

但毛泽东更有一个政治家的独特视角：他从浪漫主义诗人屈原身上体味批判精神和战斗性；他从《诗经》的国风里得出老百姓也是圣贤的结论；他从小说《红楼梦》里看到的是封建社会的一部历史。跨越千年时空，毛泽东在书房沟通着中国的历史、现实和未来。

高智（曾任毛泽东的秘书）：这个地方是主席的卧室兼办公的地方。他休息的时候也办公、看书。就在这里。这儿放着很多的书。这是主席当年吃饭的地方，这个就是给主席打饭的饭盒。因为主席吃饭很简单，就这么一个小盘盘。但是每次这个辣椒不能少。吃饭的时候他还坐这里看书。主席理发也简单，就是平常坐这么个藤椅，理发的时候不是看报纸就是看书。他有时候吃完饭拿着书，还在这个沙发上坐一坐。这就是主席的卧室。这周围你看都是书。这都是当年看过的这些书。有的书他不让随便动，有的书看完以后他就叫田家英同志，逢先知同志，有时也叫我们整理一下，整理以后保存在书房里面。这就是主席睡觉的床铺，主席习惯睡木板床，他睡觉就是这么一块地。床上这面都是书，书报刊物，有时堆得这么厚。看的时候就躺在这个地方。主席有时看书，为什么看我还弄不清楚。你比如在北戴河有一次游泳的

时候，休息时主席突然叫，高智，你给我找一本《集贤增广》来看看。以后我就给田家英同志打电话，第二天就把这本书送来了。送来以后那天下午主席还在休息，我把那本书看一下，一看，很有意思。我就用大号金星笔抓紧时间抄了一下。我抄完了，主席他老人家也醒来了。醒来后我就把那本书给了他。他为什么要这本书，这几十年来我也还没搞清楚。

15. 韶山纪念馆找到一只木头箱子，定格。一组毛泽东视察全国各地的影片资料。采访逢先知。

解说：这是韶山纪念馆里保存的一只木头箱子。每逢毛泽东外出视察，像这样的几个箱子，总要装满书提前两个小时搬上飞机或火车。据说，毛泽东外出要带哪些书，是当地干部非常感兴趣的问题。因为毛泽东的许多话题，经常是与他最近所读的书籍有关。

也许，毛泽东对中国文史的偏爱，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局限了他作为一个国家管理者对社会化大生产的了解。但他的一生，是坚持反对本本主义的一生，他自始至终针对着中国社会现实问题去读书，去想问题。毛泽东的书单背后，往往包含着他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和思考。而这些又是值得我们今天再去回味的。

逢先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1959年10月23日，毛主席要外出，让我们给他准备一些书。这个书目单子我记下了，到现在还保存着：“主席外出要带走一大批书，种类很多，包括的范围很广。他指出要以下一些。”下面就是这些书了。（滚字

幕：《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选》、《工资、价格和利润》、《哥达纲领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列宁文选》、《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进一步，退两步（我们党内的危机）》、《做什么？（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列宁主义基础》、《列宁主义问题》、《联共（布）党史》、《毛泽东选集》、黑格尔的著作、费尔巴哈的著作、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荀子》、《韩非子》、《论衡》、《六祖坛经》、《大涅槃经》、《法华经》、《般若波罗密多心经》、《二十四史》、《史记》、《资治通鉴》、《昭明文选》、《元人小令集》、《鲁迅全集》、《古诗源》、郭沫若《十批判书》、《青铜时代》、《金书丛考》、字帖和画、中国地图、世界地图……等近百本。）从这个目录来看，毛泽东读书的面非常广泛。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从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到资产阶级的一些著作，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甚至科学技术，包括一些具体科学技术，这些书他差不多无所不读。所以他的知识面非常广泛。他爱好也非常广泛。1950年我刚到他那里给他管书时，他就给我提出来，他说，要把解放前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出的所有书都给他收齐了。那当然是不可能的。但反映了他确实是酷爱读书。另一个就是他非常之博学，所以叫他博览群书的革命家。

16. 毛泽东在书房接见各国外宾的一组影片资料。

解说：1966年8月，毛泽东从菊香书屋搬到游泳池旁。从此

人们便经常从新闻简报和电视新闻看到这样的镜头：毛泽东在书房接见来自世界各地的客人。

17. 1974年英国首相希思与毛泽东会见影片资料。

解说：1974年英国前首相希思来华，送给毛泽东一张有达尔文自己签名的照片及达尔文的著作《人类原始及类择》。毛泽东以一种钦佩的口吻与希思谈到了这位进化论者。他说，达尔文，世界上有很多人骂他。我读过他的书，帮他辩护的叫赫胥黎，他自称是达尔文的咬狗。毛泽东还评价了赫胥黎的《天演论》，说前半部是唯物论，后半部是唯心论。

18. 1975年毛泽东会见外宾的画面。采访基辛格。

解说：1975年，毛泽东对一位外国领导人说，我名誉不好，有人骂我，蒋介石就骂我们是土匪。接着，他引用了《昭明文选》里的一句话：“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并解释说，就是人必骂之，人不被骂不好。

毛泽东的书房成了他沟通外部世界的一座桥梁。他曾说，读历史的人不一定是守旧的人。他敏锐地接收着来自各个国家、地区的信息，又引经据典东方式地向对方表达他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毛泽东向世界展示的不仅是他个人独到的魅力，更是中国文化的悠久与醇厚。

记者：当观看您访问中国的纪录片时，我已注意到第一次会见是在毛泽东的书房。那时候对他的印象如何？是不是知识渊

博？

基辛格博士(美国前国务卿)：我们的会见多数在同一个地方，就是在书房，唯一不同就是第一次会见时，他在躺椅上学习，后来那躺椅一直在那里。在地板上有许多书。第一次会见时，他总不时说一些中国的诗词，我几乎很难理解。他当然是极为睿智的。

19. 采访正在中南海松寿堂加晚班的毛泽东藏书管理组。展示毛泽东批阅过的一些书籍。采访胡绳、李讷、徐中远。

周留树(毛泽东藏书管理组负责人)：现在打号打到多少了？三万四千九百六十九。(画外音)现在从打号来看，我们仅仅完成了三分之一的工作量。这就是毛主席的藏书。包括经典著作、中外的哲学、政治、经济、文化、科技，还有经史子集的线装的古书，一共二十二个大类。这里就是毛主席看过的一些经典著作。请你拿一下毛主席看过的《资本论》。这个版本，主席看完了以后，在上面作了一些眉批。这个写了1938年，这是1938年咱们国家出版了《资本论》。毛主席写了，1938年出版《资本论》的时候，距《资本论》首版的时间是七十一年。毛主席看这个版本是1954年，距《资本论》出版是八十七年。主席在书上作了一些记载。这就是主席看过的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主席在上面有很多眉批，有很多用英文作的眉批。主席懂英文，有的上面有眉批，有些字主席不太认识，查了字典在上面再注，注在旁边。旁边这些中文字都是查了字典注的。这本是毛主席自己的著作《矛盾论》，是英文版。看了以后上面也有很多眉批，有很多眉批也是用英文写的。你看这都是英文写的。主席看的经典著作里还有斯大林的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主席看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主席在上面有很多重要眉批，其中有的地方写到了发展商品经济。上面就写了，在我国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工具也是商品。据有关同志回忆，主席作这个眉批是1958年11月9日。

胡绳（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毛主席他最初提出、提议要读书是在1958年11月郑州会议上。那时候毛主席已经发现，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间出现的一些“左”的错误。按当时他的批评来说，就是这些错误主要在于违反了客观的经济规律。所以他这时候提议党内干部学习政治经济学，用意就在于要大家去学会了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周留树：这就是毛主席看过的《中国妇女》，是1962年的8月份第8期。这一篇文章，就是秦怡写的《访日札记》。毛主席看了以后觉得这篇文章很好，所以批语：“此文很好，可看。”而且加了三个圈。这部《鲁迅全集》，我们最近在整理中间发现的。凡是毛主席晚年看的用红铅笔，有个规律，早期是用黑铅笔。这里有两个圈，说明主席是看了第二遍。这是毛主席看的《水浒传》，是金圣叹的七十一回本，是《水浒》里边最好的一种版本。主席对咱们国家的重要名著，像《水浒》、《西游记》、《红楼梦》，都是看过多遍。

李讷（毛泽东的女儿）：我们读《红楼梦》是在小学。我父亲在我四年级时就开始让我读唐诗，让我背《琵琶行》、《长恨歌》，亲自给我们选了历代古诗，以后请他们给我们印成册，一人都发了好多本。一人好几本让我们背，接触中国文学。以后到了五年级，我父亲就让我们读《红楼梦》。当时好多中央同志都说，跟我父亲

说，这恐怕不行吧，她那么小就读《红楼梦》，没有判断能力，她会中毒的，这样危险。我父亲说，你不让她看她永远也没有分辨能力，这样她在看的过程中才有分辨能力。而且我父亲也不是说他就放手不管，就让你看去了。他每个礼拜天回来，吃饭时大家围在一起都问，你看到哪儿了？是怎么回事？每个人物逐个逐个地分析。他是很放手的，让你到里头去闯。但是他抓得很紧，他唯恐你迷失，给你讲，给你讲。这样的话，我们经过看，又经过他的讲解，所以我们才……比如谁是好人，林黛玉是好人，薛宝钗是不好的。那个蓝翎、李希凡出来以后，我们觉得很正常。我们已经很自然而然地接受这个了。所以我父亲真正是无为而无不为，一点都不错。

周留树：主席还看小人书。主席看书很广泛，一个伟人知识的来源，一个靠社会实践，还有一个靠吸收书本上的知识。你看这一本，这一部《南史》，主席很喜欢读。在二十四史里边批注是比较多的。而且主席看历史书有个特点，他联系现实问题作下一些重要批注。对。你看他这个圈圈画画的。有的他读得很细，标点符号都给加上。因为这些书它没有标点符号，后来主席读时都给它加上了。拿主席最喜欢看的那部《容斋随笔》。这是他那个老的版本，主席病危期间提出来看的最后一本书就是《容斋随笔》。那个时候主席病很重啊。

徐中远（曾任毛泽东的图书管理员）：《容斋随笔》这部书，是南宋洪迈这个人撰写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宋代人文掌故，以及人物传记、人物评论这方面的一本笔记性体裁的书。这部书主席是很爱看的。早在延安时期就看过，延安时期看过的这部《容斋随

笔》，转战陕北后来到西柏坡，一直带到了中南海。这部《容斋随笔》主席一直放在身边。但是到了1976年8月26日，主席要看这部书的时候，因为主席要得很急，秘书一时找不到，所以他又找我，还要找这本书。所以我就请柏林寺图书馆的同志查找，找到了这部书。

20. 夜幕下的菊香书屋。

解说：毛泽东逝世十七年了。中央档案馆毛泽东藏书管理组的整理编号工作还在进行之中。据统计，仅毛泽东批阅过的书就达一千三百多册。但毛泽东一生到底读过多少书？恐怕是谁也无法统计的。毛泽东和书相伴相随了一生，书是毛泽东留下的一笔丰厚遗产。

字幕：到本片播出前，已知毛泽东藏书91000册。整理工作仍在进行之中。

大海纳百川

毛泽东说：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事……

——题记

1. 黄帝陵、轩辕庙（“人文初祖”牌匾、黄帝像石刻图）。群众祭祀活动场面。国共同祭黄帝陵的照片。

解说：远古时期，在我国黄河中游，有一位部落首领，胸怀大志，逐鹿中原，平息部落间的纷争，统一了天下，还做了许多为民造福的事情，深受百姓拥戴。他就是传说中的轩辕黄帝——中华民族的祖先。

多少年来，一代又一代的华夏子孙，都向他献出深深的敬意。

1937年清明节，对黄帝陵来说是个特殊的日子。在中国大地上拼杀了十年的两大阵营的领袖——毛泽东和蒋介石，同时派代表来到这里，祭奠共同的祖先。

2. 毛泽东祭黄帝陵文的碑亭。黄帝陵航拍。西安城航拍。西安事变的电影资料、照片，张学良公馆空镜头。采访王淇。红军大学旧址。采访汪裕尧。

高文增（曾任黄帝陵研究所所长）：陕甘宁边区政府派林伯渠代表来祭轩辕黄帝，林伯渠到这儿来宣读的祭文是由毛主席

起草的《祭黄帝陵》，当时国民党在这儿也宣读了祭文。祭罢陵以后，在国民党的报纸上只发表了国民党的祭文，而共产党的祭文没有发表，这个祭文解放以后我们把它刻到石碑上。

字幕：……频年苦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

解说：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毛泽东以这篇祭文，在黄帝英灵前再次呼吁：建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实，这一建议，在几年前就告诉了蒋介石，但是正忙于“剿共”打内战的蒋介石无心理会，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直到1936年底的西安事变，才出现了时局转换的契机。

1936年冬天，蒋介石亲临西安，督令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开赴陕北，“围剿”红军。张、杨两将军以民族大义为重，扣押了蒋介石，逼蒋抗日，这就是著名的西安事变。

王洪（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副会长、教授）：事变初期的时候，党中央包括红军将领，曾经提出过审蒋的意见，就是说把蒋介石交付国人审判。不过，这个时候毛泽东对于蒋介石在国民党中的政治倾向也还是有一个分析，认为他是属于“中派”。党中央经过几天的观察、分析、判断，在12月19日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要承认蒋介石在南京国民党政府中的领导地位，要努力地促成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发动。这是集体讨论的意见，由毛泽东最后下决断。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的精神，周恩来等中共代表，在西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活动，联络各方，团结各方，

对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3. 保安红军大学旧址。国民党三中全会资料。斯诺为毛泽东拍照。红军将领换装。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

解说：十年内战，说不清有多少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惨遭国民党反动派的杀害。当时，党内外有许多人对释放蒋介石想不通。1936年12月28日，毛泽东到陕北保安红军大学讲演。有学员问为什么不能杀蒋介石。毛泽东回答：如果仅仅从我们党的私仇出发，杀蒋介石来解恨，忘记了民族危亡这个大局，那还能称马列主义的政党吗？有人担心，放蒋后他不接受抗日主张怎么办？毛泽东打了一个比方，说陕北农民赶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是在前面拉，二是在后面推，三是用鞭子打。我们就是用这种办法逼蒋抗日。

汪裕尧（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我们中国共产党争取早日实现抗战所主动采取的一个重大举动，这个电报提出了五项要求，四项保证。这四项保证的第一项，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的武装暴动的方针；第二项，就是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的指导。当这个电报传到国民党的五届三中全会上去以后，得到了国民党内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领袖人物的支持、响应，在这个会议上虽然没有能够作出明确的表示、决定，但实际上它接受了国共联合起来，一致抗日的条件。

解说：这是毛泽东非常喜欢的一张照片。它是美国记者斯诺拍摄的。

这是拍照前的影片资料。他就是斯诺，毛泽东在画面外，他没有戴军帽，可斯诺觉得一位红军统帅戴上军帽更神气，就把自己头上的军帽给了毛泽东。细心的观众可能会发现照片上的帽子和衣服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但是不久为了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毛泽东便主动告别了这顶缀着红星的八角帽。

1937年8月22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命令，于是，朱德换了军帽，彭德怀也换了军帽，红军将领和士兵全都换了装。连军旗也换了。

对此，毛泽东是怎么想的呢？

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这篇文章中，我们找到了答案。毛泽东说，只有这样，才能改变国内两个政权敌对的状态，这是一种有原则有条件的让步，实行这种让步是为了去换得全民族所需要的和平、民主和抗战。

4. 延安的电影资料、照片。采访王德芬、华君武。延安文艺座谈会旧址、照片。

解说：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局面形成以后，国民党不得不解除对我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向往延安的有志之士和大批知识分子纷至沓来。

毛泽东一贯主张，干革命，打日本，既要靠枪杆子，也要靠笔杆子。他敞开了心扉，同知识分子广交朋友。

王德芬(作家萧军的夫人):萧军到延安一共两次。第一次是1938年,从临汾民族革命大学步行到延安的,走了二十多天。毛主席知道他是写《八月的乡村》的,作用很大,另外也知道他是鲁迅先生的学生,所以特别想见见他,就派他的秘书,叫和培元,说你去请一请萧军。萧军那个时候特别年轻,他有点傲气,要是一般人的话,毛主席请那是特别高兴,马上就去的,他就不,他跟和培元说,我是路过,我呆不了几天,我马上就要到游击队去打游击去了。秘书回去跟毛主席一说,毛主席亲自在第二天就到旅馆来看萧军来了,这就使得萧军挺惊讶的,主席真是礼贤下士,所以特别受感动,也觉得非常惭愧。第二次就是1940年了,刚到延安的时候,非常高兴,跟文协的同志,好多作家,都合作得非常好,后来有些小矛盾就产生了。观点不一致啦,或意见不一致啦,弄得挺不愉快的。所以萧军就想走了,就去向毛主席辞行去了,主席就说你只管说,对延安什么事情不满意,你都说出来,我好知道你为什么要走,因为人民奔延安来的没说要走的,所以萧军就把肚子里的话全说出来了。在那天谈了以后,为什么没走了呢,因为主席特别诚恳、善意,所以他说好办,那不走了,还留下来。那时候他就问主席,咱们党有没有文艺政策,制订了没有。主席说,哪儿有工夫订呀,现在正打日本,还没来得及制订一个文艺政策呢。

解说:1942年春,毛泽东专门抽出一个月时间,同文艺工作者广泛交换意见,了解延安文艺界当时争论的一些问题。这年5月,毛泽东和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凯丰联名发出请柬,请来近百名作家、艺术家和有关部门领导,在杨家岭座谈。毛泽东作了《在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次会议和毛泽东的讲话成为中国现代文艺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华君武(著名漫画家):1942年七八月间吧,我在《解放日报》发了一张漫画,可惜原稿已经没有了,这张漫画题目就叫“1939年的延安植树”,这个画面上也就画了一两根树杆吧,都已经死掉了。

毛主席讲,他说我看到过你那张漫画,他说植树不好好地植树,不管理它,这是应该批评的,也就是说可以讽刺的。但是他说,你这个题目呢,是咱延安植树,延安很大呀,到底哪个地方植树不好。他就举了个例子,他比方说,王家坪,比方说那个地方植树不好,就应该写上延安王家坪植树,而这样就知道,不是延安统统植树不好。接着他就讲了两个关系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应该注意个别和一般的关系,另外就是应该注意局部和全局的关系。毛主席的这段教导,对我以后的漫画少犯片面性的错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解说:毛泽东一直同知识分子有着广泛的联系。建国后,他还进一步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以促进科学文化事业的繁荣和发展。

5. 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照片、空镜头。采访刘英、薄一波、冯牧。

解说:毛泽东善于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这是他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最严酷的岁月，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难以维持党政军机关庞大的开支。这年11月，一位开明绅士李鼎铭，在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提出了“精兵简政”的提案，引起争论。有人反对说，抗日战争正是紧张的时候，精兵就不能发展部队，简政则很难巩固我们的民主政权，精兵简政就可能削弱我们的力量。有人因为李鼎铭是党外人士，甚至怀疑他的动机不纯。毛泽东看到这个提案后，给予了充分肯定，把它抄在了自己的笔记本上，还批注说：“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在这次会议上，李鼎铭先生被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

解说：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左”倾领导者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搞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曾给党的事业带来极大的损害。那么，毛泽东又是怎样做的呢？

张闻天、王稼祥，这两位党的领导人，在中央苏区曾经拥护过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主张。1934年10月，他们和毛泽东编入一队，踏上了长征的路途。

刘英（张闻天夫人）：长征路上，他们三个人在一起，这个时候，毛主席就有意识做工作。那个时候毛主席孤军奋斗是斗不了呀，因为当时毛主席的威信不像后来的那样高，那个时候是被打倒了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所以他就要争取力量，他看中了王稼祥，看中了张闻天。张闻天这个人是比较实事求是的，他看真理，他受毛主席影响是很深的，所以他后来衷心地拥护毛主席。这是他跟我讲的，他说毛主席是有学问的，他对中国特别了解，他打仗也是有经验，他那是打出来的，否定他是错误的。他（张闻天）

自己后来很深刻检讨他的错误。到了陕北以后遇到许多问题，不是毛主席来就是他去，两人总是商量，配合得非常好。政治局开会也集中在我们窑洞里开，因为张闻天负责嘛。一开会的时候，他（毛主席）讲的话，张闻天就把这些意见综合进去，他就说张闻天是“青天”、“明主”。他曾给我写了一首诗，我可惜没有记起来。他说：“风流天子李三郎，不爱江山爱美人。”他说现在的“当今”，就说他（张闻天）是皇帝呀，是又爱江山又爱美人。我说毛主席你别瞎讲，我才不是美人哪。他在开玩笑啦，以后他就喊他（张闻天）喊“皇帝”，喊我喊“娘娘”，结果我这个“娘娘”的名字后来就出来啦。后来整风批判过去教条主义错误，张闻天也认识这个错误，大家认识清楚了。所以“七大”是一个团结的会，大家心里很舒畅，他（毛泽东）对这些人也仍旧团结，都还当政治局委员，当中央委员，他整事不整人。

薄一波：那时像王明呀，是选举不上的，大家（对他们）都是很气愤的。毛主席就说了两句，说王明他们是代表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这一部分人，我们现在对这一部分人还要团结。毛主席在这里面找了三条王明跟我们的共同点，一个共同点就是打倒帝国主义，一个呢就是打倒国民党，一个是土地改革，大家都是一致的。在选举之前，他吩咐其他的人到各个代表团去做说服工作，说团结对我们有利，要五湖四海。做好这些工作以后，到底能够选上选不上，不知道。选举完了以后大家都走了，就留下一个唱票的人了。那时候唱票也不像现在按下电钮，多少多少就计算出来了，那时是画个“正”字，一票、二票、三票、四票、五票，画那个“正”字。毛主席一个人坐在主席台上不动，不走，奇怪啊！他不走干什么呢？所以也有人看，等着。毛主席等着唱票，一个一

个唱、一个一个唱，最后王明的票已经过了半数一票，毛主席站起来，很轻松地走了。

解说：毛泽东团结王明的真诚和气度，就这样留给了历史。同一年，历史还记下了另一个令人难忘的瞬间。

冯牧（作家、文艺评论家）：那时候正是延安的整风运动、审干（审查干部）刚刚结尾的时候，结尾的甄别，就是对被扩大化、被错误审查的同志作出正确结论的时候，毛主席作报告，实际上就是带有总结性的。他充分肯定了延安的整风运动对于我们拨正党的路线，克服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左”的路线对中国革命带来的不利影响，意义巨大。同时，也讲到审干运动，认为审干运动是必要的，但是他认为有扩大化，伤害了一些不应该伤害的同志。我记得当时他举了个例子，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说审干运动是很必要的，因为大家来自五湖四海，谁都不了解，把自己的经历搞清楚，这个很有必要，这就好比每个人都需要洗澡一样，我们洗澡，因为要讲究卫生，应该放一点灰锰氧，但是我们这个运动，灰锰氧放多了一点，有的同志的皮肤受到了伤害，这事他承担责任。他说，为了那些同志受到不公正的审查，为了他们所受到的思想感情上的伤害，我应该代表党中央向同志们行个脱帽礼。脱帽礼什么意思呢？给你们扣的帽子，我亲自给你们把帽子摘下来。然后他自己把自己的帽子摘下来，给大家一鞠躬。这个场面只有几秒钟，我看到绝大部分同志都流眼泪了，一切云雾立刻散去，天晴日朗。

6. 抗战胜利的电影资料。重庆谈判的照片和旧址。采访重

庆市党史研究办公室人员。

解说：1945年8月，各党各派、各界群众，欢庆着抗战的胜利，也思考着未来。民主建国，已成共同的心声。蒋介石在命令其军队大抢地盘的同时，也不得不装装门面，连发三封电报，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和平谈判。最初，他估计毛泽东不敢来，可当毛泽东真的出现在重庆机场时，蒋介石只好假戏真做了。

（配蒋宴请毛的画面）

频频地举杯，蒋介石竭力制造和谈气氛。然而，就在毛泽东飞抵重庆的第二天，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就密令各战区，印发蒋介石的《剿匪手本》。中共代表团则有准备地提出和谈方案，毛泽东、周恩来还遍访重庆各界人士，广交各界朋友。中共和谈的诚意，民主建国的方针，在人们心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胡康民（重庆市党史研究办公室副主任）：这一带地方，是一个当时叫“民主之家”的遗址，这是民主人士活动的地方，毛主席1945年到重庆就曾经到这个地方来过三次。拜访张澜先生和沈钧儒、张申府、左舜生这批民主人士，接受过张澜先生的邀请，出席过宴会。这个地方后来被毁了，现在根据建设的需要，建起了楼群、大楼。

颜太龙（重庆谈判期间曾任毛泽东的副官）：毛主席所有的一切外出活动，没有一次我不去的，哪一天见谁哪一天见谁，我到现在不记得了，因为见了好多人，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阻止、建议毛主席不要去见的，就是戴季陶。总理（周恩来）把主席的名片、他的名片给我，他说，你知道戴季陶住的地方吗？我说我知

道，就住在离我们不太远的地方。他说，毛主席要去拜会他。我说这个是特务头子，你们去拜会他干什么？他是跟我们势不两立的呀，不需要去。毛主席就在旁边说，你不懂得，我们去见见好啊，他说，如果他见我，我们去谈谈，不见我，我们礼行到了。这个话他当时对我们说的。（我们）把片子一递进去，他（戴季陶）来了。那时是龙飞虎、成龙、我三个人保卫去的。陈立夫也去见了，他（毛泽东）那个时候要看陈立夫去，我说这是个中统特务，不需要去见他，毛主席说见见好，将来认识。就这两个人我们是有点意见，不大同意他们去见，作为保卫工作人员来讲，提出了我们的意见。

记者：当时有照片留下来吗？

颜太龙：没有照片，当时我们那里没有一个人会照像。

解说：毛泽东在重庆四十一天，他同各界人士的交往没有留下图像资料，我们只好从文献记载中来了解毛泽东当年和各界人士的频繁交往了。

滚字幕：8月28日，毛泽东抵达重庆。

同日，会见郭沫若、于立群、王世杰。

30日，访宋庆龄。

同日，会见柳亚子、沈钧儒、陈铭枢、王昆仑、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等。

同日下午，访张澜、鲜特生。

31日上午，赴邵力子宴会。

同日下午，会见王昆仑、许宝驹、屈武、侯外庐、曹孟君、谭惕吾等。

同日晚，赴吴铁城宴会。

9月2日上午，会见王世杰，中午出席张澜宴会。

同日下午，会见邹鲁及各方友好。

3日下午，访于右任、戴季陶、白崇禧、吴稚晖。

同日下午，会见郭沫若、于立群、葛伯赞、邓初民、冯乃超、周谷城。

4日上午，会见白崇禧。

5日，赴邹鲁午餐。

同日，会见《大公报》记者。

同日晚，赴褚辅成、黄炎培等六参政员的宴会。

6日，赴于右任午餐。

同日下午，访居正。

同日下午，访柳亚子、张伯苓。

同日晚，赴宋庆龄宴会。

7日，赴覃振午餐。

同日，赴冯玉祥晚宴。

8日，赴孙科晚宴。

9日，会见郭沫若、于立群等。

11日晚，宴请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等。

13日，赴戴季陶晚宴。

14日，赴白崇禧晚宴。

15日下午，访张澜。

同日下午，宴请左舜生。

17日下午，会见刘鸿生、范旭东、胡西园、吴羹梅、吴蕴初、章乃器、潘昌猷等。

18日，赴国民参政会茶会。

20日，访陈立夫、叶楚伦、程潜、贺耀组。

同日，赴《大公报》社宴会。

22日上午，接见蒋匀田。

同日，会见重庆作家和戏剧界人士。

30日，在红岩村会见青年学生。

10月2日，会见柳亚子。

8日，赴张治中宴会。

9日，应邀赴林园与蒋介石夫妇共进午餐。

10日，赴“双十”国庆招待会。

11日上午，离开重庆。

7. 蒋介石离开南京资料。毛泽东进入北平资料。采访傅冬菊、余湛邦。毛泽东赴北平车站接宋庆龄、和宋庆龄等人上天安门电影资料。采访吴阶平。

解说：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总统宣布“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当他登上美龄号座机的舷梯离开南京时，回头一望，没有看到以往各界人士欢送的热闹场面了。

同年3月25日，毛泽东从西柏坡来到北平，在西苑机场，受到近万名群众的热烈欢迎。在一百多名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重要人士当中，有许多来自重庆。

解说：此时此刻，毛泽东没有忘记七年前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说过的一句话：“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

毛泽东着手筹建一个名符其实的民主政府。

傅冬菊(傅作义之女):毛主席对在人民解放事业中作过贡献的人不会忘记。北平和平解放以后毛主席对我父亲做了许多工作。当时他最关心的问题就是他的部队,跟他多年的这些人怎么办?所以后来他自己主动地提出来,他说他想见一下毛主席。后来就通知他,叫他2月下旬去一趟西柏坡。到那儿以后,毛主席很风趣地跟他说,过去我们是在战场上见面,清清楚楚,现在我们是姑舅亲戚,难分难舍。毛主席还说,我俘虏你的那些人,你可以见他们,也可以把他们送到绥远去,让他们学习,学习以后,我还要用他们呢,这个就解除了我父亲的思想顾虑,所以他回来以后就整个变了一个人,把那旧军装也扔掉了,换了中山装,这就反映他精神面貌起了很大变化。到1949年的5月端午的时候,他生日主席还请他去吃饭,他非常高兴,觉得主席考虑得那么周到,连他生日都记得。主席那时候就问他,你解放以后打算做什么工作。我父亲就讲,他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在绥西修过黄河水渠,他觉得这个工作可以直接为人民服务。毛主席就记着这个事,所以到政协开了第一次会议以后安排政府部长的时候,就把他安排了水利部长,他觉得他的愿望达到了,所以觉得非常高兴。

解说:张治中,原是国民党军的上将,曾跟随蒋介石二十多年。1949年4月,他作为南京政府的首席代表赴北平谈判,诚恳地接受了共产党的和平建议。但南京政府拒绝签字,导致和谈破裂。毛泽东、周恩来劝他留在北平。

余湛邦(原张治中的秘书):毛主席有一天对张治中说,我们要召开政协,要建立中央人民政府,想邀请你参加。张治中说,过去国民党政权是我们负责的,失败了,成为过去了,我这个人也就成为过去了。毛主席笑了笑说,不,不,过去的等于过去,年三十,今后,还要从大年初一做起。这话有很强的暗示力,这不但是个幽默的话,也是表示他对张治中的评价,对他寄予希望。毛主席对张治中很信任,你比方说像国旗,就是我们现在的国旗,这是张治中竭力主张的,当初(一届全国政协会议)摆两个国旗图案在那里,一个是一个杠,代表黄河,红星,满地红,一个是现在的国旗。在讨论的时候,多数人赞成这一杠的,张治中说,不,这个不好,“杠子”就从来没有代表河流的,这是一;第二,一个杠,那不就是分裂中国了吗?这可不好哇。毛主席一想,这话有道理呀,他然后拿出现在的国旗给大家看,他说怎么样,用这个好不好?有人又说,可是那里有四颗星,四颗星是代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将来阶级要消灭了,要少了一个两个怎么办呢?毛主席说,这还不容易吗,把那说明改一改,是表示全国的团结,这样不就行了吗?

解说:1949年8月28日,毛泽东在北平火车站等候宋庆龄的到来。宋庆龄是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国民党的左派领袖,一生都在为中国人民的和平解放事业奔忙。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平逝世后,她便再也不愿来北平。但是,毛泽东两次真诚的邀请,使她改变了主意。但宋庆龄没有想到,毛泽东会亲自上车站迎接她,这种礼遇,对共产党的任何领导人,都不曾有过的。

一个月以后,宋庆龄和各民主党派的代表,同毛泽东一起登

上了天安门城楼。

这是一个由各党、各派、各界人士组成的真正的民主联合政府。在这届政府中，党外人士在六位副主席中占三位，五十六位政府委员中占二十七位，四位政务院副总理中占两位，十五位政务委员中占九位，政务院三十四个部门正职领导中占十四位。

毛泽东(同期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吴阶平(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主席)：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就出现一种情况，觉得民主革命胜利了，所以所有的民主党派都觉得是完成了历史任务了，实际上这种想法是很普遍的，包括有些共产党员。那时候，正是1950年的1月下旬到2月初，毛主席、周总理等还有很多的领导人都到了莫斯科，去商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在这个过程里头，在国内，很多民主党派觉得可以解散了，其中一个进行得最快的，就是沈钧儒先生，他也是一个民主革命的老前辈了，也是当年的“七君子”之一。沈钧儒先生就把他领导的救国会的成员都请来北京，所以大家签字同意，救国会就解散了。这个时候，在九三学社里也有不少人觉得九三学社也可以解散了。这个时候就到了2月下旬，毛主席从莫斯科回来了，知道救国会解散了，就非常地惋惜，说，啊呀，怎么救国会解散了呢？所有的进步组织都应该继续地发展，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嘛。就说是救国会不应该解散，已经解散了就没有办法，其他民主党派也不应该解散，特别说到九三学社，特别派了李维汉同志找到了许老(许德珩)传达这个意思，表示说还要继续发展，革命的事业还长呢，所以九三学社才没有解散，其他民主党派也没有解散，所以九三学社的发展，九三学社的继

续，都是毛主席伟大的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使它能够保持下去的。

8. 毛泽东和少数民族在一起。采访多吉帕姆活佛。

解说：毛泽东不仅开创了一个多党合作、民主协商的政府，还领导建立了一个民族大团结的国家。

毛泽东多次说过，民族不分大小，都要团结，鄂伦春族不到两千人，也要和他们团结。帮助各民族发展和进步，是整个国家的利益。建国初期，党中央确定，以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作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

毛泽东对新疆代表说，我们一定要搞好汉族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的团结。还说，汉族干部要谨慎，少数民族干部要畅所欲言。

毛泽东对西藏代表说：中央对西藏非常关心，派干部到西藏都是为了西藏的发展，藏汉两个民族互相团结，共同建设一个新西藏。

为了消除千百年来遗留的民族隔阂，1950年，中央特地派访问团到西南民族地区，向受过历代汉族统治者伤害的各少数民族，主动赔不是。

为了增进民族感情，党中央经常邀请少数民族代表团到北京等地参观学习。其中有一位很特殊的代表，就是全国唯一的女活佛桑顶·多吉帕姆。

多吉帕姆是西藏的大活佛之一。1955年，十三岁的多吉帕姆，在北京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

1959年初西藏发生叛乱时，多吉帕姆被叛乱分子胁持带到

印度。那年她十七岁。

在印度流亡的日子里，她想念祖国，想念亲人，更感到流落他乡前途渺茫。于是，她多次派人与我国驻印度商务代理处暗地里联络，要求回归祖国。在我有关方面的帮助下，她绕道伊朗、莫斯科，终于在1959年国庆节前回到北京。

解说：毛泽东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使全国五十六个民族紧紧团结在一起，团结在五星红旗下。

毛泽东说过一段至理名言：“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族人民的团结，这是我们事业胜利的基本保证。”

9. 李宗仁回国。采访程思远。

字幕：1965年7月20日，原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先生携夫人郭德洁女士回到祖国了。

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了李宗仁夫妇。

程思远（曾任李宗仁秘书）：在谈话中间，毛主席偶然插上一句话，李德邻（李宗仁，字德邻）先生，你上当了，毛主席笑着说，新中国成立以后，到了今天，台湾国民党当局骂我们是“共匪”，说大陆军队是“匪军”，那么你这次回来不是误上贼船了吗？毛主席这么个幽默感使李宗仁不知所对，不知道讲什么好，所以我当时就讲了，我说，主席，我们是搭上引路的慈航，渡登彼岸了，我们得救了。

第七集

胸中百万兵

在河北的一个农家小院里，毛泽东指挥了三大战役，白了一根头发……

——题记

1. 1955年解放军授衔仪式资料片。大元帅肩章和大元帅服。采访宋任穷。

解说：从枪林弹雨和炮火硝烟中走出了十位元帅和一千五百多名将军，人们敬仰将帅们的赫赫战功，同时也羡慕那象征着荣誉的将军服和元帅服。

解说：但是，却很少有人见到过这套军服。

这套由天津一家工厂的工人花了半年时间缝制的大元帅军服，在陈列室里默默地躺了近四十年。

这当中有着一个不寻常的故事。

宋任穷（上将，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干部部第一副部长）：毛主席实际是大元帅。授衔，我们自己没有经验，按照苏联的经验，应该有个大元帅。汇报了以后，毛主席讲，我这个大元帅军衔不要评了，我穿上大元帅的制服多不舒服啊。要到群众里面讲话、活动多不方便啊。人民代表大会上对毛主席不授大元帅，他们提出了意见。少奇同志就讲，这个东西是毛主席提出来的，你们当然可以讨论，你们讨论了以后，你们有意见，见了他的

面可以说服他，如果他不同意的话，因为他是国家主席，授军衔是国家主席下命令，他不下命令那就不行。

解说：毛泽东统率过千军万马，指挥过大小数百仗，大元帅对他来说当之无愧，但他没有接受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授予他的光荣称号。

毛泽东无疑是一代军事大家，可是他却不喜欢摸枪。

1927年秋，曾跟随毛泽东上井冈山的陈士榘将军回忆起了一件往事。

2. 陈士榘谈毛泽东与朱德会师时第一次挎驳壳枪的事。各地毛泽东纪念馆毛泽东用过的笔、砚。

陈士榘(上将)：毛主席要去见朱德，他过去是不打绑带的，打了绑带穿了衣服，就是我们穿的一套普通蓝色军装，灰蓝色的那个军装，戴的那个帽子，当时还没有五角星，以后才有的五角星。就戴了帽子，穿了军装，扎了皮带，绑了绑腿，挎上驳壳枪。他自己开玩笑地说：师长见军长，要讲军容啊。就挎了驳壳枪。他就是那么对我讲的：我是第一次挎上驳壳枪。

解说：井冈山会师后，毛泽东担任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党代表兼十一师师长，他把枪交给了警卫员，从此再也没有见过毛泽东身上挎过枪。

我们寻遍了各地的革命纪念馆和博物馆，都没有发现属于毛泽东的枪。但是，我们却看到这些地方都陈列着毛泽东用过的毛笔和砚台。

贺子珍曾经专门为毛泽东缝制了一个装笔墨和文件的多层挎包。毛泽东说，我要用文房四宝打败国民党。

3. 在龙源口战斗旧址采访

永新县委党史办研究人员：这就是龙源口，这叫龙源口村，后面叫新七溪岭，这个是龙源口纪念碑，是朱老总 1965 年亲笔题词，后来我们建造起来的，下面是个接待站。当年龙源口战斗就是在这个地方结束的，我们整整消灭了敌人一个团。

1928 年 5 月，游击战争“十六字诀”已经形成，当时在龙源口战斗，这个时候基本上对“十六字诀”进行一次贯彻。比如说第一是敌进我退。当时敌人五个团从吉安向我进犯，我们主动把大部队退回到宁冈去。同时，派萧克同志的一个连和敌人保持一定的接触。这个就比较好地体现了敌进我退。

6 月 22 日，敌人聚集在龙源口一带以后，我们的地方武装就在夜里骚扰他，就体现了敌驻我扰。这个战役首先在老七溪岭取得了胜利。胜利后，我们部队除了少数部队追击敌人以外，大部分包抄到龙源口，使新七溪岭的敌人受到腹背之击。敌人的一个团，全部溃退到龙源口桥附近一带。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对敌人进行了全部歼击，把这个团全部消灭了。第二天，我们还在这里召开了万人大会，庆祝龙源口战斗的胜利。

解说：毛泽东和朱德提出的游击战的“十六字诀”，至今依然是军事院校学习研究的课题。

4.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讲堂，军事教官在讲授“十六

字诀”。采访萧克。

教官：“十六字诀”是对“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个游击战争基本原则的简称。“十六字诀”的内容可以说是非常丰富的，它不仅是战术原则，同时还是战略原则。它不仅包含战略退却，同时还有战略反攻和战略进攻。它不仅在革命战争初期指导我军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它在整个革命中都发挥了巨大影响，它在研究战争、指导战争的方法上，仍然值得我们今天研究军事、指导战争的人们学习和借鉴。

解说：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身边不离笔墨的一介书生毛泽东当年指挥着工农红军，竟然一而再、再而三地打败了几十万国民党正规军的“围剿”。

人们从毛泽东的战地诗中，感受到“七百里驱十五日”，“横扫千军如卷席”的豪迈气概。

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中央革命根据地三次反“围剿”的萧克将军，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艺术充满了钦佩之情。

萧克(上将，曾任红一方面军独立第五师师长)：他是个战略家，大战略家。主要从战略上来考虑的。以毛主席为首的总前委，研究了作战方针，“坚壁清野，诱敌深入”八个字。敌人向我们苏区进攻，我们消灭了张辉瓒的湖南军队。我们第一次反“围剿”结束了。俘虏了他一个师长张辉瓒。蒋介石不服啊，开始组织第二次“围剿”，这一次兵力增加了一倍，派何应钦作总指挥，在南昌。我们的方针还是“坚壁清野，诱敌深入”。由西至东打了半个月，第二次反“围剿”，敌人二十万人，十五天打完了。不久，蒋介石又

来组织第三次“围剿”，三十万军队，蒋介石自己来，坐镇南昌。这次我们打得久一些，打了三个月。第一次我们打了好几仗。我们依靠根据地的好条件，和群众结合起来，打了几仗就把蒋介石的主力消灭了好几个师。蒋介石没面子啦，他说，三次“剿匪”告一段落。这是蒋介石的原话。

5. 井冈山空镜头叠出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合影。

解说：蒋介石不甘心失败，又对我根据地进行了新的“围剿”。1934年秋，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远征。遵义会议后，当毛泽东重新获得军事指挥权时，红军面临的是一百五十多个团、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蒋介石似乎有理由相信，处在绝境中的红军插翅难飞，做不出什么文章来了。他决没有想到，就在这崇山峻岭之中，毛泽东凭借一条赤水河，灵活用兵，写下了他平生的得意之笔，这就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著名的四渡赤水。

6. 采访李聚奎。动画图示。

李聚奎（上将，曾任红一师师长）：四渡赤水本来的意图是准备从赤水城那个地方北渡长江，到川西与四方面军会合的，结果，我们还没有到赤水，敌人就追上来了，赤水没走得了，就回头在土城打了一仗。

解说：这是一场恶战，有数千名红军战士牺牲在这里。毛泽东当机立断，下令连夜撤出战斗，于拂晓前，从元厚土城西渡赤

水，经古蔺向扎西开进。

7. 土城。红军一渡赤水的渡口。摄制组到河里拍摄。二渡赤水的二郎滩。三渡赤水的茅台镇。采访老红军。四渡赤水的二郎滩、太平渡。

解说：这次战斗没有留下任何图像资料，但是这里的山不会忘记，这条河不会忘记，我们摄制组的年轻人呢，索性跳进河里，去探寻历史的真迹。

（河中，摄制组人员的对话）

——这条河为什么叫赤水河？

——这条河的上游，四川、贵州两岸的土壤都是红的，所以下雨啊，山水都流到河里，河水变红了，所以叫赤水河。

——现在怎么绿了？

——现在还没有到汛期，上游没有下雨。

——土城战役以后，红军一渡赤水是从这里过的吗？

——是的，毛主席就从这里过的。

——当时有桥吗？

——架的浮桥。

——这水深吗？能站到底吗？

——站不到。

解说：一渡赤水后，蒋介石连忙调集重兵，阻挡红军北渡长江。毛泽东避实就虚，先南下后东进，从二郎滩二渡赤水。

（二郎滩渡口双机拍摄现场）

摄制组成员：前面快到二郎滩了，当年红军在这里二渡赤水的时候，这里搭过浮桥。现在建了大桥，一桥连两省，左边是四川，右边是贵州。四渡赤水时，红三军团有三个团从这里渡河。

解说：红军二渡赤水后，奇袭娄山关，再占遵义城，消灭了贵州军阀王家烈的两个师。然后挥师西进，经茅台三渡赤水。

没等蒋介石明白过来，红军已经享用起茅台美酒了。

曾宪辉（四渡赤水老红军）：我们打了一天仗，我到街上小店里买了一点茅台酒，大概是一块钱一瓶，我只买了三个铜板的，用来把脚擦擦，天气阴又冷，擦擦脚。在这个桥上我们朝这里走，船旁边的老百姓说，你们又来了。你们红军行动真有巧——巧是有技术的意思——我干人（穷人）看到你们回来就欢笑，双枪兵看到你们吓得满山跑——是王家烈的双枪兵——头上乌鸦叫，兵败如山倒。缴了鸦片枪，又缴了九响炮。

（太平渡，元厚等古渡口的空镜头）

解说：红军杀回川南，又摆出北渡长江态势。蒋介石急派主力追击，毛泽东却突然调头，向东由二郎滩、太平渡第四次渡过赤水，主力抢渡乌江直逼贵阳。坐镇贵阳的蒋介石慌忙调云南军阀部队前来保驾。而红军则转向西南，在昆明虚晃一枪，巧渡金沙江，北上道路就此打通。

（长征组歌中有关四渡赤水的片断。插电影《四渡赤水》。）

解说：许多年后，在舞台和银幕上，人们看到了毛泽东用兵如神的形象。

8. 国防大学教授徐焰谈毛泽东不二过之事。

徐焰：毛主席在指挥宏大的革命战争中，他有过许多成功的经验，也有过受挫折的教训。毛泽东同志自己在1956年“八大”上，曾经讲过这么一段话，我也是犯过错误的，指挥军事战争时，也打过败仗。陈毅同志特别有感触地说，毛泽东伟大之处就在于不二过。就是同样一件事情，他不犯第二次错误，有了经验教训之后，及时总结，然后，才使得战争不断地胜利向前发展。

9. 毛泽东给萧子升的信。日军侵华资料。八路军开赴前线。延安凤凰山毛泽东旧居。

解说：毛泽东不是神，但他也绝不是一个普通的人。

1916年，还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毛泽东，在给好友萧子升的信中曾经预言：二十年内中日必有一战，只有磨砺以待日本。果然，二十年后，他的预言成了现实。

日本军队大举侵略中国。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战开始了。

战争好比下棋。优秀军事家善于通观全局，恰当地部署兵力。抗战一爆发，八路军主力三个师开赴前线，毛泽东把他们像棋子一样摆在了战略要地。

于是，一一五师在晋东北创建了晋东北抗日根据地，一二〇师在晋西北创建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一二九师进到晋东南，一

一五师一部到了晋西南，在山西的四角建立了抗日根据地。

这些根据地的建立，对八路军发展到全华北，坚持长期抗战，取得最后胜利，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解说：在战争初期，毛泽东就用他预言家的笔，为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勾画了一幅蓝图。战争的进程，证实了他的一系列预见。

在延安凤凰山毛泽东旧居，一位十岁的小学生让我们领略了毛泽东奋笔疾书的风采。

10. 延安。毛泽东旧居。某小学生讲解毛泽东写《论持久战》的情景。

延安某小学生：这里是毛泽东的办公室和寝室。毛泽东在这里居住期间，为了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批评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先后写下了《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等著作。这就是毛主席在写作时用过的椅子。这张照片是毛主席在写《论持久战》一文时拍下的珍贵照片。毛主席在写《论持久战》一文时，思想高度集中，几天都没有好好地休息，把身体都累坏了，医生再三劝他休息，可是他只吃了一点药，又接着写了起来。一天晚上，桌子下的炭火把他的棉鞋烤着了，他也没有发觉，直到警卫员给他送水来的时候，他才发现。主席望了望那双烤着的棉鞋哈哈大笑起来。

解说：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批判了亡国论和速胜论，提出了打持久战的思想。他把战争分为退却阶段、相持阶段和反攻

阶段，准确地阐述和描绘了整个抗战的策略方针、发展进程和必胜前途，成为指导抗战的一个战略方针。这不仅增强了解放区军民取胜的信心，而且鼓舞了国民党将士抗日的勇气；不仅对中国战场具有指导作用，而且在国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11. 采访日本教授，谈《论持久战》对抗战的影响。采访罗焕章。

近藤邦康（日本东京大学教授）：我很佩服《论持久战》。

日本被中国打败是当然的，这样非常好的战略著作在日本是没有的。日本物资方面和科学技术方面都优于中国，武器优越于中国，但没有这样的以哲学为基础的宏远战略眼光，日本没有。日本的军队是速决战，中国的战略是持久战，结果，日本被中国的持久战打败了。

罗焕章（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我们研究抗日战争的一些同志有时谈论起来，二次世界大战的领袖有罗斯福、邱吉尔、斯大林、毛泽东，当然中国还有蒋介石。就其战略的高明，运筹的艺术，首屈一指的还是毛泽东。

12. 蒋介石阅兵、讲演的镜头。胡宗南进攻延安。国共两方当时拍摄的纪录片。

解说：对这样的评价，蒋介石当然不会同意。他认为只有他才是中国一流的军事家，毛泽东不过能写几本书而已。他把曾与国民党共同抗日，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八路军、新四军视为仇敌。

抗战结束，蒋介石发动了内战。在美国政府支持下，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并夸下海口，要在几个月内解决问题。

（胡宗南向延安进攻。轰炸、炮击解放区）

解说：蒋介石的嫡系胡宗南，果真替他“解决了”问题。胡宗南以十倍于我军的兵力，分两路向陕甘宁边区进犯。两军对垒，毛泽东从来不看重一城一地的暂时得失。他着眼整个战局，做出拿延安换取中国的战略决策。1947年3月19日，胡宗南占领延安。

尽管是座空城，他还是大张旗鼓地做了一番文章。

下面是当年国民党拍的《占领延安》的纪录片。

（国民党《占领延安》纪录片片段及原声解说词）

中外记者团的专机做了第一次的访问延安，解放延安的健儿们列队欢迎。

这位便是胡宗南将军。英勇的国军以正义解放了延安，并热忱为解放了的人们服务。这虽然是政府一些微薄的施舍，但也是政府应尽的责任。

国防部新闻局长代表政府向受尽赤色恐怖的边区老百姓做诚挚的慰问。

解说：几乎是同一时期，共产党也拍了一部纪录片《撤离延安》。

（我军拍摄的《撤离延安》片段及原声解说词）

敌人进来了，但我们要告诉这些匪徒们，你们的兽蹄虽然踏

进了圣洁的延安，但你们先别高兴，这不是你们的胜利，严重的后果在等待着你们。正像新华社社论所指出：蒋匪侵占延安将标志着蒋介石的灭亡，人民解放军放弃延安将标志着中国人民的胜利。

毛主席和中共中央各首长，在敌人进驻延安前几小时才离开。

虽然胡匪以二十多万的精锐匪军疯狂地东奔西窜，大言不惭地叫嚣道，要打击中国共产党的首脑机关，但毛主席亲自领导的二万三千警卫部队和边区的人民，坚持在陕北和敌人周旋，常常在离敌人只有五六里的地方指挥着战斗。战争最艰苦的时期，我们在米脂县以北、方圆不到四十里的地区内活动，就在这样一个时期，毛主席和他的战友始终是紧紧地和陕北人民在一起。他的每一个指示都由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传达到全国各地，鼓舞了人民向蒋介石匪帮作英勇的斗争。

13. 陕北靖边县的小河村。毛泽东当年在小河村召开前委会的照片及决议件。

解说：当蒋介石占领延安大摆庆功宴的时候，毛泽东正在陕北的山沟沟里与胡宗南捉迷藏。在中外记者面前出尽风头的胡宗南被解放军的“蘑菇”战术弄得筋疲力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部队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战斗中被一口口吃掉。胡宗南气急败坏地四处寻找毛泽东，要决一死战。可这时的毛泽东，却在离敌军不到十里路的小河村里与他的战友们谈笑论英雄呢！1947年7月，毛泽东在小河村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上，作出了敌进我进，向外线反攻的战略决策。1947年10月10日，我党领

导下的武装力量统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同时颁布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随后，毛泽东又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大反攻开始了。

解放军的三支大军呈品字形打进了国统区。

14. 陈赓兵团原通信科长戴其鄂谈品字形战略进攻。

戴其鄂：刘、邓在大别山的南边嘛，陈、粟的大军在豫皖苏、陇海路以南、平汉路以东这个地区。陈、谢在平汉路以西。大别山，包括在陇海路以南大别山一直到桐柏山，这个是陈、谢。这就是品字形了。品字形可以互相联系，互相配合，敌人不能再搞什么重点攻势啦。另外一个给陕北减轻压力了。大别山根据地也建立了。建立后，敌人对大别山就害怕，敌人始终也不敢动。因为大别山最靠近他的腹心啦，好像一把刀正插在他的心脏上一样。过去他老到我们根据地打，现在我们到他统治区去打。吃也吃在那里，扩军也在那里扩军。这样一来，我们主动了。

15. 陕西吴堡县黄河渡口纪念碑。

解说：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从陕西吴堡县川口渡口东渡黄河，离开了他住了十三年的陕北。

（采访当年送毛泽东渡黄河的老船工）

记者：毛主席是怎么上船的？

老船工：船边上搭了一块木板，两边警卫员在保护着他。

记者：那时候，你知道船上毛主席吗？

老船工：看那个痣才看出来，不然不知道。区政府里有毛主席的画像，看那个痣才看出来。

记者：听说，船开走后，毛主席的大青马跳到黄河去了，你知道这回事吗？

老船工：你咋知道的？

记者：我是听说的。

老船工：我把这事给你说一下。另一条船装了七八匹马，毛主席的大青马不上岸，它跳到黄河里往回游。要问为啥不上岸？因为我们陕北的马不愿过黄河。

解说：战马恋故土，不愿过河东，为历史留下了一个轶闻。毛泽东东渡黄河，拉开了决定中国命运的大决战的序幕。

16. 解放军打击国民党部队的场景。国民党军队溃败逃窜的镜头。

解说：1948年是解放战争实施战略决战的一年。辽沈战役刚刚结束，淮海战役就拉开了帷幕，紧接着，平津战役的炮声又响了。

面对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国民党军节节败退，被打痛了的蒋介石突发奇想，何不擒龙先擒首，偷袭中共中央机关？一朝得手，或许能够挽救失败的命运。

蒋介石一连几道电令，要北平的傅作义偷袭西柏坡。

不料蒋总统的一番苦心，却被毛泽东的小小一计粉碎了。

四十年后，我们像听神话一般，听这位老农话说当年。

西柏坡老乡：诸葛亮在城楼上弹琴，城门大开，司马懿的兵打到城门前不敢进。诸葛亮在城楼弹琴，我来唱两句：“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诸葛亮是走一步算三步，计计成功；司马懿是迈一步算一步，计计不成功。毛主席看了两部三国书，《三国志》和《三国演义》，看得可透彻了，精通诸葛亮的用兵之法。“诸葛亮”指挥着三大战役，取得了全部胜利。傅作义的骑兵可厉害了。傅作义的骑兵来围咱们的老区，“诸葛亮”使了一个计，把傅作义的骑兵吓住了。噢，是毛主席！毛主席和诸葛亮一样使了一个空城计。

（毛泽东写的电讯稿原件，叠印傅作义的骑兵）

解说：老乡无意间的口误，正巧道出了毛泽东的韬略。当傅作义的十万重兵奔袭西柏坡的时候，解放军主力远在外线作战，靠在最近的石家庄也是座空城。毛泽东便使出了一个现代“空城计”。他亲笔写下几篇电讯稿，号召沿途地方部队和人民群众行动起来保卫党中央，同时，点出敌军几支部队的番号和行动计划，并声称要诱敌深入，聚而歼之。接着，用电台、报纸、传单的方式广为播发。

精明的傅作义赶忙收兵，庆幸没中毛泽东的诱敌之计。等到兵马撤回北平，才发觉还是上了当。

17. 西柏坡。采访纪念馆馆长。

纪念馆馆长：毛泽东同志是1948年5月27日来到西柏坡的，毛主席在西柏坡一共住了将近十个月，三大战役电报的起草和七届二中全会报告的起草都是在这个办公桌上。据不完全统计

计,根据老同志回忆,指挥三大战役的电报稿有一百九十多封。在主席当时的住址的西面有一个军委作战室,当时军委作战室每周一次总结会,这个总结会是总司令主持。周恩来同志是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据老同志回忆,军委作战会议的决策,一些文件,一些图,做成后送到主席那里进行决策。主席的电报稿传到各个战场。实际上是主席在这里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18. 军事科学院军史部座谈。

军史部研究人员: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这三大战役一共是一百四十二天,作战双方都投入了大量的兵力,双方先后出了四百三十多万军队,其中我军就投入了二百三十万人,国民党投入了正规军二百多万人,还包括绝大部分的空军和海军。从这个情况来看,作战的规模之大,样式之复杂,战役、战斗之频繁和激烈,这在中外战争史上是罕见的。三大战役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歼灭了国民党一百七十三个师或旅,共计一百五十四万余人。在决战中,毛泽东首先以他自己高明的智慧,同时他还集中了全党、全军的智慧,精心筹划,对电报亲自处理,亲自过问,精心筹划,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可以说表现出很高的、卓越的战略指导艺术。

19. 配三大战役历史镜头。采访张震、洪学智、杨得志。

张震(军委副主席,上将,曾任华东野战军副参谋长):辽沈战役是关门打狗,拿下锦州以后,就能消灭东北的敌人。林彪曾经对南下有顾虑,因为没有后方,想先打长春。以后他接受了毛

主席的意见，先打锦州。三天打下锦州，然后转兵东南，解决了廖耀湘，打得干净利索。

洪学智(上将，曾任东北野战军第六纵队司令员)：毛主席打辽沈战役，是经过多方面分析的。因为锦州那是弱点。华北来增援，有我华北部队牵制着。

另外，傅作义也不会全力来增援。毛主席分析了他们的内部矛盾，他还分析了沈阳来增援，沈阳也不大容易。结果，毛主席下决心要四野打锦州。他是经过充分考虑的。他是从整个战略上分析敌人的弱点来确定的。掌握了敌人的情况，抓住了敌人的要害。

范汉杰被俘虏以后，交给了我们的干部训练队。我去找他，问他对形势有什么看法。他们住两间房子里，范汉杰住在里头，几个军长和师长住在外头。我去时，他们正在吵呢。他说，我承认我不行，不会打仗，当了俘虏，你们能打，为什么也当了俘虏呢？他说，你们还吵什么，东北不保，华北不保，华北不保，蒋家王朝完了。

(淮海战役资料)

解说：淮海战役，我军的兵力少于对方，解放军是六十万，国民党军是八十万。毛泽东曾经说过，淮海战役打得好，好比一锅夹生饭，还没等完全煮熟，硬是一口口把它吃掉了。

淮海战役的突出特点是情况变化快，敌人变了我们也跟着变。这个战役是从小到大逐渐发展起来的。打了六十六天，歼敌五十五万五千人。

毛泽东在战略指挥上，博采众议，听取前线指挥员的意见，

适时调整作战计划，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

1948年9月24日，济南战役胜利后的当天早上，粟裕同志向军委建议，第三野战军攻克济南以后，就南下进行淮海战役。

张震：那个淮海战役的含义是打淮安、淮阴和海州。把海州拿下来，把淮安、淮阴收复，苏中解放区就能打通与山东的联系。9月25日毛主席回电，同意我们进行的淮海战役，是小淮海。在部队出动的时候，毛主席来电，对三野部队怎么打都作了部署。

部队到达马头镇得一情报，何基沣、张克侠确定于11月8日晚起义。那是国民党七十七军和五十九军，两个都是老共产党员。得知这个情况后，粟裕同志就和我商量，于8日又发了个电报，我们建议歼灭黄百韬之后，不以主力下两淮，转向徐州进攻。11月9日毛主席复电，毛主席改变了决心。毛主席的伟大就在这里，看到形势变了，作战方针随着战局的发展，作了重要修改。明确了在徐州附近消灭敌人主力，不让敌人南下，就是要把徐州的敌人在徐州附近歼灭，不让他跑掉。这个仗就打大了。

如果不是毛主席修改了计划，我们主力去打两淮，不是去打新安镇的话，黄百韬就跑掉了，打不到了。那可能把两淮占了，可能战役还要延长，还会反复争夺。

毛主席的伟大战略指挥气魄就是大。我们是小打小闹，他最后来了个中央突破，一下子打大了。

解说：平津战役，我军一百万对敌军五十万，敌人成了惊弓之鸟。战役的关键是扣留傅作义，不让他逃跑。毛主席采取隔而不围，围而不打，在傅作义举棋不定时，把他各个歼灭。

杨得志(上将,曾任华北军区兵团司令员):傅作义主力三十五军在新保安,原来是想从南边张家口那儿,收缩到北边来的。毛主席看得很清楚,必须使这个部队不要进到北平来,把它卡住在新保安。毛主席指示我们,围而不歼,把它围住了,不攻它也不歼灭它,这一着很厉害。

然后,集中力量把新保安的三十五军打掉了。主力部队消灭了,又把傅作义围在北平城里,有四十多万人,没办法了,只好谈判投降,北平和平解放了。

20. 西柏坡毛泽东旧居。毛泽东用过的躺椅。采访李银桥。毛泽东在躺椅上吸烟,悠闲自得。

解说:平津战役的枪声停了。毛泽东放下了手中的笔,揉了揉熬红的眼,坐在了这个椅子上,让他的卫士长梳了梳头。

李银桥(曾任毛泽东的卫士长):那天中午睡觉起来后,在院里树底下,我给他梳了梳头,我看见主席头上有根白发。我说,给拔下来吧。主席说,拔吧。我拔下来了。他用手搓着看,说打胜了三大战役,白了一根头发,值得。

解说:一根白发,一支毛笔,一百九十多封电报,国民党百万大军在谈笑间灰飞烟灭。

放眼世界

毛泽东十九岁第一次看到世界大地图……

——题记

1. 旋转的地球。国外拍的毛泽东的影视片镜头。毛泽东看世界地图照片。

解说：本世纪 30 年代以来，毛泽东被当作一位传奇人物引起了世界的瞩目。人们试图以各种方式来认识他、了解他。不同肤色不同信仰的人得出了同一个结论：毛泽东是一位影响了世界的“东方巨人”。

那么，毛泽东是什么时候开始认识世界，世界又是怎样开始认识毛泽东的呢？

2. 长沙市定王台。采访长沙市图书馆副馆长王秀芳。北京图书馆拍的“万国大地图”。

字幕：湖南省长沙市

湖南省图书馆古籍藏书部

王秀芳(长沙市图书馆副馆长)：这就是定王台。1904年3月，我国最早的一批图书馆之一就诞生在定王台，当时的名称叫湖南图书馆兼教育博物馆。1912到1913年，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同志曾经在这里自学过半年。他在这个图书馆里阅读了大量的

18、19 世纪的中外名著，比如像亚当·斯密的《原富》、卢梭的《民约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等等。毛泽东同志在这里不仅阅读了大量的中外名著，而且在这里收获最大的呢，就是在湖南图书馆阅览室的一个墙壁上看到了一张《世界坤輿大地图》，他每次走过这里的时候，总是站在这里久久地看着……

解说：站在这幅地图面前的毛泽东，原以为湘潭县就很大，湖南省更是大得不得了。谁知，从地图上看，中国只是一小块，湘潭县连影子都没有。

3. 斯诺拍摄的红军纪录片。毛泽东在延安同美军观察组成员在一起。采访章百家。

解说：后来，毛泽东把这段感想告诉了一位年轻的美国记者，他叫埃德加·斯诺。1936 年，经宋庆龄的安排，斯诺进入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保安，毛泽东同他交谈了十几个晚上。这在毛泽东的一生中是绝无仅有的。通过斯诺的笔，外部世界第一次了解了一个并不像国民党宣传那样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也第一次了解了毛泽东！

章百家（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中美关系项目负责人）：1936 年秋天，在和斯诺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详细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主张，这就是中国必须同世界上所有反对新的侵略战争的国家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而且他还预言，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将同中国结成统一战线，反对日本在远东的扩张。几年以后，欧

洲战争、苏德战争和美日战争相继爆发，毛泽东的预言完全实现了。他建立统一战线的战略和策略，又有了更加广阔的实践天地。1944年，美国派遣了一个军事观察组进驻延安。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抗战中主要的盟国建立起半官方的外交联系。

解说：毛泽东很兴奋，他几次出现在这种半官方的外交场合。尽管这样的外交还要受到国民党政府的限制，但毛泽东不失时机地突破国民党的束缚，向世界展示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和魅力。

章百家：抗战后期，由毛泽东亲手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对美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共同抗日和民主合作。当时，毛泽东曾设想，与苏联和美国都发展友好关系，但是中共与美国关系的发展并不顺利。抗战结束以后，为了争取实现国内和平，中国共产党在批评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的同时，也做了许多工作，争取美国。1946年初，马歇尔到中国来的时候，周恩来重申，中共愿意与美国合作，毛泽东也带话给他说，如果要出国的话，他愿意先到美国去看看。但很快国际国内形势就恶化了。不久，毛泽东对世界形势作出了新的判断，并对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作了重大调整。

4. 美苏军备竞赛。雅尔塔会议。美国军队在中国。马歇尔在中国。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手稿。

解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并没有带来人们所期望的和平。世界上主要国家划分成了以美苏两个大国为首的对立阵营，形成了长达四十多年的“冷战”局面。这个国际背景给毛泽东领

导的中国共产党在战后的外交战略带来了重要影响。

1945年2月，苏、美、英三国首脑在苏联的雅尔塔举行会议，签订了有损中国主权的秘密协定，会议同意美国在中国占支配性影响。

毛泽东不能接受大国的安排，也不能接受国内蒋介石的独裁统治。1946年8月他向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明确表达了一个战略判断：美苏两国之间存在着极其辽阔的中间地带，这里有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向外扩张的实际目的，是控制包括中国在内的中间地带国家，这些国家的人民应该团结起来进行斗争。毛泽东还说，从长远的观点看，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在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时刻，美国政府为了维护它在中国的利益，力求使中国革命带上温和的色彩。当过燕京大学校长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与中国各派政治力量有着广泛的联系。他曾表示愿意前往北平与中共接触，毛泽东同意了；但要求美国政府必须先同国民党政府断绝关系，杜鲁门政府拒绝了。

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从南京悄然离开了中国。毛泽东以中国人的自信写了这篇著名的《别了，司徒雷登》：“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他说，司徒雷登“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

5. 采访韩念龙。毛泽东1949年访问苏联，同斯大林在一起。采访柯迪、师哲。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50年代苏联专家在中国。中苏人民友好握手。

解说：建国前夕，毛泽东就为新中国的外交提出了三个重要原则。

韩念龙(曾任外交部副部长)：这三个重要原则，一个是另起炉灶，一个是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第三个是一边倒。另起炉灶，就比较容易理解，旧中国的外交，他们都是屈辱外交，磕头外交，丧权辱国外交，所以毛泽东提出来另起炉灶，重新干。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什么意思呢？由于不平等条约遗留下来的许多问题，还存在那里，还在起作用，要逐渐消除，有许多事情要做，没有办好，就马上建交，跟人家来来往往是不合适的。第三呢，一边倒，1946年冷战开始，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逐渐成立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逐渐成立了，就是两大阵营对立了。在这个情况下，中国刚刚解放。中共跟国民党打的仗，实际上美国人出枪、出钱、出炮，蒋介石出人，来杀中国人。那么我们中国倒向哪一边呢？当然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

解说：在东西方两个阵营尖锐对立的情况下，确定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新中国，自然要倒向苏联一边。为实现这一外交战略，毛泽东在1949年12月第一次走出国门，踏上了访苏的旅程。

何迪(中国社科院美国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在外交方面，“一边倒”只是表明新生的政权是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在任何方面都要屈从于苏联，或跟随着苏联当时的旨意，按苏联的旨意来行事。就是在毛泽东宣布了一边倒以后，他第一次访问苏联，访问苏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

要签订新的中苏条约；签订新的中苏条约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替代苏联曾经和国民党政府在1945年8月份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解说：起初斯大林并不愿意放弃从旧条约中得到的某些权益，毛泽东据理力争。谈判中，他以幽默的方式向斯大林表达了自己的意思。

师哲（曾任毛泽东的俄语翻译）：毛泽东这样说：唔，是要搞个什么东西，这东西“既好看又好吃”。我在翻译时还加了些解释：“好看”就是形式上好看，就是冠冕堂皇，“又好吃”就是要有内容，不是个空架子。他们还是不懂这是个什么东西，甚至贝利亚当时笑得发出了声，哈哈大笑……

解说：当斯大林终于明白什么是“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后，双方很快坐上了“条约”的签字台。

何迪：要签订一个新条约来代替一个旧条约，它的意义在哪儿？我想一个主要的意义就是表明一个新生的政权和旧的联系完全是割断的，要求苏联真正承认这个新生的政权，给她以平等的地位，而要真正放弃和她旧有的所谓国民党政权所签订的条约的一切权利。毛泽东在这一点上非常具有民族的立场。

解说：中苏两国人民走到了一起，大批苏联专家来到了新中国建设最需要的地方，为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打下工业化的基础。中国人民不会忘记这段美好的历史。

6. 政协一届一次会议，毛泽东讲话镜头。

解说：新中国成立之后，面对国际上帝国主义的封锁，毛泽东在政协一届一次会议上说（毛泽东原声）：“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吧，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随后，他走上天安门城楼，在开国大典上向世界宣布（毛泽东原声）：“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

字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外交史上的新纪元。

7. 上海遭受轰炸。美军仁川登陆。美军轰炸中国的安东。毛泽东等在怀仁堂。志愿军入朝。中、朝、美三方签订《停战协定》。毛泽东同回国志愿军代表在一起。

解说：但美国政府仍旧仇视新中国。1950年2月，美国和台湾的蒋介石在上海扔下了炸弹。同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军很快介入，在仁川登陆，并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严正声明：中国不会坐视不理。美国政府仍不相信，甚至轰炸了中国的边境城市安东（今丹东）。麦克阿瑟宣称：倘若中共军队渡过鸭绿江，我就要使他们遭到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没有任何一个中国指挥官会冒这样的风险。

字幕一：毛主席命令：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

的胜利。

字幕二：志愿军队伍中，也包括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

（歌曲《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歌》）

解说：美国直到在朝鲜战场上吃了败仗，才意识到自己小看了毛泽东领导下的新中国。当他们被迫坐下来签订《停战协定》的时候，美国将领克拉克沮丧地说：“我成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议上签字的陆军司令官。”

朝鲜战争使美国政府不得不承认中国是他的平等的对手。

抗美援朝取得了伟大胜利。在欢迎志愿军官兵凯旋而归的热烈场面中，谁能看得出毛泽东内心世界的隐痛？这场战争使他失去了第六位亲人——他的长子毛岸英！

8. 周恩来在万隆会议。报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毛泽东会见亚非拉外宾。采访卡翁达。

解说：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使中国进一步挺直了腰杆，成为世界力量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1954年4月的日内瓦会议，中国开始重返国际舞台。一年后，周恩来又登上了万隆会议的讲台。他根据毛泽东的外交战略，宣传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外交思想。

产生于1954年中印边境谈判期间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包括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实际上已成为中国同其他国家发展双边关系的基本准则。

5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毛泽东再次把目

光投向了世界舞台上辽阔的“中间地带”。他重申自己1946年提出的这个观点。1964年，他又把“中间地带”一分为二，第一中间地带是日本、西欧、加拿大等国，第二中间地带是亚非拉许多的发展中国家。到70年代，这位目光远大的国际战略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著名论断。这是相当一段时期的中国外交战略，至今，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仍产生着影响。

卡翁达(赞比亚前总统)：他(毛泽东)的分析是正确的。发达国家自然不同于发展中国家，为什么我们如此珍视你们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珍视毛主席、他的亲密战友周恩来和他的同事给予我们的帮助，因为中国也是个发展中国家，并且依然是，但却给了我们那么多帮助。因为中国的领导毛泽东知道我国需要帮助，在我们困难的时刻，给予我们极大的援助，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有极大的财富，他们什么也没有，他们把所拥有的奉献出来与我们分享。

9. 1957年毛泽东访问苏联。采访福克·耶诺、李超然。赫鲁晓夫1959年访华。

解说：民族利益和国家安全始终是毛泽东在外交事务中考虑的头等大事。他的一贯方针是，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不听从任何大国强加于人的摆布。当然，也包括曾向中国伸出友谊之手的苏联。

福克·耶诺(匈牙利前总理)：在苏联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时候，我在莫斯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他在莫斯科参加庆祝

活动,我也是。我和毛泽东及其代表团在一起度过了几分钟。他讲了一些很有意思的问题。

他说：“你们咒骂斯大林，咒骂他的罪行，全盘否定斯大林。不要骂嘛！因为他有坏的建议，但也有好的建议，而你们的领导人什么都听，唯命是从，像奴仆一样，斯大林说什么，你们就做什么，斯大林提的是建议，而你们则当作圣旨接受。斯大林给中国，给我个人也提了许多建议。我们告诉他，我们回去研究研究，与我们的领导人和人民商量以后再定。斯大林好的意见我们采纳了，错误的我们屏弃了。”

解说：1958年，中、苏两国出现的分歧日渐明显。在两国商谈军事科技合作的时候，赫鲁晓夫通过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向毛泽东提出建议……

李越然(曾任毛泽东俄语翻译)：一个是要搞个长波电台，一个是搞个共同舰队。搞长波电台呢，他说他们远东的潜艇需要加油呀，需要联系，有的时候不方便；搞共同舰队呢，是要联合对付美国的第七舰队，等等。尤金来谈，毛泽东就问他，这是怎么回事，你们这事是怎么个考虑？尤金他是大使，只是机械地执行任务，怎么告诉他就怎么说，就解释不清楚。毛泽东就很生气，但是还行，说你回去问一问，怎么回事，问问清楚是什么意思。尤金回去就报告了，又来了第二次。毛主席又见了，他还是说不清楚，这次(毛主席)火得就更厉害了，那说不清楚就请赫鲁晓夫自己来吧。这样，赫鲁晓夫决定自己来，这就是1958年7月31日。然后赫鲁晓夫就讲了，我接到了尤金大使的报告，听说毛泽东同志你很有意见，我们没有别的想法，主要是谈谈我们怎样合作的问

题，我们远东的潜艇，需要加强联系呀等等。毛泽东听着听着就站起来了，“赫鲁晓夫同志你说了大半天还没有切题。”就指着他（赫鲁晓夫）的鼻子，“我问你什么叫共同舰队，什么叫共同舰队。”问得赫鲁晓夫很发毛，说：“共同嘛，就是咱们共同研究的意思嘛。”（毛泽东说）没这个意思，你就真正地讲你想干什么？你是不是要把我们沿海的地方统统拿过去，你要就拿去好了，共同舰队？谁的舰队？是归你指挥还是归我指挥？谁来指挥这个舰队？怎么指挥法？你想干什么？

解说：1959年9月30日，赫鲁晓夫访华，参加中国的国庆十周年大典。中国共产党认为，趁此机会把矛盾摊开了，有助于中苏之间的相互理解。看起来谈得似乎很融洽，但分歧却在不可避免地加深。因为毛泽东不允许苏联把中国纳入他的全球战略轨道。

10. 大庆石油工人王进喜。大庆油田第一口油井喷油。第一枚长征二号火箭升空。南京长江大桥通车。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解说：赫鲁晓夫回国后不到一年，1960年7月，苏联便中止合同，撤走专家，催还贷款。留给中国一大批半截子工程。这对正处于经济困难的中国人民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中国在失去外援的时候，毛泽东倡导一种民族气节，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国际上的封锁给我们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却不能阻止中国人民前进的步伐。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在差不多同一时间里，爆出

两件让世界震惊的新闻。一件是赫鲁晓夫下台，一件是中国成功地爆炸了自己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历史的安排竟如此巧合。

11. 毛泽东学外语照片。毛泽东读英文批注。采访林克。

解说：在中国受到西方世界封锁的情况下，毛泽东仍然渴望了解世界，因为中国必须全面走向世界。

林克（曾任毛泽东的英文秘书）：这张照片就是在1957年，主席在飞机上学习当时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文章的英译本时拍下的。这里你看有两个茶杯，有一个是他的，有一个是我的，有两份英文稿子，一份是他读的，一份是我看的。他后来达到的程度是能够借助字典阅读一些政治理论的文章和书籍。他学英语的主要目的，我认为是要拓展知识，要了解世界；特别是要了解西方世界。

12. 美军在越南。珍宝岛事件。1970年国庆节毛泽东和斯诺在天安门。采访黄华、基辛格。美国乒乓球队在中国。采访吴旭君。

解说：中国全面走向世界的机会隐约出现了。美国在越南战争中越陷越深，已有抽身之意。尼克松上台后曾表示愿同中国发展关系。与此同时，中苏关系日趋恶化，珍宝岛事件的爆发达到顶端。

毛泽东敏锐地观察着，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构想开始酝酿。70年代的第一个国庆节，一个美国人被毛泽东邀请上了天

安门。他就是三十多年前第一次让世界了解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斯诺。

黄华(原外交部部长):10月1日,我陪同他们(斯诺夫妇)上天安门城楼观礼,我们站的位置是很靠近重点的一个位置。斯诺后来回忆说,他被安排在那样一个显著的位置。后来周恩来总理过来带他们到了主席身旁,在那儿跟主席叙谈了一会儿。这当然是发出了一个重要的信号,这就是说,显然毛主席同斯诺有关于中美关系的重要的话要说。

记者:1970年10月1日,斯诺先生被邀请在天安门同毛泽东一起观看国庆典礼,这被我们认为是向美国表示友好的方式,美国政府当时对这件事怎么看?

基辛格(美国前国务卿):对于斯诺先生被邀请在天安门城楼同毛泽东在一起,我们那时不理解这可能是在向美国做某种表示,我们错过了它。我们一直在试图同毛泽东接触,中国人理解了我们的意图,而我们没能理解中国人的意思,我们用了两年时间才真正走到一起。

解说:1971年4月,美国乒乓球队被中国邀请到北京访问,这件起初看来意义似乎不大的事,成了中美关系转变的契机。这次富有戏剧色彩的民间外交活动,导演就是毛泽东。

吴旭君(曾任毛泽东的护士长):毛主席在4月6日那天给我看了份文件,这是什么文件呢,这是由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联合起草的一份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这上面,毛主

席在他自己的名字上圈阅了。我当时想,这么看来,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这个大局已定,因为大家的意见都一致。主席让我看完文件后退给外交部去办理,办完这件事以后我觉得主席有心事,因为我跟他相处久了,看得出来,至于有什么心事我不知道。就在4月6日那天他要提前吃安眠药,他要提前睡觉。晚上11点多了,他坐在这儿,当时那儿是床,他就坐在床边、床前面的桌子上吃饭,我坐在他对面,他因为吃了大量的安眠药,睡极了,他就脑袋这么低着,就在那儿这么低着睡,就是不肯躺。过了一会儿,他突然间说话了,嘟嘟啾啾的,听不清楚说什么。听了半天了,我才听出来,他要我去给王海容同志打电话,当时王海容同志是外交部副部长,他说要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我的天哪,我一听这话当时就愣了,我想这跟白天退走的文件正好相反,如果我按他现在说的去办,那跟文件的精神不符合呀,那总理和他都画了圈的,那可能会办错了。再有,主席曾经跟我交待过,他说他吃了安眠药以后讲的话不算数。那么现在他跟我交待的这件事就是他吃了安眠药后讲的,那算不算数呢?我如果照他现在说的去办,那不就是错上加错了吗?我在提醒自己,这么大的事可不能轻举妄动。我得想一个办法来证实主席现在到底是清醒还是不清醒,用什么办法呢?我想,那就是我得让他再主动地讲话。过了一会儿主席勉强地抬起头来,使劲睁开眼睛看着我,小吴,你怎么还坐在那儿吃呀?我叫你办的事你怎么不去办呢?我想这下可好了,主席可说话了,我就很大声地问他,我说,主席,你刚才都跟我说了什么啦,我尽顾吃饭了,没听清楚,你再跟我说一遍。不错,他又断断续续,一个字一个字地,慢慢吞吞地又把刚才交待的事重新说了一遍。我就反问了一句,我说你现在都吃了安眠药了,你说的话算数吗?主席就向我这么挥了一下

手，说，算，赶快办，要不就来不及了。这个时候我意识到了，毛主席作了最新的决定。

解说：“乒乓外交”成为外交史上的一段佳话。周恩来总结说，这是“小球推动大球”。

13. 基辛格访华。采访黄华。1971年7月16日《人民日报》尼克松访华《公告》。

解说：三个月后，尼克松总统派特使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成为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关键步骤。谈判开始前，毛主席确定的原则是“小东西不要碰，要谈就谈大东西，谈大问题”。所以，会谈的大部分时间是讨论国际形势和两国关系中的重大问题，只是在最后双方才讨论了尼克松的访华《公告》。

黄华：双方在讨论中，在措辞上发生了障碍，我们的措辞大意是：鉴于尼克松总统表示愿意到中国来访问，我们因此发出邀请等等。基辛格不同意这样的措辞，他说，按照措辞的逻辑，那就是等于尼克松总统自己邀请自己来访问中国，因此他不能同意。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僵了下来，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会后，我们几个人到了主席那里，到的时候，主席坐在书房里的沙发上，精神很愉快，我们说了几句话，主席已经听懂了，他笑了起来，挥挥手说：“改改吧。”后来总理在公报上只改了一个词，就是由原来的“鉴于”改为“获悉”。基辛格博士满意地接受这样一个措辞。

14. 乔冠华在联大会上。采访福田赳夫。尼克松访华。毛泽

东、周恩来在一起。邓小平接见外宾。

解说：尼克松访华《公告》一公布，在世界引起震荡。

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11月15日，乔冠华率中国代表团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应该说，这是毛泽东长期重视开展“中间地带”工作结出的果实。但中美关系的解冻无疑为这历史性的时刻提供了契机。

这一事件惊动了整个世界。

福田赳夫（日本国前首相）：基辛格访华使人大吃一惊，他从事了秘密的外交活动，我们做梦也没想到他会干这件事。

解说：一年后，中日建交。

在尼克松访华后的一年里，一共有二十个国家与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其中西方国家就有十多个，“小球”终于推动“大球”转了起来。

字幕：

1972年3月，英国和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1972年5月，荷兰和中国建交。

1972年6月，希腊和中国建交。

1972年9月，日本和中国建交。

1972年10月，联邦德国和中国建交。

1972年12月，澳大利亚和中国建交。

.....

(资料片及同期解说声):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应中华人民共和国邀请前来进行访问,2月21日上午,乘专机到达北京。

解说: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成功合作,打开了中美关系大门。开创了外交工作的新局面。邓小平进一步发展了毛泽东的外交思想,使今天的中国以全新的姿态走向了世界。

15. 毛泽东会见尼克松。车队行进。中南海游泳池。访吴旭君。

解说:然而,为了尽快会见访华的尼克松,身患重病的毛泽东付出了极大的努力。

吴旭君(曾任毛泽东的护士长):会见尼克松当时,主席身体很不好,正是在给他治疗时候,发生了一次休克,所以医疗组是挺为这件事担心的,因为我们尽量保证毛主席按时会见尼克松。可是我们必须要有两手准备,另一手就是我们要做好一切抢救准备,以防万一在接见过程中发生什么意外。所以在当时,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在这个门后头,都在这儿等着,有领导,有警卫,有电工等等,工作人员都等在这儿。那个时候,这儿没有水,上面铺了一层木板,那头是所有的专家睡觉的地方,这一头是所有抢救用的物品,甚至于我们把给他用的强心剂都抽在了针管里头。我认为,我们的准备工作是相当充分的,因为要分秒必争啦,是处于临战状态。可是我们的毛主席,他又

很顽强，他跟……他跟衰老、跟疾病作斗争。表现得非常顽强，也很惊人。在他跟尼克松总统会谈的整个时候，他表现出伟人的气魄，统帅的风度，他的思维是敏捷的，他是在谈笑风生的，我想他也是在顽强地进行着斗争。所以这一点，让我们所有的人看到了，都非常敬佩他，也很感动。当时外交部给主席安排只是接见十五分钟，可是主席跟尼克松谈了六十五分钟，我觉得毛主席真是费尽了心啦。

解说：毛泽东预感到自己的生命将走到尽头，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是看不到中美建交的那一天了。

字幕：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

1979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独领风骚

一位西方人说：一个诗人赢得了一个新中国。

——题记

1. 韶山峰正在修建中的毛泽东诗词碑林。

记者：整个碑林区占地多少亩？

工程指挥：二十五亩。一共有五个时期——青少年时期、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建国以后……，把主席这些时期的诗词都全部归拢，刻在这里……这是全国最大的一个碑，长十二米二六，这是象征毛主席生日；高八米三，就是象征八十三岁；厚九十九厘米，象征9月9日逝世……

解说：1992年5月，为纪念毛泽东一百周年诞辰，用一百块花岗岩精心雕刻的我国最大的毛泽东诗词碑林在韶山动工兴建。

2. 收入不同版本的《毛泽东诗词选》。

解说：一位西方记者说过：“一个诗人赢得了一个新中国。”这种评价把毛泽东的革命生涯浪漫化了。

诗词创作贯穿了毛泽东的一生。1957年，他的诗词才开始正式发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选》，分

正编和副编收入了他 1918 年到 1965 年写的 50 首作品，人们从这些诗词中感受到了一个特别的艺术世界和 20 世纪中国的历史风云。

3. 采访德斯坦。

德斯坦(法国前总统)：毛泽东在法国知识分子中的威望很高，他的文章写得很美，他的诗歌在法国很有名……

4. 采访竹内实。

竹内实(日本著名汉学家)：毛泽东确实是革命家又是诗人，他的诗只流传发表了一部分，实际数量是很多的。他是一位革命家，在革命工作中作诗，所以依据他的诗，可以追寻他的革命历程……

5. 采访冰心。

冰心(著名作家)：毛主席写诗，不是像我们所说的是作诗，他是从心里边自然流露出来。他的诗我想不都是在书桌上写出来的，他一定是在马上，在行军打仗的时候哼出来的，这非常非常地好……

6. 采访臧克家。

臧克家(著名诗人)：毛主席给旧体诗词开了一个新纪元。我

简单地讲，首先他有丰富多采的革命生活，他还很努力，书无所不读：经、史、子、集；诗、词、歌、赋；政治的、军事的，全看。他不单是看，还批注，有时批注批一万多字。其次是谦虚，他从来不以诗人自居……

7. 湖南大地。韶山冲。

解说：湘楚大地是一片充满浪漫主义气质的文化沃土，孕育了瑰丽多彩的楚文化。两千多年前，中国最早的大诗人屈原，在这里留下了不朽的代表作《离骚》和《九歌》。毛泽东的诗词创作也是从这里起步的。

1910年，不满十七岁的毛泽东离开韶山，他第一次用诗歌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志向，改写了一位日本人写的诗留给父亲：

孩儿立志出乡关，
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
人生无处不青山。

8. 长沙。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岳麓山。湘江。

解说：从1911年到1925年，毛泽东曾长时间在长沙学习、工作和从事革命活动。这期间，中国和世界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字幕：辛亥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十月革命；五四运动。）这些事件影响了历史进程，也激励着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许多热血青年，他们以各种方式探索着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

9. 采访罗章龙。

罗章龙(新民学会会员,九十七岁):我认为他的诗,在中国的文学里面是有地位的,并且在世界文学里面也有地位。中国人,文的能作诗,武的能打仗,这种人不多。我那个时候同毛泽东,我们常常到岳麓山去,我们登山、游水,再有就是作诗……

解说:有一段时间,毛泽东和朋友们寄住在岳麓山下的岳麓书院,他们上山拾柴、挑水,这种生活使毛泽东体会着大自然,也有更多的时间学习和思考。

1918年春天,取名纵字一郎的罗章龙准备到日本留学,毛泽东写了一首诗为他送行,抒发他们风华正茂的书生意气。“……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这是正式公开发表的毛泽东五十首诗词中,写作最早的一首。

在长沙的那些日子里,毛泽东从事了大量的革命活动,为在湖南地区建立中共党组织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1925年,已是职业革命家的毛泽东独立湘江橘子洲头,写下了《沁园春·长沙》。在这首词中,毛泽东“指点江山”,抒发出“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壮志豪情。

写这首词时,毛泽东三十二岁,刚过而立之年。从这以后,他的诗词创作与革命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10. 采访陈晋。

陈晋(中央文献研究室副研究员):在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当

中，毛泽东同志是最富有诗人气质的革命家和政治家，他的创作成就和创作风格和他特殊的个性有关，同时也是和他一生从事的轰轰烈烈的事业不可分的。他高妙的地方，就在于能够把个性和特殊的历史内容糅在一起，这就形成了毛泽东一个突出的创作特点，什么创作特点呢？我感到就是越是困难的时候，越是处于逆境当中，他的诗情越高涨。这个特点非常明显。比如说有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在延安他生活了十年，这十年时间他没有留下一首诗。而且在1941年，他的两个儿子在莫斯科给他写信，请他写点诗，想读他的新作。他在回信中说“我现在一点诗兴也没有”。

延安这十年，是革命从低潮走向高潮、走向胜利，比较顺利的一段时间，毛泽东同志本人的生活也比较安定，他没有诗兴。相反呢，他的创作高潮就恰恰出现在特殊岁月里面。大体上他的创作高潮可以分为三个。第一个高潮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31年第二次反“围剿”这四年时间。都知道大革命失败以后，革命马上处于低潮，但这期间他诗情澎湃，比如说“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都是在逆境当中一种乐观的情态。第二个高潮是1934年秋天到1936年到达陕北这一年多的长征前后。在那么凶险异常、变幻莫测的长征途中，成天都打仗，而且前途怎么样都不了解，这个时候一般人心目中都很难有诗意，但是毛泽东却在马背上哼出了他的一系列代表作，五十首公开发表的诗词里就有八首是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写的，这里边有“不到长城非好汉”的乐观，有“万马战犹酣”的壮阔气势，还有“三军过后尽开颜”的胜利的喜悦……这是第二个高潮。

第三个高潮，是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大家知道，这段期间是大跃进之后，中国受到了严重的挫折，经济上混乱，又加上

自然灾害，同时国际形势也不妙；中苏关系开始破裂，中印关系很紧张，国际反华的浪潮比较高。在这种逆境下，毛泽东的诗情又一次高涨，而这个时期诗词的主要的一个主题，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是一种傲骨。

记者：在毛泽东现在公开发表的诗词里边，你认为最有代表性，而且不论是从诗的风格也好、完整性也好、气魄来说也好，最好的是哪两首？

陈晋：最好的，我个人认为，一首是《忆秦娥·娄山关》，另一首是《沁园春·雪》，而且这两首恰恰都是在长征前后写的，也就是说是在最艰难的日子里边写的。有句话说，毛泽东仿佛不是用笔在写诗，而是用枪声，用平平仄仄的枪声在押韵……

11. 暗转。娄山关。

解说：毛泽东的《忆秦娥·娄山关》作于1935年2月；描写中央红军第二次攻克娄山关，并迅速从这里通过的情景。

为了体会《娄山关》一词的创作环境，品味“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的诗情画意，我们摄制组没有乘车走公路，而是在当地老乡的帮助下，沿着当年毛泽东行军的山路前往娄山关。

一进山，马就不习惯时常对着它的摄像机镜头，最后终于惊了……

制服了惊马，我们继续行军。协助我们拍摄的当地武警部队领导带我们去寻找“娄山关”石碑。当年，毛泽东曾指着石碑同人讨论石碑上三个大字的书法笔体。

何昌武（武警遵义地区支队政委）：当年我们发现的碑大概

就在这个地方。因为时间比较长，有的地方记得不准确了。当时我们发现碑躺在这个地方……

记者：当时您在哪儿？

何昌武：我在军区当战士。现在这块碑立到下边去了。当年我们发现之后，我们的战士和电影厂的同志一起把它从这个地方抬下去了……

我们说的就是这块碑。那个时候我们部队协助上边的一个电影厂在娄山关拍一部片子，我们战士在这个后边发现草丛中有一块石头，战士把上边的草扒开一看，有“娄山关”三个字。当时这后边还有个农民在割草，把农民喊来一看，他说这是当年立在娄山关上面的碑，由于时间比较长，风吹雨打，倒在那里没人管，我们的战士就和电影厂的同志一起，把它抬下来立在这个地方……

12. 娄山关战役阵地。中央文献研究室档案处。

解说：我们今天尽量选择有路的地方前进，而当年的红军则是从没有路的地方攻上娄山关的。

敌军的阵地还依稀可辨，渺无人烟的荒坡好像在向后人转述着一段峥嵘岁月……

王道金（娄山关战役红军连长）：……我们教导员最后总结，那个时候开始都保密。我们教导员说，娄山关从战役上说是伟大的胜利，消灭了敌人，但是我们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大概伤亡一千多人，我那个连冲到敌人地堡里面，也牺牲了三十几个人……

解说：如此壮烈的战斗，毛泽东在他的《忆秦娥·娄山关》里却只字未提，只是到了1962年5月，他才在郭沫若写的解释这首词的文章清样上面，用郭沫若的口气写了一段话……

吴正裕（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毛泽东用郭老的口气写道：“在接近娄山关几十华里的地点，清晨出发，还有月亮，午后二三时到达娄山关，一战攻克，消灭敌军一个师。此时已近黄昏了，乘胜直追，夜战遵义，又消灭敌军一个师。此役共消灭敌军两个师，重占遵义。词是后来追写的，那天走了一百多华里，指挥作战，哪有时间和精力去哼诗呢？南方有好多个省，冬天无雪，或多年无雪，而只下霜，长空有雁，晓月不甚寒，正像北方的深秋。云贵川诸省，就是这样。‘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两句，据作者说，是在战争中积累了多年的景物观察，一到娄山关这种战争胜利和自然景物的突然遇合，就造成了作者自以为成功的这两句话……”

13. 画入娄山关景色。

解说：（朗诵《忆秦娥·娄山关》）

西风烈，
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
马蹄声碎，
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
苍山如海，
残阳如血。

解说：1935年10月，刚刚到达陕北的毛泽东，把一个被世界称为“前所未闻的故事”，浓缩在了一首《七律·长征》之中。

14. 采访姚雪垠。

姚雪垠(著名作家)：今天重新学习毛主席诗词，我有一个观点，不是每首都好，因为任何大的作家的作品都不是每首都好的。但《长征》是最好的，一是充满了革命激情、革命浪漫主义；第二是对仗很工整——律诗最讲究对仗，气魄也大。因为他是写词多，写诗少，在诗里头，这首诗是最好的……

解说：《七律·长征》，是毛泽东最早流传于世的诗词作品。美国记者斯诺在1936年10月访问毛泽东后，很快在西方报刊上发表了几十篇报道文章。当时，一位叫王福时的爱国青年组织人汇集翻译这些文章，编成《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于1937年3月秘密印刷出版，斯诺特意为该书提供了毛泽东写的《七律·长征》。随着斯诺的书不断被翻印，毛泽东给人们留下了战争诗人的印象。

(朗诵)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
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
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
三军过后尽开颜。

解说：如果说《七律·长征》在毛泽东诗作中占有重要位置的话，那么他的词作《沁园春·雪》则是千古绝唱。

1936年，日本军队侵入华北，蒋介石仍在调动大批中央军企图“剿灭”刚刚结束长征到达陕北的红军。

1936年2月，毛泽东、彭德怀在陕西清涧指挥红军东渡黄河，准备赶赴前线对日作战。

毛泽东就是在这个时候写下了《沁园春·雪》。

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他没有想到，九年前他写的《沁园春·雪》却引起了一场文化风波……

15. 重庆。采访周勇林、吴祖光。

周勇林（四川省历史学会顾问）：毛主席的《沁园春·雪》是一首脍炙人口的千古绝唱。这首词最早写于1936年2月，红军东征过黄河之前，传抄出来是1945年毛主席在重庆谈判时。

毛主席到重庆来之后，为什么要把《沁园春·雪》抄送给柳亚子？毛主席跟柳亚子是非常要好的。毛主席是8月28日到重庆，9月6日毛主席就去看柳亚子，当时柳亚子并不知道毛主

席有一首《沁园春·雪》。当时在国统区，很多人都不大知道毛主席对诗词是有很高深研究的。当时柳亚子正在编一本《民国诗选》。《民国诗选》就选了毛主席的《长征》诗——“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柳亚子就请毛主席核对一下这首诗的传抄有没有错误，毛主席说：“我另外抄一首给你。”

毛主席真正把《沁园春·雪》抄给柳亚子，是在10月7日毛主席快要离开重庆时。柳亚子读了之后非常佩服，柳亚子当时就把毛主席的原词和了一首。接着10月11日毛主席就回延安了，柳亚子就把毛主席的原词和他的和词送到《新华日报》去发表。当时《新华日报》有规定：凡是要发表毛主席的诗词和著作要经过延安批准，所以只能发表柳亚子的和词。

柳亚子的和词是在11月11日——那时毛主席已经回到延安很久——才发表出来的，柳亚子的和词里边写了一段小序，说是“和毛泽东到陕北见大雪之作”。既然有和词，就一定有原词，这就引起重庆文化界和各方面人士的注意。

吴祖光（著名剧作家）：当时我是在重庆《新民晚报》的副刊《西方夜谈》作主编。

就在毛主席走了不久，我就得到了一首毛主席写的《沁园春·雪》词。这首词当时只是在极少数人手里流传，而我拿到这首词的时候，是个残缺不全的，缺了两三个短句。缺一个字也不行，也不能成为一首完整的词。

当时我拿到这首词的第一个愿望，就是要在编的副刊上发表，于是我就想办法把它凑齐。果然我后来又拿到了两首也是不全的词，凑起来就完整了，但后来知道其中还是有一两个错字，但毕竟是完整的一首词了。当时我就不作任何考虑，我就要

发表，可那时被拦阻了。拦阻来自几个方面，主要是中共领导方面，说不要发表，原因是毛主席不愿意让人家知道他在写旧体诗词，他认为旧体诗词被格律限制，束缚年轻人的创造性，他不主张发。

可是后来发现《新华日报》登了柳亚子和毛主席的词，那就说明毛主席的顾虑已经不复存在。既然有人和你的词，说明你本人就是写词的。

这样我就不征求任何人的意见，在《新民晚报》上发表了，时间是1945年11月14日。发表的时候我还是考虑了一下，用什么形式来发表，因为一般发表一个文学作品，底下就写着作者的名字，而我就没有这么做，我就把题目写成“毛词”，底下小字“沁园春”，然后就是他的原词，原词后面，我就用文言文写了几句：“毛润之氏，能诗词，似鲜为人知，客有抄得其《沁园春》咏雪一词者，风调独绝，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据氏自称，则游戏之作，殊不足为青年法，尤不足为外人道也。”

周勇林：你现在查《新民晚报》最早发表毛主席的原词，跟现在有些地方不同。一个不同，毛主席后来有改动，比如原来是“原驱蜡象”，驱逐的“驱”，现在是“原驰蜡象”。还有那时排印上有错误，“只识弯弓射大雕”，“雕”字是个“周”字旁，排成一个朋友的“朋”字去了，成了“只识弯弓射大鹏”。

当然，当时大家都很渴望在重庆看到毛主席的原词，《新民晚报》一发表之后，山城的文化界就轰动了，争相传颂，也就引起了国民党的重视，国民党看了觉得毛主席的诗词气魄很大。12月4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就用一个“东鲁词人”发表两首，来骂毛主席，骂主席主要的一点，就是抓住“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说毛主席有帝王思想。接着国民党的报纸,还有些反动报纸,就纷纷发表了几十首。我现在收集的正面、反面、中间派的一共有三十六首。

毛主席回到延安后,王若飞在重庆就把所有骂毛主席的诗词和赞成毛主席的诗词都寄给毛主席。毛主席看了之后,就全部寄给王若飞的舅父黄齐生,毛主席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是:我们不要被国民党用这些小事把我们纠缠住,我们以大局为重。但是毛主席表明态度:“国民党骂人之作,鸦鸣蝉噪,可以喷饭。”

曾经蒋介石布置过,就在国民党内部,要写出超过毛主席诗词的作品,准备用国民党高级人士的名义来发表,可是拿不出来。

解说:在抗战胜利后那段形势十分复杂的日子,毛泽东以一首词在国统区为共产党塑造了全新的形象,使国共两党尖锐的政治斗争,一度以风雅的方式,在文化领域里展开。

大后方的文化人第一次感受到毛泽东的胸襟和气魄。

16. 画入祖国壮丽的山河、冬景。

解说:(朗诵《沁园春·雪》)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

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

欲与天公试比高。

须晴日,看红装素裹,

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
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
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
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17. 暗转。画入解放战争场景。

解说：从1936年2月毛泽东写下《沁园春·雪》到1949年春天，在长达十三年的时间里，毛泽东极少写诗作词。

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举世闻名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全国正处于革命胜利的前夜。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和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当天，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4月23日占领南京，宣告了蒋家王朝的灭亡。

毛泽东在北平香山双清别墅获悉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心情振奋，挥笔写下《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这是毛泽东继十三年前写下《沁园春·雪》之后又一首气势恢宏的杰作。

如果说，前一首揭示了一个旧世界必将灭亡，那么后一首正

好宣告一个新世界即将诞生。

18. 画入交响合唱《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钟山风雨起苍黄，
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
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
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间正道是沧桑。

19. 画转。画入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活动。

解说：战争硝烟逐渐散去，毛泽东的诗词创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50年代，蓬勃向上的社会主义建设是毛泽东诗词创作的主旋律。武汉修建的长江大桥，江西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病，丰收年头农民踏着炊烟收工回家，都激起他的诗兴。

60年代初，毛泽东的诗词创作又进入了一个高峰期。这个时期他的诗词大都富有战斗性，这与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密切相关。如果说毛泽东是政治家诗人，诗人政治家，那么，这一时期的作品是富有代表性的。

20. 画转。画入中南海雪景。

解说：毛泽东一生爱雪，爱得深沉，爱得执著，爱得强烈……

周福明(曾任毛泽东的卫士)：毛主席对雪特别有感情，一下雪，我们告诉他：“主席，今天外面下大雪了。”他穿着睡衣，外衣也不穿，帽子也不戴，就出去了，就在雪地上踩，好像年轻了，像娃娃的劲头，特别高兴。有时脸都冻得发紫了，我们说：“主席，披个大衣吧。”他不要，就在雪地里走。有时我们为了主席高兴，把地上的雪都堆起来，堆在院子里，他穿个拖鞋就来，鞋里被雪灌满了，他也高兴……

解说：毛泽东也钟情于梅花。梅花浴雪迎风的超凡品格，特别受到毛泽东的喜爱。

1961年隆冬时节，毛泽东把傲然挺立在冰雪世界中的梅花，写进了一首美丽的词——《卜算子·咏梅》，笔调是那样的昂扬，乐观。

21. 画入飞雪中的梅花。

解说：(朗诵《卜算子·咏梅》)

风雨送春归，
飞雪迎春到。
已是悬崖百丈冰，
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
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

她在丛中笑。

赵朴初(全国政协副主席):毛主席的诗词是现实主义同浪漫主义的结合。“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你看着好像是风雨送春归了,马上下了雪,又迎来了春天,所以使人想起世界上一个很有名的句子: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在那么一个寒冷的时候,梅花却盛开了;这个“俏”一方面是说梅花的俏,实际上是说革命者的才气、胸襟、经纶,是革命者的俏……

22. 画入一组毛泽东诗词手稿。

解说:五六十年代,毛泽东着手整理过去的一些诗词作品,作进一步推敲,而且挥笔书写他的作品。这一时期,毛泽东的书法艺术,特别是他的草书成就也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境界。

沈鹏(中国书法家协会代主席):在1958年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给田家英同志有一封信,这封信是10月16日写的。这封信是这样意思:田家英同志,请将已存各种草书字帖清出给我。从这封信来看,毛泽东同志这时他更自觉地在书法上面有进一步的追求。由于他早年有的基本功,再加上他的胸怀,他的学识,因此他在书法方面也是很不凡的。在用笔当中,他不大注意要中锋,还是侧锋,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执笔法。我想作为一个大艺术家,他在这方面并不是考虑很多,他考虑比较多的是他在书法作品中怎样显出一种总体的气势。

23. 暗转。一组祖国山川、大海的壮丽画面，叠印《毛泽东诗词选》。

解说：毛泽东一生充满了艰辛。作为革命家，他被认为是一位传奇式的伟大人物；作为诗人，他又是十分浪漫的。他的一生如同他的诗词，充满了革命的浪漫主义。

毛泽东诗词，是他的人格魅力的体现！

毛泽东诗词，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真实写照！

毛泽东诗词，成为了 20 世纪中国历史的一座丰碑！

第十集

到中流击水

毛泽东说：七级台风，在北戴河里游泳很舒服……

——题记

1. 毛泽东在各个时期游泳的画面。

字幕：1954年毛泽东在北戴河游泳	61岁
1956年毛泽东畅游长江	63岁
1964年毛泽东游十三陵水库	71岁
1966年毛泽东畅游长江	73岁
1974年毛泽东在长沙游泳馆游泳	81岁

解说：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喜好体育锻炼。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他最后二十年间游泳的场面。

毛泽东锻炼身体，比较常见的活动，一个是爬山，一个是游泳。最能展示毛泽东的意志和个性风采的，还是游泳。从韶山故居家门前的小池塘到祖国的江河湖海，在风浪中搏击，伴随着毛泽东度过了他多姿多采的一生。

2. 长沙游泳馆。

解说：1974年，八十一岁的毛泽东最后一次离京外出巡视，深秋季节来到了这里。这位看见风浪就忍不住激动的革命老人，

已无法到橘子洲头去中流击水了。他来到长沙游泳馆，先是坐在藤椅上，鼓励警卫人员从十米高的跳台上往下跳，接着他自己也站了起来，摸索着走向下水扶梯。

程根增(长沙市游泳馆馆长)：当时毛主席有八十一岁的高龄，在我们这个馆游泳，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毛主席每次都在这个地方下水。他下水的时候，习惯于先到水里面做几个准备动作，把头埋下去再起来，再埋下去再起来，这么活动两三次以后，就突然看到他一蹬边就出去好几米，就开始游起来了。主席在水里面的水性是特别地好。跟他在岸上的情况完全是两样。在岸上，看起来身体并不见得好，走路有人搀扶还不是很方便，但是到了水里面，完全是两个人一样。他一会儿是仰泳，一会儿是侧泳，一会儿又平躺在水面上，一会儿又潜到水底下去，并且经常做一些动作引起我们大家发笑。我记得在这个中间他平躺在水面上，做操给大家看，逗大家笑，然后平躺在水面上用脚搓脚，用手去搓脚，在水里面还连续转几个圈，大家一鼓掌一笑，他又转几个圈，逗得大家哄堂大笑。水性特别好，就像他诗词中写得一样，“胜似闲庭信步”。完全是两个人一样。

解说：下水前，考虑到毛泽东的身体不大好，有关负责同志同他约定只游二十分钟。可毛泽东一下就游了四十分钟。上岸时一位警卫人员游上前去托扶他，毛泽东用湖南话一字一字地说：“要自力更生嘛！”这是毛泽东一生最后一次游泳。

3. 暗转。画入韶山故居门前小池塘。

解说：这是毛泽东开始人生搏击的港湾。小时候他常在这里游泳。十三岁那年，父亲有一次当着客人的面骂他懒而无用，他与父亲顶撞后跑到池塘边，说如果再逼近就要跳下去。父亲无奈，只好同他谈判。后来，毛泽东获得了一个浅显却非常直观的真理：“如果温顺驯服，他反而打骂我更厉害。”

4. 暗转。画入《新青年》所载《体育之研究》。长沙湖南第一师范学校。采访周思源、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毛泽东纪念馆馆长和萧立昂。

周思源(毛泽东的同学周世钊之子)：主席在第一师范学习的时候非常注意锻炼身体。每天清晨，天还不亮，就跑到这个井边，用上面这个轱辘把井水一桶一桶吊起来，整个往身上泼，从头往下淋。他认为这样坚持锻炼自己的身体，能养成一个抗拒寒冷的能力，而且也是锻炼意志。大冬天没有一点吃苦耐劳的精神，要一桶一桶的水这样泼下去，是一般人受不了的。主席除了这样采取冷水浴的办法锻炼身体外，他还搞了几种：风浴、雨浴、日光浴。日光浴大家都知道。风浴，就是大风天气到野外去吹，面朝北，让北风使劲地吹。还有下倾盆大雨的时候，跑到外面去让雨淋，有时候跑到岳麓山顶上去让雨淋。还有日光浴。这么几种浴。另外，为了在学习的时候在宿舍也可以锻炼，他自己摸索出一种六段运动，就是现在说的按摩呀、搓呀、摸呀、揉呀，这么些手法，捶啊。六段，一共分六节，就像六节体操一样的。六段运动，这也是一种锻炼方法。

我记得我父亲说过，他(毛泽东)曾经受一个教师的启发，废止朝食。他曾经也试行，试过一段，早晨不吃早饭，他说饿也是一

种锻炼身体的方法，后来试行了一段，认为这种方法不可取，后来就停止了。

林德（第一师范学校青年时代毛泽东纪念馆馆长）：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游泳。主席游泳，游泳在那边，南口那边，橘子洲头那边。他经常到那边游泳，一下就是几个小时啊。游泳有的时候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坚持不断。游着游着可以几个小时不上来，就这么个毅力，这与锻炼身体是分不开的。

解说：今天的人们可能很少知道，毛泽东这位影响历史进程的大思想家、大政治家，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竟然是研究体育的。这是1917年4月的《新青年》，这篇《体育之研究》的作者“二十八画生”，就是毛泽东。他在文章里说，我们民族的体质太弱，大大影响了国力，许多有才华的古人不能长寿，就是身体不好。体育锻炼不但可以增强体魄，还可以锻炼意志和勇气，这样才能办成大事。

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期间，毛泽东在校园内贴出过一个启事，说：铁路之旁兮，水面汪洋；深浅合度兮，携手同行；晚餐之后兮，游泳一场……可见他对游泳的兴趣。毛泽东还写过一首诗，其中有这样两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

1918年，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这位没见过大海的青年，在冬天特意约了罗章龙、萧三两位好朋友一起去了一次天津。

萧立昂（萧三之子）：我父亲和主席祖籍都是南方，一直没有见过北国风光，也没见过海。1918年他们到北京的时候，主席就特别想去看海。这是冬天了，我父亲和他坐车去了天津，下车又

转车到了大沽口，就特别想看海，而且挺激动。结果到跟前，两人都傻眼了。一看，一片冰床，全是冰天雪地，一点水都没有。两人感慨了半天，也很遗憾，说这不是白走一趟吗？不甘心，在冰上走过过瘾也行。两人就各奔东西，看能不能找到海。主席向西去了，我父亲就向东去了。走了半天，两人找了个约会的地点。我父亲碰到一个木屋，看那屋子有点火，就奔去了。里面有个老头，在火堆跟前。老头打问他，我父亲说是湖南人，没见过海，从北京来看海。老头就乐了，就让他进来了。不一会主席也来了。老头很热情，招待他们喝了一杯茶，暖和过来后他们就出来了。还不甘心，决定再绕一圈。我父亲走了一段路就回到约会的地点，等了很长时间不见主席，最后很晚了，主席过来了，也很遗憾，说找了半天还是没看到海。最后他们在海边上捡了一些蚌壳、石头子就回去了。回到天津已经傍晚了，路灯已经亮了。

解说：第一次北京之行，毛泽东虽然没有看到大海，但他感受到“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他站到了历史潮头，投身五四运动。回到长沙后，毛泽东创办了《湘江评论》，立志打开冰冻千年的洞庭闸门。他告诉世人一个秘密：“什么都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经过“五四”大潮的洗礼，毛泽东早年的反抗性格和叛逆精神有了明确的方向。他走上了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家道路。

5. 蹊转。采访萧三妻子叶华。

叶华（萧三夫人）：在延安有一个小河不能游泳，它不够深。

我也喜欢游泳，这样我们就可以洗一洗。但是这个河不怎么深，没办法，那时候没什么游泳池，什么都没有，连水都没有，我们吃水是毛驴带上来，没有自来水，什么都没有，真的，延安电灯都没有。油灯、洋蜡都是觉得很珍贵的。

6. 毛泽东在杭州爬山的资料。陕北黄土高原航拍。黄河。陕北转战时的历史镜头。

解说：除了游泳，毛泽东喜欢的运动就是爬山。青年时代，他登览过南岳衡山、东岳泰山。这是他1955年在杭州登莫干山北高峰的情景。他爬山很有特点，就是不走回头路，哪怕是无路可走，这常使警卫人员犯愁。而毛泽东则说，路是人走出来的。他在一首诗里说过，“无限风光在险峰”。这或许是他对峰回路转的中国革命的一种体会吧！

1947年6月，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在陕北与胡宗南大军转战周旋的时候，住在王家湾。当时刘戡率大军从西北方向扑来，先头部队进到离王家湾只隔一个山头的下寺湾，而中央纵队司令任弼时手下只有二百多位战士。为了毛泽东的安全，他理所当然提出向北行军，避开敌人，万一摆脱不了追击，还可以东渡黄河。毛泽东却决定：迎敌而进，向西穿插，绝不过黄河！还在身后留下一块牌子：毛泽东由此上山。

当时的战场形势是危急的。但是，只要毛泽东在陕北，其他战场就好打；只要毛泽东在陕北，对扭转陕北战局就是巨大的感召，就是希望。

毛泽东正是在这种历史的大风大浪里，表现出搏击风浪的英雄本色，成长为人民领袖的。特别是在推翻三座大山，打碎旧

世界的历史过程中，他身上总有一股不信邪、不怕鬼的大无畏精神，这种精神是唤起民众、凝聚革命队伍的富有感染力的号召，也是毛泽东性格中最光彩的一个侧面。

7. 暗转。采访王宇清和徐涛。

王宇清(曾任毛泽东的警卫科长)：我跟随毛主席游泳啊，游过长江，游过湘江，游过赣江，游过珠江，毛主席还游过邕江。我还跟随毛主席无数次地在北戴河游过大海。我还跟主席游过北京的十三陵水库，湖南的韶山水库，江西的庐山水库，还有这里的武昌东湖。主席游了我们祖国的主要河流、名川大江，这个数目是很多的。毛主席游长江的次数，我记得不完全了，记忆当中有二十多次。毛主席为什么这么喜欢游长江？长江水深、流急、浪大。毛主席讲，它既能够锻炼身体，也可以锻炼意志，所以毛主席游长江。他有伟大的气魄。

徐涛(曾任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毛泽东游泳有自己的一套原则，那就是游大不游小，游长不游短，游远不游近，游险不游夷。

解说：毛泽东的性格就是这样，越是大江大河他越是要去，越是风大浪险的地方他越是要闯。

8. 暗转。画入北戴河。王宝贵、李讷介绍毛泽东第一次在北戴河游泳。碣石山。采访徐涛。

解说：1954年夏天，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戴河。可是正赶上北戴河一连几天的狂风暴雨。

王宝贵（曾任毛泽东的卫生员）：那天毛主席去的时候是水温比气温高，具体的情况我记不清楚了。刚下过大雨，他就非要下，我们就不愿意让他下。没办法，就找了杨尚昆，杨尚昆说了也不行。又找了罗瑞卿，他（毛泽东）给罗端卿说，你不下你就不下嘛，我也不让你下，我游我的嘛。往下下的时候呢，下不去，那浪就一个接着一个，全都把你打上来了，打翻了。最后我们所有的警卫人员弄成一个人墙，挡着。要想挡住这个浪，根本就挡不住。浪一来了……一下子根本就挡不住这个浪。最后呢，还是主席他有他的办法，他在那儿先蹲着，看准了一个浪来了以后，他这么一钻就进去了，顺着浪再往后一退啊，就到里头去了。不像我们好多人，好多年轻人哪，往那儿一站，啪，全给你打倒了，浪实在太大了。

解说：1954年的这次游泳，使毛泽东兴奋异常。他说，我“总算找到了一个好对手”。他告诉身边的卫士们，“你们还年轻，要经风雨见世面，要在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

以后，毛泽东又在1957年3月18日召开的济南党员干部大会上讲，游泳，就是“要到大风大浪之中去。七级台风，在北戴河里游泳很舒服。平时没有一点风浪反倒吃力。”

李讷（毛泽东的女儿）：他很喜欢和大自然搏斗，他觉得，可以锻炼身体魄，又可以培养人的意志。所以我们家的孩子都会游泳。这门课，过不了关就不行，就不及格，不毕业。我父亲游……

台风过了以后，那个大浪，真是白浪滔天那样的，这个浴场地基都裂开一条大缝。浪特别大，排天的浪，很高很高，比这房子还高，就那么样。那种景观我们都没见过。我父亲一看那个浪，就高兴。他一看那个浪就特别精神，眼睛都特别放光彩。他很喜欢这种搏击的心理。一看到那种场面，我觉得他那个精神状态就不一样，他马上换衣服就下。那个时候很难下，很大的浪，人都进不去。要进好几次，反复被打到岸上来。最后就冲进去。

解说：一千七百年前，曹操北征乌桓取得胜利后，班师途中经过碣石山，写了有名的《观沧海》诗。他看到的是“秋风萧瑟，洪波涌起”的苍凉景象。

四十年前，毛泽东来到北戴河，登临碣石山的时候，正以独具一格的开拓精神走上建设新中国的征程。魏武帝曹操的功业在他的眼里已成过去，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出发前毛泽东对工作人员说：“好吧，我们到海边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就要到了，我们到有潮水的地方去。”他不是站在岸边观沧海，而是奔向大海，到浪涛里去搏击。

徐涛（曾任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我记得那年在北戴河游泳，就是刚才我说过的，他跟大风大浪搏斗的那一年，后来有些天主席在休息的时候，常常口里念念有词，在读一首诗，常常读呢，我也就经常听，慢慢也就听会一些，那首诗是（加字幕）：“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解说：毛泽东游泳常常激发起诗情。这次游泳上岸后，他写了气势磅礴的《浪淘沙·北戴河》：

（朗诵）

大雨落幽燕，
白浪滔天，
秦皇岛外打鱼船。
一片汪洋都不见，
知向谁边？

往事越千年，
魏武挥鞭，
东临碣石有遗篇。
萧瑟秋风今又是，
换了人间。

9. 武昌东湖。毛泽东接见外宾的房间。采访宾馆管理人员。毛泽东在武昌接见蒙哥马利、斯特朗。美国的密西西比河。印度恒河。采访徐涛。

熊之凯（湖北省政府接待办公室协理员）：这个地方就是毛泽东主席当年会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地方。会见的时候基本上就在晚上，地点就在这个地方。四周都是沙发，中间摆了一个圆桌……

解说：畅游了中国的大江大河，毛泽东仍不满足。他把目光投向了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以外的江河湖海。在武昌东湖这间

房子，毛泽东先后会见过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人。1958年在谈到复杂的国际形势时，毛泽东冷不丁向对方提出，如果可能，他愿意到美国的密西西比河去畅游一番。

1960年初，毛泽东会见尼泊尔首相柯伊拉腊时，同客人讲起人与水的哲学。他说水是个好东西，能把人浮起来，这叫抵抗力。人要通过它就得把这压下去。还说，很想到印度的恒河，到尼泊尔的河流中去游泳。

徐涛：我觉得通过主席的游泳，也可以了解他思想和他性格的一个侧面。他为什么喜欢游大江大河，我觉得一般人游泳不大容易有这个特点，我给他起了个名字叫游外之意。就好像我们讲话有言外之意一样。他通过游泳表达他的想法。

10. 随转。画入四川都江堰。宝瓶口。三峡。人大七届五次 会议。

解说：1958年3月，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讲了革命者要有“五不怕”的精神。随后，他参观了著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毛泽东指着宝瓶口的急流问当地负责人：“这里有多深，过去有没有人下去游过。”回答说：“这里有八米深，没有人下去游过。”毛泽东笑了笑说：“我想下去。”

在这以前，渴望搏击风浪的毛泽东还曾把目光投向长江三峡。1957年7月7日，他郑重地给中央写信，提出要下水游过三峡。中央常委经过讨论没有同意他这出人意料的要求。

解说：毛泽东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这是一个民族征服自然的梦想。

两千年来，长江洪流曾给人们带来了二百一十四次大灾难。1953年2月，毛泽东乘舰艇视察长江时，伸手指着地图上的三峡口子说：能不能把这个口子卡起来呢？要驯服这条长江，一定要认真研究。1954年长江再次发生百年不遇的大水，毛泽东开始考虑修建三峡大坝工程，并指示有关人员认真调查研究。

1956年6月，毛泽东在武昌游泳横渡长江，挥笔写下了《水调歌头·游泳》，再一次为三峡工程立下了宏愿：“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

1992年4月3日，毛泽东治理三峡的愿望，经过半个世纪的论证，终于开始付诸实施了。

（中央电视台当天晚上的新闻联播）

解说：依然是湍急的河流，依然是陡峭的绝壁，依然是巍峨的群山。三峡重新向我们走来，向中国的21世纪走去。

这是人类改造大自然的又一次搏击。三峡惊动了世界。

11. 暗转。画入庐山外景。采访徐家贤。庐山水库。

解说：1959年夏天，毛泽东在主持召开庐山会议期间，曾多次到半山腰的一座水库里游泳。当时的警卫人员还清楚地记得毛泽东游泳时的情景。

徐家贤（江西警卫处处长）：主席游泳呢，他的时间是没有一

定的，有时候中午 11 点钟，有时候凌晨 3 点钟、4 点钟。我们所担心的就是主席，因为庐山的气候比较凉，水呢也比较凉。我们有时候坐在家里，我才二十多岁嘛，晚上穿毛衣。主席去游泳，游泳以后主席会不会感冒啊，会不会生病啊，我们都担心主席的健康。没想到主席游泳还一样健康，一样地工作。从我们的观察当中，主席不只是游泳，有时是在思考问题。在我们这个庐顶人工湖躺上抽一支烟，脑子是在思考问题。游泳不只是一种娱乐，他更重要的是在思考问题。

12. 暗转。画入中南海颐年堂、毛泽东故居空镜头。中南海游泳池空镜头。采访李越然。

解说：1958 年 7 月 31 日，赫鲁晓夫秘密访华。当天上午，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与赫鲁晓夫举行会谈。苏联提出要在中国建长波电台和搞“共同舰队”，毛泽东拒绝了这两个无理要求，维护了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上午的会谈在严肃的气氛中不欢而散，决定下午继续会谈。

下午，毛泽东把会谈地点改在了中南海游泳池旁边。至今为止，还没有听说哪个国家的领导人，在游泳池会见外宾，商谈严肃的话题。这大概是毛泽东独有的举重若轻的洒脱风采吧！

毛泽东在游泳池的出现又使双方外交官感到吃惊。会谈的翻译李越然还清楚地记得毛泽东邀请赫鲁晓夫下水游泳的情形。

李越然（曾任毛泽东的俄语翻译）：讲游泳那就事多了。赫鲁晓夫也想下游泳池。下游泳池，下去了。毛泽东这游泳就不用我

介绍了，在游泳池里他站着，几乎垂直站在水里头。毛泽东在中南海的游泳池里头，一下去，他一般是侧泳，一下子，游泳池就差不多到头了，就是从深水下去再往里一下子就完了，浅水就不够他用的。而且，他一会儿可以躺着，一会儿可以站着，最大限度几乎垂直站在水里头。赫鲁晓夫看傻了。赫鲁晓夫也进去了，划划划拉两下就不行了，完了还让上面的警卫员给他扔下去个救生圈，带上个救生圈在里面扑拉扑拉，说这下子我行了，我的心脏不用用劲了。我心想，毛主席不会这样。

13. 暗转。画入 60 年代初中外社会镜头。《不怕鬼的故事》。

解说：反对奴性也是毛泽东一生的宝贵性格，这种性格使他能够在任何大风大浪中表现出大无畏气概。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社会风浪接踵而来：中苏关系恶化，西藏分裂分子武装叛乱，台湾海峡危机，中印边境冲突，国际上出现反华浪潮，特别是大跃进失误后接踵而来的三年自然灾害……

这个时候，毛泽东却给人们大讲不怕鬼的故事。在 1959 年 4 月 5 日召开的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绘声绘色地讲起《聊斋》中的一段，说，一个书生夜晚读书，有鬼从窗户伸进长长的舌头来吓他，书生不慌不忙也把舌头伸出去，最后那个鬼只好走掉了。我们不怕鬼，炮击金门，一打，台湾海峡就风平浪静了。

一时间，“不怕鬼”成为中国人民克服内外压力的格言。1961 年当毛泽东从何其芳那里接过他亲自指导编写的这本《不怕鬼的故事》一书时，欣慰地笑了，他说：“我已六十多岁，就是不怕

鬼！”

解说：事隔一年，中苏论战拉开了序幕。专家撤走了，合同撕毁了。一些“老大哥”帮助建设的工程下马了。

毛泽东告诉带来苏共中央信件的苏联同志：“别着急，笔墨之战是死不了人的。起码有四件事我可以保证，不管你们怎么批评我们，天照样下雨，女人照样生孩子，草木照样生长，鱼照样在河里游。”

14. 暗转。画入毛泽东与斯特朗在延安会面。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与人民群众联欢、跳舞。

解说：在延安的窑洞里，斯特朗曾以女性记者特有的眼光发现了这样一个差别：周恩来的华尔兹舞是一流的，刘少奇的舞步像数字一样准确，朱德的步伐像是长征，而毛泽东则常常按着自己的节奏跳舞。这就如同别人喜欢在平缓的水流中游泳，而毛泽东则喜欢在七级台风中搏击一样。

15. 暗转。画入韶山水库。滴水洞。武汉长江水面。采访七一六艇艇长胡建平。1966年7月25日《人民日报》。

解说：1959年6月，毛泽东赴庐山开会之前，曾在这里游泳。上岸后，他兴致勃勃地对陪同他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说，在这个山沟里修几间茅草房也可以嘛，我老了回来住一住。于是，便有了这座依山而建的小楼，韶山当地群众管它叫滴水洞。

1966年6月18日下午，三辆小轿车和一辆大客车驶进了这里。毛泽东在滴水洞一住就是十天。他没有公开活动，每天就是看书批文件，然后就是游泳。

6月28日，毛泽东离开韶山来到武昌。7月16日，毛泽东以他73岁的高龄，再一次跃入滚滚长江。这一次他游了一小时零五分钟，游程十五公里。

胡建平(曾任七一六艇艇长)：当时正好主席在那面向游泳健儿招手，整个江面上，当时啊……看到主席在我们船上，就高呼“毛主席万岁”，在最激动的情况下，整个武汉游泳大军，“毛主席万岁”响遍武汉上空。当时主席就在这里高呼“人民万岁”。后来船开到汉口那边去了。到了汉口那边去以后，我们船就靠到武汉关那一带了。靠到武汉关那一带呢，武汉关的轮船上好多群众，当时看到主席在那边向岸上的群众招手，也是高呼“毛主席万岁”。这个时候，主席站在这个地方高呼“同志们万岁”。这个时候啊，毛主席畅游长江。

解说：毛泽东这次游长江，中国新闻界破例做了公开报道。时隔三十三天，仅仅三十三天，毛泽东挥动着一顶军帽，站到了天安门城楼上。

蓝色的海洋变成了红色的海洋。

毛泽东自己也没有想到，他掀动的这片红海洋，一下子持续了十年。

16. 暗转。画入照片中毛泽东青年时代到老年的一举一动。毛泽东在江河湖海中游泳。

解说：毛泽东一生有他独特的性格。他的一举一动，也同他的性格一样，很有特点。

他走路相当从容，就是在中青年时代也是这样。

毛泽东这种插腰讲话的习惯，在1949年之后的新闻镜头中就不太多见了，但他明显增加了手上的动作。

毛泽东每次都认真对待别人递到他手里的东西。在这些物品中，如果是帽子，他很乐意在头上试一试。

毛泽东还习惯使用拐杖。这我们可以在转战陕北途中和解放后毛泽东在杭州的一次登山活动中领悟到。

毛泽东这种不讲什么规则的游泳姿式，一生都没有发生变化。多少年来，他的游泳姿势始终保持着这个样子。

毛泽东游泳一贯随心所欲，想怎么游就怎么游，怎么舒服就怎么游。这大概是因为他太熟悉水的特性，驾轻就熟地掌握了游泳规律。所以他显得那样地自由自在。

第十一集

领袖家风

毛泽东对堂弟说：你是农民，还是种田稳妥些……

——题记

1. 新华门。丰泽园。颐年堂。长廊。菊香书屋。

解说：1949年9月开国前夕，毛泽东从北京西郊的香山双清别墅，正式搬入紫禁城旁边的中南海。中南海曾被人们看成是很神秘的地方。

丰泽园，建于清朝康熙年间。每年春天，清朝皇帝都要在这里演练一下耕田种地的程序，以表示对农业的重视。

往里走，就是颐年堂，这是丰泽园的主体建筑。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间，这里一直是毛泽东等第一代中央领导人举行重要会议的地方。抗美援朝、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等重大决策都是在这里作出的。

再往里去，东院叫菊香书屋，从前是清朝皇宫藏书的地方。

解说：荡去千年的斑驳历史和皇家封尘，这里成了新中国的心脏。从1949年9月到1966年8月，毛泽东在这里工作、学习和生活。菊香书屋成了毛泽东住得最长久的一个地方。

字幕：毛泽东在菊香书屋学习、工作、生活了整整17年。

2. 随转。画入韶山全景空镜头。推入韶山故居外景及屋内。毛泽东父母遗像及墓。

解说：来自农民家庭的毛泽东，还有另一处人们都知道的旧居。从1893年到1910年秋，毛泽东在父母身边生活了十六年。

这是一对典型的农家夫妇。男的勤俭能干，女的纯朴善良。毛泽东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长大成人。父母亲身上的传统美德和优秀品质沉淀到了毛泽东的血液里。

毛泽东一生以四海为家，但他始终也没有忘记故里的乡亲们。1959年，已经是共和国领袖的毛泽东，在阔别家乡三十二年后，回到了养育他的这片土地，回到了早已作古的父母身旁。回到家乡的当天晚上，毛泽东思绪万千，几乎一夜没有睡觉……

王宇清（曾任毛泽东的警卫科长）：一天早晨主席出来散步，往一个小山上走。我们陪主席走到一个山顶上。走到山顶上看到一个小坟头，坟旁边有一个墓碑，事后我们看了墓碑才知道，这是领袖父母的合葬墓。事先不知道主席有这么个活动，我们也没做什么准备，连花圈也没准备，连个小白花也没有戴。这时沈同同志找点松枝捆成一束递给了主席，主席就恭恭敬敬地献给父母的坟前，主席向父母的墓三鞠躬。

刘彬珍（韶山毛泽东纪念馆副馆长）：因为当时的墓是很普通的一个土堆，没有水泥，所以旁边有一个人就问主席，说，主席呀，这个墓要不要再修一下。主席说不要修，你们每年清明的时候，找一些人来培一些土。后来，罗瑞卿同志又回忆说，到了宾馆以后，毛主席还在想这个问题，就对罗瑞卿同志讲，我们共产党

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相信什么鬼神，但是生我者父母也，教我者党、人民、同志、朋友，这个我不能忘记，所以我下次回来，还要去看他们。

3. 暗转。画入留峰、蓝天。

解说：1910年秋天，不满十七岁的毛泽东毅然离开父母，走向了山外。这片土地给了他生命，山外的广阔世界却能展示他人生的辉煌。

4. 《炉边谈话》油画。

解说：1921年春节，已经选定革命信仰的毛泽东，回到了韶山冲。他把弟妹们叫到一起，围着火塘谈了一次话。毛泽东对弟妹妹们说：你们不要舍不得离开这个家，我们欠人家的帐要还人家，别人欠我们的钱就算了。就这样，一场炉边谈话引发了一场舍家为国的家庭革命，毛泽东的弟妹们都先后投身革命。

5. 毛泽民、毛泽覃、毛泽建、毛楚雄诸烈士遗像。

字幕：

毛泽民——毛泽东之弟，1943年9月27日被新疆军阀盛世才刽子手勒死，埋在天山脚下。

毛泽覃——毛泽东之弟，1935年4月25日饮弹卧血于江西瑞金。

毛泽建——毛泽东堂妹，1928年8月20日被敌人杀害于

湖南衡山县。

毛楚雄——毛泽覃之子，毛泽东之侄，1947年8月被胡宗南部下活埋在陕西北县东江口镇。

6. 板仓杨开慧墓及其雕像。

解说：杨开慧，是毛泽东最敬爱的老师杨昌济教授的女儿。1920年冬天，她成了小学教师毛泽东的妻子。从此她跟随毛泽东奔走革命。先后在长沙、上海、广州、武汉等地从事工作。

7. 板仓杨宅及杨开慧纪念馆。杨开慧日记发现处。

杨新和（杨开慧纪念馆馆长）：从1921年春天到1927年，毛主席曾经四次来过板仓，具体情况我们进去看一看好吧。

编导：这里全是她家？

杨新和：这个院子里住着杨开慧的一家。

编导：他们是认识几年以后结婚的？

杨新和：1913年，杨开慧当时随他的父亲迁居到了长沙，在长沙的师范学校认识了毛泽东。当时和毛泽东在一起的还有陈昌、蔡和森这些人士，在一起看一些进步的书籍，谈论一些救国救民的大事。从那以后，毛主席和杨开慧逐步加深了感情。我们1983年在这个墙缝里头发现了杨开慧烈士的手迹，这本手迹写了开慧同志从六岁到二十八岁的回忆。在这个回忆中间有一段她和毛泽东相爱的过程，回忆中写了，她看了毛泽东很多的文章，看了他的日记，因此她就爱上他了。具体的你们可以看看她的日记，陈列室里面有。

这个就是开慧 1929 年写的，从六岁到二十八岁之间的回忆，在这之间，写了她与毛主席相爱的过程：“不料我有这个幸运，得到了一个爱人，我是十分的爱他”。——这个他就是毛主席——“自从听到了他的许多事，看到了他许多的文章、日记，我就爱了他。不过我没有希望过跟他结婚，因为我不要人家被动的爱，我虽然爱，也决不表示爱还在个人手里头。”

邹红辉(杨开慧纪念馆解说员)：“直到他写了许多的信件表示了他的爱意，我还不相信我有这样一种幸运，得到了一个爱人，我是十分的爱他。具体地说，他为我十分的苦闷，我也有一个新的意思了，我除了为母亲所生之外，就是为了他。假设有一天母亲不在了，他被人捉住了，我要去跟着他同享一个命运。”在湖南第一师范，举行了一个淡雅的婚礼。但是她的父亲去世以后，她把四百块大洋全都捐献给船山学社了。

8. 杨开慧抱孩子的照片

解说：毛泽东上井冈山后，杨开慧在长沙板仓坚持革命工作。1930 年 11 月 14 日，杨开慧被敌人杀害于长沙浏阳门外的识字岭，时年 29 岁。她留下这样的遗言：“死不足惜，但愿革命早日成功。”

9. 采访李淑一。(用《蝶恋花》诗词画面)

字幕：1957 年 5 月，毛泽东写下了这首怀念杨开慧的词。

编导：您老今年多大了？

李淑一：九十三岁。

编导：毛主席和杨开慧好不好？

李淑一：蛮好的。

解说：李淑一是杨开慧的亲密朋友，杨开慧在恋爱和结婚的一段时间里常向她吐露感情上的“悄悄话”。

10. 毛岸英小时候各种照片。

解说：母亲牺牲了，毛岸英和两个弟弟被送往上海，由地下党照管。在党组织遭受破坏后，他们曾流落街头。后来毛岸英被送往苏联学习，还成了苏联红军的一名军官，战斗在反法西斯的前线。

11. 毛泽东、毛岸英父子合影。

解说：离别二十年后，毛岸英才见到自己的父亲。然而，毛泽东并没有把爱子留在身边，先是让岸英去当农民，后来又让他当了工人。

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发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紧接着就把新婚不久的毛岸英送到了朝鲜前线。1950年11月25日，毛岸英遭敌机轰炸牺牲。他永远地躺在了异国他乡。

12. 采访刘松林。

刘松林(毛岸英的妻子):主席的暗示,使我做好了思想准备。大概是1953年夏天,我就去问了,为什么毛岸英这么长时间没有来信。当时他告诉了我,已经牺牲了,考虑到我还在学习,怕影响我的学习尽量往后推,能让我安心一天是一天,他说很对不起,没告诉我。

主席对毛岸英是很赞赏的。我是这么想的,到前方去,生命是危险的,我总觉得他离死亡是很近的,枪弹都不长眼睛的,不管怎么保护都是没有用。毛泽东他出生入死几十年的战争经历,他不可能意识不到这一点,不可能想不到把儿子送去培养锻炼,他不一定会平平安安地回来,他不会的。他一定想到这里是有危险的,而且是相当的危险,我想他要是仅仅是把儿子锻炼出来的话,他不会下那么大的决心,等于是下赌一样,他不会的。他还是想到让他作为一个普通公民,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走在第一线的。

13. 采访毛岸青、邵华一家。

解说:毛岸青,是毛泽东的第二个孩子,小时候他和哥哥一起经受了各种磨难。在上海流浪时曾遭受外国巡捕毒打致使脑部受伤。岸英哥哥牺牲的消息,又使他再次受到精神刺激。

邵华(毛岸青的妻子):父亲总是告诉我们,你们不要以为自己是毛泽东的子女,而有特殊感,特别强调这一点,你们没有任何值得用来骄傲的本钱,你们应该和广大的劳动人民的子弟一样,人家做什么,你们就要做什么,甚至还要付出更多的辛劳才行。这样的话呢,我们都是铭记在心,我们平常在学校都是过的

集体生活，和大家一样同吃同住，我们只有周末才和大家一起回家，节假日的时候才回家，其他时间都是在学校，住的是集体宿舍，吃的是集体食堂，包括困难时期，我们也完全和大家生活在一起，吃的一样的东西。大家挨饿的时候，吃不饱，我们也是这样。同志们浮肿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回到家里来，父亲也绝不给我们改善生活。

14. 毛泽东与贺子珍合影。采访李敏一家。

解说：贺子珍，是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同毛泽东结合的，她和毛泽东一起参加了开辟和巩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工作，并一起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他们有几个孩子在战争年代或夭折或丢失了。为拍摄本片，我们采访了他俩唯一的女儿李敏。

编导：主席经常对你要求得很严吗？

李敏：严。

……走路上学、住校，初中一年级、二年级住校，初三的时候走路上学，高中后才开始骑车。住校的时候吃食堂，后来是带饭，带中午饭。

15. 访李讷。毛泽东与李讷在延安的合影。

解说：这是毛泽东的小女儿李讷，出生在延安。

李讷：家里一个月给我二十六块钱念大学，不够就跟别人借，下个月在自己的二十六块钱里还，不许多要一分钱。好多同

学都以为我是大款，主席的女儿嘛，借上一个十元我还能勉强强地过，再借第二次，我自己都得跟别人借钱，我还不能告诉他。他们都不能相信，我自己连饭费都交不上了，就十五元饭费，剩下没有多少钱，所以紧紧巴巴的。最近有个同学看了回忆录，跟我说，我真想不到，当年我跟你借，还以为你多有钱，原来你也很困难哪。我觉得他给我们的最大财富就是他对我们的教导，这种精神上的财富是我们一生取之不尽、用之不完的，这个财富是最宝贵的。

我觉得，有人曾经说过，当年你父亲要求你那么严格，你觉得幸福吗，甚至还有人问，你恨不恨？我说怎么会提出这个问题？我爱他还来不及呢！我觉得他那样要求我，完全是为我好，而且是爱得长远，看得长远。假如他不那样严格要求的话，我后来一个人带着孩子过，恐怕很难过得来。我想他是早就预见到了，他那样要求，完全不是过份的，而是很实事求是的，按着你将来要怎么样，必须要过那样的关，才那样严格要求，并不是说是随便地那样做。他那是真正的父爱。他爱我，真的。

16. 毛泽东及全家照片。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和人民在一起画面。南京路上好八连。

解说：毛泽东以他特有的方式爱着自己的子女。为了党的事业，他同样以自己的方式爱护着党的干部。他开创了一个时代，同时也开创了一个时代的新风尚。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解说：建国后，他明确提出了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指导方针，强调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1957年3月18日，毛泽东在济南党员干部会议上批评一部分同志，在革命胜利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过去跟敌人打仗时的那种拼命精神少了，而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这些东西多起来了。”第二天，毛泽东又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特别提出：“我们的同志应当注意，不要靠官，不要靠职位高，不要靠老资格吃饭。”

解说：1963年，毛泽东了解到上海南京路上好八连的干部战士们，身居闹市、一尘不染的事迹后，特别写了这首《八连颂》赞扬他们。他希望全国人民，特别是党的干部，用一种特殊的精神和特殊的情操来要求自己。他自己，更是这样做的。

17. 采访吴旭君。

吴旭君（曾任毛泽东的保健护士长）：1966年3月8日邢台地区地震的时候，主席刚刚睡下，我连忙爬起来，赶往主席卧室里头，把他推醒了。我搀扶着他，我们到了小院子的空地上去了，因为没有房子。地震之后呀，我想把他屋子里的东西收拾一下，再震的时候拿起来就走。想来想去，主席居然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除了接见外宾穿的那套灰色制服外，就有一双皮鞋，旧皮鞋，另外就是床上放的一床破旧的毛巾被，一件睡袍子和一双拖鞋。他既没有黄金也没有白银，也没有存折，又没有现金，他从来就是身无分文的，那些年连一块好的手表和一支好的钢笔都没有。

我就想，拿什么呢，我看见他满屋子都是搬不动的书，这是贵重的，可是搬不动。唯一能够拿走的，就是那块他经常用的旧手表，还有一件能拿走的东西也是比较贵重的，就是主席让我保存的那一沓子诗词手稿。

18. 暗转。采访姚淑贤。

姚淑贤(曾任毛泽东专列列车员)：1953年的时候，部里头召开了一个会，说是有一个重要任务，是人民的重托，我们要用党性去完成它，要完成好，同时还宣布了一个纪律，不能随便乱说，不能乱问，不能随便答复问题，不能串车厢。经过一天一夜，我也不知道我的车厢里是谁，我也不敢到这车厢上来。我一看哪，叫你们都想象不到。床铺本来是有软垫的，也拿掉了，成了硬板床。枕头也是硬梆梆的。本来咱们车上是准备缎子被的，结果也把它拿掉了，换上了两床毛毯。那毛毯上都是抽烟烫的小窟窿，旧毛毯。睡衣吧，旧的，尽是补丁。一看牙具，更让人难以相信是主席用的东西。牙刷几乎没毛了。牙粉……，那时候市场几乎买不到牙粉。香皂也没有，是肥皂。毛巾旧得呀……，也很旧。我想肯定不是毛主席，毛主席哪能用这个东西呀。我当时很失望了，就坐在车上。反正人家不让说，咱也别说了，不让问，咱也别问了。经过一天以后，卫士长对我说，你还没看见主席吧，你应有礼貌，去见见主席吧。我说谁，他说主席。我想主席，是工会主席吧，我早就想看看了。我心里那么想，但没敢说出来。我就跟他走，走到他房间，他可能去跟主席说了一下，说你进来，我就进去了。唉呀，我一看，真是主席，当时我是很激动的。在我的想象里头，主席的吃住用肯定不是这样，他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19. 暗转。画入毛泽东遗物及住房。

解说：长期以来，毛泽东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生活习惯，俭朴、随便，很能凑合。他对穿衣服的要求是：实用、节省，然后才考虑美观。毛泽东一生没有住过根据他的需要专门给他盖的好房子，他长期住的菊香书屋这种四合院，和北京城内的许多四合院一样，没有遮风避雨的回廊，屋子里也没有对流通风的窗子，而且屋子比较矮，比较阴暗，也比较潮湿。到了夏天，还有些闷热。后来，他从菊香书屋搬到游泳池那边去住，身边工作人员觉得这不是住家的地方。可是毛泽东说，我觉得这里不错，走出卧室门就到了大厅，大厅又可以学习，又可以开会，还可以会客，还不用上下阶梯。又节省人力，又节省物力，还节省汽油，还能和大家在一起游泳，多好啊。后来毛泽东的住处有几个地方漏雨，他不同意修，还说，漏雨嘛，拿个盆子去接水就行了，又不影响我办公，不要花这笔钱了。毛泽东在这里一住就是九年。

20. 采访周福明、吴连登、鲁毅。珍藏在韶山的毛泽东遗物。

周福明（曾任毛泽东的卫士、理发员）：我一看到这件睡衣，想到当年在主席身边的时候，主席穿着这件睡衣，补了几十个补丁。这件睡衣现在就唯一这一点地方，是原来的布料，其他都是补了的，而且补了又补。毛主席生前……刚才讲到毛主席躺着办公的时候，这一侧胳膊肘茧子特别厚，这个衣服这个袖子磨破了又补，这个肩上都是打的补丁，这后面可以看一下，整个都是打的补丁，打了几十块补丁，连这个衣服下面也都打了补丁。我陪

着主席吃饭的时候，我说，主席呀，给你换一件睡衣吧，你这个睡衣太不像话了，你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这么穿着，我们心里不好过啊。当时我也穿了件补了的衣服。主席说，你可以补，我难道就不可以补吗，我是国家主席就可以搞这种特殊吗，我这个衣服可以穿，我也不是搞外事活动穿，我在家里穿，有什么关系呢？你给我补，能帮我补就补，实在不能穿的时候，你给我保存好，教育我们后一代。我们国家很穷啊，我们不能铺张浪费啊。所以这件衣服就一直穿到70年代的时候，就留下来，一直留到现在。

吴连登（曾任毛泽东的生活管理员）：对这件衣服，我们动员主席，说，主席，能不能换一件。主席说，你们给补一补还能穿。我们不是说我们国家给主席做不起一件衣服，也不是我们毛主席没有这个钱，而是毛主席从战争年代苦过来，进了城以后没有享受，没有忘记人民，他心里一直想着全国人民。

周福明：这个毛巾被呢，主席有两床，中南海里有一床。这床有六十多块补丁，那一床有七十多块补丁。看这个厂子，是上海太平洋厂家，是解放以前的，不是解放以后的。这个是主席建国初期就一直盖着，所以主席不像我们一样要盖被。他呢，只盖毛巾被，冬天盖两条甚至三条毛巾被，夏天就盖单的。三个毛巾被就代替被子。这个毛巾被他说是很舒服，走到哪里，我们就负责给他带着，就是补了好几十块补丁。我们看一下，也可以数一下，到处补的补丁，这个毛巾被都和蜘蛛网一样，都看不出原来的样子，一点毛都没有了。

鲁毅(曾任江西省警卫处长);主席是爱游泳的,当然他就有游泳裤。他穿什么样的游泳裤呢,我一看主席的游泳裤有补丁,放在主席住的地方也不严肃,我告诉服务员赶快给换一条,把旧的扔掉。主席又把它找回来,还继续穿。主席够俭朴的。

21. 晒转。晒入毛泽东开支帐本。采访吴连登。

解说:毛泽东的衣食住行是这样地简朴,那么,他的收入又是如何开支的呢?

吴连登:这是主席遗留下来的帐本、收支情况。主席的工资一共是四百零四元八角,光房租就是要开支八十六元三角二分,到冬天的时候有取暖费,增加四十多块钱,冬天的取暖费也是从工资里面扣。除了饭费、党费和其他开支,还要付车费,洗澡要付洗澡费,还要付房租、水电费,包括厨房里添置的东西,我们也从主席工资里扣。

22. 中南海。采访李银桥、周思源、柳晓昂、高智。

解说:毛泽东在生活上简朴、克己的故事,还有许多。我们想,他之所以这样要求自己,一方面是因为他在长期的艰苦革命斗争中养成并保持着这种习惯,另一方面作为党的领袖,他要为党的高级干部带好个头。但毛泽东对身边有困难的工作人员、老同事、老朋友却很慷慨、大方。在不到两个月的实地采访中,我们就发现了毛泽东邮寄给他们的资助款达两万多元,这远远不是全部。这些钱都是毛泽东的稿费收入。

李银桥(曾任毛泽东的卫士长):我生了第一个孩子,有困难,主席给了我200块钱,说帮你解决困难,你有孩子花钱多。

韩桂馨(李银桥的妻子):我们离开北京,调到天津去了,要安家,1963年又帮助我们三千元。

周思源(毛泽东青年时代的同学周世钊之子):主席对第一师范的一些教师、同学也是很有感情的,给我父亲寄了好几次钱,转交有生活困难的同学。这就是一封:“看了田仁尊兄的信,表示生活极为困难,似有求助之意,寄上五百元,请予转交。另外,如有其他穷朋友因生活困难的,日子难过的,也请转告,我予以援助,都由你经手。这是一种社会主义援助性质,又及。”

“敦元兄,”我父亲的字叫敦元嘛,“信收到,重谢。复信一封,人民币二千元,请转致张次峯先生为盼。祝好。”张次峯是第一师范的校长,他的名叫张干。

柳晓昂(李淑一之子):“淑一同志,给我的信及祭文均收到,迟复为歉。寄上五百元,聊佐薪水,勿却。”

编导:这五百元是怎么回事啊?

柳晓昂:毛主席不是有一些稿费嘛,对一些有困难的老同志,一些烈属,他就赠送一些。

高智(曾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1957年主席研究形式逻辑,就把上海复旦大学的周老周谷城请来。当时我记得住到友谊宾馆。因为是主席亲自请来的,毛主席就让我送给几百块钱,因为他到了北

京要零花用。那个时候，我见了周老就给他了，也没有个条子，也没有打个收据，是三百呀还是五百呀，我也记不清了。

23. 辘转。圈入韶山。寻找和采访毛泽连。

解说：建国初期，毛泽东的一些亲属知道他在京城做了大官，就请他帮忙安排工作，但都被毛泽东拒绝了。其中有一个就是他的堂弟毛泽连。

编导：天天都劳动啊？

毛泽连（毛泽东堂弟）：是啊，天天劳动。

编导：你多大年纪了？

毛泽连：八十了。

编导：你眼睛不好，还劳动啊？

毛泽连：是啊。八十了，天天劳动，我的眼睛看不见，也是这样劳动。种地呀，也是这样做的呀。我看你们同志我也看不清楚，模模糊糊。我老表（毛泽东）他讲，泽连的困难我知道，我了解，我也不能只解决他一个人的困难，他的困难要由当地解决。他说不能解决我一个人的困难，“我要解决全中国的困难，我要解决你一个人的困难，我这主席也当不了。你还是在家乡种地稳妥些。”我们都是普通老百姓。

（与毛泽连告别。渐远。）

解说：这位几乎失明的老人，至今仍天天在地里劳动。正像他的堂兄毛泽东所说：“泽连是农民，还是种田稳妥些。”

从中南海到韶山冲，是那样地遥远，却又是那样地贴近。毛

泽东从我做起，编织了共和国的一代新风！

第十二集

晚年岁月

毛泽东说：今天的青年和未来的青年将按照他们自己的价值标准来评价革命工作……

——题记

1. 中南海游泳池。

字幕：中南海游泳池。

解说：1966年8月下旬，毛泽东从中南海菊香书屋搬到一个叫游泳池的地方居住。他在这里度过了一生的最后十年。

毛泽东去世后，这里经过了重新装修，我们今天看到的游泳池已不是原来的样子。

1974年5月30日，毛泽东在这里向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请教了一个问题……

2. 采访李政道。

李政道（著名美籍物理学家）：到的时候，是早晨7点。毛主席等我坐下来，他就问我，说：“对称”是一个静止的观念，像个天平，两边都摆平了就是“对称”，而静止的观念在他的经验里边对社会的发展不是最重要的，因为社会的发展是“动”的。所以他不觉得“为什么在科学上‘对称’有这么重要？”

那时我坐在这儿，毛主席坐在我的右面，中间有个小茶几，茶几上有一个纸本，旁边有些铅笔。我就拿了纸本，拿了铅笔，把

铅笔往毛主席那方面一推，铅笔就滚下去了，铅笔还没有滚完，我这样一来，铅笔又滚回来了，每一个时候都在动的，所以“对称”在科学上并不是一个静止的观念，所有的宇宙运动，都跟“对称”有关，它是在“动”的里边来“对称”。

毛主席对这个观念能够接受，也觉得很有启发性，他说，非常遗憾他没有可能把科学再继续研究下去……

解说：这一年，毛泽东已经八十一岁高龄，当他感慨没有时间研究自然科学的时候，实际上也没有更多的时间去研究他最为熟悉的社会科学了。

从70年代开始，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就起了明显的变化。

3. 人民大会堂。1973年“十大”电影资料。采访吴旭君。

解说：1973年，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绝大多数与会代表恐怕至今还不知道当时发生在毛泽东身上的一个特殊细节。

吴旭君（曾任毛泽东的保健护士长）：1973年“十大”召开的时候，那段时间毛主席的身体不是太好，主要在健康上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当时他的腿走路走得不是太稳，可以说步履艰难，而且有点气喘吁吁。

大会开幕的时候，主席出席了，代表们热烈地鼓掌，气氛是相当好。后来宣布散会了，我看到主席两只手扶着椅子使劲往下压，就是说他想要让自己的身体能够支撑起来。这时候我马上叫身边搞生活服务的人赶快过去搀扶他，让他站起来，把椅子往后

挪，腾一个地方让他站稳了。台上台下哗哗地鼓掌，气氛是挺热烈的。

长时间的鼓掌和欢呼，可能持续了十分钟之久。我估计是总理发现了主席的腿在颤抖，他让主席坐下，主席这个时候也毫无顾忌地一屁股重重地就坐到了椅子上，一动也不动。

台下的代表们还是在向毛主席欢呼，还是那么热烈，大家都不动。周总理这时挥动两只手，意思就是说让代表们赶快退场，可是毫无反应。

（画入资料片及毛泽东原声）：

“你们不走，我也不好走。”

吴旭君：总理匆匆地就向我走来，我马上就迎上去了。总理跟我讲：“吴旭君同志，你估计主席还能站起来吗？”

我说：“看来困难了。”他说：“怎么办呢？代表们不肯走啊，你在主席身边这么久，你了解主席的健康，你了解主席的脾气，你是不是提一个建议？”

我看到总理那么为难，因为这是处理毛主席的事情，没有经过毛主席的同意是不太好办的。所以我当时也很着急。想一个什么办法，既不能让代表们知道毛主席身体不好，又不能让毛主席先走，因为主席不走，代表就不走。后来我认真地想了一下，就跟总理讲，我说：“总理，既然你让我提个建议，那我就大胆地说了。”我说：“是不是请总理亲自向代表们宣布：毛主席目送各位代表退场。”

他马上就采纳了我的意见，当机立断，转身就走向主席台中间放麦克风的地方，他大声地讲：“各位代表请注意，现在毛主席目送各位代表退场，请大家立即行动起来，分成各路退场。”

台下顿时就骚动起来，还是在鼓掌，还是在欢呼，可是人们在慢慢地朝门口移动，大家的脸都是朝着主席台，等于是倒着走。

代表们都走了，毛主席是最后走的。

解说：据毛泽东身边医务人员介绍，1971年，他犯过一次肺心病。1972年元旦，美国总统尼克松来访前夕，他又休克了一次。生理衰老和疾病缠身使这位雄心不已的老人开始面对一种新的矛盾，但他留给人们的印象依然是那样乐观。他多次同中外友人谈起自己的生死观。

4. 莫斯科。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采访吴旭君。1965年毛泽东会见斯诺的电影资料。

解说：早在1949年第一次访问苏联时，毛泽东就对苏方翻译费德林讲了一句中国成语：“视死如归”。费德林不解其意，毛泽东解释说：“归”在这里不是通常“回来”、“归来”的意思，这个成语应当这样解释：“藐视一切困难和痛苦，像看待自己回到原来状态一样看待死亡。”

解说：1958年5月20日，毛泽东又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说：“其实我们中国人把结婚叫喜事，叫红喜事，死人也叫喜事，叫白喜事，合起来叫红白喜事，很有道理。如果孔子还在，会场上有他，问他多大年纪？两千五百岁，这就很不好。讲辩证法不赞成死亡不好，是形而上学。”

吴旭君：主席跟我长谈了一次，他说：“总而言之吧，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喽……”说完这句话他哈哈地大笑起来。后来他又接着跟我讲：“我死了，要开个庆祝会，你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最好穿上鲜艳的、红颜色的衣服或者是花衣服，要兴高采烈地、满面春风地去参加这个庆祝会，然后你就大大方方地上台去讲话。”我说：“讲什么呀，主席？”他说：“你就讲，同志们，今天我们开个庆祝会，这是个胜利的大会，毛泽东死了，我们大家来庆祝辩证法的胜利。”

解说：毛泽东总是用一种轻松、幽默的方式表达自己对生死的看法。轻松和幽默的背后，却是他对自己身后中国的思考。

1965年1月9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斯诺。在这次会见中，斯诺问毛泽东：“你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环境。但在比较安逸的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将做些什么？”毛泽东说，他也不可能知道，“将来的事情要由将来的后代去决定，……从长远来看，将来的后代应当比我们更有知识，……今天的青年和未来的青年将按照他们自己的价值标准来评价革命工作……”

这个谈话表达了一个十分可贵的思想，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但是，毛泽东晚年的实践和理论却不完全一致。在与斯诺谈话后一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5. 1966年“文革”，毛泽东检阅红卫兵的资料片。

解说：对于这场给新中国带来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要负主要责任。当然，毛泽东发动这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

动，并不是要破坏他一手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结果导致了一场大大超出他预料和控制的大动乱。

6. 蹊转。画入行驶中的毛泽东专列。

解说：1967年，毛泽东外出视察，“文革”的实际情况使他有了新的思考。他对身边同志讲：“文化大革命一年开张，二年见眉目，打下基础，三年收尾。”

这场运动没有像毛泽东所预想的那样发展。林彪、江青等人先后组成两个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的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的错误，背着他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活动，给党和国家造成了无法估量的危害。

7. 1967年5月1日《人民日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看林彪讲话。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与斯诺在天安门。

解说：这是1967年5月1日的《人民日报》。有一天，毛泽东拿着这张报纸问当时在场的人：“谁封我四个官啊？”又说：“你们不要宣传这些，要讲马克思主义，马列主义万岁，不要宣传个人，否则将来要吃大亏。”

解说：毛泽东并不完全拒绝人们对他的崇拜，但对身边的这个人，他已开始警惕。

解说：我们从“文革”的影片资料中多次发现，当林彪在高呼“万岁”的时候，毛泽东总是紧锁着眉头。

解说：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斯诺说：“四个‘伟大’讨嫌。”同年12月18日，他又在与斯诺的谈话中把喊“万岁”的人分成三种，其中第三种是假的。毛泽东说：“你才不要相信那一套呢。”

8. 1971年5月1日晚天安门焰火晚会影片资料。照片。采访杜修贤。

解说：这是1971年5月1日晚中央电视台拍摄的新闻片，从始至终没有拍到一个林彪和毛泽东在一起的镜头，这是异乎寻常的。

杜修贤（新华社摄影记者）：那天晚上是主席先到的，到了之后林彪才上来，上来之后就坐在原来那个位置，天安门城楼正中间第一排，一个圆桌，毛主席在东边，林彪在西边。林彪坐下来以后，我们也奇怪，他跟主席没有打招呼，主席跟他也没有打招呼。

我这个人拍照片，不管什么情况先按一张，按完一张之后我再选择其他时候拍。拍完一张之后，我也发现他俩没打招呼。

记者：林彪是和谁说话？

杜修贤：林彪是跟董老，主席是跟西哈努克亲王。我们拍电影、拍电视的站一排等他们说话。大约两三分钟，林彪起来了。我们以为他上卫生间，我们给他闪开一条道，让他出去了。过了快半个小时了，还不见回来。我就问警务处的同志，我说：“林副主

席上卫生间上了这么长时间，快半个小时了？”人家告诉我：“早回家了！”这下我们紧张了，因为只有我拍了一张，电影、电视都没开机。

解说：我们无法猜测毛泽东当时的心境，但我们知道这是毛泽东第四十五次登上天安门城楼，也是他一生的最后一次。

9. 暗转。采访吴旭君。行驶中的列车。外景。温都尔汗坠机图片。

吴旭君：1971年，有一次毛主席南巡，那一次我跟着主席一起去了，南巡的时间是从1971年的8月14日到9月12日，将近有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吧。这一次南巡，跟以往不一样，一个就是主席自己带头，也让我们唱《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再一个就是他沿途谈话提到林彪的事情比较明显，再一个不一样就是在沿途谈话中提到了“三要三不要”，就是“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到了9月11日的上午，车子到达上海，到了下午突然就离开了上海，傍晚的时候，火车路过了苏州地区的一个铁路桥，安全通过了。这个铁路桥是林立果和江腾蛟准备在这里炸的，要谋害毛主席的，可是因为主席行动快，安全通过了，一路就没有停。当车子到达北京丰台，主席突然下令说，停车！车子当时就停在丰台。

在丰台，他找了北京军区、北京市委的负责同志谈话，谈了两个多小时。等到毛主席的专列安全抵达北京，我们回到游泳

池，已经是9月13日的凌晨了。

毛主席知道林彪机毁人亡的事情以后，他自言自语地说：“我一离开北京，林副主席就慌了手脚，其实我是出去搞调查研究的，他倒害怕起来了。”他说：“本来我是想这一次外出回来，回到北京再找他谈一谈，谁知道他心里有鬼，急急忙忙，马不停蹄，结果摔死了吧……”主席说：“阴谋啊，是搞不得的，有一个是垮一个，有十个是垮五双，一个不漏。”

解说：“九·一三”事件对毛泽东内心世界的震动是完全可以想见的。他又一次重新审视这场运动，重新思考许多新的问题。当时的中国人都感到自己敬爱的领袖明显地衰老了。

10. 暗转。1972年陈毅逝世及追悼会影片资料。采访陈昊苏。

解说：1972年1月6日午夜，陈毅元帅在北京最寒冷的季节里逝世。

1月8日，毛泽东签发了陈毅的悼词，10日下午在八宝山举行追悼会。当时因为另一个阴谋集团“四人帮”的控制和干扰，追悼会的规格受到了限制，参加追悼会的人数控制在五百人左右，政治局委员不一定出席。

1月10日这天，毛泽东独自思考着，香烟点了一根又一根。中午，他已经躺在床上，突然坐起，没有剃须，不让更衣，就在睡衣的外面套上这件灰色夹大衣，驱车来到八宝山。

陈昊苏(陈毅元帅之子)：1972年1月6日，我父亲逝世，1

月10日党中央为他举行追悼会。当时我们作为家属，事先知道这个追悼会的安排，原来的安排并没有毛泽东主席出席。但是后来当我和我的母亲一起到了八宝山革命公墓的休息室的时候，周总理来通知我们说：“毛主席已经来了。”

后来我们就赶到毛主席在的那个休息室去见他，我们当然非常地激动，因为这是我们事先没有预料到的。我想因为我的父亲和毛主席曾经是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的亲密的战友，所以当他逝世的时候，毛泽东主席出于对战友的怀念，因而打破了常规来参加追悼会，我想这可能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当然这也不排除还有一些别的方面的原因。

当时“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五年，在1971年的9月发生了林彪集团叛党叛国的事件，这个事件对于毛泽东主席来说，当然是一个打击，因为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一种失败。那么到了第二年的1月，我父亲逝世的时候，毛主席之所以决定要参加我父亲的追悼会，我想这跟当时的政治形势有一定的联系。

毛泽东主席在晚年的时候，他很看重自己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他当然主观上是绝不愿意否定这种“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但是客观上，由于林彪事件的发生，林彪和他的一批亲信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中国，特别是党中央的领导核心当中就出现了一个空白，所以这个时候他必须考虑，要把一些当年受过迫害的、受过批判的老同志……，让他们出来工作的问题，我想这是作为一个现实的政治家不能不考虑的问题。

首先他对我父亲作出了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他说：“陈毅是一位好同志，一个好人，”他还甚至这样说：“陈毅同志生前曾

经和我有过好几次的争论，但那没有关系，那是我们同志之间的争论。”他实际上对老同志作出了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那么以后人们当然就可以用同样的观点来评价一些还活着的、还健在的老同志的作用了，这对今后老干部的解放工作确实有很大的影响。

解说：也就在这个追悼会上，毛泽东突然提到了邓小平，而此时的邓小平还在江西南昌郊区的一所简陋的工棚里劳动。

11. 暗转。1973年4月12日人民大会堂欢迎西哈努克亲王宴会的影片资料。

解说：1973年4月12日晚上，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宴会大厅里，人们突然发现了一个熟悉而又久违的面孔，在数百双眼睛的好奇注视下，邓小平沉默地坐在席位上。记者们没有等到宴会散席，便直奔邮局发稿：邓小平复出！

12. 邓小平 1973年至1974年工作活动新闻资料。

解说：1973年8月，邓小平在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进入中央委员会。12月，在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议邓小平出任政治局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毛泽东在谈话中还诚恳地说道：“有几次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词，就是不好嘛，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吧。”

1974年10月，毛泽东又提议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

理。1975年1月，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并被选举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毛泽东对邓小平寄予了深切的期望，称赞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

13. 1957年毛泽东访苏的影片资料。毛泽东、邓小平 1973、1974、1975年工作活动新闻资料。

解说：毛泽东曾不止一次地评价过邓小平。早在1957年1月，毛泽东在苏联对赫鲁晓夫说：“看到那边那个小个子了吗？他非常聪明，有远大的前程。”又说：“这个人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难得的人才。”

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又在政治局会议上说邓小平办事果断，柔里有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

毛泽东在肯定邓小平的同时，始终关注着国内的经济问题。1974年四届人大前夕，毛泽东反复强调：“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并指出：“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邓小平遵照这一讲话精神，对工业、农业、交通、科技、军事、文艺、教育、卫生等各条战线进行了全面整顿，为打开经济建设的新局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毛泽东支持邓小平的工作，他对“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一再进行批评。1974年7月17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一次使用了“四人小宗派”这个词，并声明：“江青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

1974年11月，毛泽东在长沙同邓小平谈话，明确支持邓小

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同江青一伙的无理取闹作斗争，说：“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好，我赞成你！”不久，毛泽东更尖锐地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

但是，毛泽东在总体上要维护“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他不可能从根本上认识和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也不能容忍1975年邓小平在各条战线搞的整顿不可避免地发展到对“文革”“左”倾错误的系统否定。1975年11月，毛泽东作出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错误决定。

1976年6月15日，毛泽东在病重时对华国锋等人谈到了自己的一生，他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另一件事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1976年，是中国的龙年。在关系到中国未来命运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在病榻上没有把权力交给“四人帮”，这个重大决策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是极为幸运的。

14. 暗转。毛泽东会见基辛格、卡翁达、尼克松、布托的影片资料。采访基辛格、卡翁达、尼克松。

解说：在晚年的时光里，尽管毛泽东的身体越来越虚弱，衰老已无法抗拒，但这位非凡的老人仍以自己最大的努力在世界面前保持着乐观幽默的形象。

基辛格（美国前国务卿）：1975年，我再次会见了毛泽东，当他见到我的妻子，他觉得有趣的是我的妻子比我要高，他对这事做了些评论，问我对比男人还高的女人有什么感觉？

卡翁达(赞比亚前总统);毛泽东是一个很快乐的人,我的夫人戴着手镯,他问这是不是象牙做的?我回答是象牙做的。他对非洲很有研究,比如说屈膝礼——夫人们为了表示对他的尊敬,用的是非洲礼节,他也行屈膝礼,用同样的礼节来回报。

解说:1976年2月23日,毛泽东再次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当电视镜头和聚光灯打开时,他让搀扶着他的护士离开,他要靠自己的力量独自站着和尼克松握手。

尼克松(美国前总统);毛泽东可以说是一位非常伟大的历史性的人物,我当初同他见面的时候,当时他并不是处于最好的状态中,但仍然充满了领袖般的魅力,富有幽默感,富有哲学家的思辨能力,在世界上所有国家领导人当中是位非常出类拔萃的领导人物。

解说:1976年5月27日,毛泽东最后一次会见外宾,客人是巴基斯坦前总理布托。从此,毛泽东不再露面。

15. 暗转。画人游泳池夜景。采访唐由之。毛泽东为唐由之题诗手迹。

解说:晚年的毛泽东,患有严重的白内障。1975年7月23日,我国著名的眼科专家唐由之为他做了眼睛手术。

唐由之(著名眼科专家);大概是11点左右,主席睡在房间

里，我就进去了。我说：“主席，今天已经是第十天了，主席看，是不是可以做手术了？”主席翻身来问我：“你们都准备好了？”我说：“准备得差不多了，准备好了。”主席哈哈大笑，就躺在床上说：“做！”这么一讲了以后，我当然很兴奋，也很紧张，出来就告诉大家：“主席准备做！”当然事先大家都准备好的，各司其责，大家有条不紊地去做。

我同服务员把毛主席从房间里搀出来了，毛主席问我：“你动手术，都准备好了？”我说：“都准备好了。”他说：“你音乐准备了没有？”“哎呀，”我说：“我没想到。”因为当时我们做手术都没有放音乐的，所以我说我没考虑到。主席当时就对旁边的服务员说：“你去拿一个《满江红》的弹词。”

记者：整个手术过程都是在《满江红》的乐曲声中完成的？

唐由之：是在乐曲声中完成的！主席的确不失为一个伟大的巨人，他没有动。手术没有多长时间，包括消毒在内，最多只有半个钟点，很顺利地把手术就做完了。

7月23日的晚上做的手术。11点左右开始手术，完了最多12点。主席大概躺了三个钟头左右，醒了，主席就翻身了，我耳朵听见，就进去了。主席的耳朵特别好，他听见有人进来了，就问服务员：“谁进来了？”服务员告诉他：“唐由之进来了。”

主席信口就念了一首诗：

“岂有豪情似旧时，
花开花落两由之。
何期泪洒江南雨，
又为斯民哭健儿”。

可是主席讲的是湖南话，我听不太懂。我说：“主席，您念的我没有完全听懂。”主席说：“你拿纸来，我给你写。”他就写了给

我了。因为眼睛是包着的，双眼包着，所以他用铅笔，拿了个硬本，眼睛闭了写的。

因为眼睛包着，他把“两”、“之”写重叠了。我说这是什么字？“由之。”

我说不太清楚。他说：“我再写一个。”

我说这是谁作的？是主席？他说：“不是，是鲁迅为悼念杨杏佛写的。杨杏佛被国民党枪杀以后，鲁迅去悼念他写的。”

这下面写的时间是1975年7月24日凌晨3时5分。

29日主席已经看得见了，我给他戴镜子，他要的一本字帖，我不知道这本字帖的书写者是谁？主席说：“黄鲁直。”我听不懂，他就拿铅笔写了个“学黄鲁直”，然后用铅笔一横，这个表示主席的眼睛已经复明了，所以他写的字“学黄鲁直”，一横画得很好。

16. 毛泽东眼睛复明后的照片。故事影片《难忘的战斗》片断。

解说：在眼睛复明以后，很久没有看电影的毛泽东，1976年春节看了一部电影《难忘的战斗》。当看到解放军入城受到人民群众热烈欢迎的场面时，他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泪流满面，泣不成声。这是最后日子里的毛泽东。

17. 踏转。采访周福明。1976年9月9日台历。

周福明（曾任毛泽东的卫士、理发员）：毛主席在9月8日这一天的工作还是跟往常一样，但是比平常觉得疲劳。当时有医务人员招呼我，看主席在那儿动，是什么意思？我也听不清楚，我就

赶快把主席的笔、纸递到主席手里。主席非常吃力地写了两次，就写的“一、二、三”的“三”。就画了三个道道，画完以后手就下来了，没有多少力气了。当时过了大约五分钟——主席这种情况我们也不敢动——主席的手就往后头床头敲了两下……

解说：在场的几位工作人员猜测，前边是“三”，后边敲木床，估计毛泽东是要了解当时日本三木派和福田派竞选的情况，他们问毛泽东，毛泽东点了点头，工作人员找来《参考消息》，为毛泽东念了。这一天，毛泽东还看了其他一些书籍和材料。

几个小时之后……

字幕：1976年9月9日0时10分，毛泽东与世长辞。

18. 暗转。画入毛泽东遗体。汽笛长鸣。全国人民沉痛悼念毛泽东逝世。联合国为毛泽东逝世默哀。

字幕：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字幕：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

——邓小平

大型电视纪录片《毛泽东》

创作人员名单

总顾问：薄一波

逢先知

总监制：杨伟光 汪裕尧

沈 纪 刘宝玉

总编导：刘效礼

执行总编导：汪恒 陈荻芳

崔屹平

总撰稿：陈 晋

总摄影：赵立信

撰 稿：吴晓梅 张 民

音乐音响总设计：包布和

编 导：王益平 褚嘉骅

华 越 冷治夫

李安东

摄 影：彭红军 赵 阳

王沛毅 熊仕顺

张 强 李凤科

史德祥 王磊

音乐编辑：宋 力 包布和

作 曲：艾立群 李海辉
解 说：赵忠祥
演 奏：中央乐团
指 挥：谭利华
制片主任：段树诚 吴文政
艺术顾问：周居方 陈 浩
顾 问：冯 惠 吴正裕
 吴旭君 王宇清
 徐 涛 周福明
 章百家
制 片：顾建培 刘卫民
 徐家贵 张 飞
 王立夫
资 料：阴建白 胡家强
 杨文兰
外事记者：杨培英 刘正铸
 周 勇 崔 文
字 幕：鲍宏志 袁晓东
 王亚力
技术主任：李晓明 史盾新
技术制作：赵 航 刘 平
制片人：李东升 黄明德
 岳晓涓 刘宝玉
 李英健 杨宪金
监 制：张钰钟 陈景亮
 任慧英 王传玉

章壮沂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武警总部政治部

中国电影资料馆

中南海西苑出版社

辽宁人民出版社

中央电视台

联合录制



《毛泽东》摄制组的编导人员，用史家的眼光和笔法，充分调动电视手段，从十二个不同的侧面为毛泽东立传。他们没有回避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却处理得入情入理

.....

《毛泽东》编导阐述

刘效礼

1. 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意义非凡、机会难得,我们摄制组的每一个同志都要珍惜这一机遇——一生接受毛泽东思想的哺育,现在该是“还愿”的时候了。

2. 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但他决不是一个普通的人,片名就叫《毛泽东》,无须作任何修饰,因为毛泽东本身就是一座丰碑。

3.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对毛泽东作出正确的评价。我们的任务是:用电视的手法,从十二个不同的侧面为毛泽东立传,为 20 世纪的中国立传。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要用史家的眼光和正史的笔法,把《毛泽东》搞成一部传世之作。人生在世,毁誉各半,就是胜利者。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不必回避,但要入情入理。社会上不是有这样的追星族吗?我们要通过我们的作品,让世世代代的中国人不要忘记我们的大救星。

4. 节目创意要新,形式也不要落入俗套。《毛泽东》既要有别于《让历史告诉未来》,又要不同于《望长城》,但纪实主义本质属性不能变。对于这一点,关键的关键是如何突破自己,打倒自己。

历史资料的“活用”

——大型电视纪录片《毛泽东》创作谈

汪 恒

毫无疑问,《毛泽东》一片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历史题材的创作向来是电视纪录片创作中难度较大的领域。虽然这些年来,在电视纪录片方面,历史题材的创作已有不少,为我们后来的创作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经验,但许多表现方式仍旧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和探索。当我们开始承担《毛泽东》一片的创作时,就不仅打算通过这次创作和探索积累一定的经验,也希望从失败和教训中发现有价值的东西。因此,这部纪录片的创作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将是有意義的。

也许换一批人来拍摄《毛泽东》一片,都会像我们一样首先关注有关毛泽东的影像资料。而我们当初所遇到的情况是不容乐观的,我们所能掌握的有关毛泽东的影像资料并不比其他兄弟单位多;从后来的播出片来看,许多兄弟单位创作的有关毛泽东的电视片中的资料比我们的还丰富。能使我们从创作初始,一直到最后保持信心的,就在于我们不是靠多,而是靠怎样把资料用活来体现我们的创作特色。因此,有效地使用历史资料就成为我们一直思考的问题。

起初,在影像资料问题上,我们内部也有不同看法。有的人倾向于少用资料,以纪实采访为内容核心;也有的人认为,一定要想法把有关毛泽东的影像资料收集齐,以资料为主体开展创

作。在开拍前召开的创作研讨会上，我们经过争论和探讨，对资料问题的认识达成了统一，资料是需要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使用好。过去的历史题材纪录片创作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是，在创作思路是以解说词为主导的情况下，历史影像资料本身包含的内容往往被忽略，创作者关心的是理性述说，将资料的使用从属于解说词的延续，结果出现以大量替代资料来完成表现的情况，甚至出现张冠李戴的问题。我们在研讨会上曾就一个画面的使用解剖了这个问题。比如现在人们都很熟悉的毛泽东的一张戴八角红星帽的照片，在过去的许多片子中，人们常常看到这张照片被用于遵义会议，这种用法就是不大准确的。但遵义会议又没有留下任何影像资料，因此后来的许多创作就不得不去使用替代资料。严格地说，历史题材纪录片既要对历史负责，也要对后人负责，有些重要的内容，影像资料是不能够替代的，我们不能只是要求解说词的准确，而忽略资料使用的准确。从《毛泽东》一片中，观众可以对这张连毛泽东本人都非常喜爱的照片得到一系列准确的信息：当时毛泽东四十二岁，是在陕北保安。照片是由美国记者斯诺拍摄的，帽子是斯诺的，拍照前是由斯诺从头上摘下来戴到毛泽东头上的，而拍照的时间是遵义会议后一年。

在研讨会上，我们形成的另一个共识是，对影像资料的需求绝不限于小范围的，除与毛泽东有关的资料外，还需要大量的背景型的影像资料。有效地使用背景资料将扩展我们的表现，并强化内容效果。比如我们这些搞电视创作的人大多知道毛泽东撤离延安时有历史影像资料，却不知道国民党占领延安时也有影像资料。当电影资料馆向我们提供了一批国民党的新闻片时，我们的编导不仅发现了这一难得的资料，并有效地使用了它。将国共两方当时拍摄的纪录片一齐纳入我们的片子，就产生了强烈

的对比效果。编导还特地保留了原有的解说声音，使艺术效果更加强烈，观众不仅能够明白毛泽东以延安换取全中国的英明决策，也会对这种特殊的表现产生浓厚的兴趣。可以说，这种对于背景影像资料的有效使用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可视性和艺术感染力。

我们从一开始就对创作风格确定了原则，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对内容进行严格的考证，不传小道消息，准确把握事实，力求客观地表现。当我们要前往上海，到第十一届国际行动理事会上去采访一些曾与毛泽东有过交往的外国原首脑人物时，我们做了一项十分关键的工作，提前观看要采访的人与毛泽东会见时的新闻片，并查阅他们的一些回忆文章，从而确定采访问题。在观看影片时，我们发现基辛格博士和夫人在会见毛泽东时，毛泽东握着基辛格夫人的手笑着说了几句话，因当时的新闻片没有同期声，我们并不知道毛泽东当时说了些什么。因此，在采访基辛格时，我们就这一问题向他提问。结果，基辛格的回答使我们非常满意，正是我们所缺乏但又应该反映的毛泽东的风趣幽默的个性内容。同样，在看卡翁达及夫人会见毛泽东的新闻片时，我们发现了毛泽东与卡翁达夫人握手时下蹲的细节，这也就成为了我们对卡翁达的一个提问，结果也是很风趣的内容。但在采访尼克松时，因时间太短，我们事先没有看资料片，也就只能问一些大众化的问题。有时候，大众化的问题可能不好与资料片有机地结合，并遗漏有价值的细节内容。因此，事先观看资料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另一方面，在过去的许多文字材料中，都有国际著名政治家对毛泽东的评价，而我们这次创作更重视的是请这些政治家直接表达这种评价，这就更客观、更准确。材料的记载若非其本人亲自撰写，是很可能有出入的，而且过了这么多

年，认识还有可能在变化。因此，直接的采访是最为准确、客观的，再将这种采访与历史影像资料有机地结合，将是最有说服力的，只可惜我们在创作中有些采访与资料尚未结合圆满。比如在一些国外政治家评价毛泽东时，就没有把原有的历史资料使用进去，表现上缺少生动性。

在许多内容的构成上，我们并不是以解说来确定资料的使用，而常常是以资料来确定解说的方式，甚至确定整体的结构，这是值得总结的一个经验。比如在第七集《胸中百万兵》一开头就使用了以历史资料来引导内容的方式。起初的构思是以大元帅军服开头，用解说来介绍这套军服。后来，编导将1955年授衔的历史资料放在开头，引出了“大元帅服”，这就使表现更为生动。这样一改，解说就要根据画面来构成。再比如第二集《历史的选择》是以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一历史资料片为内容灵魂来构成全片的。编导一开始就设想在五十分钟片子中尽可能不用毛泽东本人的影像资料，直到最后才第一次出现毛泽东走上天安门的资料，以强化资料本身的重大历史意义。因此，这一集成为使用毛泽东影像资料最少的一集，但内容并没有离开毛泽东，或许这就是资料精用吧。应该说，这种思考是很独特的。有些历史资料既有它本身包含的特定内容，也有今天和后来的人不大了解的重大历史意义，那么我们在创作中就不仅仅是再现历史，还要再现历史的重大意义。

要想有效地使用历史资料，就必须分析它，深入地研究它，这是搞好历史题材纪录片创作的一个关键步骤。1972年，毛泽东会见尼克松时正是大病初愈，从影像资料上看，毛泽东面部略有浮肿，行动开始迟缓。编导在使用这段资料时充分了解了毛泽东当时的身体状况，并在把握整个中美关系发展脉络的基础上，

有效地使用了这段资料，为历史留下了浓重而极富感人色彩的一笔，成为第八集《放眼世界》中十分感人的一个结尾段落。当尼克松第二次访华会见毛泽东时，我们从影像资料中看到了毛泽东苍老而坚毅的表情。毛泽东此时更加衰老了，一直都有医护人员搀扶，但影像资料中却是毛泽东独自站着同尼克松握手。因此，编导就把文章做到了这一点上，特地用解说词说明了当聚光灯打开时，毛泽东让搀扶他的护士离开，充分反映了伟人自强不息的性格，成为第十二集《晚年岁月》中精彩的一笔。

但有些资料的文章并没有做到位，即使我们后来认识到了也无法改变了。比如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和1959年回韶山，从资料上看，毛泽东这两次都是充满感情，非常愉快，思绪万千的。在井冈山上，毛泽东离开众人，背着手独自走向了一边，他深情地望着井冈山脉。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是毛泽东寻找到革命道路的地方，也是挽救了中国革命星星之火的地方。三十八年后，这位革命老人又重返这里，心情是复杂的。但由于这段资料使用得靠前了，感情色彩出不来，铺垫不够。同样，毛泽东回韶山的资料也是使用靠前了，也没有铺垫够，文章就没有做到位。这反映了我们事先构思时对资料的研究不够。

当然，通过采访再进一步寻找资料，有效地使用它也不失为一种好的方法。比如编导在采访吴旭君同志（曾任毛泽东的护士长）时，她回忆起了1973年中共“十大”会议上，毛泽东在开幕式上最后一个离开会场的细节，这反映了毛泽东当时的身体状况。编导还从吴旭君那里得知当时有不少摄影记者在现场拍摄，因此，特别叮嘱资料员寻找“十大”开幕式资料。终于，资料员从我们台里以往封存的资料中查找到了，使我们感到意外的是，资料中还保留了毛泽东的一段同期声，成为第十二集一开头的精彩

之笔。

历史影像资料的一个最大的弱点在于，它包含的内容往往是不全面的，经常是遗漏了细节的，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充实内容，将资料最大限度地利用。我们在这次创作中，对于许多历史资料的运用都是结合了对当事人的采访，这就进一步丰富了内容，使原有的带有许多遗憾的资料更加生动起来。比如在第八集中，关于中苏、中美关系内容的反映，编导较好地资料与采访当事人结合起来，深入地把握了细节内容，达到了表现上的生动。毛泽东的俄语翻译师哲和李越然分别回忆了毛泽东与斯大林、赫鲁晓夫的会谈情况，解决了资料片只是反映表面情况的弱点。通过基辛格、黄华和吴旭君的回忆，中美关系的解冻生动地展现在观众的面前。关于“乒乓外交”的影像资料是少得可怜的，但吴旭君的回忆却大大补充了这部分内容，成为引人入胜的细节。吴旭君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二十年，从很早起毛泽东就建议她不要只是搞医，要了解国际国内大事，并让她看一些材料，做一些医疗之外的工作。因此，她掌握了一些官方以外的特殊细节，成为创作的极好素材。我们今天来拍摄《毛泽东》一片，应该说为时不早，也不算晚，许多重大事件的当事人还健在。因此，我们是将采访当事人作为重要内容加以重视的。

通过对于历史影像资料的艺术处理来反映人物性格，我们这部作品也进行了一定的尝试。比如在第四集《艰难的探索》中，编导利用一张照片做了充分的文章，使这一集收了一个令人难忘的结尾。毛泽东曾多次把目光投向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直到年逾古稀，他还想骑马沿黄河考察。对于毛泽东的这一雄心壮志，我们找到了一张珍贵的照片，毛泽东在北戴河由卫士们簇拥着骑上了专为他训练的一匹白马。编导在处理这一段内

容时,是从钢琴弹奏《黄河大合唱》开始的,令人激动、振奋。通过这样的艺术处理,一张普通的照片便有了深刻的含义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毛泽东的充满探索精神的内心世界和曲折的道路得以艺术化地再现,使人回味无穷。在第十集《到中流击水》的结尾处,编导将一系列毛泽东的极富特点的影像资料编辑在一起,来同观众一起分析和发现毛泽东与众不同的个性特点,使其表现得极为生动活泼。这就达到了我们在创作初始所确定的风格要求:既要严格考证,准确客观,又要生动活泼,丰富多采。

当然,在这次的摸索中我们也出现了不少失误处,但教训同样是有价值的。比如资料的重复使用在整个十二集片子中是比较严重的;对不少资料的研究不够,使用的效果还不理想;有些资料由于缺少字幕提示,使观众难以达到编导者的理解程度,其创作目的也就达不到。但我们毕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对于历史题材的创作,要特别重视资料工作。同时,影像资料并不是随意可以使用的,至少要像我们写解说词时重视文字材料的研究和推敲那样,首先要认认真真地分析和研究历史影像资料。

(原载《电视研究》1994年第2期)

把“旧闻”做成“新闻”

——《毛泽东》创作谈

陈 晋

一、对象——换一种说法

还是那句老得让人陌生的行话：理解是表现的前提。更何况即将出现在屏幕上的，是90年代的毛泽东。

关于他的故事、贡献，说尽人皆知，当不为过。只要哼一首歌，提几个年月，说几处地名，但凡有点文化的人，续着往下讲，准行。

这样，一开始我们就否定了走生平传记式的老路。那还是1993年3月，我们三个撰稿人拿出初步设想，向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组的领导汇报。经过讨论，确定了以分专题横向展开的结构方式，来串毛泽东的一生。这样做，自由度大，时序和空间的确切定位似乎淡化了，但每集的主题便于展开和深化，不求给观众灌输多少多少知识，能留下毛泽东某一方面的个性风采的突出印象，则足矣。

接下来，是给每集找故事。对吃这碗饭的人来说，并不难，难的是这故事需巧，于不起眼中要有穿透力。人尽皆知的大事、大背景，不能没有，不能不要，但最好是隐在背后，前面是小事，这样或许更能伸进毛泽东的心灵窗户，见出他独到的魅力。

例如，《胸中百万兵》（原名《挥手之间》）一集，写军事，这无

疑是毛泽东的强项。他和其他军事家有什么不同呢？终于找到，天津一家总后工厂1955年曾给他缝制过一套大元帅军服，但他拒绝了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授予他的这个称号。这套军服硬是在陈列室里躺了近四十年。气势便出来了，玄妙也跟着出来了——原来这位统帅并不喜欢摸枪，他是用“笔”打仗。背后的潜台词是：笔杆子可以创造思想，导演战局，没有思想指导的枪杆子，大多只创造死亡。1916年，师范生毛泽东就预言，二十年后中日之间必有一场生死大战。这个预言实现的时候，他则把麾下的军队像棋子一样摆出去，自己坐下来写了预言和指导整个战局的《论持久战》。这些，大概就是毛泽东和一般军事家的不同之处。

要写毛泽东晚年，就不能回避“文革”；要表现“文革”，就不能不带出林彪。如果正面去说毛泽东对他从信任到不满、提防，正面说林彪的阳奉阴违，未必能表现、好表现，也未必有穿透力。于是使用1970年“五一”节电视台新闻片中，始终没有毛泽东和林彪在一起的镜头为契机，引出背后微妙的故事。

换一种说法，把具有表现力的镜头对准伟人各个层面的细部，避免遥远而朦胧的“光环”。毛泽东，也就成了平实却不平凡的人。

带着初稿，我们走出北京宽街的一家招待所。先前，这里是清代有名的和敬公主府，雕梁画栋，“庭院深深深几许”。抬头一望，已然是满眼飘柳絮。出得大门，车马喧嚣，招手一声“TAXI”。便幡然领悟：时节可消融隔阂，沟通不同时代的人们的心灵。历史和现代，贴得是这样地近。只要你用心地去体会。

二、手段——“我”在哪里？

中国的纪录片，过去太有“我”。画面降为解说的形象符号，

戏称“看图识字”。观众(或说“听众”更贴切)便如“白纸”一般的儿童了,“我”说什么,你听什么。

这里的“我”,就是创作者的主观。

近些年,似乎倒了个个儿,要同期画面原汁原味的声像效果,那是干货。“我”吗?隐到后面去,越远越好,免得“矫情”。

这是众人看好的进步。

被视为标志的,是刘效礼此前的佳作——《望长城》。偏偏是他,又执掌起《毛泽东》的帅印。如果是,《毛泽东》并没有成为第二部《望长城》,这就很让人钦佩了。创作总结会上,我借用第六集片名讲过一句:大海纳百川的创作气度。说的便是这位大校。在他的艺术感觉和思路里,一切都是可能的。

其实,编导、撰稿等主创人员在香山首次汇聚时,关于“我”的问题——当时用的概念是“纪实”和“政论”——还是成了讨论的一个热点。嘴上的门一旦把不牢,纪实就偏到无我,政论被说成是说教,乃至有人不经意道出,要不要解说词都可考虑。

然而,我们拍的是已经逝去十七年的毛泽东,对象的特征很难让我们只朝一个方向走。他携带的历史内涵,把握上的政治分寸,和今天人们的时空距离……,这一切,若都能靠纯粹的现场纪实来解决,扛起摄像机就走,何等痛快乃尔!

我想,即使是《望长城》、《广东行》、《中华之门》这样纪实得可以的好片子,主观性并不弱,也是“我”得可以的。那主持人的表情动作,那长镜头的着力运用,画中人物面向观众的“唠叨”,焉知不是“我”在暗示、诱导、评价?两极相通,最纪实的,或许就是最主观的,就像艺术史上的那个著名说法:最原始的,就是最现代的,最民族的,就是最世界的。

看来,还是对象决定手段,好的手段能让对象“活”起来。该

纪实就纪实，该议论就议论，不拘于“我”的有无、多少，顺其自然，用得恰当就行。对象是毛泽东，拍出“毛泽东风格”就行，“刘老总”甩出这句话定音。

当然，什么是“毛泽东风格”，谁也没见过。那就在屏幕上见吧，看看“我”是怎样出现的。

第三集《曲折之路》，说到红军长征，毛泽东被抬着离开苏区，接着杭天棋在舞台唱《十送红军》。情调很好，避实就虚，意在让观众感情也沉淀和酝酿一下。看了初编带，觉得歌曲长了些，又是在现代舞台上，有点“隔”，担心离开内容，变成歌曲欣赏。就在两段过门处压低曲乐，强化空镜头的山水色调，分别加上解说词：“这一年寒冷的11月，中央红军在湘江两岸遭受惨重失败。八万余人损失过半。”“这一年寒冷的12月，担架上的毛泽东，渐渐接近贵州遵义城。”“我”的叙述，“我”的感情，“我”的想法，就自自然然有了感染力。

这是用解说引出的“我”。其他形式，如镜头、音乐、字幕、色调等，在《毛泽东》里，有的地方也配合得很好，直接传达出“我”的感情倾向。如第八集《放眼世界》的结尾，在中南海游泳池边上采访吴旭君，说，身患重病的毛泽东为打开中美大门，会见尼克松，付出巨大的艰辛。谈起往事，吴很动情，哭了。最后，配上慢放的毛泽东和尼克松握手的镜头，上来一句解说词：“毛泽东预感到自己生命将走到尽头，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是看不到中美建交的那一天了。”此时的音乐渐慢，渐滞，渐远，画面色调很暗，映出游泳池淡蓝色波光。配上字幕：“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1979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个结尾，利索，又透出很多内涵，很有点掩卷沉思的效果。

看来，纪录片并不排斥主观的“我”，关键是这个“我”是否对对象有真切的理解和感受。

三、价值——来一点研究

任何一种历史人物的“纪实”，都只是一种“追纪”，是一种力求达到的目标。电视片“纪实性”的强弱或成败，常常表现为一种艺术追求——多大程度的现场实感，一种创作态度——多大程度的真实严谨，一种理解能力——多大程度地占有素材、研究细节。

《毛》片创作伊始，主创人员便树立了这样一个意识：“还原一个毛泽东”，尽管我们清楚历史不可能“还原”，但上面说的三种创作要求，都不能放松，片子一定要体现学术研究性。更何况主要的合拍单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是研究毛泽东无可替代的权威机构呢！于是，香山创作会议纪要写进这样一条：“既要使创作具有文献性的价值，又要在认识上达到当今研究毛泽东的学术性成果的高度和深度。”

这种追求，恰是历史人物纪实片的权威性的应有之意。好几个朋友看了片子，都曾对我谈到：《毛》片之所以别具一格，让人信，是用了许多鲜为人知的资料素材，结构气势大，却很真。

有的场面，确是第一次披露，如毛泽东在十大上说“你们不走，我也不好走”，便是偶然发现的。加上吴旭君对整个过程的叙述，许多人记住了这句“话”。

更多的情况，所谓“鲜为人知”，主要指电视手段而言。靠着创作人员锲而不舍地追求可靠性、权威性，“还原”了事情。

例如：1929年6月红四军内部出现争论，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被选掉了。他到上杭县苏家坡的一个山洞养病。这件事党史

界是熟悉的，但未宣传。片子把这事说了，特别是摄制组冒着酷暑，翻山越岭，寻找到这个洞。当地人在镜头面前说，省级以上的电视台是第一次来拍摄。追求的效果就这样出来了。

斯诺在保安给毛泽东拍的那张著名照片，反映长征的一些纪录片，大多用这个画面。我们的创作人员便有意纠正。第四集说到遵义会议，推出这张照片时，特意加了一行字幕：“1936年美国人斯诺摄于保安”。第六集说到红军换装，改编成八路军时，又做了番文章。画面上是拍照前，斯诺摘下自己的红军帽递过去的影片资料，解说词交待：“毛泽东在画面外，他没有戴军帽……细心的观众可能会发现，照片上的帽子和衣服的颜色是不一样的。”这是什么？这就是老老实实的“还原”，是一种“电视研究”。

毛泽东批示处决刘青山、张子善，更不是什么“新闻”。为了体现实感，让观众爱看，在处理上，便特意强调文献性。先是河北省公安厅和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档案库，铁皮柜缓缓打开，有了点气氛；接着翻出杨秀峰下令逮捕二犯的手令原件，和高级人民法院一审案卷原件；然后是当时的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负责处理这个案子的刘澜涛，讲述毛泽东的有关谈话，中间画入毛泽东在薄一波、刘澜涛的报告上的批语原件。整个表现很紧凑，每个画面都是实证的。观众看起来，虽不是新闻，却也新鲜。

用细节塑造典型人物的人格魅力

——创作《毛泽东》的细节选择与运用

褚嘉骅

一部成功的文学艺术作品，总是离不开丰富多采的细节描写。准确、逼真、生动的细节描写，是塑造人物典型形象的重要手段，对于深化主题，烘托环境气氛，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细节选择运用得恰到好处，使人物丰满、完整、活灵活现，能使作品产生以小见大，微中见巨的艺术效果。

电视人物专题片(纪录片)中的典型人物能否使观众在观赏时产生共鸣，并给予观众强烈的感染力，人格魅力的塑造是至关重要的。除了人物本身在所处时代、重大事件中的作用以外，细节的选择和运用将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在拍摄十二集大型电视纪录片《毛泽东》的时候，我们作了一些探索。

毛泽东是中国和世界的一代伟人，他是政治家，却又有诗人的浪漫气质；他是军事家，而身上又带有浓厚的文人士大夫的高雅志趣与农家子弟的朴实作风；他既幽默风趣、含蓄温和，又严肃认真，猛烈逼人；他坦率、外露，提倡活得真实，可也十分精明，有时腼腆；他很谦恭、豁达，也不乏高傲与敏感；他做事细致严谨、明察秋毫，但作风却粗犷洒脱、不拘小节；他具有成就大业的忍让耐心，一旦需要则当机立断，决不坐失分秒……这些都构成了毛泽东独特的人格魅力。但是，要在一部长达六百分钟的大型人物纪录片中真实地展现毛泽东的这一人格魅力，仅凭一段

文字(解说词)从政论角度宏观阐述是远远不能满足观众要求的。从发生在毛泽东身上的大量故事中挖掘出最感人和精彩的细节,是我们采访编辑中的重要工作。

第一集《丰碑在人民心中》一开始有这样一段题记:“大区书记到中南海开会,毛泽东只给每人一碗面条……”这个细节是我们在采访中发现的。毛泽东来自人民,心系人民,他关心人民的疾苦,与人民群众有着天然的血肉联系。在结构这一集时,编导在展现毛泽东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的几个重大事件中穿插了两个细节。前一个细节,是陕北农民杨步浩到中南海做客,毛泽东请他吃饭。杨步浩的儿子用浓重的陕北口音回忆:“主席还请我爸爸吃饭,一顿吃八个馍(大馒头),主席说‘吃得好’。”紧接着编导让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向观众提供了另一个细节:60年代后期,毛泽东主持了一次大区书记会议。会议开了很长时间,快到吃饭的时候,毛泽东招待书记们吃饭,却嘱咐:“不要搞多了,每人一碗面条就行了。”当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问毛主席为何这样“太小气”时,毛泽东回答:“正因为他们都是一些高级领导同志,平时谁敢让他们饿肚子?总是吃得饱饱的。到了我这里不准吃饱,让他们记住饿肚子是什么滋味。”又说:“官当大了,容易忘了还有受苦的人。”这两个细节,留给观众的印象无疑是深刻的,对于塑造毛泽东这位将毕生精力奉献给中国人民的伟人形象和深化该集主题所起到的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在主席一生的革命生涯中,这两件事看来似乎微不足道,而编导敏锐地捕捉并运用了这两个细节,以小见大,真实地再现了毛泽东心中永远装着人民的品格。

第五集《书山有路》主要表现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编导为观众展现了一个细节(请注意,这个细节一开始似乎与毛泽东是无

关的)。在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有一块匾额，上书四个大字“实事求是”，这块匾额的悬挂时间是1916年。1917年至1919年毛泽东来到长沙求学。编导这时客观地向观众介绍，毛泽东这段时间曾寄住在岳麓书院，当年他一定看到了这块匾额。紧接着，画面上出现了毛泽东在延安书写的“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个细节的出现，令观众耳目一新。众所周知，长沙是青年毛泽东学习和从事革命活动的基地。编导没有花多的笔墨去论证岳麓书院的读书生活对毛泽东后来的影响，却通过“实事求是”匾额的细节描写，让观众去慢慢领会伟人毛泽东不仅仅是酷爱读书，而是将读书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第九集《独领风骚》主要塑造毛泽东作为诗人政治家和政治家诗人的创作生涯和作品魅力。该集用大量鲜为人知的史料和现场采访向观众介绍了毛泽东1936年2月创作的《沁园春·雪》，以及1945年的发表经过，接着又向观众介绍了他1949年4月创作《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情况。在介绍这两首作品的间隙，编导向观众提供了一个时空上的细节：从1936年2月毛泽东写下《沁园春·雪》到1949年创作《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在长达十三年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毛泽东极少写诗作词。这个时空上的细节，看来无非是在介绍诗人创作生涯中的空白，但往下看，却颇能引人思索：“如果说，前一首揭示了一个旧世界必将灭亡，那么后一首正好宣告了一个新世界的即将诞生。”

毛泽东是一个有着独特人格魅力的伟人，在他的一生中，永远充满自信，充满一种渴望，一种冲动，这种给人以巨大感染力的人格魅力，体现在他一生的各个方面。

毛泽东一生喜欢游泳，但他的游泳又不同于一般人的游泳，

他常常通过这一活动显示他的意志、他的力量。在毛泽东的游泳里边有哲学，有政治。正如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保健医生徐涛介绍的那样：“毛主席的游泳，就像我们平时所说的‘言外之意’一样，常常有‘游外之意’。”

对毛泽东的“游外之意”，大量的故事和细节摆在我们面前，如何选用最精彩的细节来塑造毛泽东这一典型人物的人格魅力呢？在第十集《到中流击水》中，编导向观众提供了一个鲜为人知的细节。1958年7月31日，赫鲁晓夫秘密访华。当天上午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的颐年堂与赫鲁晓夫会谈，会谈的中心话题是赫鲁晓夫提出要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毛泽东义正辞严地驳斥了赫鲁晓夫的无理要求，捍卫了中国主权。上午的会谈在严肃的气氛中暂告一个段落，下午毛泽东突然把会谈地点改在了游泳池。当赫鲁晓夫来到游泳池边时，他看到的毛泽东身披浴衣。毛泽东没有和赫鲁晓夫谈任何问题，首先邀请赫鲁晓夫游泳。接下来，当时在场担任俄语翻译的李越然绘声绘色地向观众介绍了毛泽东如何在游泳池中展现他的游泳技巧，而赫鲁晓夫却要了一个救生圈套在脖子上，面对毛泽东娴熟的游泳技能，目瞪口呆的情景。这一细节非常精彩。

在这一集里，编导还将一组毛泽东在不同场合的游泳镜头组合在一起，让观众细细欣赏毛泽东在游泳时的细节。这些细节的运用，使观众大开眼界，又一次从不同侧面领略到了毛泽东那充满感染力的人格魅力。

全片最后一集——第十二集《晚年岁月》，是一集有较大难度的重头戏。

毛泽东晚年处在雄心不已和生理衰老的矛盾之中。在这一段时光里，毛泽东曾犯严重错误，这是编导无法回避而必须正视

的。如果说这一集“难搞”的话，难就难在既要正视毛泽东晚年的失误，又要不伤害广大观众对毛泽东这位伟人的感情。

应该说，编导在采访上，是下了大力气的，采访到的许多细节都是包括编导者在内的大部分人从未听到过的。这些细节无论哪一个都有其精彩的地方，都能吸引观众。然而，编导们深知，细节的选择和运用是从属于作品整体，为充分表现主题思想和展现人物典型形象服务的，它毕竟是作品的一枝一叶，一木一石。细节的选择、提炼与安排，必须从内容出发，服从作品整体的需要。因此，为了充分展现毛泽东独特的人格魅力，编导们进行认真筛选，忍痛放弃了大量细节素材，选用了最生动、最富表现力和感染力的几组素材。在表现毛泽东晚年身体状况时，选用了1973年毛泽东出席党的“十大”开幕式最后一个离开会场的细节，并加上同期声的运用，给观众以强烈的感染力和震撼力。

在论述了毛泽东晚年关于“文革”的错误，关于他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所作出的重大决策，关于他对邓小平同志的起用和评价等重大事件之后，编导用较大的篇幅向观众展现了几个细节。这几个细节的相继出现，对塑造毛泽东晚年的人格魅力，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晚年的毛泽东，尽管身体越来越虚弱，衰老已无法抗拒，但这位非凡的老人仍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在世界面前保持着 he 乐观幽默的形象。

在反映毛泽东晚年会见外宾的情景时，编导选用了最有代表性的三个细节来表现毛泽东乐观、幽默、风趣的人格魅力。

尼克松回忆说：“毛泽东可以说是一位非常伟大的历史性的人物。我当初同他见面的时候，当时他并不是处于最好的状态中，但仍然充满了领袖般的魅力，富有幽默感，富有哲学家的思

辨能力，在世界上所有国家领导人当中是位非常出类拔萃的领导人物”。

在这一集结束之前，编导仍不松手，在有限的时间内，挤出了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为观众提供了一个细节。在眼睛复明以后，很久没有看电影的毛泽东，看了一部电影《难忘的战斗》。当看到解放军入城，受到人民群众热烈欢迎的场面时，他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泪流满面，泣不成声。这一细节对观众内心的冲击力无疑是可以想见的，尤其是当它同全片的最后一个细节连在一起时，它所产生的冲击力就更大。

1976年9月8日，毛泽东的工作还是跟往常一样，但是比平常感觉疲劳，他已不能讲话。毛泽东用手势示意工作人员找来《参考消息》，为他念了当时日本政党竞选的情况。这一天，毛泽东还看了其他一些书籍和材料。几个小时之后，1976年9月9日0时10分，毛泽东与世长辞……

艺术细节是细小的，但它所产生的冲击人们心灵的力量是无穷的。从一个个相关交织在一起的细节总和里，我们看到的是完整的、活生生的典型。由于这几个细节在《晚年岁月》中的有机组合，因此，尽管该集没有回避正面反映毛泽东晚年所犯的严重错误，但最后留给观众的毛泽东的形象却依然是令人崇敬和久久难以忘怀的，使观众从感情上得到了满足。

在以上这些细节的展现及其与重大事件、历史背景的组合中，毛泽东的人格魅力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相比之下，一些用华丽的辞藻组合而成的慷慨激昂的解说就显得苍白无力了。同时还应肯定的是，这些细节的选择和运用，对于《毛泽东》这样重大题材（或类似题材）的影视作品，以其直观的方式再现和升华了历史的真实。

如果说,《毛泽东》一片播出后能给观众留下些什么的话,那么我想,那些为塑造毛泽东独特的人格魅力起到重要作用和再现、升华了历史真实的细节,恐怕是印象最深的。

关于细节在电视人物专题片(纪录片)中的地位和作用,是编导们熟知的,笔者不敢班门弄斧,本文没有赘述。但还须强调一点的是:在细节的选择和运用中,真实是第一位的。所以恩格斯将“细节的真实”视作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的原则和必要的标记。人物专题片(纪录片)不同于故事片、电视剧和其他艺术门类,它不允许用虚构或者夸张的艺术手法来“制造”细节。只有真实,细节才有生命;只有真实的细节,才能在作品中为塑造典型人物的人格魅力产生作用。

(原载《电视研究》1994年第2期)

大型电视纪录片《毛泽东》所取得的成就，所达到的思想与艺术高度，给观众情感带来的冲击力、震撼力，是首屈一指的。人们对其视野之开阔，角度之新颖，结构之宏大，构思之巧妙，赞叹不已。……中国的电视纪实艺术，也由此走向成熟……

新颖·真实·感人

——大型电视纪录片《毛泽东》研讨会发言摘录

杨伟光 逢先知 刘效礼 赵群

杨伟光：《毛泽东》这部片子，是为了纪念毛主席诞辰一百周年而制作的。

这部片子光采访的人数就有二百六十七人。通过这些人的讲话、他们的回忆，来反映毛主席光辉、伟大的一生。从播出后的情况看，大家反映相当好，在北京的收视率达到29.8%，全国的收视率是15.2%，作为专题片，这个收视率是很高的。片子播出后，观众纷纷打来电话，要求重播。有些老同志希望拿到带子看。各方面认为这部片子是成功的。香港卫视和亚视也买了这部片子，现在正在播放。北美东方卫星电视也播出了。

这部片子播放后，为什么各界广大观众反映这么好呢？我认为首先是总体上把握比较好。用电视的手段，比较生动具体地反映了毛主席伟大的、光辉的一生。

第二，这部片子充分发挥了电视的声像优势。有些东西你光用文字来表达，感染力不够。很多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过的同志的回忆，感情很真。它不是采取过去的那种手法，图像加播音解说。如果那样，我想它的感染力肯定会受到影响，真实性也会受到影响。现在片中处理得很好，我们自己看了都非常感动。

第三，我觉得摄制组很注意选择一些典型细节，构思巧妙，一些重大事件的细节也被反映出来。比如，关于美国乒乓球队的

一段描述，在如何邀请的问题上，把那个过程细节描述出来了。还有毛主席接见尼克松的细节，实际上毛主席那时候身体已经很不好了，但他对自己非常自信，表现得很坚强，结果五分钟的接见，延长至一小时五分钟。通过这些细节来表现主席，就不是一种观点、一种概念化的人物，而是一个丰满的有血有肉的、生动的、立体化的人物。

当然，电视都是遗憾的艺术。就片子说，十二集片子也不是一般齐，有些也显得差一些。应该说，由于时间关系，有许多很精彩的东西，我们还没有挖掘出来。这些，有待于我们今后进一步挖掘，可以肯定成绩，找出不足，以鼓舞我们今后更好地为党的事业奋斗。

逢先知：记得我第一次在这里看片子的时候讲过，这部片子放映后很可能产生轰动效应。现在证实了我的话。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轰动效应。

我们有个同志到山东出差，他回来告诉我，这个片子收视率真高。怎么高呢？他说，在一个县里办事，没到晚上8点钟（我们的片子是8点10分播出），一些干部就都走了，说回去看电视片《毛泽东》。所以，我想这个片子所达到的效果超过原来预想的。之所以有这样好的效果，首先在于这部片子很真实，真人、真事、真材料、真实物。当时接触过毛泽东的人中既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这些人出来说话，是最有力量的。人家相信，是真的。我们有个同志就讲，看了好多反映毛主席的艺术片，印象不深，尽管它也有艺术感染力，但印象不深，因为那是故事。但这是真东西。真实是这部片子成功的原因之一。

第二点，在政治把握上，现在看来比较好。这是从撰稿、编导

一直到各级领导共同努力的结果。现在这个角度选得比较好。毛主席晚年的错误不能回避，发动“文化大革命”带来那么大灾难，确实是严重的错误，不应回避它，但也不应渲染它，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上，这样处理符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对毛主席的总体评价：功劳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要向前看，不着重于个人的责任，不把错误归到个人的品质上，这都符合历史决议。所以从政治把握上，现在看来是好的。现在对毛主席有各种各样的评价，但我们统一到历史决议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建国以后的历史，都经过了曲折的过程，特别是毛主席在晚年又犯了错误，这在政治上把握是有较大难度的。现在看来这个问题解决得是好的。

第三点，是选材比较好。这部片子，从1893年到1976年，跨度这么大，八十多年；从横向看，通过各个侧面来反映毛泽东，要在十二集容纳这么丰富的材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这就有个选材问题。有些镜头选得非常好，特别“乒乓外交”、尼克松访华，一直到毛主席与尼克松谈话，一些观众包括一些学者都对电视片这一段评价很高，认为处理得特别好，是非常感人的，认为有震撼力量。配上当时的纪录片以及尼克松的谈话，加上毛主席当时身边工作人员的现身说法，这么一结合，它的感染力、震撼力就更强烈了。还有毛主席晚年的那些镜头，我觉得选材都比较好，比较新颖。

再一点就是参加创作、拍摄这部电视片的各有关单位之间的合作是很好的。中央电视台、武警部队，还有中央文献研究室，好多单位在一起合作。文献研究室的同志这一次感到合作得很愉快。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从广电部的领导到电视台的领导全力支持。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也不能达到这么好的效果。

刘效礼：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但他决不是一个普通人。这是我们拍这个片子时的基本思想和总体把握。走下神坛的毛泽东决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他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但是怎么来把握？怎么来表现？我们是用事实来表现的。说白了，是毛泽东这个人物的伟大，决定了这部片子的成功。摄制组一成立，就明确提出：拍摄《毛泽东》，学习毛泽东，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一生中就这么一次了，谁也不会有第二次。所以我们拿出全部的力气来，把这部片子拍好。

70年代末，80年代初，社会上各种思潮都有，有的否定毛泽东思想，有的坚持“两个凡是”，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第一个站出来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就是邓小平。他多次强调，毛泽东的旗帜不能丢，毛泽东思想不能丢。这一点，现在回过头来看非常重要。小平同志主持制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我们在拍摄过程中的基本依据。

薄一波在审看这部片子的时候说，你们把毛主席的成就、成功、错误全部说了，他仍不失为世界第一流的伟人。我们在采访法国前总统德斯坦时，他说，现代社会变化很快，很多国家元首都被人们给忘记了，只有少数人被人熟知，如法国戴高乐，法国人知道他，尊重他。那么，在中国，毛泽东也一样。对毛泽东，对伟人的评价，很难作出一个具体的标准，但伟人会影响一代人，毛泽东就影响了一代人。我们想通过这部片子影响第二代人、第三代人，通过毛泽东的人格魅力、思想来影响后人。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小平同志是如何继承的、如何发展的，这是我们下一部片子的奋斗目标。

赵群：毛泽东的一生是伟大的一生，他的丰功伟绩是多方面的，每个方面都有值得大书特书的地方。拍摄这个伟人的传记，从何处着手？用什么样的形式？用什么样的结构呢？

电视纪录片《毛泽东》摄制组采用了高度的归纳法，将毛泽东主席重要的革命实践，归纳为十二个方面，真实地展示、描述、记录这个伟大人物的思想、实践、成功、挫折、品格和风范。

高度概括，恰当切入，有震撼力和说服力的现场采访，许多鲜为人知的感人细节，珍贵的历史资料等等，以很大的信息量，辐射出领袖的历史丰采和个人魅力。有许多集拍摄得相当成功，催人泪下。让人流泪的电视纪录片，并不多见。

《毛泽东》摄制组1993年4月组建。完成这种大型纪录片，一般需要一年，但他们仅用了半年多一点时间。他们跋山涉水，沿着毛泽东从事革命活动的足迹，跑遍了全国二十几个省市，拍摄了大量的有珍贵价值的材料，素材带时间达两万多分钟。如何浓缩这些素材，又把握好宣传的度，编导煞费苦心，使观众看到了一个完整的伟人形象。

毛泽东是中华民族的英雄，又是世界公认的领袖人物。片中许多国家的前首脑人物对毛泽东的评价也是很有说服力的。那一组采访相当成功，也很难得。

摄制组工作人员拍摄《毛泽东》，学习毛泽东。剧组的一位中年编导王益平说，越拍毛泽东越感到毛泽东的伟大，太伟大了！总编导刘效礼同志说：“毛泽东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是无论什么都改变不了的，这是我这次体会最深的一点。”他还说：“毛泽东同志使中国人民站立起来，邓小平同志使中国人民富裕起来，这两个人都是使中国历史发生重要转折的人。”

今天到会的各位领导、专家对《毛泽东》一片从创作上、艺术

上给予很高评价,进行了分析和总结。中央电视台对大型重点节目开放式地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目的在于精办节目,为广大电视观众提供更多更好的精品节目。《毛泽东》一片属精品节目、一流节目,各位专家、学者都给予认定。我代表中央电视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人民日报三家主办单位对各位领导和专家学者出席今天的研讨会表示衷心的感谢!欢迎各位今后再出席我台举办的有关活动。

(原载 1994 年 1 月 24 日《中国电视报》)

出类拔萃之作

刘扬体

在所有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的影视作品中，大型纪录片《毛泽东》所取得的成就，所达到的思想与艺术高度，给观众情感带来的冲击力、震撼力，是首屈一指的。它给观众带来的既熟悉又陌生，因为熟悉而倍觉亲切，因为久违而仿佛陌生、而倍觉珍贵的感情，是难以言喻的。当中国革命历史通过这部电视片站在人们面前时，你会感到它不是抽象的历史，而是活生生的毛泽东；当毛泽东再度向你走来时，你会感到走来的不但是毛泽东这个伟人，还有每一页都记述着他的伟大的历史。

在观看这部电视片的过程中，我常常会为此片视野的开阔，角度的新颖，结构的宏大，构思的巧妙，采访的深入，细节的真实，情不自禁地赞叹不已。平时我不太愿意过分推崇某一部电视片，但是这一部，的确称得上是大视野、大气魄、大手笔，角度新、手法新，立意也新。真可谓出类拔萃。

我非常欣赏这部作品角度的新颖。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但又不是普通的人，这个尺度该怎么掌握？我想，此片的成功，首先是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把握得相当准确、适度。因为最能表现毛泽东的胸怀气度的，不是别人而是毛泽东自己；最能表现他的思想与个性的丰富性、明确性、坚定性的，不是他在某一方面的革命实践，而是在革命实践和实际生活过程中自然而然显现和流露出

来的、他那与众不同的、富于特殊魅力的个性。毛泽东个性的丰富性、生动性和自始至终的独特性和完整性，是无与伦比的。黑格尔说：“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整体，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满的有生气的人，而不是某种孤立的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品。”能够在完整的意义上真正让人感到他的全部性格，无论从哪方面看，都不是孤立的，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充满生气的世界，无论从哪方面看，都不仅和他个人的人生追求，还和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整个民族的奋斗目标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在近现代历史上，还有谁可与毛主席并肩呢！所以，集中力量表现他的性格的魅力，表现他性格层面的丰富性、独特性，表现他的哲人头脑、诗人情怀、统帅气魄、革命战略家的风骨，表现他的家风、他的亲情和友情，把毛泽东的革命历史当作他的性格发展史来抒写，使得这部作品具有史诗的风度。纪念亭的那一组镜头，不仅表明此片叙述时空的开阔和采访的深入，也表明编导十分注意细节的真实和情节单元的完整。试想，如果没有那张照片，没有张大妹的讲话和指认，那就不免会给观众的情绪期待留下不应有的空白。由此再引出对瑞金叶坪村和沙洲坝村的采访，在情绪衔接和推进上就显得十分自然。当两位老村长动情地讲述毛主席当年和人民群众亲密无间的关系，特别讲到那时的毛主席如何带人帮助沙洲坝群众挖井时，镜头在给了这口井尤其是井上的碑文以特写之后，再转入遵义会议之前革命者对选择自己领袖的回忆，就自然而然深化了领袖和人民的关系，八十八岁的革命老人师哲同志，说起当年在革命的危急关头，党内同志怎样急切盼望选出能够负起历史重任的领袖来时，犹自潸然泪下的情景，亦因有了前面的叙述而分外感人。

《毛泽东》作为对一代伟人百年祭的巨片，不可能不涉及对

这样一位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的历史人物的评价。这部纪录片没有回避这一点，不但将应有的必要的评价贯彻在各集之中，而且还特意安排了《晚年岁月》这一专集。应该说，整个片子的立意和整体把握是否深刻准确，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它在此集命意结穴之处能否不蹈故常，做到胜义独擅。本集既用大量史实表现他对林彪、江青两个反党集团的不满，及其所进行的必要的斗争，同时又未回避他始终不曾也不可能完全否定他自己发动的、给中国人民带来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解说词以简洁有力的语言，明确肯定的语气指出：“对于这场给新中国带来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要负主要责任。当然，毛泽东发动这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并不是要破坏他一手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搞文化大革命就毛泽东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的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结果导致了一场大大超出他预料和控制的大动乱。”这是很有说服力的。在我看来，对大型文献纪录片而言，所谓构思新颖，并不完全在于技巧性、技术性的安排，而在于立意的新颖、深刻。《毛泽东》对毛泽东的评价，不仅用了这位伟人自己的说法，还特别精彩地表现了他的生死观，站在参悟人生的层面上来表现他时至晚年始终保持着独立不羁的性格，自始至终不愧为伟大的革命家，不愧为哲人和诗人，始终保持着革命家的风度、哲人的头脑和诗人的情怀。“我死了，要开个庆祝会，……毛泽东死了，我们大家来庆祝辩证法的胜利”，能在生前用轻松幽默的方式向医务人员谈论这个问题，而且把它提到这么一种哲学的高度，这本身就是对自身生命的一种超越。这也正是毛泽东性格倜傥不群、卓犖过人之处。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在给他作手术之前，以严重白内障患者的微弱视力和腕

力不济的手，给唐由之大夫写出“花开花落两由之”这么不失其特有的风趣和幽默感的话来。也可以说，正是由于他在生死观的问题上具有超越生死的自由意识，才能在与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表现出惊人的毅力。事实上每一个人都必然是历史的人，实践的人，任何人思维的真理，都只能在实践中去寻找答案，人的实际生活过程，其实就是人的性格的函数。所以，用实践的观点、革命变革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历史反思的观点去表现毛泽东，就使得这部片子在整体把握上做到了高屋建瓴、高瞻远瞩，在审美气度上使人感到气魄宏大，在审美感受上不仅使人获得重新发现历史、认识历史的愉悦，还能获得重新体味历史的魅力，重新拥抱生活的真理，那样一种能够提升人、净化人的美感。

所以，我十分赞赏《书山有路》这一集的编排，它能让人清楚地看到毛泽东文化性格的由来。对长沙岳麓书院刻着院训的碑文与抗大校训有无联系的猜测，特别是对那块写着“实事求是”四个大字的方匾与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不无牵连的推断，都不能不引起观众的联想。其它各集也有不少地方显示出编导手法的新颖。他们通过深入采访，在再现历史中重新发现历史，在认识毛泽东思想性格深厚的文化内蕴的同时，重新发现与肯定通过伟人格而作用于历史的文化的穿透力，非常值得赞誉，为此而在采访中开掘出的某些素材，一旦进入审美情态之中成为不可多得精彩细节时，它的审美价值及给人唤起的审美感受，实在令人称绝！“也许，毛泽东对中国文史的偏爱，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局限了他作为一个国家管理者对社会化大生产的了解。但他的一生是坚持反对本本主义的一生……”这样的解说词，如果没有一点儿反思历史、对历史再发现的精神，那是写不出来的。

这部片子视野的开阔是大家公认的，贯串纵横过去与现在，

传统与现实，中国与世界，上下古今，方方面面。凡是看过的人，恐怕没有人不称道它在突出描述毛泽东独特性格的同时，又总是将他的性格与红军的命运、中国的命运及其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对世界历史进程的影响交织在一起。许许多多鲜为人知的人物、事件、背景材料、历史情状、生活情态，都以重温历史和反思历史的眼光，生动地呈现在观念面前。《历史的选择》中，对世界上许多国家前领导人的采访，那么集中，那么深入，是以往的文纪录片从未有过的。这些被采访人以他们特有的身份、阅历和见解来评价毛泽东，这种评价的权威性，及其所表明毛泽东的世界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这一集叙述视角所及和情节辐射的时空，对毛泽东性格、事业和中国革命历史的全方位的观照，是充满历史纵深感的。其中讲到福建永定县牛牯扑村有一位农民陈添裕，曾在危急时刻救护过毛主席，片中先对陈的侄子作采访，然后请陈的妻子张大妹讲话，并且拿出过去的照片来，由她指认陈添裕。由于片中尽可能地再现了某些未曾披露过的历史细节，而深深吸引了观众；还因为这一鲜为人知的事实本身，强烈地闪耀出毛泽东性格力量的光彩，而令人生出无尽的追思和感念。

一部大型纪录片不但某一集而且在整体上经得起推敲，使人感到结构非常完整，是很不容易的。手法多样而又能做到叙述精练，剪裁得当，那就非有整体上的高度驾驭能力不可。叙述精练，剪裁得当，离不开采访的深入；而整体驾驭能力，又常常要求内在情绪饱满，并表现为结构的风格化。《艰难的探索》中，对兴国县毛主席居住过的旧址进行采访的情节，很能说明问题。在介绍兴国出过上将两名、中将四十七名、少将四十七名，同时也牺牲了两万三千一百七十九名烈士之后，紧接着便以此为背景，对一位年已八十一岁的妇女、当年的红军战士谢培兰作采访。这位

很可敬的老大娘，回忆起当年兴国农民参军的情形时，依然那么兴奋，脸上流露出十分自豪的神情：“当红军的多。你领导我，我领导你，大家都努力去。你也去，我也去，全体出发。妇女就来做田，妇女在后方就犁呀耙呀，全都是妇女干。兴国县一个月就建了兴国模范师，一个少共国际师，一个工人师，组建了三个师。……你也叫你的老公当兵，我也叫我的老公当兵……”说着说着随即唱起当年流行的红军歌曲来。这个情景对当时历史和历史氛围的观照，是极其富于历史真实感和纪实性审美所需要的生动个性色彩的。从这里可以看出，文献纪录片的事件描述和思想主题表达，以及特有的历史氛围营造，是可以通过人物采访，激发人物自身的情感，复活某些变得遥远了的情感记忆，用富于情绪表现力的画面来完成的。值得在此提出的，还有各集的“题记”，大型纪录片中似该片这样精研覃思、意味悠长的题记，还不多见。它们成为此片整体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审美情趣上平添了许多动人的情致。

总之，这部文献纪录片的成功，标志着我国大型电视纪录片走上了又一个新阶段。虽然，不能说它的每一集都无可挑剔，但应当肯定，它的经验和某些不足，都很值得我们研究。从这部片子的风格和达到的成就看，可以想见以刘效礼为首的摄制组工作态度的严谨及采访的深入。作为观众，我真心希望我国电视界能有更多作风过硬的摄制组，拍出更多更好的电视纪录片来，满足广大观众的审美需要。

（原载《中国电视》1994年第3期）

又一份文献珍品 ——电视纪录片《毛泽东》观后

夏 之 平

看完十二集电视纪录片《毛泽东》，我想向摄制组全体同志深深地鞠躬，因为他们为人民作出了一个历史性的贡献，为子孙后代留下了一份电视文献珍品。

如何评价毛泽东，近些年来，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年轻人则更是人云亦云、模糊难解。《毛泽东》的出世，其针对性及现实意义正在于此。

日前某报在中学生中作了一次调查，有两个学生的回答很有代表性。一个同学说：“我对毛泽东的认识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他是神，汽车司机把他的照片挂在车前，说是可以保平安；另一方面，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我认为他是一个有严重错误的领导人。”另一个同学的回答更简单，也更能代表年轻人，他说：“我知道毛泽东，但我不了解他。”

普遍存在的实际情况是：通过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不仅年轻人，即使是中年人甚至一些老同志，也不容易对毛泽东作出客观、冷静、恰如其份的评价。虽然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早就有了明确结论，但对这样一个复杂问题所作出的简要阐述，确实不容易为亿万人民具体理解，更难以化为群众性的、感性的认识。纪录片《毛泽东》不仅详细而多方面地介绍了毛泽东的一生，而且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有关内容作出了形象化的、通俗的、具有极大说服力的诠释。对这位具有世界影响的人物，电视用自己的表述方式，进行了全面、公正、准确的评价，使人们第一次这样深入地学习了近现代史，了解了毛泽东。这部纪录片在电视观众中、在人民群众中、甚至在世界上可能产生的影响是怎么估计都不会为过的。

用事实说话，是纪录片的绝对优势。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看到了不少有关毛泽东的电视节目，但很难与纪录片《毛泽东》同日而语。事实说明，对真人真事最有说服力的表现手段是运用纪录片（或叫作“系列片”、“系列报道”）的方式。过去，人们在运用纪录片时，常为它难以真实地显示已经过去了的事件而烦恼。《毛泽东》摄制组继承近年来制作大型纪录片的经验，大量运用深入采访的方法，沿着毛泽东所走过的道路调查研究，发现了许多历史的见证人和历史遗迹。在当年的现场，请当时的目击者、参与者或他们的子弟以朴实无华而具体生动的讲述，为人们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这些资料如果不及时抢下来，将成为永远的遗憾。而这些资料的发掘，使毛泽东得到多方面、多角度的反映，使这个历史人物被表达得更加丰富、更加新鲜、更具有深度。据介绍，《毛泽东》摄制组先后访问了二百六十七人，年龄最大的是毛泽东青年时的朋友，九十七岁的罗章龙。当年的另一个密友萧三已不在世，则请他的夫人和儿子来讲述他们之间的生动故事。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声泪俱下的许多回忆述说，尤其是毛泽东当年的护士长吴旭君的多次细腻、动人的讲述，让人们通过一个个感人的细节更深一层地认识毛泽东。他们提供的是不容置疑的、人们十分感兴趣的事实。努力去发掘事实，充分运用这些事实，尽可能多地提供当时的细节，会使人物表现得更具感染力，这是《毛泽东》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

对具有国际影响的人物的评议，必须有相应的国际知名人士参与，才能使之更具权威性。在这方面，《毛泽东》有所突破，而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摄制组利用时机，访问了一批外国前著名领导人，通过他们过去与毛泽东的接触，由他们自己讲出对毛泽东的印象和评价。这些讲话使人感到真实可信，使人看到毛泽东在外国知名人士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和他在国际上的巨大影响。这是表现毛泽东的一个重要侧面，因为毛泽东不仅是属于中国的。他在国际上受到的高度评价，恰恰是国内的许多人所估计不足的。摄制组采取的这一手，使人看出他们活跃而准确的思路。

电视手段的完满综合运用，说明大型纪录片的制作正在逐渐走向成熟。纪录片从早期的“重画轻文”到近年来有些作品的“重文轻画”或“重采访轻解说”，虽各有侧重，各有千秋，也有创新之意，但都有疏漏，有不足，都不是对电视手段的充分而和谐运用。电视工作者继续在实践中摸索，听取各方意见，总结自己的经验。到编辑制作《毛泽东》时，编导们对画面、文字、解说、音响、音乐、图解、电视技巧等电视节目的多种制作手段的运用，已趋于娴熟。它不仅成功地表现了毛泽东，而且也说明电视队伍正在迅速成长。

做到脉络清晰、层次分明、主题思想突出，是大型纪录片结构上的一个难题，也是驾驭巨作的重要一环。《毛泽东》没有采取编年史的方法，而是截取毛泽东生活中最辉煌、最能代表他性格的方面，分别汇编成集，充分展开笔墨，把一个活脱脱的毛泽东展现在观众面前。毛泽东与工农群众、乡亲、知识阶层和家人的平等、亲切相处；毛泽东早期政治道路上的几起几落；毛泽东在指挥战争上的雄才大略；毛泽东对学习的孜孜不倦；毛泽东对个人生活的刻苦节俭和对友人的慷慨相助；毛泽东乐于在大江大

海中迎浪搏击的宽阔胸怀；毛泽东对国际事务的高瞻远瞩和细致入微等等，都脉络清晰地作了表述。这样毛泽东性格的方方面面，连同他对国家、对世界的巨大贡献，被鲜明、突出地展示出来。在性格和事件展开的同时，毛泽东从与人民群众鱼水难分逐渐发展到脱离群众，以及他晚年错误的逐步形成和他自己的矛盾心理，都表现得层次分明，作出了实事求是的介绍和评说。《毛泽东》这篇大文章是很不好作的，涉及中国的革命史和毛泽东的功过是非。现在看来，这篇文章是做成功了。有薄一波、逢先知同志作顾问，有中央文献研究室同志们的帮助，使成功取得了必要保证。

总编导刘效礼介绍他们的编辑思想时说：“我们认为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但他决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们已经实现了自己的编辑意图。节目播出后，在群众中产生的反响是：毛泽东确实确实是一个伟大的人。毛泽东虽然晚年有过错误，但仍然不失为一个世界伟人。

“中国出了一个毛泽东”，是中国人的骄傲，是中国人的幸福。对这一方面，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人，体会就很深。在《毛泽东》第二集开头，编导运用了邓小平同志的一句话：“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正道出了这一点。毛泽东以他自己的实践、理论和诗作为中国和世界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在这方面，《毛泽东》的播出会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更加全面，头脑更加清楚。

研讨会上，大家对每集的头尾处理作出了好评。开头运用歌曲《东方红》，典型的历史氛围跃然而出，确能引人入胜。以翻阅毛泽东不同年龄照片为结尾，有独创性，而且余味无穷，在观看了长达五十分钟的一集之后，确实仍然能留住观众。我认为每集

开头的“题记”也运用得很好，体现了编导的精心构思。如第四集《艰难的探索》题记为：“毛泽东曾想骑马考察黄河……”；第五集《书山有路》题记为：“谁也不知道毛泽东一生读了多少书，但他反对本本主义……”这些文字简明扼要，又耐人寻味地概括了全集的内涵。但题记中也有败笔，这些既是遗憾，也不能苛求。

整整十二集，一共六百分钟、十个小时的节目，我粗看两遍，感到总体上处理得相当完整，缺点不多。也许因为浩瀚的历史资料，使人一下沉溺在应接不暇的大量信息之中，来不及冷静思考。但还是感到有一些不够精密之处，如：第一集，对人民的感情缺乏渲染；瑞金那个座谈会是否需要保留？毛泽东有藏书 91000 册，为什么只表现他对古书的钟爱？纪录片中有一段表现了他八十一岁高龄接见李政道时，还曾与之探讨科学上的“对称”问题，说明毛泽东那样爱好书籍，那样认真地学习英语，是否都与面对世界、面对现代社会、面对先进的科学技术有关，编导在这方面似乎有所忽略。即使这些确实构成了缺点，但并不影响整体，巨作已经无可否认地树立起来了。

纪录片《毛泽东》是一个电视文献节目，是一部历史教科书，也是一本可读性很强的人物传记，应该进一步扩大它的影响，发挥它的作用。希望能让它深入传播到大、中、小学中去，传播到人民群众中去，传播到海外关心中国的众多人士中去，让更多的人认识毛泽东，了解毛泽东。

（原载《中国电视》1994年第3期）

历史的另一种笔法

王纪言 于爱群

先从《史记》说起

司马迁在《史记》中开创了一种新的史书体例“纪传体”，以“本纪”、“世家”、“列传”的方式为历史人物作传，有别于以年记史的“编年体”史书体例，而是采取“以人记史”的方式，通过人的行为、命运，展现历史的风云变幻。在这里，人成为史书的主角，历史成为以人为中心的历史。他以一支如椽大笔刻划了上下两千余年间众多血肉丰满的历史人物形象，留下了栩栩如生的历史画卷。鲁迅先生曾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以后这一体例沿袭了两千余年，这就有了前后相续的二十五史，称为“正史”。

这种深厚的正史传统绵延不断，到了 20 世纪又给一代电视工作者以启迪，使他们自觉地秉承这种传统以记录历史。电视纪录片《毛泽东》正是其中的成功之作。在毛泽东辞世十七年之后，终于由这一代电视纪录片工作者为这位世纪伟人作传，这无论如何是幸运的。

20 世纪的中国历史中，毛泽东的传记是最重要的一章，整整一个世纪的沧桑变幻，无法与他的名字分开。拍摄他的传记片，就是在书写历史。纪录片《毛泽东》运用自《史记》以来的正史

笔法，以平实的镜头，朴实的叙述，既渲染出深厚的历史空间感，又浓墨重彩刻画出毛泽东的历史形象，开阖有度，举重若轻，因而显得豁达方正，绝少小家气象，在众多的关于毛泽东的传记作品中，以“正史”的气度让人肃然起敬。

这一方面得益于十七年间越来越宽松平和的时代氛围：从70年代末“真理标准”大讨论开始，思想解放的进程延续至今，毛泽东随着这一历史前进的步伐，一步步走下了神坛；而党的“实事求是”思想原则的重新确立，又指导着后人对毛泽东加以平等而全面的审视。十七年的时间距离让我们既不至于丧失对一代领袖充满激情的景仰，又可以保持对远去的历史伟人平静的注目。

另一方面得益于十几年间电视纪录片的发展完善：纪实语言的日趋丰富多样，艺术功力的日益长进，创作实践的不断积累，技术条件的改善，使电视纪录片创作在走过《丝绸之路》、《话说运河》、《望长城》等若干座高耸的里程碑后，已臻日新月异。《毛泽东》处在这一脉薪火相传中，自是好风借力，气象不凡。

时代心态的成熟和电视表现手段的成熟从两个方面为《毛泽东》的成功提供了宏观背景；而编创人员对这一题材独到细腻的具体把握最终完成了毛泽东光辉历史形象的塑造。

历史情境的营造

人的存在不能脱离具体的环境和背景，否则就失掉了“存在”的理由和历史的真实性，这就是文学中现实主义创作流派以刻画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性格为叙事原则的依据所在。

以纪实主义为基本叙事策略的纪录片《毛泽东》，摒弃哗众取宠之心，把忠实于历史真实奉为基本原则，以书写正史的严谨

态度面对毛泽东八十三年人生历程的方方面面，展开以毛泽东为立足点的关于中国革命波澜壮阔的历史的叙述。然而电视语言与文字语言不同，影像再现以物质世界的还原为依据，纪实手段以“现在进行时”为基本表述方式；而历史的“过去完成时”存在，使我们无法拥有“在场”的情境经历，历史的真实感将如何获得？在《毛泽东》中，我们看到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听到了大量历史见证人的诉说，随着摄像机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考证。我们终于明白了作者的苦心所在：营造一种历史情境，让我们身临其境地去经历，去体味历史的真实。

这种营造是从时空两方面进行的。时间上，是声音的展开。声音是具体情境得以生成的最重要的信息场。电视理论界认为，脱离了声音的影像使实物脱离了具体的情境，影像就可能变成一个形象记号。《毛泽东》片中，大量与毛泽东有过亲身接触的人们回忆和叙述了与这位伟人共同经历的历史，每一次叙述都给我们以新的视角，使我们有可能从不同的侧面逼近那历史的本真。这是人物诉说的魅力，是历史见证人的魅力。这种诉说最重要的特征是从细微处落墨，从不忽略具体细节。它的意义在于：一，使人物的讲述更富于情节性，生动而吸引人；二，披露一些与重大历史事件相关联却又鲜为人知的细节，使重大的历史更具具体可感，使历史伟人更具有人情味；三，叙述细节与经历细节时间长度上最为接近，使倾听诉说也成为一种过程，同样需要情境上的经历，因而把人带入一种具体的历史氛围中，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细节叙述成为这部纪录片一个极为重要的叙事元素。看过《毛泽东》，人们不会忘记在毛主席身边工作多年的护士长吴旭君关于“乒乓外交”策略的出台、关于与尼克松见面等等鲜为人知的细节的讲述。人们因为这些讲述从“后台”进入历史，历史

因此变得更加清晰、触手可及。

营造历史情境的另一方面，是空间的展开。这是以实地考证、实物展现的方式完成的。摄制组循着毛泽东的生平足迹走遍大江南北，寻访毛泽东曾经生活、工作、战斗过的旧地、旧居。人去物在、物是人非最容易引起人的历史沧桑感。再没有什么比“毛主席就在这张桌子上，在这盏油灯下写完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种表述更能让我们体会当时的情景，引发历史的感叹了。在《毛泽东》中，这种此地此物却非此时的场景比比皆是，甚至仅仅一棵老树，一对石狮子，也被恰到好处地引用，表达一种对历史的追思。这种寻访有点类似于文人墨客的访古凭吊，但后者更注重抒发个人的历史与文化的情思，而前者首先是一种严谨的史实考证，其次还担负着叙事功能；既然无法“现在进行时”地再现历史，可以“现在进行时”地展现对历史的考证与追寻，这种追寻的过程使抽象的历史在影像叙事上有所依附，给观众留下了发思古之幽情的充足空间。

营造历史情境无疑是一种电视化的史书笔法，它对丰富电视语言意义重大。还应引起注意的是题记的写法：“毛泽东在河北的农家小院里，指挥了三大战役，白了一根头发”；“毛泽东曾想骑马考察黄河……”……完全放弃了对历史进行哲理概括与升华的大好机会，仍然从细节落墨，从具象的情景出发，引伸出幽远深长的意味。这是电视的擅长，也是电视的魅力，它对我们的认知结构所产生的冲击力将是深远的。

人格魅力的展现

《史记》成为千古绝唱，不仅在于它提供了翔实的史料，更在于它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让我们看到了在历史

的辗转中人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强烈撞击着我们的情感，引起一代代人的共鸣，许多人物史传因此成为文学史上不朽的篇章。没有鲜活的、生动的人的形象，史书的生命力就是干瘪的。

《毛泽东》的成功亦在于它艺术地塑造了毛泽东的个性形象，展现了毛泽东丰满而独特的领袖人格。“他不是神，他是一个人，但他绝不是一个普通人”，全片就围绕这一基本把握，充分而层次清晰地展现了一代伟人的人格魅力。他有常人的情感，又有常人不能比拟的广阔胸怀；他有常人的需求，又有常人所没有的伟人的孤独。这种展现既有史的眼光，更有一种诗人的情怀，纪录片因此具有“史诗”的韵味。

基于这种把握，《毛泽东》找到了一个进退自如的角度，像一根红线串起这个伟人的整个人生。

于是我们发现，《毛泽东》在结构上完全打破了时间顺序，也不遵照政治、历史的轻与重来编排，而是按照毛泽东人格特征的各个方面组织选择：……《书山有路》，《胸中百万兵》，《放眼世界》，《独领风骚》，……从容不迫，一集一集地娓娓道来，展现了毛泽东多彩人格的各个侧面，烘托出一个立体的伟人形象。

于是我们发现，《毛泽东》在选材上举重若轻，许多资料仿佛信手拈来，却别具匠心地为我所用；而大量影像的、图片的、文字的历史资料素材好像突然焕发了生命力，变得鲜亮灵动起来。按常规思路不能入“正史”的琐碎资料，却成为毛泽东人格魅力的有力注脚，为本片倾注了大量新鲜信息，使毛泽东的历史形象更加丰满，历史也更加形象、更加人格化。

《毛泽东》总体的叙事风格亲切朴实而又满含深情。从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意气风发的少年，一个屡经挫折而不悔的革命者，一个爱吃辣椒的领袖，一个慈爱的父亲，一个不服老的老人；我

们看到了一个风华卓绝的诗人，看到了一个从不带枪的天才军事家，看到了以无名以名的泳姿笑傲乾坤的历史巨人，也看到他作为一个人民的伟大公仆的形象。《毛泽东》使我们走近了毛泽东，而我们却更加景仰他。

我们还发现，对待毛泽东晚年的失误这一敏感课题，纪录片以史家的冷静与审慎，既不回避也不渲染，不把失误与个人品质相联系，不算历史旧帐，不作一种历史的道德评判，而是立足现实，面对未来，深入毛泽东的精神世界，着力表现老年毛泽东的精神品质，他的生死观，他的孤独，他不懈的探索精神，他与衰老与疾病所作的顽强斗争，为他完整人格形象的塑造画上了“最后一片叶子”。

看完《晚年岁月》这最后一集，我们的眼前是一位可爱可敬的老人。他有过辉煌的过去，现在他老了，自然的法则不可抗拒，疾病缠绕着他，死亡威胁着他，可他的精神世界依然强大，他的执著探索从无止息，他在历史上有过失误，却把作为一个人的丰饶的精神遗产留给了我们。

《毛泽东》以电视化的方式完成了毛泽东历史形象的塑造，把“正史”的笔法作了电视化的移植，这种开创的意义不可低估。它也让我们对它的某些稚拙和不成熟之处宽容待之，期待着后继者的充实和完善。历史从来不是史料的堆砌，它更是一种价值体系，是今人对前辈的价值评判，因而也是对自己的价值确认，所以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史书。《毛泽东》记录了毛泽东的生平历史，记录了毛泽东这一代伟人的业绩，记录了领袖的风采与魅力，然而却刻意地回避了毛泽东人生历程中的某些重要方面，使我们在深深沉浸的同时又若有所失。正如前文所说，人的存在离不开具体的时代环境和历史背景，不论是创造历史的人还是

记录历史的人。若干年后,后人再看《毛泽东》时,他看到的不仅仅是保存完整的珍贵文献,他还将看到站在世纪末的地平线上的一代人甚至几代人,对这位离去不远的历史巨人的景仰与眷恋,对 20 世纪中国百年沧桑的回眸与深思。

(原载《中国电视》1994 年第 4 期)

深情赞颂《毛泽东》

朱 羽 君

在毛主席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前后，电视屏幕上播出了许多有关纪念毛主席的电视节目。其中中央电视台拍摄的十二集电视纪录片《毛泽东》令人难以忘怀。它充分发挥了电视纪实的优势，真实、质朴、亲切、感人地展示了毛主席伟人的风采，带领我们寻访毛主席的足迹。它为表现历史人物的传记性的电视纪录片提供了新的思路，开创了新的风格样式，让观念在真实的历史资料和现实的情感记录中得到心智的启迪和艺术的感染。

十二集电视纪录片构思巧妙，角度新颖。它撇开了编年史，不用平铺直陈的叙述，而以一集一个侧面，一集一个主题的方式来组织事件和资料，在结构上就取得了很大的自由，使之对毛主席生平事迹、人格性情的叙述自然流畅，资料的选用能纵横捭阖。十二个侧面组合成毛主席具有立体感的形象，既伟大又亲切，他不是神，但绝不是一个普通的人。比如第一集，《丰碑在人民心中》，重点展示毛主席一切为人民，把人民的利益和疾苦放在心中的精神。围绕这一重点取材，建国方针的制定，治理淮河，处决刘青山、张子善，消灭血吸虫病等材料，自由组合，展示毛主席的这种胸怀和人格精神，各种资料似断实连。又如第四集主要展示毛主席重视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作风。围绕它，考察湖南农民运动，寻乌调查，延安有组织的调查研究活动，以及后来的

视察大江南北，直到晚年仍想骑马考察黄河等资料和事件，一气贯通。并且毫不避讳地指出，晚年毛泽东的行动受到局限和约束，很难亲身调查研究，影响了他晚年的许多决策。其中许多有关毛主席调查研究的真实事迹采访和追述得十分生动感人。《曲折之路》一集则专门写毛主席一生的几次大的挫折，它同样突出了主席奋发有为、百折不回的坚强意志和伟人性格。其它集有的谈读书、谈诗、谈打仗、谈统一战线、谈家风，写事写人，突出了毛主席独特的个性。

此片赋予已知的历史事件以鲜活的、以往不为人知的细节，使这些重大事件充满情节性和故事性，充满生活气息和人情味，这是这部长达十二集的电视纪录片能紧紧吸引观众，具有艺术感染力的重要方面。比如“乒乓外交”是打开中美关系僵局一个信号，已人所共知，但以往人们难以知道它在毛主席脑海中折腾的情景。影片借身边工作人员之口叙述了这一细节：毛主席在下午签发了不接待美国乒乓球队的指示之后，心中仍在权衡利弊，吃了大量的安眠药仍不能入睡，最终才下决心，叫护士长赶紧去收回他的指示，传达他的新决定。又如尼克松首次访华，这是中美关系的历史性转折，全国、全世界人民早已在电视屏幕上看到。但是有谁知道，在屏幕上谈吐自若的毛主席原来重病在身，在会谈不久之前昏迷过，而且只一板之隔，医生、护士和工作人员组成的抢救队伍正严阵以待，以防不测，连强心剂都吸进了针管里……影片中，护士长给我们打开了这扇门，讲述了当年的情景。又如中苏关系破裂，已见诸历史文献，但有谁知苏联大使尤金曾两次进中南海传达赫鲁晓夫的建议，被毛主席顶回去；毛主席叫赫亲自来，赫来了之后，毛主席又当面揭露和斥责赫侵犯我主权的行径。又如延安大生产运动已为大家十分熟悉，但有谁知

在这以前有一个传奇式的故事。原来毛主席有一次在延安召开一个调查会，突然雷雨大作，闪电将与会的一个人击死。有一位农民得知此事说，雷公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毛主席听到后，并没有想到要责怪他，而是耐心调查他为什么会对自己有这么大的火气。原来是农民对过多征收公粮不满，于是毛主席下令减收四万担公粮，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影片就这样将毛主席的革命经历娓娓道来，使观众能从新的角度去感受毛主席的伟大。

此片采访了二百六十多人，包括当年跟随毛主席浴血奋战的老将军、毛主席的老同学、亲朋好友、医生护士、秘书警卫等。这些当事人在今天本身就具有纪实的新闻因素。他们的诉说有历史价值，可信，感人，尤其是这种诉说在故居、旧址中进行，伴以过去的照片、影片资料，有机组合成一种信息场，将现实和过去结合，在观众的想象中重构过去的时空，使人物形象呼之欲出。如护士长吴旭君的几段诉说，结合当年的环境，伴以大量的细节介绍，描绘出毛主席当年的神情姿态和语气，加上她自己的情感，极为生动地“再现”了毛主席的形象。又如师哲诉说中苏关系紧张时，赫鲁晓夫来华的经过。他当年是翻译，他的诉说具有权威性。他将各种细节、毛主席当年铿锵有力的话描绘得有声有色，使观众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又如罗章龙诉说毛主席年轻时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时的情景，犹如一串电影闪回镜头一般，出现在观众的脑海中。尤其是兴国那位当年苏维埃政权的女委员的诉说更为感人，照片资料先出现了她半个世纪前的英姿，再听眼前这位满脸皱纹的老人激动的诉说，我们看到岁月的年轮如何滚动至今。诉说，这种形式只有用于电视纪实才能充分显示其艺术魅力，在今后的历史性、传记性的电视纪录片中，将会发挥更

大的作用。

此片在采访拍摄的方式上也具有现代电视纪实的观念和风采。比如,重视展开行为过程,重视时空的连贯和氛围的积累,创造了全片的一种追忆、缅怀的情绪基调,在采访当年的现场和当事人时,摄像镜头注意将采访的过程组织在画面之中。如第四集中,记者在寻乌的采访活动,到发现《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一文的村落中去采访的过程,都伴随拍摄,似乎在带领观众去采访。在介绍毛主席当年寄住过的湖南岳麓书院时,摄像机一直随着讲解员行进,保持着长镜头的时空连贯、声画的连贯,使观众如入其境。又如介绍中南海毛主席的旧居,是从汽车进中南海的大门开始,然后镜头沿着中南海,转入石径,直至菊香书屋,进一院,又进一院,一直走到毛主席的书房和卧室,这种空间连贯的交待,完全满足了观众追寻、访问、缅怀的心理要求。

另外,此片在综合运用电视各种手段丰富画面的信息量方面也具有特色。如前面所说的岳麓书院的介绍,不但时空连贯,而且进行了大跨度的时空组合。讲解员一讲到书院中过去的人和事,电子摄像即时将照片、影片资料准确地呈现在现场采访画面的一角,谈到书院的院训与以后抗大的校风有承继关系时,画面即时现出抗大的校址与之并列。全片字幕的运用也十分到位,还有绘制的图表,动画展示路线、方位等,具有立体的多方位的信息结构。每集之前有一题记,也很别致,虽不是每个题记都好,但它的确赋予了影片一种文学的格调。

我深情地赞颂《毛泽东》,它用电视纪实手段,从新的角度真实而丰满地展示了毛主席的伟人形象,它标志着电视传记性纪录片的创作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里程。

(原载 1994 年 2 月 26 日《文艺报》)

电视纪录片《毛泽东》 与电视纪实艺术

朱 景 和

毛泽东主席诞辰一百周年，中国文坛上尤其是电视屏幕上出现了温度颇高的“毛泽东热”。这一陡起的热潮，表达了广大作者和亿万群众的炽烈真诚。其空前的热度甚至引起了国际传播界的关注和评论。这里，仅就电视纪实艺术的同时升温说几句话。

一、纪实艺术潜力的空前发挥

1993年12月12日至30日，十九天的时间，中央电视台同时播出两部电视连续剧《西行漫记》、《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和系列电视纪录片《毛泽东》，播出时间分别在20至21点之间，被各方面公认为是纪念毛泽东主席的众多电视作品中的优秀之作。根据《收视报告》提供的材料，三部作品的收视率情况如下：

	北京地区最高收视率	全国最高收视率
《西行漫记》	19.0%	15.1%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26.8%	14.5%
《毛泽东》	29.8%	15.2%

对比颇耐人寻味。如果说不同题材内容的两种艺术形式在同时同地播出作比较，可能有诸多因素难以类比，不足以说明问

题,那么相同题材内容的两种艺术形式同时播出,则不能不说对比相当鲜明,尽管受影响的因素依然存在(比如播出时间是否同属一类黄金时段),然而,即使考虑到这一因素的影响,对比仍是很有说服力的。可以说,在我国电视史上,十二集电视纪录片《毛泽东》掀起了第二次高收视率的纪实艺术热,这种状况在当今国际范围内也是少有的。

二、收视率的两种参考作用

电视是当今最具群众性的传播工具,又是最具广泛性的大众文化。节目的娱乐性、群众性,是影响收视率的首要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娱乐性又与商业性成正比,因而就使它具有了商业价值。但我们必须承认,娱乐性并非主要的,更不是唯一的艺术标准。播出时间、时段的差别,是直接影响收视率升降的第二个因素,此外,电视频道之多寡、家庭录像机的普及程度、节目宣传是否得力、其它文化设施之发达程度,等等,也都对收视率产生影响。因此在不同历史环境、不同时段播出的不同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节目,不应简单地仅以收视率评价其优劣。

收视率不是评价节目的唯一标准,然而,收视率仍然是评价节目的重要标准。在社会历史环境、播出时间、思想内容等条件大体相同的情况下,收视率便成为一面高清晰度的镜子,既能帮助人评价节目,又能使人了解观众的心理动向和审美趋向的变化。比如以《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为例,北京地区 20 点与 21 点的收视率的不同,主要说明时段差别的重要;而同是北京地区 20 点播出的纪录片《毛泽东》能高出相同题材的电视剧近三个百分点,却不能不说是纪实艺术难得的成功。

三、深入认识并熟练驾驭电视纪实艺术的标志

电视纪录片《毛泽东》的空前成功和良好社会反响，首先是毛泽东伟大人格和人民群众的感情因素的作用，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纪实艺术创作自身。《毛泽东》使得电视纪实艺术潜在的巨大能量得到了充分发挥，同时也显示了电视工作者对纪实艺术认识和驾驭水平的提高。我国电视纪实艺术经过一度徘徊和探索，终于以纪录片《毛泽东》为标志，开创了新的辉煌，也标志着我们这支创作队伍素质和艺术功力的飞跃。

我们的纪录片创作和对纪实艺术手段的认识和运用，走过了一段漫长而曲折的路，如主题先行的客观报道体，注入强烈主观感情色彩的文学体、政论体，追求浑朴自然的即兴采访纪录体，等等，都曾出现过优秀之作，并曾分别把摄影、解说词和采访人的作用发挥到十分可观的程度。然而，在诸手段的认识和运用上，总是留下一些人为偏颇的明显痕迹和遗憾。

纪录片《毛泽东》的作者们，娴熟地驾驭着诸多手段，完成了具有雄厚论辩力和强烈感染力的纪实艺术巨作。不言而喻，对伟大人物及有关历史评价的把握和作品大框架结构的确定，乃是取得成功的基础。普通的人—伟大的人—富有个性的人，这一述事书史，以史写人的实事求是的认识角度，既回避了集中的结论式评价，又给伟大人物和历史一个恰如其分的为多种层次的人所认同的结论；写人物不用历史传记体，而以伟人性格侧面、国事侧面和历史发展相结合分列篇章，取得挥洒自由的余地，集中、展开任意驰骋，巧妙地摆脱了历史和时空的许多局限。历史影片资料的收集周全而丰富，使用高度准确；故地重访的拍摄，新视角新材料层出不穷，每每令人耳目一新；接受采访的人物多

达二百六十七个,许多人本身便具新奇色彩,大量讲话内容堪称秘史新闻,鲜为人知;讲话和解说词的使用,宜多则多,宜少则少,宜无则无。总之,各种艺术手段的使用,达到了各扬其长、各尽其妙的境地。不拘泥体例风格的样式,便是一种独特的样式——高度和谐完美的纪实艺术样式。评论者尽管可以指出尚存在的某些技术性瑕疵和不足,但《毛泽东》作为一部空前完美的高水平纪实艺术作品,却是得到公认的。

四、两种思维的结晶,双重价值之并存

理论研究依靠逻辑思维,艺术创作有赖形象思维,这是一般的公论。作为文献纪实艺术的纪录片创作,则离不开(或者说应该自觉运用)两种思维方式。许多成功之作都说明这一点,纪录片《毛泽东》则是更有力的佐证。

毛泽东从普通农民的儿子、一介书生到伟大战略家、哲学家,他的生平经历和人品性格与当代中国的历史命运以至和当代国际关系的许多大事紧密相关。书其人论其事不可能不用逻辑思维,以最大限度地还个人与历史之关系的本来面貌。而形象思维的任务,便是如何把历史(或事实)通过形象表现产生一定艺术魅力和审美效果。

纪实艺术是用事实说话的艺术。纪实艺术的再现事实,绝非讲故事作报告或历史教科书的翻版,而是通过其特定的多种物质与非物质手段来实现。事实,现场摄录的事实,形象资料记载的历史事实,权威人士回述的事实,等等,作为艺术原素和综合手段有机部分为主题服务的事实,便是纪实艺术的血肉和生命。有的关键性画面形象,能胜过千言万语;有些当事者的亲口回述,堪与最好的表演艺术匹比。

问题在于如何巧用适当手段纪录事实，表现事实。各种艺术手段的尽善尽美使用，既是为局部特定效果，更是为作品的总体目标；以事实述事、论理、抒情，以达到预期的艺术效果。在通过形象思维进行创作的过程中，电影艺术的蒙太奇原理，总在不同程度地，自觉不自觉地被遵循、被利用。而关键性细节的巧妙表现则是最重要的手段之一。这种细节表现，既可以是跨越时空的铺述、渲染、寄情，也可以是严格限制在特定时空之内的详细纪实。第八集《放眼世界》中的三个例子属于前者。

俄语翻译李越然回顾毛泽东当面反驳赫鲁晓夫关于“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的图谋的情景，生动地表现了毛泽东的大智大勇和坦率性格，对强权恶势的毫不畏惧和极端蔑视，在事关国家利害的大事上，寸利不让针锋相对，使民族尊严得以维护，民族气节得到升华，因而使人感到无比自豪和痛快；保健护士吴旭君回述毛主席对是否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如何打开中美关系问题上，深思熟虑，夜不成寐，终于作出正确决策并及时付之实行的情景，绘声绘色淋漓尽致；毛主席晚年以危重病躯会见尼克松的活动，经当事人回述，配合影片史料，一串细节真实地重现了这一历史性时刻，充分表现了伟人晚年以超人的顽强与衰老与疾病斗争的情景，其艺术震撼力、感染力无与伦比。这便是纪实艺术的魅力所在，其它艺术形式不可替代的特性所在。

为了特定艺术效果而巧妙地使用各种手段，是形象思维的用武之地，它的任务是形象化地再现生活和历史。纪录片《毛泽东》创作集体，包括高水平而又深入创作的顾问们，组成了善于两种思维的创作大脑，可谓政治家和艺术家结合的范例。因而作品本身便具有很高的双重价值——艺术审美价值和文献史料价值，是艺术性的文献，文献性的艺术。史学工作者可以视之为史

籍、史料,为史学研究提供事实和论据;广大观众则作为艺术品观赏,从中获得认识的、审美的满足和裨益。这正是纪实艺术应有的品格,基本的也是最高的标准。

(原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4年第2期)

电视纪录片的重大突破

——《毛泽东》启示录

仲 呈 祥

我以为，在中国电视纪录片创作历史上，新近播出的十二集《毛泽东》树起了一块耀眼的丰碑。它标志着我国的电视纪录片，尤其是关于历史伟人的纪录片的创作，在思想内涵的开掘和表现形式的创新上，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里程。它不仅在纪念毛泽东百周年诞辰的日子里，为人民群众献上了一份弥足珍贵的精神食粮，而且也今后的电视纪录片创作，提供了许多具有普遍意义的新鲜经验。

首先，它启示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电视纪录片这种精神产品样式因其拥有的特殊优势而负有神圣的时代使命。记得我国已故的著名电影理论家、美学家钟惦莱先生曾为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成立三十周年写过一篇题为《审时》的文章，说“新影厂自有它光辉的过去，但我更感兴趣的是它的现在和未来”。“纪录电影向何处去？实际上要从纪录电影所处的时代要求寻找答案。如果它不能成为这个新的社会体制的触角，并且用新的电影语言和新的电影方法把这个事业推向前进，它就会停留在事物的表面而踏步不前。”（见《电影策》第183页、184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钟先生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即要从“所处的时代要求”去寻找纪录电影的发展方向。如今，新影厂成建制地并入中央电视台，可谓

正是应了“所处的时代要求”。同样是关于纪念毛泽东诞辰百年的题材，由于制作方式、生产成本及周期的差异，一部纪录电影仅五十分钟，而一部电视纪录片却长达六百分钟。短而精当然很好，但像十二集的电视纪录片《毛泽东》这样长而内容充实的作品，恐怕是短而精的优秀之作难以替代的。表现毛泽东这样的历史伟人，实际上就是展示伟人所处的时代的一部历史，就是展示一部中国人民的现当代革命和建设史。没有足够的篇幅和容量，是难免会受到一定的局限的。《毛泽东》之所以能高屋建瓴，从容铺陈，叙议精当，充溢激情，不能不说与它所具有的相应容量有关。电视纪录片拥有的独特优势及其所负有的别的精神产品样式难以替代的神圣的时代使命，由此可见。

其次，它再一次证明：电视纪录片的成败关键，在于创作者对纪录对象的整体把握和具体表现的功力，在于创作者在纪录过程中所注入的历史观、人生观、价值观乃至文艺观。像《毛泽东》这样的纪录历史伟人的作品，其难度之大，不言而喻。创作者知难而上，注重吸收当今党史研究和毛泽东研究的最新最高的思维成果，因此，全片大气磅礴，具有强烈的思想启示力和形象震撼力。列宁曾把纪录电影称为“形象化的政论”。《毛泽东》这部电视纪录片，就堪称“形象化的政论”。它的力度，表现在许多镜头所展示的表面的纪录，都突破了纪录的表面，而透视出历史运行的规律和人生真理。譬如该片的总撰稿人陈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研究员）评价毛泽东的诗词创作，于平实的纪录画面与声音中，透视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美学观分析毛泽东诗词得出的颇有见地的结论，给人的启悟，远远突破了荧屏纪录的表面。

再者，它又一次以成功的创作经验告诉我们：电视纪录片要

承担和表现像“毛泽东”这样的重大题材，一定要努力实现创作生产力诸方面因素的“优化组合”。物质生产有一个资源配置和生产力诸因素的优化组合问题，精神生产是否也有相似的问题呢？我以为，尽管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有着各自不同的运作规律，但同样都存在着资源的最佳配置与生产力诸因素的优化组合问题。《毛泽东》的成功就雄辩地证实了这一点。正是因为该片既得到了中央领导的精心指导，又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专家学者与中央电视台的电视纪录片专业工作者的通力合作，才做到了对这一难度极大的纪录对象的整体把握的“度”颇为恰当，而电视表现的手段和技巧又相当多样化，且把这两者又尽可能和谐地统一起来。这些，使《毛泽东》在中国电视纪录片创作历史上，占据了一席光彩夺目的重要位置。

（原载 1994 年 1 月 21 日《北京日报》）

丰碑植根在人民心中

——纪录片《毛泽东》观感摘编

《中国电视报》编者按：十二集大型纪录片《毛泽东》在本台播出之后，我们收到许多观众来信。有的深切缅怀毛主席的丰功伟绩，有的感谢《毛泽东》剧组不辞辛苦，在短时间内推出如此鸿篇巨制，等等。由于版面有限，不能一一刊登。现摘录其中一部分，以飨读者。

一代伟人毛泽东离开人们已有十七年了，今天毛泽东已被中华儿女置于人化的观点上崇敬、学习乃至评说。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大型纪录片《毛泽东》便是人化毛泽东的艺术纪实。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在峰回路转的革命历程中一位农家儿子成为人民领袖的艰难步履，在硝烟弥漫的疆场上一位书生成长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军事战略家的雄壮历程，在变幻莫测的国际风云中一位中华之子抗拒东西两霸、维护祖国主权的政治家的伟岸，在卷帙浩繁的书册中，一位莘莘学子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思想家的智慧；看到了在艰难险阻中引吭高歌的诗人的豪迈，看到了在波涛汹涌中乘风破浪的健儿的果决……当然，我们也看到了艰苦探索中的失误，豪迈自信中的疏漏，战天斗地中的过激，自力更生中的偏颇，多快好省中的急躁，放眼世界中的无奈……毛泽东，中国人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他的成功，激起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自豪；他的失误，教导中华儿女永铭“骄傲使人落后”的良训。

一位毛泽东，是一部观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行中外之交的百科全书。

（浙江 谢 晖）

毛泽东是伟人，《毛泽东》肯定感染人。没看电视片之前，我已认定这一点。然而，我所没想到的是，《毛泽东》竟如此强烈地、似不知不觉间震撼了我的心。

是一种无法离却的力量，是人格的力量，是领袖的力量。以往，我对毛泽东了解得太少了。尽管从小至今毛泽东的名字常听常见，却从未深刻地认识他，只模糊而肤浅地停留在“伟人”这一简单词语上。

《毛泽东》是一次集中、全面展示的过程，是一部可以作为史料的电视片。

《毛泽东》那么自然地走进我的心里，那么深入地扎根在我的心里……不多时，我已紧紧跟在拍摄者的身后，随其行，随其观，随其闻，随其振奋，随其加快心的跳动……

当江西省委招待处那位服务员讲述那难忘的亲身经历时，我竟难以抑制地流下眼泪……及至后来主席的护士长哽咽讲述的画面出现时，我又一次难以控制……不是悲哀，而是激动，为共产党人中这样一位伟人；不是伤心，而是怀念，怀念一生服务于人民的好领袖。几十年过去了，毛主席的一言一行仍逼真地存留在亿万群众的心中。毛主席去世十多年了，《毛泽东》又将使他的光辉形象植根在千千万万新一代人的心中！

（河北 傅学磊）

我怀着崇敬的心情收看了大型纪录片《毛泽东》，激动的心情无法表述，它全面而客观地介绍了毛主席的丰功伟绩，和他在创业道路上所走过的艰辛路途。在纪念毛主席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似有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在深深地怀念着他老人家。纪录片《毛泽东》拍出了全国人民和世界友好人士的心声。

沿着主席的足迹，努力真实地反映他老人家的思想轨迹。据我所知，这部纪录片有着相当大的收视群，不仅是那些亲身经历过磨难，对他老人家怀有深厚感情的中老年观众，像我们这些生在红旗下、长在党的怀抱里的年轻人，甚至儿童在大人的带动下，也每集必看。从中，我们深深体会到，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来之不易，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拍出如此好的电视片，感动着亿万人民的心，摄制组也值得欣慰了。

（河南 李玉芳）

我是一个快六十出头的人了，看《毛泽东》每到动情处，总要流泪，三次五次，十次八次，难以抑制。为什么？因为毛主席是人民的儿子，他的思想品质、牺牲精神、人格力量太伟大了，一句话，因为人们太了解毛泽东了！光辉一生的毛泽东留给人们的是永远的怀念、追忆（这种感情对相当多的人们来说至死不会中断）。

但愿《毛泽东》能永远留给世人！

（内蒙古 刘守勤）

最近在纪念毛主席诞辰一百周年时，全国举办了那么多纪

念活动,出现了很多好作品,真令人高兴。在诸多作品中,我认为十二集大型纪录片《毛泽东》是最好的一部。它使人民看到了真实的毛泽东、全貌的毛泽东,看到了毛主席的思想、品格、才华、胆略、风采及其由衷爱民、坦诚磊落、无所畏惧和伟大中的平凡……

从这部片子中看到了中央电视台《毛泽东》剧组对毛主席、对祖国、对人民的爱,看到了你们的追求、你们的功底、你们的辛劳。正是由于你们的不辞辛苦,才会有这部翔实感人的《毛泽东》。人民感谢你们!

我真不愿十二集演完那天到来。我还想多看看毛主席为人民操劳一辈子的身影,多看看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那些平凡而伟大的人们,还想找回我们应该找回的东西。

(北京 曲振荣)

(原载 1994 年 1 月 10 日《中国电视报》)

三个月外出采访拍摄,《毛泽东》摄制组顶着盛夏酷暑,备尝艰辛;三个月后期编辑制作,他们又埋首机房,日夜操劳。他们踏着毛泽东的足迹,用真挚的感情写成了一部史传精品,从而也就表现了电视艺术家的品格。

丹心写春秋 精品献人民

——记大型电视纪录片《毛泽东》摄制组

李德润 李战吉

《人民日报》编者按：这是一篇令人振奋的报道，很值得一读。

邓小平同志指出：“思想战线上的战士，都应当是人类灵魂工程师。”作为文艺工作者，应当像《毛泽东》摄制组那样，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始终不渝地面向广大群众，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确实，长期以来，有许多人民的作家、艺术家以崇高的思想、道德、精神，以自己美好的心灵，呕心沥血，熔铸出许多生动感人、催人奋进的文艺作品，为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发挥着作用。同时，许多作家、艺术家的“立身”也是人们行为的楷模。

在1994年初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同志号召宣传思想战线要紧紧围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指针，“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我们热切希望文艺界涌现出更多的像《毛泽东》摄制组那样的文艺工作者，希望文艺工作者中间有越来越多的同志成为名副其实的人类灵魂工程师，为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四项“育人工程”，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不懈努力！

1993年12月，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的日子里，

十二集电视纪录片《毛泽东》横空出世，独领风骚，备受观众欢迎和赞誉，成为里程碑式的力作。它是一部流动的历史，展现了毛泽东的伟大性格魅力；它是一段定格画面，印下了创作人员的追求和汗水。

人民群众是最有权威的批评家，他们的判断总是最有分量的。他们说：《毛泽东》摄制组为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人民感谢你们

自从12月13日中央电视台开播《毛泽东》之后至今，一封封热情洋溢的信从祖国的四面八方飞到电视台，飞到主创人员手中。这些普通观众“怀着崇敬的心情收看了大型纪录片《毛泽东》，激动的心情无法表述。”（河南李玉芳），“每到动情处总要流泪，……难以抑制”（内蒙古刘守勤），不知不觉间受到了强烈的心灵震撼（河北傅学磊），他们赞扬片子“拍出了全国人民和世界友好人士的心声”（河南李玉芳），“在人民心中树起了一座毛泽东纪念碑”（甘肃廖剑峰），是“一部感人肺腑、催人奋进、教育后人的优秀巨作。”（河南王铎），他们纷纷要求重播，不约而同地对摄制组说：“人民感谢你们！”（北京曲振荣、济南市部分电视观众）原毛泽东保健医生徐涛、护士长吴旭君写道：“我们感到又回到了毛主席身边。你们为人民为历史做出了贡献，立了大功，你们应该获得崇高的荣誉与奖赏！”

在播出前的审片汇报中，摄制组总顾问薄一波高兴地对主创人员说：“你们辛苦了，祝贺你们拍摄成功！”为拍片注入了心血的另一位总顾问逢先知和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研究组的几位负责同志也都赞扬《毛泽东》为世人留下了一份真实而宝贵的

资料。在播出后的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们一致称赞《毛泽东》是一部高扬主旋律的艺术精品。

一部作品的优劣，最终要由广大的人民群众来评定。有什么能比广大群众的满意、认同更使艺术工作者感到欣慰的呢？总编导刘效礼在接到一位外地妇女打的电话来索购《毛泽东》录像带，要送给女儿作嫁礼时，他激动得语调哽咽了；总摄像师赵立信捧起老父亲在病房里看完《毛泽东》后的来信时，眼睛湿润了；执行总编导汪恒听说几位海外学子为寻找《毛泽东》录像带而四处奔走时，心灵震颤了……

然而摄制组的同志们并没有陶醉于成功的喜悦。他们说：“是全社会一起创作了《毛泽东》。”他们没有忘记在八个多月的奋战中，社会各界人士所给予的热诚帮助，没有忘记在三个月的采访中，大半个中国的地方同志所给予的无私支持。他们想起了为抢时间、争速度，江西省委接待处副处长张飞、警卫处副处长徐家贤、湖南省警卫处副处长刘仁义亲自率领警车为摄制组开路；想起了韶山纪念馆破例让他们拍摄《毛氏族谱》和一些珍贵的革命文物并且不收一分钱；想起了贵州习水酒厂热情帮助摄制组找渡船，找当年红军四渡赤水的渡口，忙前忙后，竟连“请宣传一下酒厂”的话头也没有提；想起了广空、兰空、北空部队派出优秀驾驶员协助航拍，不少单位无偿地提供舰艇和汽车……

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要把一个伟大的毛泽东送上屏幕，要把一个真实的毛泽东献给观众。文艺是社会的事业，文艺工作者只有与社会的脉搏相契合，才会使创作引发社会的共鸣。是的，社会只钟情于把心灵敞向社会的人，观众只青睐于把目光投向观众的人。

一个人追求的目标越高，他的才力就发展得越快，对社会就越有益。《毛泽东》摄制组以精品意识进行新的探索

毛泽东属于整个社会。1993年，神州大地上，不少单位、不少人都在谋划为他的百年诞辰献上一个耀眼的花环，一场艺术创作的激烈竞赛方兴未艾。

中央电视台军事部主任刘效礼大校慷慨请战：“这是百年一遇的殊荣。我们不拍，谁拍？现在不拍，何时再拍？”当这位屏坛宿将把创作《毛泽东》的令箭稳操在手的时候，那沉甸甸的分量使他清醒地认识到：只凭感情不足以描绘出一位为中华民族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世界性历史人物，一位有着鲜明个性和特殊魅力的人民领袖；仅靠几个人闭门造车无法创作出震动当代、启迪后人的艺术精品。

于是，中央电视台由军事部牵头，集中了台里的一些“尖子”人物；请来了研究毛泽东、掌握资料最丰富的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研究组；联合了拍摄过毛泽东专题片的武警总部摄制组。一个摄制《毛泽东》的“统一战线”、一个“多兵种”联合作战的“集团军”在春暖花开的日子里诞生了。

1993年4月26日，摄制组集中到香山开会。会上做出的最重要的决议也许就是后来为人们所称道的创作思想和创作风格了。《毛泽东》不是毛泽东的编年史、资料片，而是要采取纪实与政论相结合的方式，在现实与历史、人物与事件、情感与理性、知识与评价相联系的层面上，用典型性的侧面来塑造一个真实可信、血肉丰满的领袖形象，来反映中国革命历史中毛泽东的伟大一生。摄制组要在12月26日之前的八个月的时间里，完成以往一两年的工作量。任务艰巨，责任重大，时间紧迫。台长杨伟光

那掷地有声的话语为摩拳擦掌的摄制组上足了发条：“我们相当于一支国家队，国家队就要拍出国家队的水平！”摄制组成立了临时党小组，提出了一个朴实而响亮的口号——“一不为名，二不为利；拍摄《毛泽东》，学习毛泽东。”他们决心竭尽全力，探索创新，让毛泽东活在屏幕上，让《毛泽东》活在人们心中。

香山会议前，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研究组已经筹备与别的单位合拍一部毛泽东的专题片，陈晋、吴晓梅、张民花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完成了十集十万字的脚本。进入《毛泽东》摄制组后，这三位撰稿人按照集体讨论确定的增加两集的要求，重新组织素材，又夜以继日地赶出了十万字的提纲，最后几经讨论，数易其稿，连续作战，写出了可供操作的拍摄大纲。

关于毛泽东的资料浩如烟海，从中筛选拍摄素材谈何容易！但是在档案、图书部门的密切配合下，三位撰稿人硬是以愚公移山的精神，选精择要，提供了成百上千个采访线索。单是为了采访外国政界要人，他们就翻遍了从1949年到1976年毛泽东会见外宾的现有全部记录，为采访组整理出了人物名单、谈话内容、当时情景等资料，设计了能够引发外宾兴趣的采访提纲。

他们呕心沥血的案头工作为纪录片出彩创造了可靠的基础。然而有谁知道他们为此熬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他们的提纲是在够不上星级的招待所里写出来的呢？可是他们无怨无悔，因为人民需要主旋律精品，因为摄制组的其他同志也和他们一样，在为创造一部巨片而辛勤地工作，艰苦地探索。

人，只要有一种崇高信念，有一种追求，就什么困难都能克服。《毛泽东》摄制组以竭诚的态度、百折不挠的精神挖掘出生活深层的宝藏

《毛泽东》运用的是过去时和现在时相融合的结构方式。它要以现在人的眼光来评说过去的历史，以现在人的口来讲述过去的故事。因此，大量而精粹的采访就成了全片成功的关键。

多少人为纪录片中这样一些情节而激动不已——毛泽东的女儿李讷说，上大学时她也是紧巴巴的，家里每月只给二十六元钱；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讲述为了让干部记住还有受苦人，毛泽东只请前来中南海开会的大区书记们每人吃一碗面条；毛泽东的理发员兼卫士周福明展示毛泽东那补了七十三块补丁的毛巾被、补了五十九块补丁的睡衣；毛泽东的警卫科长王宇清叙述毛泽东登上小山给父母上坟鞠躬；福建永定县牛牯扑村村民陈添裕在白军搜捕中把身患疟疾的毛泽东背到家里藏起来，为诱骗敌人，他倒穿草鞋，把敌人引向相反的方向……可是人们不会想到当初摄制组为寻找这些不会干涸的历史而投入了多少热情和努力！

1993年春节刚过，武警大校赵立信便在王宇清的带领下，扛着摄像机敲响了徐涛、吴旭君夫妇的家门。吴旭君只是冷冰冰地撂下一句话：“我们已经‘死’了十七年了，请别再来打搅我们！”赵立信真诚地笑了。他知道这些老同志只是在等待、在考验，他明白老同志的警觉和担心并非没有道理。

近年来，一些作品把毛泽东请下“神坛”，产生了积极作用。但是有些作品却把毛泽东俗化，哗众取宠，还有人恶意中伤，也有人把描写领袖、兜售“秘闻”当成了猎名谋利的手段。在鱼龙混杂的“毛泽东热”中，摄制组能够正确地表现毛泽东吗？

毛泽东不是神，却是一代伟人。我们的时代需要了解真实的毛泽东。毛泽东的伟人性格要由熟悉他的人共同来塑造和评价，

老同志出镜不仅会传达出时代的声音，也会记录下时代的历史。

摄制组耐心而焦灼地等待着，一些主创人员三番五次地打电话致意，登门拜访，表明一个艺术工作者的良知和对毛泽东的深情。他们的真诚激活了那些沉思的心灵。徐涛毅然放下了手头正在撰写的回忆录，吴旭君不顾身患心脏病……他们不仅当起了“演员”，还当上了顾问。摄像灯下，他们不管脸上被烤得爆了皮，一个又一个、一遍又一遍地讲述着那些流逝的往事。大街小巷，他们不顾年老体弱，陪同编导和摄像以真情叩开了因病已多年谢客的李敏、李讷的家门……

就这样，摄制组以百折不挠的毅力和对时代、对历史负责的精神从生活中挖掘出数百个采访对象，从采访对象中挖掘出许许多多鲜为人知、感人至深的毛泽东当年生活的故事。

毛泽东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正确宣传毛泽东，这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不仅中国人关注，全世界都在关注。于是，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日本前首相福田赳夫、赞比亚前总统卡翁达……一大批外国政界要人成了《毛泽东》中不可或缺的“明星”。他们的出台，使人们进一步感受到毛泽东与人类世界、与我国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有机联系。在这些“超级明星”杰出“表演”的感染下，每一个炎黄子孙都会为自己是毛泽东的骨肉同胞而热血沸腾。可是谁会相信摄制组并没有飞向海外，没花巨额美元，没住高级宾馆，而是在祖国大地上，只用了三天时间就采访到了这么多的风云人物呢？

1993年5月初，摄制组捕捉到一个意外的好消息——由世界上三十多位退休的国家领导人组成的国际行动理事会将于12日在上海召开第十一届会议。一大批外国要人云集上海，这对急于采访国际人士而苦于无法周游列国的摄制组来说，无疑

是天赐良机。一个十五人组成的采访组于会议前一天兴冲冲地赶往代表下榻的上海新锦江饭店。不料会议规定不接受任何与会无关的采访，虽经多方联系，均告爱莫能助。

会期只有三天，活动安排紧凑。时不我待，采访组拿到了一份会议日程表，掐分算秒，决定抓住空档，突击采访。大家从早到晚扛着摄像机、提着设备守在饭店大厅里，每天十七八个小时，时刻保持“一级战备”。

第一天上午，代表们到浦东开发区参观。尾随其后的采访组认出了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展览室里，摄制组的女翻译寻机凑上前去说明来意，没料到特鲁多一听说要谈毛泽东竟欣然应允。采访组抓空在楼道里采访了他，接着又乘机采访了英国前首相卡拉汉和尼泊尔前首相比斯塔。

第二天，采访组想方设法做通了会议的一位外国新闻官的工作，在他的帮助下，一天竟然采访到了十来位代表。晚上，代表们游览黄浦江去了。机警的采访组发现了在大厅里徜徉的匈牙利前总理福克·耶诺。机不可失，镜头立即对准了他。原来此翁竟是采访组所不掌握的第七位见过毛泽东的外国前领导人。福克·耶诺谈起了1957年他在莫斯科听到的毛泽东所说的那段话：不要全盘否定斯大林。斯大林的建议有对有错，不能唯命是从。他的好意见我们采纳了，错误的我们摒弃了。听了福克·耶诺的一番介绍，大家又高兴又后怕，如果稍一疏忽，这么精彩的一幕岂不是失之交臂了！

起初，摄制组内定采访到六位代表就是极大成功，而采访组紧追不舍，见缝插针，三天突击采访了十七位外国要人。

摄制组注视着生活，搜寻着信息。全组同志以超常的负荷慷慨地支出自己，以克己的精神吝啬地支出费用。为了节省时间，

节省开支，不少同志很少吃过一顿像样的饭，一些人自己掏钱胡乱买些东西充饥。摄制组先后采访了二十来位外国人，连同差旅费在内，一共才花费不到三万元。他们摄制十二集片子共支出二百多万元人民币，而日本 NHK 来华拍摄两集关于毛泽东的专题片，却投入了一百多万美元。

人生的价值在于创造，在于为社会留下一份财富，它需要创造者付出辛苦和牺牲。《毛泽东》摄制组以献身精神在创造作品的同时，也塑造了自己

艺术和历史的生命都在于真实。为了真实，摄制组追随着毛泽东的足迹和思想，实践着艺术和历史的长途跋涉。

观众们也许还清晰地记得这个令人热泪盈眶的镜头——1973年“十大”召开的时候，毛泽东已患肺心病，还曾休克过。开幕式结束时，他在掌声中站了十来分钟后就坐到了椅子上，他累得无法移步却又朗声向代表们说：“你们不走，我也不好走。”在周恩来的疏导下，代表们边鼓掌边向门口倒退着流去。

为了这短短的一分钟镜头，从软缠硬磨借胶片资料，把胶片转成磁带，到反复看带子，从一大堆散乱的资料中大海捞针，找到这段有同期声的感人画面，资料员阴建白和编导褚嘉骅花费了好几天时间，默默地付出了辛勤的幕后劳动。连吴旭君看了片子之后也禁不住叹道：“你们这些人真行！毛主席又活了！”

毛泽东从巍峨群山、崎岖小径开始，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光辉大道。摄制组的三个采访组的同志们，有谁没跋山涉水，把脚印写在如今已人迹罕至的羊肠小径上？

为了探寻毛泽东一生中大大小小沉浮起落的来龙去脉，展

示他探索革命的“曲折之路”(《毛泽东》第三集),编导王益平率领他的小组穿行在湘赣闽黔的崇山峻岭之中。他们找到了当年毛泽东遭排斥在上杭县苏家坡居住的山洞,从而创下了一项全国纪录——省级以上电视台第一个走进这偏远的地方。

为了追求艺术的质朴感染力,音乐音响总设计包布和奔走在黄土高原,找到了陕北歌王贺玉堂,让《毛泽东》的片头回荡起歌王吼出的那一曲撼人心扉的“东方红……”;编导陈荻芳从毛泽东的上千幅照片中精选了二十几幅,拍摄了五六次,终于以一幅幅原本静止的照片使片尾流动起毛泽东的生命史。

成功的艺术同成功的历史一样,都需要创造者以牺牲精神作代价。

采访组赶赴外地采访期间,正值盛夏酷暑。车里闷热,外边灼热。屋里拍摄,摄影灯烘人;屋外拍摄,阳光烤人。同志们肩扛十来公斤重的摄像机,身穿装着四五块电池的摄影背心,拍一阵儿,圆领衫和短裤就可以拧出水来。采访组几乎每两三天就要转一个外景点,澡没空洗,头没法理,不少人腮瘪眼胖头发长,活像是刚放出来的“囚犯”。在强行军式的采访中,有谁没病过?中暑、发烧咬着牙干,病重的留在当地打点滴,其余的继续挺进。随组工作的顾问们深情地说:“这些人是真正合格的文艺工作者!”徐涛、吴旭君心疼了,每天晚上在采访组看录像带回放时,挨个儿给这些“拚命三郎”们看病、检查身体;回到北京,还买了药品送给他们、写信嘱咐他们要保护身体。

在后期制作的两个月中,编辑人员扎进工作室,粘在剪接台。编导华越为了选好片子的素材和结构,边编片子边学毛选,困了,倒在堆满带子的小床上闭闭眼,饿了,吃上几口方便面。所有的同志都像他一样忘我地日夜奋战。音乐编辑宋力累得竟晕

倒在工作台前，大家忘记了节假日，顾不上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家在外地的制片顾建培长期盯在摄制组，过家门而不入，直到片子播完之后才匆匆赶回家去过新年……

然而他们所付出的还不只是体力和精力的牺牲，他们也真的经历过生与死的考验。

7月初，一个采访组在黄洋界完成拍摄任务后，驱车下山向井冈山市驶去。市区在望时，刹车突然失灵。一边是峭壁，一边是悬崖。汽车翘翘翘地向山下冲去，车上二十个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汪恒和赵立信急忙安抚受惊的人们并暗自盘算：万不得已就刮山强行停车，可是……说来也怪，汽车一路无闸滑行，竟然没有遇上一辆车、一个人，滑到市里时，刹车忽然又灵了。同志们风趣地说，这是毛主席保佑大家大难不死，保佑片子拍摄成功。

在八个月的没有硝烟的战斗中，摄制组献给社会、献给人民的，是太多太多了。他们献给社会七百盘两万一千分钟的素材带，十二集六百分钟的大型电视纪录片；他们献给人民一个一生为人民，直到晚年还在与疾病和衰老作斗争，临终前几小时还在过问日本三木派竞选情况的真实伟人毛泽东。摄制组得到的，却是太少太少了。难怪很多观众、很多老同志大声疾呼：《毛泽东》摄制组也是冠军，也要给他们扬名，给他们重奖！可是摄制组的同志们却十分动情地说：“我们的收获太大了！毛泽东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教会了我们怎么做人的；通过拍片，我们在政治和艺术上更加成熟了！”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毛泽东》已经成为历史。如今，这些成熟的艺术工作者们又在酝酿新的巨大策划，又要走向更加艰难的探索 and 创造。下一个，他们奉献给社会和人民

的,将会是什么呢?

(原载1994年3月4日《人民日报》,作者系该报记者)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大型电视纪录片《毛泽东》精彩内幕

邵 燕 君

“国家队”着手权威制作

1949年，毛泽东进住北京前夕，曾在京郊的香山双清别墅小住。四十四年后，一支阵容强大的摄制组又开进此地，赶拍大型电视纪录片《毛泽东》。摄制组一位负责人士风趣地说：“以这样大的规模拍摄毛泽东，也许是空前绝后。我们得拿出对得起历史和人民的片子来。所以，特选此地‘起事’，以求他老人家的‘神助’。”

随着毛泽东百年诞辰的临近，国内外多家电视台都在竞拍有关纪录片。日本的NHK等早已派出“重兵”，国内的北京、湖南、湖北、四川等地方电视台也都各显身手。中央电视台摄制组堪称其中的“国家队”，它是中央电视台奉中央关于“隆重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的精神，抽调“尖子”组建的，中央文献研究室、武警总部和中国电影资料馆等单位也给予了大力协助。中央电视台投资二百万元人民币，拍摄这部十二集的系列片。届时，它将作为国家级纪念活动之一，在黄金时间播出。

突击采访外国政要

毛泽东是一个改变历史进程的人物，要拍有关他的大型纪

录片，如只在国内的圈子里转，而不走出去听听世界范围的评论，显然有失全面和公允。据称，与中央电视台竞争最激烈且财力雄厚的日本 NHK 电视台就早已派人遍访曾与毛泽东有过密切接触的各国政治人物，而这对于中央电视台来说，无论从财力上还是从时间上都是不可能的。

恰似真有神助。自从摄制组成立的那一天起，他们所要采访的人就频频“飞”来。头天刚念叨尼克松，第二天就在新闻里听到：“尼克松今日到京。”这边刚说如果李政道来了就好了，第二天李政道果真来了，并且在京停留三天。

最奇的是，恰在此时，第十一届国际行动理事会在上海召开，许多毛泽东的“旧相识”云集于此。摄制组刚一听到这个消息，便星夜飞往上海。

一连几天，他们守在会议人员的下榻地——上海新锦江宾馆的会议室外，俟机而动。后来，他们“打通”了大会的新闻官。一提起这位原南斯拉夫籍的新闻官，摄制组的人就赞不绝口：“这哥们真够意思！我们想采访谁，这位新闻官便把谁从会议现场请出来，而且，还不告诉人家是谈毛泽东的问题，只说中国中央电视台希望采访。最后干脆问我们：‘×××人就在，你们要不要采访他？’”

政治家们如是说

短短三天之内，他们采访了包括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法国前总统德斯坦、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日本前首相福田赳夫、赞比亚前总统卡翁达在内的十七位外国原政治首脑。他们对毛泽东发表了精彩的评论并谈到一些有趣的往事。

基辛格共见过毛泽东五次，对毛泽东的性格有着深刻的印

象,他说:“毛泽东是一个具有极高的权力和格外的睿智的人,他有很强的活力来控制谈话,在外交事务上很有见解,即使在1975年他的健康状况已很不好时,才智仍没有受到影响。”

摄制组向他问起:“1975年毛泽东会见您和您的夫人,当看到您夫人时脸上露出了有趣的表情,这是怎么回事?”

基辛格不禁笑了:“他觉得有趣是因为看到我妻子比我高,问我‘对比男人还高的女人有什么感觉’。”

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在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曾发表一篇声明,称毛泽东是20世纪最伟大的领袖之一。当被问到“您是否现在还这样认为”时,他回答说:“是的,历史证明毛泽东是一个伟人,因为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毛都能把自己的理想付诸行动,并且明白中国人民需要鼓舞,需要领导,这就是伟人的特征。”

其他一些政治家也发表了相当精彩的评论,这里恕不一一透露。这些评论将以大视野、高角度评估毛泽东这位中华民族的伟人在世界大背景中的位置。

聚焦毛泽东身边人物

毛泽东有一张头戴八角帽的照片,多年来一直被认为是在开中共七大时拍的。纪录片《毛泽东》将首次“匡正”它的真正出处——原来,它是斯诺在延安给毛泽东拍摄的,斯诺在按下快门前突然“灵机一动”,把自己的八角帽摘下来给毛泽东戴上。摄制组用这种几近刻板的考证方式,努力为观众提供一个“准确认识毛泽东”的渠道。

从上海回来后,摄制组兵分三路,遍访大江南北,几乎走访了所有他们能找到的“历史性”人物,他们或是曾在毛泽东身边

生活、工作过，或与毛泽东在特殊时期有过深入接触，从他们那里，摄制组挖出一批鲜为人知的新史料。

尤其是他们找到的几位年近百岁的毛泽东的“故交”：李淑一、罗章龙、易礼容等最为引人注目。

另外，曾在井冈山作为士兵委员会代表的陈士榘和曾在遵义会议上做过李德的翻译的伍修权，也将以他们亲身经历重现那段历史的真实情景。五位毛泽东生前的身边工作人员徐涛、吴旭君、王宇清、周福明、吴连登还随同摄制组千里跋涉，亲临毛泽东当年生活现场拍摄。

毛泽东的一生是极富浪漫传奇色彩的一生。系列片的第十一集《领袖家风》，专门反映毛泽东的家庭生活，他的两位前妻——杨开慧和贺子珍将在片中有不同形式的展现。一直很少接受采访的李敏、李讷也将出镜。

历史要不要回避？

这个问题是摄制组无时无刻不遇到的，尤其是对“文革”时期这样一些敏感的区域。虽然，对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中央曾做出过决议，但决议毕竟不能代替一部大型纪录片。

在此片中，中央电视台摄制组采取了一种颇具创造性的结构方式，即打破编年史的惯例，把重大历史事件放到专题背景中，突出毛泽东的个性特征。为什么在本世纪初东方会出了个毛泽东？是什么因素使毛泽东获得历史性的成功？曾被视若“神明”的毛泽东究竟是怎样一个人？这个影片分三个部分，每部分四集，对上述问题作出翔实且具有新意的回答。

关于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問題，将集中在系列片的最后一集——《晚年岁月》里。据摄制组负责人士透露，他们将提醒观众注

意一些一直被忽略的细节：如毛泽东在“文革”期间每次接见红卫兵时，常是双眉紧皱。通过对这类细微之处的透视，帮助观众去窥测毛泽东晚年深邃而孤独的内心。

除了采访外国政治家、毛泽东身边人物，摄制组发起的“第三轮冲锋”，是采访尚健在的我国政界的高级人士。目前，摄制组已采访了薄一波、宋任穷和黄华。他们还有更大的“野心”，去触及一些更为敏感的人物。

抗拒媚俗及盲目怀旧潮

近年来，大陆民众中逐渐涌起一股怀恋毛泽东的热潮。人们仿佛又置身于一派“红色海洋”之中。如果说前两年流行的《红太阳》盒带还以某种摇滚的唱法反映了当代人对那一段独特历史的一种心态的话，10月1日、2日在北京首都体育馆隆重举行的“毛泽东颂歌”大型演唱会则是不折不扣的“历史回声”了。

如果说汽车司机每人在座前悬挂一个毛泽东画像还是出于一种朴素的祈福消灾的心理的话，“永不再版”并公开拍卖的毛泽东金银质纪念章，则渗透了制作者精明的商业目光。

毛泽东可能会相信，十七年后，他仍会被人民齐声歌颂，但恐怕不会料到，他的头上竟会闪耀出另一重含义的金光。

有人担心，新一轮“毛泽东热”的兴起，可能会引起“左”的思潮，而且，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商家对利润的追逐与买主对财富的炫耀相结合，再加上一股怀旧情绪，会使任何一种理性的思考难以立足生根，从而使对毛泽东的纪念流于媚俗。

对此，《毛泽东》摄制组早有警觉。据总撰稿人和执行总导演等负责人士介绍：这部片子的一大特点便是参加人数最多、赞助单位最少，它将以材料的准确性、论点的权威性和制作的非赢利

性来抗拒来势汹汹的媚俗浪潮。

该片力图阐明：从毛泽东时代过渡到邓小平的时代是一个自然的延续过程。片中通过中外一些知情人士提供的材料显示出，毛泽东在晚年做的一些事为今天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如他在1970年国庆节时邀斯诺与其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率先向美国作出友好表示，从而打开西方的大门；他还多次肯定邓小平的才干，1975年重新起用邓小平，使权力最终未落入“四人帮”手中……而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时期所运用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等思想原则，也正是毛泽东思想中的精华部分。

在“百年诞辰”这样一个“空前绝后”的时机中，摄制组日益感受到他们肩负着一个不容推卸的历史责任，即作为一部“国家队”的“权威之作”，《毛泽东》不能只在那个“普天同庆”的时刻满足人们的怀旧情绪，它还必须起到“导向性”作用。使人们看过片子后，能引发一些新的思考。通过对毛泽东的再认识，对中国革命的再认识，重新审视中国和中国革命走过的历程，使该记住的永远铭刻在心，使不该发生的永远不再发生。

目前，该片已进入后期制作，摄制组对已剪接出的几集感到十分满意。现在，他们已进入“倒数计时”阶段，确保该片在毛泽东百年诞辰的正日子隆重推出。

（原载1993年10月16日《解放军报》）

留下一代人的思考

——大型电视纪录片《毛泽东》拍摄前后

赖仁琼

在毛泽东诞辰百年之际，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大型电视纪录片《毛泽东》，以全新的纪实手法、翔实的史料、生动的细节，展示了伟人的风采和人格魅力，在同类题材的影视作品中独领风骚，倾倒了无数电视观众，给人们留下难以忘怀的记忆。

中国第一部伟人传记片是如何拍成的呢？看过电视片的人们或许更想知道荧屏下的故事……

被杨伟光称为“国家队”的摄制组有一百多名创作人员。在三十多名主创人员中，八成是军人。

1991年春节刚过，大型纪录片《望长城》研讨会在京举行。听到与会者的一片赞誉，该片的总编导刘效礼却坐不住了，他在琢磨：下一部拍什么？

大校军官刘效礼，干电视已有二十七八年。他拍的《干枝梅》、《说凤阳》、《让历史告诉未来》以及《望长城》等屡屡获奖并深得各界好评。但这位每次获奖后都要“把自己打倒”的山东汉子，从不满足于“上一部”的成功，而总是把目光紧紧盯住“下一部”。那些日子，刘效礼每每想起1993年毛泽东百年诞辰，心中便涌起一股拍摄这位伟人的难以遏制的冲动。

“咱们拍毛泽东，如何？”刘效礼把考虑已久的打算试探性地告诉军事部的汪恒，没想到汪恒也一下子兴奋起来：“拍毛泽东？”刘效礼点点头：“两年后即是毛泽东百年诞辰，机会实在难得。等到老人家诞辰两百周年时，我们这代人都不在了。”少顷，他连珠炮似地说：“我们不拍谁拍？现在不拍，何时再拍？”

几番“密谋”，刘效礼把汪恒等人的情绪都给“煽动”起来了。于是，一个报告打到台里。但因种种原因，这个报告被搁置下来。

虽然报告未获批准，但刘效礼却一直在为之努力。1993年2月的一天，刘效礼十分兴奋地告诉汪恒：“批了，拍摄任务交给咱们了！”

兴奋、激动之余，刘效礼他们又犯开了愁：中国电视界从未拍过伟人传记片，如何拍好，没有把握。加之时间紧，要完成这部大型纪录片，真是困难重重。

台长杨伟光对接受任务后的刘效礼说：“现在国内多家同行都在拍同类题材的片子，你们是‘国家队’，拍出的作品应该高人一筹，具有权威性。”

雄心勃勃的刘效礼与台长的想法不谋而合。很快，一批在电视纪录片创作队伍中被称为“大腕”的人物云集摄制组。庞大的创作班子有一百多人，而三十多名主创人员中，八成是军人。刘效礼多次对汪恒说：“我们要搞一部非常大气的作品，使它成为反映毛泽东一生的最准确、最权威的电视纪录片。这样，既对得起逝去的伟人，也对得起历史和人民。”

为了总体把握伟人一生史料的准确，刘效礼和汪恒几次前往中央文献研究室，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十七年之久的逢先知等人，给予摄制组热情的支持。文献研究室不但同意提供所需的大量资料，而且专门派出三人分别跟随三个摄制小队协助拍摄。

以后，这三人成了摄制组的“活字典”。

4月下旬，全体创作人员聚首北京香山饭店，经过热烈而又激烈的讨论，全片的总体结构、创作风格以及日程、分工等基本确定。此时，颇具大将风度的总编导刘效礼已成竹在胸，极善用兵的他一面给摄制组打气，一面却又不断“加压”，以至会没开完，一帮人已按捺不住创作的激情，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二十九岁的华越领受了两集拍摄任务。他说：“怎样拍毛泽东？一开始我茫然不知所措。”

毛泽东逝世那年，华越刚上小学三年级。如今，领受了第六、第八两集拍摄任务后，二十九岁的华越不知从何入手。他说：“怎样拍毛泽东？一开始我真是茫然不知所措。”

广播学院毕业的华越虽然受过系统的专业教育，但对于毛泽东和毛泽东的外交、统战思想的了解却十分有限。想到摄制组提出的口号：“拍摄《毛泽东》，学习毛泽东。”他灵机一动，找来毛选，平生第一次认认真真地拜读了老人家有关统战、外交方面的论述，结果受益匪浅。

同事们善意地调侃华越关在机房里读毛选，不过他的拍摄提纲的确是从毛选中得来。“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华越反复咀嚼着毛泽东的这句话，一遍一遍地琢磨，领会其深刻含义。

翻阅资料、大量读书和深入采访，使华越受到心灵的洗礼。他逐渐走近了这位拍摄对象，也熟悉了他所处的时代。“要了解一个人，光凭道听途说或看几本小册子哪行？”华越说：“更何况自己和摄制组面对的是一位已经逝世十七年的伟人呢。”

拍摄毛泽东时，尽管华越他们的目光是平视而非仰视或俯视，但在与众多被采访者深入交谈时，华越仍感自己的心灵一次次被震撼。文学家冯牧讲述自己在“文革”中多次挨批斗的经历后说：“虽然历经磨难，但我并不怨恨毛泽东。今天，我仍十分真切地怀念他。”华越由此感到，毛泽东的人格魅力至今还影响着许多人。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华越和他的小组在最热的季节跑到最热的南方拍摄。沿着伟人当年的足迹，他们拍得很苦。在贵州、重庆时，两个摄像相继病倒，华越自己扛起机器拍了一天，也累病了。三个月下来，他们拍了一百七十盘资料。刚进摄制组时，华越的体重是六十八公斤，片子拍到一半，剩下不到六十公斤。从西藏回来时，大家都心疼地说他只剩两只眼睛了。

虽然大学毕业后才穿上军装，但华越自小生长在军人家庭，也算得上是条硬汉。接下来制作又是三个月。家在北京的他多数时间却吃在机房，睡在机房。开始，还能拥被而卧，后来，行军床上堆的带子越来越多，困极了，他往那些带子上一倒便呼呼大睡。事后有人问他咯不咯？华越笑笑：“忙得整宿睡不着，好不容易有点空，哪还管得了那么多？”

“感动观众的地方，首先感动了我们。”华越说，编吴旭君讲述毛泽东1972年会见尼克松那段片子时，他在机房流泪了。会见前一个月，毛泽东曾经休克，出于健康的考虑，这次会见原定十五分钟。担任保健的医务人员为防万一，将强心剂抽进针管备用。最后，毛泽东与尼克松交谈长达六十五分钟……

华越和他的小组拍摄的《大海纳百川》和《放眼世界》两集颇得同仁好评。他真诚地说：“不管怎样，算是给历史留下我们这代人对毛泽东的认识和思考。”

未出国门，摄制组竟幸运地采访到十七位已卸任的外国首脑。

毛泽东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在纪念他诞辰一百周年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世界当然格外关注中国人如何看待和评价这位中华民族的巨人，而中国也同样关心世界怎样看待和评价这位共和国的缔造者、领导者。

拟定计划时，摄制组曾打算出国采访几位与毛泽东同时代的风云人物，特别是与毛泽东有过交往的政治家。但一想到经费和时间，只好作罢。

一天早上，汪恒从收音机里听到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访华的消息，心里顿生一计。他找到刘效礼，如此这般细细道来，刘效礼一面点头称是，一面为他补充计划。原来，尼克松访华只有短短六天，如按正常渠道一级级报批，恐怕尼克松离开中国时手续也办不完。为了抢时间，他们一面打报告申请，一面则通过台里的时政记者在拍摄“乔石会见尼克松”新闻时，将采访意图传递给尼克松本人。没想到，尼克松说实在太疲劳了，无法接受采访。到了上海，尼克松才欣然同意接受采访，并约定了时间、地点。

于是，中央电视台领导出面与上海电视台联系，请他们协助，使此次采访顺利完成。

初战告捷，正当摄制组欣喜之际，又听到一个好消息：第十一届国际行动理事会即将在上海召开会议。经了解，与会者有七位见过毛泽东，如能采访，真是天赐良机。

国际行动理事会是一个由三十多位已卸任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组成的非政府性的国际组织，会议主题虽与摄制组的采

访无关,但却是一次采访风云人物的极好时机。于是,摄制组立即派人飞往上海联系,大部队则留在北京进行采访前的准备。

创作人员夜以继日地调看毛泽东会见这些风云人物的影像资料、文字记录和他们发表过的有关评价毛泽东的文章,并有针对性地拟定采访提纲。

会前两天,十五人的采访队伍开到了上海。但“先头部队”却出师不利,外交部新闻司的同志告诉摄制组,虽然他们支持这次采访,但因会期很短,安排很紧,与会者又都是上了岁数的大人物,加之外交部不是会议组织单位,无权出面联系与会议内容无关的采访。

真可谓“天下事难不倒共产党员”。带队的汪恒又想出新招。

根据会议日程,摄制组做出了周密的安排。他们充分发挥各自的公关才能,利用一切空档,想方设法接近这些大人物。或许为他们的诚意所打动,或许因为他们的话题是关于毛泽东,会议第一天,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尼泊尔前首相比斯塔、英国前首相卡拉汉先后接受了他们的采访。

没想到第二天出现了奇迹。汪恒他们带去的几名女翻译“疏通”了会议的新闻官。这位前南斯拉夫籍的西方人十分热情,答应帮助联系采访。

尽管我们的女翻译不习惯接受新闻官的吻礼,而她们身后的编导、摄像更有些不舒服,但每次吻礼之后,新闻官总能给他们带来好消息。于是,一种特殊的情况出现了:会议正在进行,代表们却一个个被新闻官请出来接受采访。有时候,新闻官还带他们走进会议室进行突然采访。

新闻官的协助令摄制组欣喜不已,而风云人物对毛泽东的评价更令他们惊奇:“毛泽东是人类思想的灯塔!”法国前总统德

斯坦讲述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1974年初，法国现任总统蓬皮杜病重，谁将担任总统？世人颇多猜测。这时，远在中国的毛泽东对访华的一位非洲元首说：“我知道下届法国总统是谁……是德斯坦先生。”非洲元首听后非常吃惊，而更吃惊的是德斯坦本人。当时他还很年轻，名气也不大，却果真当选为总统。毛泽东对法国政治的了解和非凡的洞察力、判断力，令德斯坦钦佩不已！

采访基辛格时，有记者想起资料片上毛泽东会见他时一个有趣的表情，便问基辛格：“1975年，毛泽东接见您和您夫人时，好像对您俩之间的什么问题很感兴趣？”基辛格想了想说：“毛泽东见我妻子比我高时，便笑着问我‘对比男人还高的女人有什么感觉？’”

在上海新锦江饭店，那几天从早到晚都能看见汪恒带领的十几个人或在会议室门口焦急等待，或在大厅紧张拍摄，每天忙碌十七八个小时，采访进行得异常顺利。三天会期结束，他们一统计，好家伙，接受采访的大人物竟然多达十七位！

摄制组兵分三路，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共采访二百六十七人。12月13日开播，当天上午，摄制组的采访仍在进行；最后的修改，持续到开播前两小时。

《毛泽东》从去年5月开机到12月播出，八个月拍十二集，工作量之大不难想见。吃苦受累他们不怕，最难的是对散居全国各地的有关人士特别是敏感人物的采访。

拟定的采访人物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与毛泽东有交往的人，如曾是毛泽东的同学、一同参加新民学会、现已九十七岁高

龄的罗章龙，曾与毛泽东一起组织领导了湖南泥木工人罢工运动，现已九十六岁的易礼容，杨开慧的朋友、九十三岁的李淑一等；二是与毛泽东一起打天下或长期共事的党政军领导；三是与毛泽东交往较深的一些民主人士，包括原国民党的一些高级将领；四是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同志和毛泽东的子女、亲属。

实施以上采访计划，摄制组没少碰壁或遭冷遇。但他们并不灰心丧气，而是通过各种渠道做工作。毛泽东的子女亲属中，有的身体不好，多年闭门谢客。摄制组被拒绝后，仍与他们保持联系，最后终于接受采访，使观众得以从荧屏上看到他们的身影。

攻下一道道难关，获得一条条珍闻。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说，有些史料连他们都是头一次听说。由此可见，从那些八九十岁的长者那里“抢救”出的史料是极有价值的。尽管有的采访耗费了数倍的时间，但摄制组同仁都毫无怨言，有的人物采访经多次联系才得以完成。直到12月13日开播的当天上午，他们对原国民党将军张治中的秘书余湛邦先生的采访仍在进行。

三个月的外拍使摄制组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当年毛泽东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至今环境、条件仍较艰苦。六、七、八月正值南方高温，在湖南、湖北、江西、四川、贵州、福建等地，摄影师在高温下扛着机器连续拍摄，挥汗如雨，衣服裤子都能拧出水来。

7月初，汪恒与一个小组在湖南拍摄。他们与另一个小组通话时，得知录音员病倒，全组正在为走还是留犯愁。汪恒当即告诉组长：将生病的留在井冈山，其余人继续前进，待他们到井冈山后再将病人接走。

谁知就在从湖南赶往井冈山的途中，汪恒一行险些遇难。摄制组原计划一天到达，那天起了个大早。从湖南租的大客车中途抛锚耽误了时间，只好留住在茶陵县。当地人说：“毛泽东当年重

上井冈山时也是一天到不了才住在了茶陵，你们也别想一天就上井冈山。”第二天，汪恒一行中午在黄洋界拍摄完后，即乘车驶向井冈山市。岂料快到市区时，刹车突然失灵，汽车沿山路向山底冲去，慌乱中大家不知所措。还好，路上没人没车，司机处惊不乱，约一分钟后，汽车冲进了市区，总算平安到达目的地。饭桌上，几位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此次出来陪同拍摄的老同志频频举杯，庆贺同车人大难不死。

8月底，三路人马平安返京后，马上投入紧张的后期制作，前期的创作提纲曾做四次大的修改，后期的编辑数不清改了多少次。编导们严格地考证，反复调整片子结构，修改解说词和同期声。从9月初就连续加班，三个机房不够用，台长杨伟光又特批一个。大家没有星期天、节假日，不分白天黑夜地泡在机房，以至几位体质较弱的女士几次在机房晕倒。

家住北京的也不能常回去。汪恒的妻子是个护士，轮到值夜班，就将四岁的儿子送到电视台。去得多了，小宝贝成了大伙儿的“开心果”。一天，他突然问汪恒：“爸爸，为什么叔叔阿姨都叫你汪导，叫我小制片呢？”稚气的话音刚落，剧组里响起一片开心的大笑。

按规定，片子应在播出前二十四小时入库。但编导们追求完美、真实、准确、权威，第一集播出时间是12月13日20点10分，当天下午仍在修改。直到下午6点多才送到播出线。

逢先知说：“第十二集通过了，我最担心的事可以放心了！”

拍毛泽东的晚年即第十二集是全片难中之难。开始，一些曾

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同志主张不拍。但拍一部伟人传记片，怎能不向观众交待他的晚年呢？

该集的编导褚嘉骅领受任务后也感到压力很大。他一头钻进档案和影像资料堆，就像一个深山找矿者，从那些尘封的文字记录和原始资料带中，发现了不少极为生动而又鲜为人知的细节。经过深入地采访、挖掘，主题渐渐鲜明起来。

“晚年毛泽东处在雄心不已与肌体衰老的矛盾之中。”褚嘉骅说，之所以用毛泽东会见李政道、十大开幕式、眼睛手术、毛泽东与林彪最后一张照片等细节，而只将“文革”、“九·一三”等重大事件做为背景交待，就是为了表现这一主题，从而反映出毛泽东的生死观、人生观。

既然毛泽东不是神而是人，就必然会经历衰老这一人的自然生理过程。吴旭君曾担任毛泽东的护士长，她讲述十大开幕式结束时毛泽东无法退场的细节，引起褚嘉骅的极大兴趣。吴旭君说，出席会议前她与主席约法三章：一、不吸烟，二、不站起来，三、烟瘾犯了实在忍不住时，可以把烟拿出来闻闻。褚嘉骅进一步追问：为什么约法三章呢？吴旭君说，主席早就有肺心病，怕他出席会议时出现呼吸困难，便在大会堂主席台就坐的前方供氧。有氧气当然不能划火柴，所以作出了这些规定。

吴旭君还告诉褚嘉骅，主席当时已经站不起来了，但不服老的他又不愿让更多的人看见自己要靠别人帮助才能站起来。于是，会议安排代表退场后主席再走。褚嘉骅很想用这段资料，但他在调看十大的资料片时，却没有发现吴旭君讲的这些场面。原因当然很简单：此片是经过剪辑、审查的。怎么办？褚嘉骅找到资料员阴建白。小阴告诉他，原始带已封存，要动，必须经过有关领导批准。

功夫不负有心人。几经周折，褚嘉骅终于看到了非常精彩的原始带。代表们长达十分钟鼓掌，毛泽东说：“你们不走，我也不好走啊！”全都真实地纪录在上面。褚嘉骅如获至宝，十分庆幸这段珍贵的镜头得以重现。

薄一波曾对摄制组说：“你们拍毛泽东的晚年，不要忘了他始终关心经济建设。”褚嘉骅在查阅有关会议档案时发现，毛泽东多次支持邓小平与江青等人对着干。原来，那些会议都是研究经济问题的。

毛泽东晚年曾对华国锋、张玉凤、王海容等人谈及自己的一生。他说“我一生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件事是把蒋介石赶到那么几个小岛上去了。第二件事就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但这件事赞成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褚嘉骅在片中用了这段以前未曾公开披露的谈话，人们自然可以从中品味伟人晚年的复杂心态。

褚嘉骅和他的摄制组最早拿出样片送审。他们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如果通不过，再改也来得及。”薄老等来电视台审片时，提出只看最后一集。同行和有关领导看片后，都认为不错，故最后一集被最先通过。逢先知看完后说：“拍得不错，这集通过了，我最担心的事可以放心了。”此时，褚嘉骅和摄制组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审片通过那天晚上，总编导刘效礼吃了两片舒乐安定还是彻夜未眠。他长长地喘了口气说：“片子拍完，总算干了一件事，还了一个愿。”

《毛泽东》在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黄金时间播出后，覆盖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第四套节目和香港亚视、美洲东方卫视

也先后播放此片，观众反响十分强烈，许多人写信打电话给电视台，向摄制组人员致谢。

在1994年1月7日的研讨会上，专家学者对该片给予极高的评价。有专家说，《毛泽东》构思巧、立意高、角度新，善于利用史料，充分调动声像艺术手段，使观众从荧屏上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充满人格魅力的毛泽东。还有专家认为，《毛泽东》是同类题材影视作品中最好的一部，可以代表目前中国电视纪录片的最高峰……

有位专家从分析总编导刘效礼的创作道路入手，将他的创作风格演变分为三个阶段，即以《干枝梅》、《让历史告诉未来》为代表作的第一阶段，特点是解说词充满激情；以《望长城》为标志的第二阶段，特点是大量即兴采访，拍得很随意，很自然；第三阶段就是《毛泽东》，既非《让历史告诉未来》那样庄严，也非《望长城》那样随意，而是综合了两片的优点，避免了两片的缺陷与不足。这位专家甚至认为，多拍《毛泽东》这样的片子，中国电视与国际接轨就大有希望。

作品能得到观众的喜爱和专家的好评，刘效礼又激动又不安。他知道，片子的成功，既是摄制组一百多人的心血结晶，也是众多老同志及各界人士支持、帮助的结果，个人的作用毕竟十分有限。去年，在中央电视台建台三十五周年之际，刘效礼奉命撰写一篇纪念文章，忆及个人成长经历，1966年从部队被选拔到北京的情景又一次浮现在眼前。他充满感激地写道：“一个从未看过电视的人一下子搞了电视，如果没有电视台历届领导的放手使用与培养，如果没有电视台许多老同志的真诚指点与帮助，如果没有我的同事们的全力支持与合作，单凭我一双舞枪弄炮打球的手，或者说单凭自己的一点悟性与灵感，能行吗？”“这奖

那奖,没有他们,我能得什么奖?”“事实上,我就像一个攻城的士兵,是踩着别人的肩膀把红旗插上城头的。……这胜利、这荣誉能属于个人吗?”(《荧屏岁月记》第226—227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7月版)

回想《毛泽东》的拍摄过程,刘效礼也颇多感慨。审片通过那天晚上,他吃了两片舒乐安定还是彻夜未眠。他长长地喘口气说:“片子拍完,总算干了件事,还了一个愿。”刘效礼上小学时,民房改成的教室里就挂着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画像。但对毛泽东的认识,却是随着年龄与阅历的增长而逐步深化的。“拍十二集就像对毛泽东做十二次CT。”刘效礼形象地比喻说:“通过毛泽东一生的不同侧面,展示他在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功绩。当然,对他的错误也不回避。”

拍完全片,刘效礼和摄制组人员几乎都成了研究毛泽东的半个专家。他们发现,电视片对毛泽东的认识和评价,竟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完全相符。这些原本对毛泽东这位共和国的缔造者怀有一种特殊感情的人如今又多了一份社会责任感,刘效礼说:“希望中小學生都能看看这部片子,有的追星族表示追这星那星,可别忘了我们中国人民的大教星!”为此,中央电视台准备将这部有史料价值的文献片制成激光视盘,以永久保存代代相传。

刘效礼的“下一部”是什么呢?他神秘地笑笑:“拍出来再说!”

(原载1994年2月12日《羊城晚报》)

大型纪录片《毛泽东》的背后

汪 恒

1991年春节刚过，大型电视纪录片《望长城》的研讨会就在北京召开了。也就在这个研讨会上，《望长城》的总导演刘效礼开始考虑下一个要拍摄的重大主题，他想到了两年之后就要来临的毛泽东同志的一百周年诞辰。

刘效礼已经年过半百，但还是那么充满激情。《望长城》研讨会后，他一天也坐不住了，立即向台领导打报告，申请拍摄纪念毛泽东一百周年的大型电视纪录片。拍摄伟人传记片，在中国电视界还不曾有过。也许是因为毛泽东太伟大，留给中国人民的印象太深刻，在创作上全面、正确地把握这一伟大人物太困难。因此，从考虑到具体实施创作经过了一年多的时间。

1993年2月的一天，刘效礼很兴奋地告诉我：拍摄《毛泽东》一片的任务交给我们了！我也兴奋了。刘效礼曾多次同我谈起拍摄《毛泽东》一片的想法，他说：“这是百年不遇的，到毛泽东两百周年诞辰时，我们这一代人都不存在了，所以，我们不拍，谁拍？现在不拍，何时再拍？”我们都是毛泽东时代成长起来的人，对毛主席怀有深厚的感情。虽然毛主席离开我们十多年了，这份感情却一直那么浓烈。

激情往往是创作一部好作品的源泉，参加《毛泽东》一片创作的人员都是充满了激情的。当创作工作一开始，刘效礼就对我

说：“我们要搞一部非常大气的作品，要选一批创作尖子进入摄制组。”于是，一批在电视纪录片创作领域被称为“大腕”的人物汇集毛泽东摄制组，其中主创人员大部分是军人。

我们这一批人汇集一起，大家都很有自信，决心要搞一部最权威的反映毛泽东伟大一生的大型电视纪录片，既要对得起毛泽东他老人家，又要对得起全国人民。为了把握好这次创作，刘效礼和我又几次前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希望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研究组是全国研究毛泽东最权威的机构，这时，他们已经写出了一部十集约十万字的电视纪录片《毛泽东》的脚本。得到他们的支持是这次创作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的要求得到了对方热烈的响应，他们不仅全面配合我们的创作，而且派出三位同志全程参加摄制组的工作。随后，另一个对我们创作十分重要的部门——中国电影资料馆也加盟我们的创作队伍。由于这支创作队伍是以军人为主体的，因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成为这支队伍的坚实后盾。

到了实施阶段，我们首先面临的问题是，这部片子到底怎样拍？于是，4月26日，全体创作人员在北京的香山饭店集中，召开创作研讨会。

会上，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通过讨论，认识不断得到统一和加深，从而完成了以下几项任务：1. 整体结构的确定；2. 创作风格的确定；3. 计划创作日程；4. 创作人员编组分工；5. 研究了资料的搜集和准备工作。会议结束前，中央电视台台长杨伟光来听取汇报，在随后的讲话中他说到：“虽然目前全国有许多家同行在拍摄同类题材的片子，但我们相当于一支‘国家队’，‘国家队’就要拍出‘国家队’的水平。”就从这时算起，我们的创

作仅有不到八个月的时间，而我们的计划之庞大却是以往应该一两年方能完成的。为此，摄制组提出了一个口号：“拍摄《毛泽东》，学习毛泽东”。要像毛泽东当年解放全中国那样，勇于克服一切困难，争取最好的创作效果。

创作时间短，越需要高效率。从我们接受这一创作任务时就为一件事直犯愁，毛泽东是属于中华民族的，也是属于整个世界的。今天的世界在关注中国人是如何看待和评价自己的这位领袖人物，而中国人同样在关心世界将怎样看待和评价我们民族的这位巨人。我们曾经想过出国去采访一批与毛泽东同时代的政治家，但庞大的经费无从解决，时间也不允许，可这又是不能缺少的内容。突然有一天，我从广播里听到一则消息：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来华访问。这则消息还包括另一个细节：“访问为期六天”。太短暂了！如果我们通过正常手续，提出采访申请，恐怕尼克松离开中国时手续才办了一半！为了不失时机，我们一方面立即写出报告，另一方面通过台里的时政记者在拍摄“乔石同志会见尼克松”新闻时，将采访意图传递给尼克松本人。尼克松欣然接受，但提出这两天活动安排得紧，身体有些累，可以考虑到上海时再接受采访。尼克松到上海是他来访的最后一天，也是最后一个机会。很快，我台领导出面同上海电视台联系，请他们协助，将采访完成了。也就在这时，我们得知第十一届国际行动理事会即将在上海召开。于是，一个庞大的采访计划开始酝酿。

国际行动理事会于1983年成立，每年召开一次会议。这是一个由三十多位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组成的非政府性的国际组织。理事会成员就国际形势、和平与安全、世界经济、发展、人口和环境等重要问题交换意见，提出建议和解决方案，以促进国际间的合作。这次在上海召开的第十一届会议，参加者中有七位

曾见过毛泽东,其中包括会议特邀代表基辛格先生。

为了保证这次采访能够完成,我们提前结束了在香山召开的创作研讨会,一部分人先行前往上海进行有关联系工作,其他人则在北京进行准备。为使采访目的性强,出发前,创作人员事先观看了我们要采访的人物与毛泽东会见时的影片资料、文字材料,以及他们所发表的评价毛泽东的文章、声明等,拟定采访提纲。夜以继日,全组人员共同努力,我们十五人的采访队伍终于在会议召开前两天汇集于上海。

当我们与外交部新闻司的同志联系过后,我们的希望似乎有些渺茫。外交部同志告诉我们,他们完全支持我们的工作,但与会者都是上了年岁的大人物,会期又很短,日程非常紧张,能否采访上他们全凭记者的本事了;外交部这次只是协助工作,不是组织会议单位,不好出面联系这种与会议内容无关的采访。也就是说,他们默许我们以自己的方式去完成我们的任务。根据会议的日程,我们做出了周密的计划,利用一切空档时间接近这些大人物。在我们的计划中,这一次能采访到六位与毛泽东见过面的国外著名政治家就是极大的成功,最低限度要采访到两位。为了完成这次采访,我们带了三名翻译(英语、德语、法语),上海电视台还支援了我们一位翻译。

会议第一天,我们的采访就有了突破性进展。也许是因为我们的诚意,更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话题是关于毛泽东的,所以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尼泊尔前首相比斯塔、英国前首相卡拉汉先后回答了我们的提问。到了会议第二天,一个新的机会出现了,使我们的采访更加方便。我们的几位女翻译将会议的一位男性新闻发布官说服了,他是前南斯拉夫籍的西方人,他愿意为我们联系采访。新闻官总是特别热情,并毫不犹豫地对我们的女翻译致

以吻礼。我们的女翻译对这种礼节并不习惯，而她们身后的编导、摄像更有些不舒服。吻礼过后，新闻官总是带给我们一些好消息。于是，一种极特殊的情况出现了：会议正在进行，会议代表却一个个被新闻官请出来接受我们的采访。有时候，新闻官还会引导我们直接走上前去进行突然采访。就在上海著名的五星级的新锦江饭店，那几天从早到晚可以看到中央电视台的十几个人整天守候在大厅和会议室门口。当然，我们的女翻译们也说不清接受了多少吻礼。终于，我们的一位编导也勇敢地冲上去给另一位黄头发、蓝眼睛的女新闻官致以吻礼，对方不仅惊讶，而且兴奋，眼中眨着光。显然，她喜欢这一套，但想不到礼节来自一位中国人。

基辛格博士是在会议的第三天早晨才赶到上海的，下午他就要前往北京。这位国际上十分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依旧是那么忙碌和引人注目。这一次新闻官也为难了，要占用基辛格的一点时间的确不容易。但我们必须采访他，他是开创中美关系新局面的一位重要人物，也是多次会见过毛泽东、对毛泽东很熟悉的人。为此，我们放弃午饭，一直守候在会议室外。上午会议结束时，我们随新闻官进入了会议室，将镜头对准了基辛格。经新闻官商量后，对方表示愿意谈，只是目前没时间。我们继续等待，终于在他要赴机场前采访了他。我们甚至还做好了准备，如果在上海采访不成，便请在北京的摄制组成员想办法在北京完成采访。三天的会议转眼就结束了，我们一算，竟然采访了十七位，首战告捷，大家也极度疲劳。这是一种超常的劳动，每天我们守候在新锦江饭店达十七八个小时。

采访是我们这次创作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需要大量的时间进行联系。在没有特殊联系渠道的条件下，这项工作耗去了创

作人员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毛泽东》一片采访了几百位人物，从5月份正式开拍到12月份播出，采访工作一直在紧张地进行。12月13日，开播的当天上午，我们采访的最后一个人是原国民党将军张治中的秘书余湛邦先生。从5月初我们就开始想办法联系采访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同志（曾参加了井冈山斗争），由于他工作繁忙，一直在基层视察，直到11月中旬我们才完成了采访，历时半年。可以说，《毛泽东》一片中许多采访都是很不容易的。至该片播出为止，由于种种原因，还有许多我们想采访的人采访不到，为该片留下了不少遗憾。总体来说，我们的采访主要是针对以下一些人物：早年与毛泽东有过交往的人，如罗章龙，九十七岁，曾是毛泽东同学，并一同参加了新民学会。易礼容，九十六岁，曾与毛泽东一起领导组织了湖南的泥木工人罢工运动；李淑一，九十三岁，曾是杨开慧的好朋友，等等。第二种是与毛泽东一起打天下的人物，比如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批老将军，其中上将我们就采访了七位。第三种是与毛泽东交往过的民主人士，包括原国民党中的人物。还有就是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同志。毛泽东的亲属自然是我们必需采访的人物，但采访他们一般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其中有些已是多年谢客了，身体又不大好。我们以充分的诚意接近他们，长时间与他们保持联系，终于使他们与观众见面。除此而外，有许多难以表现的内容，我们只好采访有关的研究人员。

外景拍摄是我们这次工作中特别艰苦的工作。当我们一切准备就序，要前往各地拍摄时，正值6、7、8三个月，而大多外拍地是南方。同时，毛泽东早年打游击、从事革命工作的地方都是环境条件较差的地区，这使我们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在湖南、江西、武汉、四川、贵州、闽西等地，我们都赶上了连续高温天气，摄

影师们扛着沉重的设备工作，汗水不住地往下流，衣服裤子湿透，严重时脚下的地面都能湿一小片。中暑的、患病的接连不断，可工作都不能停。也许有人会问：你们是不是太娇气了？其实，原因很简单，我们必须两个多月里完成以往一年的拍摄任务，为此，大家夜以继日，连续奔波，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再硬的汉子也难以抵挡不停的折腾。

7月初，我同一个小组在湖南拍摄，有一天我终于通过长途电话同另一个小组联系上了。他们准备离开井冈山前往下一站，正为一件事犯愁：他们的录音员病倒住院了，到底是走还是等，正举棋不定。时间不等人，我只好告诉他们，其余人先走，把病人留在井冈山。等我们赶往井冈山接病人时，我们却在路上遇到了一次极大的危险。

从湖南到井冈山，我们是沿毛泽东当年走过的路线前往的。我们从湖南租了一辆大客车。本想一天赶到井冈山，起了个大早。不料，中途车出故障，耽误了几个小时，我们只能留住在了茶陵县。当地人说，毛主席当年重上井冈山时也是一天到不了，住在了茶陵，你们也别想一天就上井冈山。第二天中午，我们到达井冈山上的黄洋界，拍摄完后立即下山向井冈山市驶去。快到井冈山市时，大客车突然刹车失灵，向山底冲去。车上顿时乱了，不知所措。一分钟后，车子直接冲进了井冈山市，幸好一路上没人没车，我们才安全到达了目的地。饭桌上，几位同行配合我们工作的、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老同志相互碰杯，庆祝大难不死。

最艰苦的大概要算在贵州遵义附近的赤水河拍摄。烈日炎炎，使两位摄影先后中暑倒下，编导只好自己扛摄像机，结果又病倒。一共六个人的小组病了四人，快要全军覆没了。在另一个

小组，随同拍摄的徐涛（曾任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六十多岁），吴旭君（曾任毛泽东的护士长，六十岁）则随时为摄制组创作人员检查身体。他们深有感触地说：“真想不到你们会如此辛苦！”我们的人则说：“能同毛主席享受一个待遇，实属幸运。”对于摄制组的许多同志来说，拍摄所经之地很多都是第一次去，气候不习惯、水土不服只是小事，他们多希望能有点空上街转转，瞧瞧风土人情，流览一下景色，哪怕是走马观花。可时间太紧迫了，除了工作就是乘车赶路。到头一算，一半以上的时间是在车上颠簸过来的。至于去过的那些地方到底是什么样并不很清楚。但有一点大家记得很清楚，那就是毛主席曾到过那些地方。终于，在8月份即将过去时，我们的三路人马都安全归来了。随后，北京地区的拍摄和航拍又开始了。

为了拍摄好中南海的镜头，我们又做了详细的研究和计划。我们的总摄影赵立信是个为了艺术质量而不厌其烦的人。他曾去中南海拍摄过，但这一次，他又在琢磨新的表现方法。于是，稳定架被抬入了中南海，这是目前全国也只有几台的高级摄像辅助设备，能很稳地拍摄移动镜头，仅租金就每天一千元。为了创作质量，我们不惜代价。从播出的节目中，人们可以看到从丰泽园，经颐年堂到菊香书屋的长长的移动镜头，以及游泳池内的长移动镜头等，都是稳定架上的特殊效果。是人力本身达不到的。

赵立信也是年过半百的人。在前往湖南、北戴河、陕北等地航拍时，他毫不犹豫地上了“运—5”飞机。机上严重的抖动使舱内所有人都难以经受，他们争先恐后地抢桶呕吐。按老赵的话说，这是一生中难以遇到的难过劲，只要能完成好任务，这都无所谓。

后期编辑工作往往是创作成败的关键，也是最耗费创作人

员精力的时候。前期的创作提纲我们曾四次大幅度地修改，后期的编辑我就无法说清是几易其稿了。由于题材重大，严格地考证、查对，反复地调整片子结构，修改解说词和同期声，使创作人员从9月初起就开始了连续加班。几个月里，大家没有休息日，无论黑夜白天，在机房里度日。当我们的第一集12月13日晚上8时10分要播出时，下午还在修改，6点多钟才送到播出线。这以后的几集片子都是这样紧张，不到播出时间，片子仍在修改，创下了大型电视片制作史上的一个纪录。工作最紧张的要算是最后为片子合成音响效果的音乐编辑了，包布和与宁力两人倒着班干。他们的机房有时一天二十四小时难得熄灯。包布和总说，我们蒙古人对毛主席感情太深了，再累也不怕，就怕机器累不起而罢工。当然，最可怜的要算是我们当中为数极少的几位女性，不是因为时间紧急得流泪，就是昏倒在机房里。

作为全国著名的节目主持人，赵忠祥这次是主动加入了《毛泽东》摄制组。赵忠祥说：“这次解说我一定要录，一是对毛主席的一份特有的情感，再一点我认为我最适合。”他的话不错。赵忠祥的声音浑厚，表现力极强，充满感情，再加上他的学识，使他的理解力不同一般。而更不同一般的是他这次对于创作的主动参与。多少年了，赵忠祥没有这样录过解说了，从讨论解说词的时候就开始参与。录音时，为一段词能反复近十遍，不断地找感觉，不停地琢磨，反复对画面，直到最佳效果。赵忠祥是个大忙人，但他更清楚这项工作的艰辛，后期录音随叫随到，不厌其烦，他也是近五十一岁的人了，跟着大家连续几个晚上加班。

薄一波同志是我们这次创作的总顾问。当我们第一次前往薄老的家中拜访他时，他很严肃地问了我们一个问题：“我这个顾问是名义上的，还是真正的顾问？”这种概念的区别是我们事

先未曾考虑的，但我们却是真心想请老首长帮我们把把关的。薄老明白了我们的意思，很爽快地说：“咱们开始吧。”秘书同志曾同我们约定，薄老年纪大，谈话不要超过半小时，哪知薄老极为重视这一创作，一下谈了两个半小时，随后又多次请秘书同志询问我们的创作情况，转达他对创作的意见。薄老说：“你们的创作一定要反映出毛主席的伟大。毛主席得到全国人民的爱戴，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丰功伟绩不可磨灭。”他又指出：“片子要有实际的内容，要以事实为依据。”薄老是非常细心的人，对片子中许多具体内容的准确性和提法都谈了自己的意见，还特别提出文章要通俗一些，要让老百姓看得懂。他还关心大家的身体，提醒我们注意身体。毫无疑问，许多老一辈的革命家对我们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是我们创作能够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这次创作规模之大也是前所未有的。摄制组常驻人员最多时近五十人，加上各方面配合人员，多达一百几十人。有不少是从外地借调来工作的，他们半年多没有回家。即便是家在北京的，工作紧张起来也有几个星期回不了一趟家，顾不了孩子。我算是条件好的，家离得近，爱人一值班，就把孩子送到摄制组。突然有一天，四岁的儿子问我：“爸爸，别人为什么叫你汪导，叫我小制片呢？”我想了半天，不知如何给孩子解释清楚这一切。

我们怎样去拍《毛泽东》

吴晓梅

1993年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毛泽东百年诞辰时，由中央电视台、中央文献研究室、武警总部政治部等单位合拍的十二集电视片《毛泽东》正式播出。人们说，这个片子感人，每看一遍就想掉泪。专家说，片子跳出了以往编年史的框框，把历史的真实与时代的真实很好地契合起来，用电视艺术手段展示了表现历史、表现人物的新天地。

那么，这部电视片是怎么创作出来的呢？

毛家湾 文献研究室“触电”

1992年岁末的一天，两位来自沈阳的客人下了火车，便直奔位于北京前毛家湾胡同一号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商谈合作拍摄一部以毛泽东为题材的电视片。毛泽东研究组负责人因本组任务繁重，开始有些踌躇，后报文献研究室领导商量后，决定尝试着干一回直接面向亿万群众的“触电”事业。组内陈晋、张民和我被指派参加撰稿。1993年新年刚过就投入工作。一个星期过后，十集的创作提纲先后交出。组领导专门组织了一些同志听取汇报，并进行了讨论。辽宁两家合拍单位辽宁人民出版社和沈阳军区政治部影视艺术中心的同志也特意赶到北京，

在张自忠路一家招待所听了撰稿的设想。

我们没有走编年史的老路，而是采用了“橘瓣”式结构——从不同侧面表现毛泽东最辉煌、最独特、最动人之处，勾勒毛泽东的一生。我们以为，直到今天还吸引老百姓的，是毛泽东的丰功伟绩、光辉思想，以及他身上那种非凡的人格魅力，而这些，也是我们在日常编辑、研究工作中时时强烈感受到的。例如，他历经坎坷斗志弥坚的顽强意志；他深刻了解中国国情，审时度势把握历史机遇的求真务实品格；他登高而呼挥手之间便改变历史走向的宏大气魄；他一生相信人民，依靠人民，为人民服务的拳拳之心；他吟诗赋词之中的浪漫洒脱与浮想联翩的情怀；还有他晚年拖着老病之身，在摄影机前推开扶他的护士，非要自己与外宾握手告别不可的独立傲骨；他甚至有时会时常流露孩童般的好奇与纯真的笑容……有了这些，他便是一个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伟人，老百姓才能爱戴、怀念和传诵他。

4月中旬，脚本初稿几经修改，基本完成。但是我们心里并不轻松。怎么表现老人家的晚年岁月？怎么反映“文革”这段独特的历史？怎么使它既合乎党的决议精神，又符合电视特性，同时又能让老百姓理解、接受？对这些问题，我们感到很棘手。

我们商定，把“文革”十年的历史推到背景上，突出毛泽东在英雄暮年对中国前途和接班人的忧虑，突出他同疾病、衰老的抗争，以及在这种抗争中所表现的乐观、自信和他对生命本质的认识。我们选择了这样一些细节：

——1971年“五·一”劳动节，毛泽东平生第四十五次，也是最后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时，摄影记者只抓拍到了唯一一张他与林彪同时在座的照片。因为林彪当时只坐了几分钟便突然不辞而别。三个月后，林立果策划谋害毛泽东的阴谋破产，林

彪叛逃死在温都尔汗……这使毛泽东急剧衰老。

——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突然出现在陈毅的追悼会上。他对西哈努克亲王说，林彪是反对我的，陈毅是支持我的。“十大”会上，一批包括邓小平在内的老干部进入中央领导层。也是在“十大”时，毛泽东抱病坐在闭幕式的主席台上，最后竟站不起来了，是请代表们退场后他才离席的。

——毛泽东后来对“四人帮”产生了不满，把目光转向了曾经被打倒的人，特别是论文论武都是一把好手的难得人才邓小平。1973年12月，他又高度评价邓小平，说他办事果断，柔里有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团，内部是“钢铁公司”。就在这年4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欢迎西哈努克亲王的晚会上突然重新出现。1975年邓小平受命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毛泽东的这些安排，对他之后的未来中国，不能不说是莫大的幸运。

——1974年的一天，毛泽东就一个既属于科学领域，也可以属于政治范畴的问题，问诺贝尔奖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对称何以那么重要？并感慨地说：非常遗憾，没有时间去研究科学了……

这个脚本，本是与最初提议这一创作的辽宁人民出版社和沈阳军区政治部影视艺术中心的同志合作完成的。合拍单位也物色了编导人员，准备进入拍摄阶段。

说来也巧，那时我们并不知道中央电视台在大张旗鼓地组织人员拍纪录片《毛泽东》，我们还邀请了中央电视台军事部的有名编导陈获芳呢。他也答应了，并看了我们的本子，认为不错，蛮有信心搞好的。

就在1993年4月12日，广播电影电视部发出的第238号函，送到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逢先知的办公桌上。里面

说，电视片《毛泽东》是一个重大题材，必将引起全社会和国际人士的关注，本着对历史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的精神，为确保这部作品的权威性和艺术质量，希望同中央文献研究室等单位合作摄制此片。

其实，还未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领导正式答复，中央电视台的编导已在下面就合作问题开始了运作。

聚香山 电视“国家队”开锣

逢先知主任收到广播电影电视部来函后不久，中央电视台就开始搭班子了。他们在香山召开一个重要会议，参加者有军事部主任、新成立的《毛泽东》摄制组总编导刘效礼和九位编导以及武警总部政治部、中国电影资料馆等合拍单位的有关人员，还请来了毛泽东的亲属、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部分同志。据通报，国内外已有多家电视机构在筹拍关于毛泽东的影视作品，例如国外有日本的NHK，国内北京、上海、湖南、湖北、四川等省市电视台也纷纷上马。在这个开始崇尚竞争的年代，出奇才能制胜。该怎么去拍《毛泽东》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已进行的工作及脚本初稿，马上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会议的第二天下午，刘效礼和汪恒从香山驱车来到毛家湾，由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王宇清同志作向导，找到毛泽东研究组副组长刘宝玉和参加撰稿的陈晋，谈了一下午，诚恳邀请我们这一方参加合作，尽快到香山同编导们见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征得辽宁方面的同意后，决定与中央电视台合作，并拿出了十集脚本。毛泽东研究组组长汪裕尧、副组长刘宝玉和我们几个撰稿人还就本片创制的方针、指导思想和表现内容发表

了意见。经过与会人员的热烈讨论，决定在十集的基础上增加两集，反映毛泽东的读书生活和海纳百川的宽阔胸怀。于是这部十二集电视片的框架和基本内容定下来了。

5月2日一早，中央电视台台长杨伟光赶到香山来听取汇报。会上的热烈气氛感染着他，他说，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是一个世界性主题，是1993年中央电视台的一个重要宣传计划，不仅中国人关注，全世界也都在关注。这次创作难度大，但有这么一些权威单位参加，如同一支“国家队”，应该取得政治上和艺术上的成功。他表示，中央电视台已经决定把这个片子安排在《新闻联播》之后的黄金时间里播出。

被杨伟光台长称作“国家队”的《毛泽东》摄制组，就这样在香山正式成立了。这立即引起了外界关注，港澳台报纸也纷纷披露这一重要信息。这时，主创人员都已到位，开始进入实质性工作状态。

这时，离播出时间仅有八个月了，而我们要完成这部总长度约六百分钟的十二集大型电视片的各项工作：修改脚本并写出拍摄提纲；大量采访和外地实景拍摄；后期剪辑、合成及撰写解说词，直到通过审查。真是任重路难又“军情”紧急。

飞神笔 外国政要论伟人

香山会议后，摄制组住进北京空军四六六医院闲置的病房着手工作。

这时，忽得信息，第十一届国际行动理事会定于5月12日在上海开幕，届时将有许多外国前政界要人和名人到会。这真是“天上掉馅饼”。毛泽东在世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正在当政，

有的还不只一次见过毛泽东。他们如何看待中国这位领袖人物呢？如果能完成对他们的采访，无疑会使我们这部片子视野更开阔。不花一个美元，就能采访到外国要人，难怪编导们连呼“此乃天意”了。

这届国际行动理事会前后只开四天，日程很满，安排的记者采访只限于中央级新闻单位的几个名额。摄制组千方百计弄到了一份这次国际会议的莅会人员名单。根据这份名单，我们三位撰稿分头翻阅了从1950年到1976年的有关档案，找出背景资料。比如：这些外国前领导人见过毛泽东几次？哪一年见的？主要谈过些什么？有什么人在场？会面时有哪些重要细节？又据此拟出采访提纲。做到有备而去，保证采访的成功。

摄制组在上海用不到四天的时间，采访到了十七位外国要人，近参加会议者的半数，包括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哥伦比亚前总统博雷罗、英国前首相卡拉汉、尼泊尔前首相比斯塔、葡萄牙前总理德·平塔尔戈夫人、澳大利亚前总理弗雷泽、日本前首相福田赳夫、法国前总统德斯坦，等等。他们都谈了自己与毛泽东接触的经过和自己对毛泽东的看法、印象。

在上海，对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采访也有收获。这位先后五次见过毛泽东的外交家，用“极富智慧，有很强的活力来控制谈话，在外交事务上很有见解”这样的话来评价毛泽东。

根据我们的提示，基辛格还回忆、证实了一个有趣的细节：1975年基辛格偕夫人访华，毛泽东一见基辛格夫妇，就发现基辛格夫人比基辛格几乎高出一头！他诙谐地问基辛格：“你对比男人还高的女人有什么感觉？”然后，毛泽东习惯地用手那么一比划，道：“压倒她！”在影片资料中，这段对话虽然没有声音，动作表情却鲜明生动。它出色地反映了一个伟人的幽默、睿智，

给观众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除了采访提纲上开列的名人，摄制组还见缝插针，访问了计划外的要人。5月15日晚，有一个瘦小老人正在空无一人的大厅里踟蹰。经过了解，翻译得知他是匈牙利前总理福克·耶诺，正为没赶上游览黄埔江的汽车而懊丧。摄制组抓住这个机会访问了他，发现此公1957年竟在苏联见过毛泽东，而中国人对此事鲜有所知。他尽兴地大谈了一通毛泽东，其中涉及毛泽东对匈牙利事件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与斯大林苏联的关系的看法。

在摄制小分队“出击”上海期间，留京撰稿人员写出了脚本第二稿，对原有素材重新进行了组合排列。后来外拍时用的十二集拍摄提纲字数虽不多，却是在数易其稿，写了二十多万字的稿子的基础上提炼而成的。这成为整个拍摄乃至编辑过程的主要依据。

洒热汗 红土地觅迹寻踪

6月18日起，各摄制小组先后出发。

我随第一摄制小组到达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多次到过的江西兴国。1929年4月中旬，毛泽东率红四军第三纵队抵兴国县城，住在激江书院文昌宫。他调查了兴国的政治、经济现状和历史情况，据此制定出兴国县《土地法》；为贯彻《土地法》，又在激江书院主办了一期“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从这里走出去的泥腿子们把兴国土地革命闹得轰轰烈烈。怎样通过今天的兴国来反映历史，进而通过历史凸现毛泽东求真务实的精神？摄制组通过实地了解找到了切入点，即通过画面展现毛

泽东旧居激江书院正在举办的兴国籍将军生平事迹展览，从而告诉人们：兴国之所以成为有名的将军县，所以能在1929年到1934年竟有五万八千多人当红军，不就是土地斗争的成果吗？当老人们讲起他们当年为什么要当红军时，当谢培兰大娘讲起妇女送老公参加红军并唱起“当兵就要当红军”的兴国民歌时，当兴国烈士陵园墙上两万三千一百七十九名烈士人数赫然在目时，人们感受到的，不正是毛泽东领导下的人民革命之所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取得成功的原因吗？

毛泽东对中国农民的深刻了解，使他把握了中国革命的脉搏，使土地革命结出了胜利的硕果。有关兴国的这一段内容在拍摄提纲中本只是一笔带过，而经过实地拍摄，后来又通过剪辑，却成了《艰难的探索》一集中前半部分的重头段落。

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毛泽东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同样令人折服。他是中国文化的扬弃者、继承者和发展者。关于千年学府、人文荟萃的湖南长沙岳麓书院的一段，就集中反映了这一点。1917年和1919年毛泽东曾住在岳麓书院，与湖湘文化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通过对岳麓书院“实事求是”匾额和院训学规等的介绍，以及延安中央党校门口“实事求是”题额的影片资料的再现，生动而深刻地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文化和哲学渊源。

外拍时正值盛夏。三个月时间，摄制组追寻着毛泽东的足迹，翻山越岭，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平均三五天就走完一个地方，拍完所需素材。每到一处，卸下摄影器材和行李，第一件事就是请来当地党史办有关人员座谈，了解本地情况及有关毛泽东的事迹，丰富深化拍摄提纲，寻找最佳切入点，沟通现实与历史，挖掘鲜为人知的生动细节，寻觅至今犹存的旧址遗迹。

毛泽东在福建上杭苏家坡养病的山洞，《寻乌调查》里提到的胡东林的木工房，金丰大山下的牛牯扑村，宁都县小源村宁都会会议旧址……几乎都原样首次出现在荧屏上，使观众真切感受到了历史的轨迹和毛泽东走过的道路。

山区偏僻的地方，大多不通车。江西省永新县塘边村，1928年毛泽东同贺子珍在井冈山根据地时曾经住过，在此也搞过调查。摄制组前往塘边村拍摄时，车开了两个多小时就没法走了。据说离塘边村还有七八里路。摄制组人员只得扛上摄影器材，弃车步行。时值盛夏中午，烈日当头，红色的土地热得烫脚。翻过几道山还不见塘边村。问一位老表，他说不远了，也就七八里路！可我们觉得已走了七八公里都不止。

进塘边村已是下午3点多钟。摄制组的到来让村民们兴奋不已。村支书徐五娇带我们穿行在依然多少还能看出20年代老样子的村里，神情激动地走到毛泽东与贺子珍当年住过的那间老屋前。老屋深匿在狭窄的巷道里，和南方普通的农舍别无二致。青砖砌墙，刷上的白灰剥落殆尽，门框上方挂着早已脱漆的匾额，上书“毛泽东旧居”。屋子里外三间，已无任何家具。绕过屋后，有一眼井，像一米见方的水塘，蹲下就能掬到甘甜的泉水。这井是毛泽东和贺子珍帮老表挖的。半个世纪的风雨过去，它依旧清澈如初。直到今天，塘边村村民还在用这口井。担水的人来来往往，井边的树荫下有坐着聊天的老人和玩耍的孩子。老表们很热情地舀了水让我们喝，那水真是格外地清凉甜爽。

拍完塘边村，出村已是下午6点多钟。后来塘边村这些珍贵镜头没有编进完成片里。像这样千辛万苦拍到却没用上的素材很多。摄制组的前期拍摄时间虽短，但收获甚丰，仅第一摄

摄制组外出三个月就拍了六千多分钟的素材带，而这一组完成的四集播出带总长度才两百分钟，也就是说播出片的每一分钟后面，都付出了数十倍的努力与辛苦。

献巨片 薄一波一锤定音

9月23日，摄制组在延安完成最后一场外拍，返京后开始后期制作。这时，已决定片子在12月13日晚20点10分开始播出。在剩下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摄制组要完成播出前的全部工作。分别设在中央电视台和梅地亚新闻中心的三个机房已无法满足需要，杨伟光台长特批增加一个。

在那些紧张的日子里，面包、饼干和盒饭是每日的伙食。晚上加班，累了就合衣倒在堆满素材带的行军床上，醒来就赶紧上机。编导们个个衣冠不整，胡子拉碴，头发又乱又长。大家见面，互相戏说要把对方送到疯人院去。

11月中旬开始送审样片。总编导们悬着心，前往中南海薄一波同志住处，请本片的这位总顾问审看并向他汇报情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逢先知，以及毛泽东研究组的汪裕尧、冯蕙、吴正裕、刘宝玉等四位负责同志，也都投入了全片的审查把关和修改定稿工作。他们陆续看了十二集的初编带，有几集成功一些，有几集返工量很大，需要集中编导、撰稿等各方面人员，重新确定编辑思路。经常是那边在审一集，这边编辑机上改一集，改完直送审片室。审片人员对每集的史实、结构都谈了看法，还提供新的采访线索，再由撰稿现去联系。有时，时间来不及了，干脆就由撰稿人员带着摄像师外出补拍，甚至驱车到石家庄、保定，一天来回。解说词写出来后，最后又

请毛泽东研究组的领导审定。他们还亲自到中央电视台的机房，认真核校字幕。

11月下旬，薄一波同志亲自到中央电视台，指名只看表现毛泽东晚年的最后一集。看后他给予了肯定。这使大家十分高兴。逢先知主任看后说，他最担心的这一集可以放心了。

有几集最后修改并通过审查时，已是1993年12月10日，距开播只剩下几十个小时。按照规定，播出带应在播出前二十四小时入库校检。但这一次非同寻常。往往晚上就要播出了，下午还在机房润色加工，直到傍晚才送往播出线。哪个小组的片子顺利播出了，播完了，哪个小组的人才踏实地去睡上一觉。

片子一经播出，就交给电视机前的观众和专家们去评说了。不管我们是否为它激动过、争论过、自豪过，还是遗憾过。

只是我们会经常想到2093年。那时，摄制组所有人员都已作古，但毛泽东的名字不会湮没。那时，也许会有人再去拍一部《毛泽东》。我们今天无法知道未来的编导和摄制人员是谁，但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现在拍的这部《毛泽东》以及数百盘未用上的素材带——我们力求在其中如实反映这位伟人的思想及其业绩——会是留给后代的一份无比珍贵的财富。

（原载《炎黄春秋》1994年第7期，收入本书时有删节）

我用心拍《毛泽东》

王 沛 毅

拍摄毛泽东，而且是从客观的视点去审视毛泽东，这我以前连想都不敢想。

1993年6月，我作为摄像应邀参加了中央电视台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武警总部联合制作的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的十二集大型纪录片《毛泽东》的拍摄工作。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我随摄制组沿着毛泽东生前的足迹跑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用摄像机记录下了无数难忘的场面。

拿起摄像机，面对寻像器，我茫然了。毛泽东他老人家一生叱咤风云，如何在十二集里展示清楚他的性格，“从不同的侧面去刻画毛泽东独特的人格魅力”？虽然编导们早已定下了全片的基调，但我拿到手里的只是薄薄几页的拍摄大纲。“纪实风格”如何体现？我深感担任本片摄像责任重大，也深知我在北京电影学院学到的各种专业技能和摄影造型手段在这里会显得很不重要。拍摄毛泽东，重要的是感受——和他老人家心灵的感应。我试着通过寻像器和他老人家进行交流，那一条条他走过的小路，那一本本他读过的书，那一处处他生活过的空间……渐渐地，我为毛泽东这个人物着迷，被他那独特的个性品质、人格魅力所吸引，和他老人家在一起度过了一百多个日日夜夜。

《毛泽东》一片的制作是1993年中央电视台的重点项目，分

三个小组同时分工拍摄。我所在的一组负责二至五集的拍摄任务。内容分别是：《历史的选择》——介绍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中的存在、地位和影响；《艰难的探索》——通过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活动，揭示毛泽东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务实、求实的个性品质；《书山有路》——介绍毛泽东的读书生活及这种生活与毛泽东的关系；《曲折之路》——通过毛泽东上井冈山后至遵义会议这段时期所经历的个人命运的沉浮，反映他对武装斗争道路的认识和实践。

6月18日，一组人从北京正式出发，成员有导演崔屹平、王益平，撰稿吴晓梅，录音王爽和我。行前在站台上，我们进行了抓拍采访，内容是“为什么北京到长沙的列车编号为1次特快？”面对这个问题，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小商小贩，几乎都这样答复：“湖南是毛泽东的故乡，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可见毛泽东在离开我们十七年后的今天，仍活在全国人民心目中。

当我们来到嘉兴南湖的时候，见到的只是汪洋中的一条船。听当地人介绍说那里连下了半个月的大雨，那天才刚放晴。也许是托了毛主席的福吧，我们的拍摄得以顺利进行。我们蹚着齐膝的积水靠近了那条神秘的小船——中共一大曾转移到此秘密召开。《红色的起点》一书的作者叶永烈，此刻正和本片的撰稿、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组的吴晓梅谈论着当年的情景。听着他们的介绍，望着那因修缮而被帆布蒙起的小船在一片汪洋中孤单的身影，我握摄像机的手颤抖了！这眼前的情景不正是当年中国革命艰苦环境的写照吗？我启动了摄像机的开关，拍下了他们涉水靠近那条小船的镜头，画面中那每一步在积水中的移动，都仿佛让我们感受到了毛泽东从建党初期由毫不起眼的地位到成为中国人民领袖所走过的道路和中国革命的艰难历程。

我忘不了塘过村的孩子们，忘不了他们那不顾一切的整齐的吼声，忘不了那永远的一瞬间……那是7月初江西最热的一天，因道路不通，我们顶着四十几度的高温步行八公里来到江西永新县塘过村拍摄。当夕阳西下，我在完成了既定的拍摄任务最后一个撤离时，被一群热情的孩子包围了。我试图和他们交谈，但他们只是一声不响地注视着我，没有一个人说话；当我转身一走，他们却一齐跟着我走。我被这一独特的欢送方式感动了，准备拍下这个送别的镜头，看看能否用在《艰难的探索》这一集里。这样，我就开着机倒退着拍摄。正当我全神贯注地看着寻像器的时候，我突然听到了一声最震撼人心的惊叫——几十名孩子几乎异口同声发出了喊声！我被这一气势震住了，下意识地立定了脚跟，回头一望，我顿时惊出了一身冷汗，再有半个脚的距离就是一个大水塘，我几乎机毁人伤！是这群善良的孩子救了我，也救了整个摄制组。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瞬间孩子们的表情。这就是老区的人民！从那一刻起，我好像对毛泽东又多了一份了解，也好像突然明白了他为什么把根据地建立在江西了，更好像真正懂得了他老人家所说的“人民万岁”这四个字的份量。那几十名沉默许久的孩子在那一瞬间所迸发出来的不正是人民的力量吗？

我走进了中南海丰泽园的菊香书屋，望着那满床、满屋的各种书籍，“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千遍万遍下功夫……”，不知为什么，我耳边响起了这首老歌。可毛主席读过的书我又读过多少？我问自己。这其中“深刻的道理”我又领会了多少呢？我不由自省起来。毛主席一生到底有多少书，这到现在恐怕还是一个谜。拍摄中我们遇到了挑灯夜战整理毛主席图书的中央档案馆的工作人员，并拍下了一个从登记打卡拉开移动到菊香书屋外

景的夜景镜头。那一声声空旷的打卡声和毛主席书房的灯光所带给我们的不正是意味深长的思索吗？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站在陕北安塞那最高的山顶上，望着脚下那一片一眼望不到头的黄土高坡，我边拍摄下我在《毛泽东》组的最后一个镜头，边不由自主哼唱起这一首我出生以来学会的第一支歌。一天前我们在延安杨家岭刚采访了延安歌舞团的作曲家党音之，由他介绍了这首歌的改编情况，并听他哼唱了原歌。我惊呆了，原来脍炙人口的《东方红》竟出自一首陕北民间情歌！从流行程度上讲，这无疑是世界上最流行的一首流行歌曲了，但我无论如何也无法将原歌中的“荞麦花，高粱地”与“他为人民谋幸福”的大救星作一个比较，也许李有源改编这支歌的初衷也是出于一个“情”字吧——人民对领袖的挚诚之情！

是啊！我们在拍摄过程中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不论遇到什么人，各行各业，各个阶层，甚至以前的国民党将领和曾经在党内反对过毛泽东的人，只要他们一看到我们背心上面印的“毛泽东”三个字，无不倍感亲切，谈起毛泽东，也无不充满热情。9月9日，我们在天安门广场采访自发从各地来瞻仰毛主席遗容的人们。整整一个上午，一位特意从深圳赶来的年轻人始终跟着我们，只为了在我们拍摄结束时和我们说一句话：“我今天一大早洗了澡来看毛主席，看到你们在拍《毛泽东》，我希望你们拍好！”这是何等的感情呀！类似这样的事在我们的沿途中数不胜数，那古田自发帮我们推车的村民，那韶山冲拒收我们饭钱的小老板，那陕北问我们延安大还是中央大的老汉，还有那生于9月9日取名“泽西”的孩子……

我每次从一个摄制组下来，都要作一番总结，整理一下自己

在拍摄中的得失，其内容更多是艺术上和技巧上的。此番拿起笔来，我却无法像以前那么从容了。如果说以往我是用艺术感觉去拍摄的话，那么这一回我却是用整个心灵去拍摄的。能在有生之年参加《毛泽东》的拍摄，是我一生最大的荣誉。我向我的朋友自豪地宣布：我曾用心去拍《毛泽东》！同时又暗暗地在心里说：毛主席，无论今天，还是事隔多年，我会把你留在我的生命里！

（原载1994年1月27日《中国电影周报》）

附 录：

外国政治家谈毛泽东

汉斯—约亨·福格尔（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前社会民主党主席）

1993年5月，上海

记者：福格尔先生，今年是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为此，中国中央电视台正在拍摄一部电视纪录片。您是德国有名的政治家，我们想请您谈谈对毛泽东的看法。

福格尔：我认为，毛泽东在中国人民的历史上发挥了伟大的作用。特别是毛泽东早期的革命活动，他领导的著名的万里长征以及于1949年最终赢得革命斗争的胜利，等等，都是举世瞩目的。不过，在毛泽东的晚年曾出现了个人崇拜的阶段。另外，他在如何使伟大中国在他身后仍然保持秩序方面也遇到了问题。

总而言之，如所有的伟大人物一样，毛泽东有功绩，但也有缺点。

记者：德国是否注意到毛泽东曾一贯主张和支持德国人民的统一事业？

福格尔：我们注意到了，毛泽东主张德国统一。不过，我估计毛泽东恐怕更希望统一的德国符合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秩序。他大概不会想到德国统一是今天这种模式。但是，毛泽东主张德

国统一，这确实是事实。

博雷罗(哥伦比亚前总统)

1993年5月，上海

1974年我所领导的政府任期结束，11月我应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政府的邀请访华。我抵京时，毛泽东正处于病中，周恩来总理亦是如此。我有机会同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先生进行了长谈。我对毛泽东主席提出的诸如中国对第三世界的政策印象非常深刻。中国的骄傲之一就是她不是个超级大国，不是一个至高无上的领导，而是第三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事实上，不久中国就(重新)加入了联合国。那时我已不在政府里工作，而是在政府之外为中国重返联合国工作。在联合国中国一贯起第三世界的作用。虽然第三世界这一说法已不太恰当，因为第二世界前苏联集团已不复存在。但是中国总是和第三世界国家患难与共，共同斗争。但是中国政府从未直接干涉过穷国至少是拉美穷国的内政，从未使冲突的局势进一步加剧，而是恪守中国自己提出的包括人民自决权在内的五项(基本)原则。另一方面，不管你赞不赞同毛泽东思想。他的著作、箴言无疑点燃了当时人类尤其是劳苦大众的希望。

我认为不管对他的印象如何，全世界都会纪念他。

福克·耶诺(匈牙利前总理)

1993年5月，上海

我听说今年是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世界是如何评价毛泽

东的，我看很不一致。一些人一味地歌颂，一些人则一味地谴责。我看这两种意见都不对，应全面看待他的一生。毛泽东为中国人民，为世界人民特别是为中国人民做了许多许多的好事，但也做了不少错事。从总体看，我认为，对毛泽东的评价应该是肯定的。

毛泽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十六岁起我对他就有很好的印象。我先是从电影，从他的作品，从别人的介绍中了解他的，我对他的印象是相当好的，是肯定的。我回忆起1921年，当时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在这座城市里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我回忆起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的英雄事迹，长征。1957年我对毛泽东有同样好的印象，在苏联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时候，我在莫斯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他在莫斯科参加庆祝活动，我也是。我和毛泽东及其代表团在一起度过了几分钟。他讲了一些很有意思的问题，从此以后我对他的印象更好了。他讲的问题很有意思，使人感到惊讶。他说，匈牙利1956年发生的事是好事。我对他的说法很诧异，因为我当时认为，1956年在匈牙利无故地、白白地死了许多人，当时的领导人拉科西之流，及其同伙是一伙罪人，我问毛泽东：“您有什么理由说明是好事？”他解释得很好，很英明，我明白了他的意思。他说：“之所以是好事，因为你们肯定从这一事件中吸取了教训，明白了错误和罪过将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全世界都从中吸取了教训，中国、苏联和其他国家都吸取了教训，这不是变成了好事了吗？一个小国发生的事，别的国家就不要再发生了。”这是令人惊讶的见解。

他还说：“你们咒骂斯大林，咒骂他的罪行，全盘否定斯大林。不要骂嘛！因为他有坏的建议，但也有好的建议。而你们的领导人什么都听，惟命是从，像奴仆一样，斯大林说什么，你们就做什么。斯大林提的是建议，而你们则当作圣旨接受。斯大林给

中国,给我个人也提了许多建议。我们告诉他,我们回去研究研究,与我们的领导人和人民商量以后再定。斯大林好的意见我们采纳了,错误的我们屏弃了。”

我理解毛泽东讲的话。我一直认为,受孙中山影响成长起来的毛泽东是一位英明的人物,他能深入浅出地解释一些问题。

我对毛泽东的看法不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发生变化的。在头一二年中我以为文化大革命是好事。但两三年后我发现,毛泽东领导人民干的这件事是极大的罪过。他说斯大林听不进别人的话,拉科西听不进别人的话,结果他自己也这样,听不进任何人的话。

也许你们会担心,说一位主要领导人有错误,会动摇人民对他的信任。我看,不要怕,不要担心,因为他把毕生贡献给了他的理想、他的人民,我认为对毛泽东的评价,对卡达尔、亚诺什的评价,对一些西方领导人的评价,对所有的评价,不仅要看他的过,更要看他的功,要看一个人的一生。毛泽东尽管在“文化大革命”中对中国人民做了许多错事,但对他的评价仍然是功大于过。

乌尔斯藤(瑞典前首相)

1993年5月,上海

记者:您好,我们正在制作一个关于毛泽东的纪录片,您了解他吗?见过他吗?

乌尔斯藤:不,没有见过。

记者:您听说过他吗?

乌尔斯藤:是的。

记者：您对他印象如何？

乌尔斯藤：他是一个伟大的领导人，改变了中国，在政治上有其鲜明个性，对中国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记者：您来自欧洲，可以谈一下欧洲人对他的看法吗？

乌尔斯藤：他是世界上著名的政治家，欧洲人对他并不陌生。

记者：具体来说呢？

乌尔斯藤：正如刚才所说的，他对于改变这个国家起到了重要作用，使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中国在社会、经济、政治上都成为世界的重要部分，而且一直保持下来。

卡拉汉（英国前首相）

1993年5月，上海

记者：做为一个著名政治家您对毛泽东和他的国家有什么看法？

卡拉汉：毛泽东？我不太了解他，也没见过他。

记者：做为西方政坛的著名人物，您认为毛泽东对世界、对人类做出了怎样的贡献？

卡拉汉：他所做的？他对人们有很大很大的影响，毫无疑问，对中国人来说他是一个世纪的毛泽东故事中的核心人物，时代造就了这样一个人。时代需要变革，他实现了这种变革。现在历史仍在变化，我想如果他在这里，他会接受这个巨大的变化。历史总是在不断变化的。

记者：你对改革中的中国怎么看，对今天的中国上海有什么印象？

卡拉汉：中国改变得比我想象的要快，有着巨大的活力，这清楚地表现在人们的行动、谈话、工作上，毫无疑问，中国正在强大的道路上前进。

记者：您可以谈谈如何加强中英关系，我们之间还存在着问题，如香港问题。

卡拉汉：是的，我希望问题能得以解决，我相信双方领导人本着相互信任的态度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也确信在所有的事实和细节问题得以解决后，会谈将顺利进行，我相信我的国家。

法里德·萨马哈(黎巴嫩驻华大使)

1993年，上海

法里德：他是中国历史乃至人类史上的伟大人物，在那个时代发挥了巨大作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奠定了基础。由于毛泽东在政策上奠定的基础，中国的新领导人们才会在世界上取得成功。在他的时代，不是实行开放政策的时代，但他为新的时代打下了人间基础，中国的基础。当新时代来临，新的领导人以极大的智慧和信心，在他的基础上开放了中国。现在，中国已成为世界上两三个大国之一，不仅是在制造业，而且在科学技术上，科技才是使国家成为世界强国之路。

记者：那么您认为是毛泽东为现代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法里德：是的，如果说新的政府使中国在各个方面成为世界强国，应归功于毛泽东所奠定的基础，我相信新的领导人能体会到毛泽东为现代中国所奠定的基础是多么出色。

记者：刚才您说作为大使住在北京，是从哪年到哪年？

法里德：从1985年到现在我一直在北京，当然有一天我会

去别的国家,不过我不愿离开北京。希望你们的电视片取得成功。

比斯塔(尼泊尔前首相)

1993年5月,上海

记者:您曾同毛泽东会见过三次,对他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比斯塔:1965年,我第一次来中国,那年我见到了毛泽东,他给我们的印象很深,他的思维敏捷,我们的谈话很好,对我很有启发。实际上,我来自一个非常小的国家,他对我的态度是充满理解的,这种印象一直持续下来。

记者:在他第三次会见您的时候,对贵国的农业问题很关注,您当时有什么想法?

比斯塔:1972年,我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有许多中国重要的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已经到了生命的最后几年,他还是问很多问题,主要是农业问题,因为中国有着庞大的人口需要解决温饱,只有通过提高农业生产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很自然,就会考虑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处理这个问题。我发现中国领导人是**非常敏锐的**。

记者:毛泽东逝世时,您对他有一个非常高的评价,认为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您现在还这样认为吗?

比斯塔:我仍旧认为他是个伟人,他彻底改变了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没有毛泽东,中国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进步,变得如此富足。真正起到领袖、导师作用的是毛泽东。

德·平塔尔戈夫人(葡萄牙前总理)

1993年5月,上海

记者:您和葡萄牙人民对毛泽东有什么看法吗?

平塔尔戈夫人:我的想法也许同我国人民差不多。就我个人来讲,尽管我从未见过他,但对他人格十分尊重。他对人民十分关心,给我印象很深的是他强烈的思想信念;而且人们坚信这种物质资料的分配方法是他们当前生活的最佳方式。正是这样,我深深意识到他是人们关注的中心。同时,我认为在他漫长的掌权时期里,确实有某个时期可能过分统治和对人权不够尊重,这使他不像在其它方面那么伟大。当然,我们是从远离亚洲大国的欧洲来接触这些问题得出的结论。在我们国家里,公众一般认为毛泽东同埃克特·格端普斯时代非常相似。但是在有着极大差异的资本家、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中都有自称是毛泽东的继承者存在着。这样就产生了一些太极端的人。但我必须认识到那个时代——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当时的人们期待较大的变革,毛泽东的思想和实践很有说服力。在这里我想我的观点同葡国人民是一样的。

记者:有很长一个时期里,毛泽东被当做一个神对待,被认为是我们国家的拯救者,可他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您对他作为新中国缔造者有什么看法?

平塔尔戈夫人:他为团结中国人民创造了一个全新的道路。工人和农民对他们关注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过去他们一无所有,就我所知在社会中既无政治地位,又无经济地位。我认为这是他对中国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尽管如此,在欧洲也是很难让人将一位社会知名人士当做神来对待。我来自一个更民主的国家,对于领导人,我们可能不喜欢,也就不可能将其看成是神。如果你在

某方面有不同的看法，可以把他撤换下来。我想中国的前景也会朝这方面发展，你说呢？

记者：谢谢！

平塔尔戈夫人：我国在1974年发生过革命，他们认为自己是在走毛泽东的道路。当然，年轻人一般都是非常理想主义的。

记者：中葡之间相隔甚远，可能在某些想法上产生误解。

平塔尔戈夫人：的确如此。那些懂些政治的人可能会恰当地考虑这些事，而不太懂的人由于某些限制就不能正确地思考这件事。希望你们的工作能顺利进行，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主题。

基辛格(美国前国务卿)

1993年5月，上海

记者：我是中国中央电视台记者，正在拍一部关于毛泽东的纪录片。在您的回忆录里提到您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情景，他的性格。可否讲一下您当时的心情？

基辛格：我见过毛泽东五次。当我见到他时，他总是极富智慧，有很强的活力来控制谈话，在外交事务上很有见解。

记者：1970年10月1日，斯诺先生被邀请在天安门同毛泽东一起观看国庆典礼，这被我们认为是向美国表示友好的方式，美国政府当时对这件事怎么看？

基辛格：对于斯诺先生被邀请在天安门城楼同毛泽东在一起，我们那时不理解这可能是在向美国做某种表示，我们错过了它。我们一直在试图同毛泽东接触，中国人理解了我们的意图，而我们没能理解中国人的意思。我们用了两年时间才真正走到

一起。

记者：当您在 1975 年见到毛泽东时，他的健康状况已非常不好，您是否认为他的健康状况影响了他的才智？

基辛格：我在 1975 年见到他两次，一次是单独会见，一次同福特总统一起，两次都是他主持会谈。尽管谈话已比较困难，但两次会谈都持续了两个小时，我不认为他的健康影响了他的才智。

记者：当我观看您访问中国的纪录片时，我们注意到第一次会见是在他的书房，那时您对他的印象如何，是不是知识渊博？

基辛格：我们的会见多数在同一个地方，就是书房，唯一不同就是第一次会见时，他在躺椅上学习，后来那躺椅一直在那儿。在地板上有许多书，第一次会见时他总不时说一些中国的诗词，我几乎很难理解。他当然是极为睿智的。

记者：我们同样注意到一些有趣的事情。1975 年他会见了您和您夫人，当看到您夫人时脸上露出了有趣的表情，您那时有何感觉？

基辛格：他觉得有趣是因为我妻子比我要高。

记者：他说了些什么？

基辛格：他对这事做了些评论，问我对比男人还高的女人有何感觉。

记者：基辛格先生，美国一些大公司要求美国延长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您对这有什么看法？

基辛格：我希望延长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

记者：您中美关系未来有什么看法？

基辛格：我认为中美关系是与两国各自利益相关的。所有国家都会认识到太平洋地区的未来极大地取决于中美关系的进一

步发展,我将为此而努力。

记者:您知道在这个过程中还存在着问题,您认为应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基辛格:我将尽我所能去解决这些问题,我想中方也会如此,我希望能得到比较好的结论。

记者:还有一个问题,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毛泽东在中国被看成是神,是中国的拯救者,您对于他作为一个世界领导人、政治家有什么看法?

基辛格:世界上对毛泽东有很多见解,他们认识到毛泽东统一中国获得了成功,建立了他的体制;另一方面,从他运用的方法和取得的结果上,他是个伟大的人,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同时也有比较大的错误。

记者:您和毛泽东会见了五次,您对他最深的印象是什么?

基辛格:具有极高的权力和格外的睿智。

弗雷泽(澳大利亚前总理)

1993年5月,上海

记者:您同毛泽东是同一时期的政治家,可否谈一下您对他的印象和想法。

弗雷泽:我从未见过他,这是我一生的一大憾事,因为他是中国的伟大领导人,为世界各国人民所尊重、纪念。我不知道中国怎么说,但在世界许多国家他被看成是时代之父。他给予这个国家以生机,关心人民,建立了能使整个国家走向富足的制度。

记者:在您的国家里,是否还有人知道毛泽东,熟悉毛泽东?

弗雷泽:像我这个年纪的人知道,年轻人、中学生是知道的,

也有一些人不大了解。总之，很多人都知道毛泽东和他为中国所做的一切。但时光流逝，再过十年、二十年，那时的年轻人也许就不知道了。

记者：您来中国多次，与过去的中国相比，您觉得今天的中国有什么变化？

弗雷泽：今日中国是一个生机勃勃的社会，她变得越来越开放、自由。城市中街道宽阔，灯光明亮，商店林立，当今中国确实是在世界上占有引人注目的地位。并在解决世界性问题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然，澳大利亚处于亚太地区，这个地区的未来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中国和她的政策以及各国间的关系。总的来讲尽管我们这个地区还有些问题等待解决，如柬埔寨问题，许多人也在为此努力，但情况还是不错的，很多国家的关系都已正常化，比如越南，不仅同中国，她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也趋于正常。我认为亚太地区这个舞台已经证明了自由开放经济。这些国家的采矿业和其它方面都成了自由经济了，在这个基础上，确定了良好的国家间关系，使亚太地区成为世界上快速发展的部分。

记者：您对于中澳关系的未来有什么看法？

弗雷泽：中澳关系发展得很好，很强。1976年中国是我当总理第一个访问的国家。中澳关系不仅在政治上很重要，在经济上也是如此，尤其是在贸易方面，中澳关系得到了进一步加强，我希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下去。

米·利比契奇（南斯拉夫前总理）

1993年5月，上海

记者：您对毛泽东印象如何？

利比契奇：我没有见过毛泽东，这一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我在南斯拉夫党内任职十三年。我们经常提到毛泽东的名字。千百年来的传统习惯是对于死去的人，只能说好话。当然对待像毛泽东这样一位历史上的伟人也应该如此。至于伟大人物的功与过问题，他们的著作除了得到高度评价以外，往往会遭到批评。我个人认为，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人物，已被写进了源远流长的中国发展史中。

福田赳夫(日本前首相)

1993年5月，上海

我很早以前就知道毛泽东先生这个名字，并且对他非常尊敬。但是，由于我从未与他见过面，因此，让我来谈对毛泽东先生的印象以及与其交往的往事等等，是比较困难的。

我是日本人，对中国这个邻国一直有一种亲近感。我从小就学习汉字和汉文。我的父亲和祖父都学习四书五经。父亲的房间里放满了四书五经、《十八史略》、《三国志》、《战国策》、唐诗等书籍。记得我四五岁的时候，一走进父亲的房间，就看到满屋子全是书。我生长在这种环境中，汉文是我上学时的必修课，那时既不用钢笔，也不用铅笔，而是一律用毛笔。我就是在这种环境中成长的。这是我的姓，叫福田，贵国的《四书》和《三国志》中都有这字，我父亲取了这个名字和这个字。

众所周知，1973年我和邓小平先生签署了《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签订这种条约，在我国历史上是首次，恐怕在世界史上也是首次。日中两国虽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完全不同，但两国签

署了《和平友好条约》，这不仅在日本和俄国是首次，在世界史上尚属首次。二次大战后，出现了以苏联为核心的东方势力和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势力，世界因而分为两大阵营，美苏分别掌握的这两大阵营的社会哲学不同，世界分成两大块，“友好”这一词语在当时是无法使用的。但是，日中两国冲破障碍，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我钦佩毛泽东先生这一富有胆量的行动，并且十分尊敬他。同时，他也为自己能为签署这一条约出力而感到自豪。当时，我正连任首相，在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前夕，我访问了东盟各国。记得在菲律宾的马尼拉访问时，他们叫我福田总经理，说是东盟都这样称呼我。我谈了日本对世界的基本想法。第一，日本虽然在经济上成了强国，但不会重新成为军事大国。从世界历史来看，经济大国必然成为军事大国，但是，日本决不走这条路。第二，这样一来，钱会用不完。日本考虑将这笔余款用于帮助亚洲各国的发展。第三，与世界各国，特别是亚洲的近邻各国进行交往，必须克服社会体制、政治体制相异这个矛盾。当时，我首先考虑的是中国，其次是越南。我认为，日中两国的往来具有几千年的悠久历史，日本给中国添了麻烦，日中两国间没有和平友好条约不好。日本是自由主义体制，中国是社会主义体制，虽然两国的社会体制不同，但必须友好相处。后来我们把邓小平先生请到东京，我们二人签署了《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现在，两国关系非常好，我认为，在几千年交往史中，我们建立了最好的关系。

请允许我非常简明、坦率地说一下，二次大战后，日本在经济上强大了，同时，我们的友好国家中国也逐渐强大起来了。展望未来，我认为，中国将继续走自己的发展道路，并定将日益强大。日中关系是互相帮助，相互合作，共同日益发展的关系。在发展中国的关系时首先考虑到这一点是理所当然的。但是，由

于日本和中国是在世界上占有主导地位的几个国家中的一员，因此我认为，从这个角度来说，在考虑日中关系时，不仅要为日中两国的利益着想，而且还应考虑全世界的事情。与此同时，我们不仅要考虑当今世界，还应为今后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乃至一百年后的全人类的事业多着想。我深信，日中两国一定能够互相合作，为两国、为全世界、为全人类的事业做出贡献。日中两国将成为世界上十分重要的国家。

无论哪个国家，搞殖民主义我都是反对的。各国情况不同，生存方法各异。中国幅员辽阔，我认为毛泽东先生走的路是正确的。

基辛格访华使我大吃一惊，他从事了秘密的外交活动，当时日本方面不清楚。

世界分成两大块，日本属于西方阵营，中国属于东方阵营。在这种情况下，日中间当然就没能建立起紧密的关系。日本与中国这个邻国之间有着几千年的友好关系，但遗憾的是，日中两国间也有过一段不愉快的时期。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克服了困难，重建了日中关系，缔结了《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我认为邓小平先生是一位伟人，我至今非常尊敬他。

贵国的国土是日本的二十五倍，有十二亿人口，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毛泽东先生长期将这个国家掌管起来，领导中国人民走自己的路，这仅靠策略是很难做到的。毛泽东是个哲学家，具有很强的领导能力，做了了不起的事，为人类做出了贡献。

德斯坦（法国前总统）

1993年5月，上海

记者：我们注意到毛泽东去世后，您曾发表过一份声明，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声明中，您把毛泽东比作人类思想的灯塔，并高度评价了毛泽东的精力和他大胆的抉择。您从没见过毛泽东，请谈谈您是如何提出这些结论的？

德斯坦：我从没见过毛泽东，因为我是1974年当选法国总统的，而1980年我访华时，毛主席已经去世了。毛泽东去世后，我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我参加了中国驻法使馆举行的悼念仪式，要知道法国总统几乎是从来不去外国使馆的，当时我却去了，因为一方面出于对毛泽东的尊敬，另一方面则出于对中国人民的友谊；另一件是我自己撰写了那篇声明，并在中法两国发表。还有一件事让我颇受感动，那就是1974年我当选总统前，我的前任在4月份去世了，就在此前几个星期，一位访华的非洲国家的元首会见了毛泽东，他们谈到下届法国总统的人选，因为那时蓬皮杜总统已经生病了。毛泽东对这个来访者说：“我知道下届法国总统是谁，是吉斯卡尔·德斯坦先生。”那位非洲的元首很吃惊，我也很惊讶，他竟然知道我，而我当时既年轻，名气又不大。可见毛主席是非常了解法国政治的，并且还有很正确的判断力。法国的知识分子阶层是很受尊敬的，在当时，毛泽东在他们中的威望很高，一方面由于毛泽东的文学作品，他的文章写得很美，诗歌在法国很有名；另一方面由于他本人的政治活动史，特别是他领导中国共产党进行的漫长而艰苦的斗争史以及他本人伟大的决策力。我自己也曾梦想能到长征的路上，例如江西、陕西等地走走，看看那些红军走过的地方。

记者：看来您很了解中国的历史。

德斯坦：我比较了解，而且正在研究汉、宋、明、清以及19世纪的中国史，因为19世纪是中国与欧洲关系最为恶劣的阶段，

欧洲人不了解 19 世纪的中国,我想知道原因何在。既然对于我们来说 20 和 21 世纪的中国史很重要,那么中国在过去都发生了什么事也同样重要。

记者:您能谈谈今天法国人民是怎样看待毛泽东的吗?

德斯坦:首先,法国人知道中国人对于毛泽东仍旧很虔诚很尊敬。要知道现代社会变化很快,很多国家元首都被人忘记了,只有少数人仍被人所知,例如法国的戴高乐将军,法国人知道他,敬重他,那么在中国,毛泽东也是一样。另外,现代社会的国家领导人并不体现一种哲学思想,他们只是解决一些问题,诸如经济、社会、军事等等。法国人却认为毛泽东体现了一种哲学思想,并且努力地把它付诸行动。这正是我们对政治的认识。我们在 1789 年进行的大革命正是为了一种哲学思想,即在当时的政治自由。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毛泽东思想也正是使中国走向一种哲学,即给予中国人民最大的权力和最高地位。

记者:就毛泽东的性格,您还能谈些什么吗?

德斯坦:我见过周恩来,他和毛泽东很不同。首先文化背景不同,周恩来和邓小平等人由于为国内政治做准备的原因到过法国,他们在雷诺汽车厂工作过。周恩来很习惯我们做事的方式,见过很多重要的人,是个具有丰富国际经验的人。在法国人心目中,他正是中国知识分子阶层领导人的代表。

记者:您知道邓小平也是一位重要的政治家,您能谈谈对他的看法吗?

德斯坦:他是我的朋友(用中文)。他曾多次到巴黎来,我们也进行过多次私人会谈,我们两家人还在一起吃过饭。我研究过他的政治生涯,现在关于他的传记很全面。我认为我能理解他变革中国的思想,并相信这种思想是很明智的。因为像中国这样一

个国家最大的问题是必不可少的经济效率和维护国家统一。也可以说是在巨大的经济变革的后果和维护国家统一之间寻找一种平衡，所以我认为邓小平所采取的措施是十分正确的。

特鲁多(加拿大前总理)

1993年5月,上海

记者:我们注意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您曾发表过一篇声明,声明中您说毛泽东是20世纪最伟大的领袖之一,请问您今天还是这样认为的吗?

特鲁多:是的。历史已证明毛泽东是一个伟人,因为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平时时期,毛泽东都能够把自己的理想付诸行动,并且明白中国人民需要鼓舞,需要领导,这就是伟人的特征。

记者:1973年,您在会见毛泽东时,曾送给毛泽东一枚银质白求恩像章。您是如何选择这一礼物的呢?

特鲁多:白求恩是加拿大人,当时加拿大青年人把他视作一个献身于一种事业和一个伟大民族的典范,加拿大人民也把他看成一个忠诚于自己正义事业的楷模。而我们也知道毛泽东曾写过论述白求恩的文章,连中国的小学生都知道白求恩医生这个人。所以可以说白求恩这个名字是联接中加两国人民的桥梁。

记者:1973年的那次会谈持续了一个半小时,您能谈谈当时毛泽东给您的印象如何吗?

特鲁多:毛泽东很健谈,谈话的口气很庄重。当时他谈了很多中国和世界的问題。那时正是冷战时期,我们一起讨论了结束冷战的必要性,我对他说我正是为此访华的。我们还商讨有关交换外交官的事情。

那一次会谈我们还特别谈到近东问题，那时候这一地区和现在一样存在着潜在的战争，毛泽东则谈了恢复这一地区和平的一些自己的看法。

记者：毛泽东的性格给您留下什么样的印象呢？

特鲁多：他是一个很庄重、审慎，具有伟大理想的人。

记者：您能谈谈加拿大人民是怎样看待毛泽东的吗？

特鲁多：加拿大人是知道毛泽东这个人的，现在中加关系不错。从前，由于冷战的原因，加拿大人对毛泽东的看法可分为两种：一种认为，毛泽东是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所以他不是加拿大人的朋友；另一种（包括我）认为毛泽东自信能领导中国人民，就该尊重这一事实。

现在冷战结束了，加拿大人领会到毛泽东是 20 世纪最伟大的领袖之一。

记者：您还能谈谈周恩来吗？

特鲁多：我和周恩来在一起的时间较长。我和他在北京有过一次很长的会谈。他还陪我到上海参观，我们一起看了一场杂技。后来他还陪我去洛阳，在火车上我们几乎谈了一夜。周恩来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在政治方面他有很敏锐的洞察力，他本人人情味很浓，也很开朗。我很欣赏他。

ISBN 7-01-002111-2



9 787010 021119 >

ISBN 7-01-002111-2/A · 209 定价: 16.00 元